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資中筠

CityU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資中筠

CityU

目录

自序
讀書人• 閱讀
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特種煉獄 ——從「梁效」說起
1949年以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總體精神面貌
鼎革之際選擇留下的動機
一方的恩威並施與另一方的自願與被迫
慶賀宗璞九十大壽及《野葫蘆引》終卷出版雙喜
附：細哉文心 ——讀宗璞《南渡記》（摘錄）
當年大學教授是如何維護學府尊嚴的
西南聯合大學教務會議就教育部課程設置諸問題呈常委會函
外交家顧維鈞的幸與不幸 ——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感
外交使節聯名呼籲國內團結
不該被遺忘的歷史人物 ——袁昶烈士
庚子之變清廷向十一國宣戰
平反、追謚、立祠
為權位，還是為社稷生靈，是分歧的核心
「東南互保」之議與李鴻章的鞠躬盡瘁
楊絳先生仙逝感言
正常的現代公民社會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為民請命
中國古代的「士」肩負着為生民立命的責任
近代讀書人作為思想載體站在「救國」的最前沿
改革開放前連保持沉默的權利也沒有
記者和律師仍是高危產業
史學界在新時期的貢獻不應被埋沒
輕薄地諷刺、貶斥前輩知識分子是缺乏起碼的自省力
錢楊二先生是不可複製也無法效顰的特例
周有光文集代序
近代中國各個時期留學生 ——在加拿大一次華人集會上的講話
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到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
八十年代出國潮和移民潮
九十年代以後的變化
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 ——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
源於古代的傳統
西學東漸以後的變化
1949年以後的「政教合一」與頌聖文化的新發展
知識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觀因素
改革開放以後的曲折道路
關於我的履歷
資中筠簡歷（更新至 2019 年）
一代風骨今何在？ ——讀《民國那些人》
宏毅之士，任重道遠 ——悼李慎之

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
袁同禮 ——我國現代圖書館的先驅
黃遵憲的《今別離》詩
「平戎策」與「種樹書」 ——中國讀書人的入世與出世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學生辯論競賽
無韻之離騷 ——太史公筆法小議
啟蒙・教育・愛國
哀清華
啟蒙與愛國 ——在青島海洋大學行遠書院講話
歐洲的啟蒙運動
與中國的關係
同中小學校長談教育 ——在全國優秀中小學校長教育論壇上講話
教育者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
方今教育出了甚麼問題？
自己做學生的經歷
接下來講德、智、體、群、美
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 哪個是手段？
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資治通鑒》的最後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
擺脫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
如何評價蘇聯解體？
告別「打江山，坐江山」思維
花蕊夫人與「男兒」卸甲
教育與啟蒙 ——在「為中國而教」2013 級項目成員培訓班上講話
啟蒙
教育
不同社會教育的目的不同
施教者的目的
1950 年代初中國教育「改革」
教育機會不平等
全社會腐敗最可怕
推薦民國元年的小學課本
百年中國「人」
國家興亡，匹夫無責
為實現「為民喉舌」的神聖職責而努力
民眾知情是民主的基礎
充分的言論自由是輿論監督的保障
美國媒體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
屈從權勢與商業化對媒體的腐蝕
西方媒體對我國的影響和啟示
與師友同遊水木清華 ——《世紀清華》序
愛國的坐標
清華園裏曾讀書
文化• 社會・婦女

從「偽君子、真小人」說到美國種族歧視
科技創新與人類禍福
閑話過敏症
又逢「三八」
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
- 中國人為甚麼要學好中文？
- 個人的經歷
- 文字是思想的載體
- 今人不可能多讀古文，但不可不讀

人性·文化·制度
- 人性
- 文化
- 制度與政治文化
- 妨礙文化繁榮的因素
- 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人性、制度的異化

說真話為甚麼這麼難？
- 寫史者的標杆
- 假消息貽害無窮
- 一句真話的力量

宣揚何種婦女觀？——沉渣泛起之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今天的爭論
- 決不能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革」相提並論
- 「五四」與激進的暴力革命的關係
- 把力量用在革新文化上是否着力點錯了？

文化與制度——雞與蛋的關係？
重建精神的家園——還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男子中心社會的「語境」
五四運動與《列女傳》的聯想

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資中筠

編輯　陳明慧
封面設計　蕭慧敏
排版　劉偉進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444-0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 社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 2020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Plight of China's Intellectuals: From Past to Pres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444-0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自序

應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之約，出一本以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為主的文集。檢點幾十年來與此有關的文字，集結於此。除了直接與讀書人有關的文章外，還有一些間接有關的如愛國、啟蒙、歷史觀、婦女觀等等，以及少量無法分類的雜文，共得四十三篇，這些文章成文的時間跨度近四十年，最早發表於 1980 年，最近的一篇殺青於 2019 年，一部分過去散見於各種報刊，一部分是今年來發於我的微信公號。有幾篇從未發表過。這個跨度剛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和我自己思想陸續解放，取得相對寫作自由的時期相吻合。本書按文章內容大致分為三部分，各部分文章按首發時間以倒序方式編排，從今天回看昨日。

本人以筆耕為業，實際上是半百以後才開始。前半生所寫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為「內部」報告，偶然以他人名義公開發表，也多為應景文章，不值得追認。我筆歸我有已是知命之年。對我這個半生為馴服工具的人說來，發現原來這支筆還能屬於自己，可以這樣來用，是一大解放。前期主要是專業研究的學術著作。在「正業」之外興之所至寫點東西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然是與當時的開放形勢分不開的。開始只是偶一為之，且多為讀書心得，後來逐漸欲罷不能，大量寫作始於九十年代，特別是正式退休之後。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

我本無「倚馬才」，以產量論，留下的文字實在不算多。自 1995 年起陸續出了幾本文集。2011 年重新整理三十年來的文字，出了《資中筠自選集》，按題材分，共得五卷，取名為：

《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我一向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小眾讀物，讀者面不會太廣。

《自選集》受到的讀者歡迎是出乎我意料的。此書一再重印，並被各種書評刊物評為「好書」，還獲了不少獎。自己的文字多一些讀者，當然總是開心的。更令我欣慰的是，這些代表了我的思考、言出於衷的的看法，雖往往與主流宣傳不合，卻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認同，而且是不同年齡段的，包括很多年輕人， 感到吾道不孤。這也許與互聯網的傳播力有關。我沒有開過微博。2015 年之後，在年輕朋友的慫恿下，「與時俱進」地開了微信公號，又得到熱心朋友自告奮勇為之編輯，在上面發表了不少新舊文章。而且關注度日益上升。在文網日益收緊的形勢下，五卷本的《自選集》現已絕版；在微信上發文也阻力重重。但是一息尚存，總不能停止思考，所以每有心得，還是忍不住要寫出來，存之電腦，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本人忝列「知識分子」，自出校門參加工作，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是「思想改造」。馮友蘭先生的東床蔡仲德君曾對馮先生做過精闢的概括，說他一生有三個時期：「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這一概括可以適用於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我本人也

大體適用。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作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後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後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

近幾十年來的思考焦點之一是中國知識分子何以至此，既有主觀的切身經歷，也有客觀的冷靜觀察。2010 年寫成的〈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代表了我到那時為止探索的成果，捋清了兩千年來從傳統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識分子的演變和異同。那篇文章引起的反響也比較大。不過網絡流傳的多是最後一節關於 1949 年以後的情況，並被加上了各種標題。而我更想說明的是從古到今，何以走到這一步。這往往是時下讀者沒有耐心注意的。文中引了韓愈「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句。如今重讀舊文，忽然發現 1980 年發表的第一篇隨筆〈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法小議〉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貴處在於沒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那種精神狀態，並欽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的寫史筆法。說明我自從蒙昧中覺醒以來到如今，第一個不變是對人格獨立的珍惜和追求。現在回憶起來，我那時正處於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撫今思昔、思緒萬端的狀態。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馬遷，於是重讀《史記》，甚至曾起意要為太史公寫一個舞台劇本，連序幕和主要情節都想好了，而且想像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後作罷，以我的才力當然是寫不成的。結果只寫了一篇讀後感。為甚麼想起「臣罪當誅兮……」這句話呢？大約是為當時各種受迫害的人被「落實政策」後一片「感恩」之聲所觸發。由此可見反頌聖、惡迎俗是我的本性，開始並沒有那麼自覺，自己也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想明白了許多問題，卻與開初的朦朧狀態遙相呼應。〈道統〉一文所述中國「士」的精神軌跡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遙望兩千年前，猶有太史公這樣的風骨，再看兩千年後的今天「頌聖」和「迎俗」的態勢， 能不令人唏噓！

在網絡發達的今天，對許多人和事都議論紛紛，我常遇到一些憑道聽途說，對剛逝去的一代知識分子的臧否，脫離時代環境，非黑即白，簡單，甚至粗暴，而對當下的自身又缺乏自省，忍不住有話要說。〈寫在楊絳先生仙逝之際〉和〈知識分子改造的煉獄》，就是回應某些議論而寫。特別是〈煉獄〉一篇， 是最新的作品，因為不可能，也不準備在內地發表，所以遣詞用字更無顧忌，盡可能把道理講透。當然，是否真講透了，也還有待識者進一步拾遺補闕。知人論世，個人見仁見智，這只是本人一己之見，爭議是免不了的。

近年來，有不少差不多同齡的舊雨新交都表示與我有共鳴。儘管經歷不盡相同，而還原底色卻有相似之處。也許因為我們青少年時受過同樣的道德文章的薰陶（與後來各自的專業和道路無關），有比較強烈的正義感，當時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已讓我們覺得不可容忍，嚮往美好、公平、正義的新社會，而且也曾經多次為之升起希望，所以對於方今現

實與當初理想的鮮明對比感受特別敏銳。至於當年的「士林」風尚比之今日，只能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我由於多年來工作和專業的關係，對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對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興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歷史觀，也畫出自己看待中外歷史的坐標。我心目中的「人」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而不是籠統抽象、集體的「人民」，或「X 國人」。因此，近年來日益強烈地感覺到我國人在「愛國」的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國族主義（我現在覺得稱「國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恰當）恰好是民族振興之大礙。而某些媒體片面宣傳的誤導和煽動害人匪淺。本書中心主題是與知識分子有關，因此舊文多選自《自選集》中的《士人風骨》卷。另外特別選入了一篇關於科學與人類的文章，代表了我多年來對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科技對人類帶來的禍福的憂思。在這亂哄哄的世界，各國掌權的政治家何時能超出狹隘、自私、短視的慣性思維，扭轉損人利己（或不利己）的行為模式，在操縱威力無比的「硬實力」、「軟實力」時，以黎民百姓、人類前途為念？大國、強國責任更為重大，他們，或者我們大家，能有這個覺悟，負得起這個責任嗎？我常以「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自嘲，人類還有一千歲嗎？

讀書人• 閱讀

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特種煉獄

——從「梁效」說起

今人提起「梁效」[1]，予以貶斥是無爭議的。對於曾與之有關聯的幾位教授，是不可磨滅的劣跡，甚至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軟骨頭」的證明，其中名望最重的背負的罵名也最重。然而，認真追問一下，為甚麼單單是「梁效」？不必查多少資料， 只要翻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歷次「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大躍進」……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大批知名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家）的文章，批判別人和自我批判，以及各種「表態」，言詞之激烈和自虐的程度遠超過「梁效」的文章（後者主要是「批孔」，最後少量「批鄧」，即告壽終正寢）。那麼為甚麼後人單單拎出「梁效」來，甚至有人指責參加者為「失節」？其邏輯大約是把它算在

「四人幫」頭上，於是與之有關的人算是「依附四人幫」，而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則是服膺於正統的領袖和組織。這可能是長期宣傳的效果，事實上哪一次運動不是最高領袖發動的，「批林批孔」當然不例外，那些被招進「梁效」的大小筆桿子難道當時會認為這不是聽命於最高領袖？再者，他們有選擇參加或不參加的權利嗎？

筆者無意為知識分子在某一時間段不光彩的表現辯護。只是作為那段歷史的見證者，趁着記憶猶新，儘量梳理一番主客觀情景，以助後人對一段歷史及一代人的理解，同時能以史為鑒，認識今天，如果有所啟迪，可多一分真誠的自省。

1949年以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總體精神面貌

關於兩千年來中國「士」的精神傳統的形成和變遷，在本書另一篇〈中國知識分子道統的傳承與失落〉一文中已經詳述， 此處對後期的情況略作補充。

經過西學東漸，受了現代文明洗禮，而又承載了傳統文化的一代知識分子，在近百年的內憂外患中，大體上共同的追求就是：振興中華、國泰民安、學有所用。大部分都有留學的經歷，有了參照系 ——希望把國家建設成甚麼樣。基本上認同民主、自由、平等。同時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有強國夢，把國家置於個人利害之上。特別是經歷了艱苦卓絕的

八年抗日戰爭，這種精神表現得最充分。西南聯大人的許多故事現在盡人皆知。只舉一例：教育部曾企圖給擔任行政職務的一部分教授

（校長、院長、系主任等）適當的津貼，以補償其額外的辛勞。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帶頭聯名拒絕接受津貼。須知那是在生活極端艱苦，食不果腹的境遇下，而且這些教授主要還是擔任教學任務，著述不輟，並非現在「脫產」的各級學官，行政工作的確是額外負擔。其難能可貴也在於此。「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幾代知識分子的座右銘。在那種艱險之中，民族文脈得以保持下來，今天回顧，倍感這一批精英的歷史功績和精神的可貴。

另外，當時的知識精英所代表的主流價值觀，是追求民主，反對專制，更痛恨腐敗。所以在四十年代末，多數都對國民政府失望。至於中國向何處去，有左中右不同的政見，也是自己的選擇。

差不多同一批人，為甚麼當時如此，後來又如彼呢？

鼎革之際選擇留下的動機

中國歷史上每當改朝換代，士人就面臨糾結，在傳統智慧中也有兩種說法：或誓死不做「貳臣」；或「識時務者為俊傑」。但是到了民國時期，國家已不等同於皇朝，去留早已不是「忠君」的問題，而有諸多因素。多數知識分子選擇留，大致有以下幾種心態：

（1）　熱土難離，好容易抗戰勝利了，自己又要流亡，是難以接受的。特別是看到俄國革命後「白俄」的處境， 不願做「白華」，是當時比較流行的說法。

（2）　對舊政權完全失望，認為換誰都比那個政府強。

（3）　中共當時正需要團結最廣泛的多數，特別是有社會地位、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統戰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重點宣傳的是「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他們可以接受。

（4）　自以為沒有在舊政府中做官，是獨立的，自己的知識總是可以在任何政權下為中國人民服務（這是很普遍的想法）。

（5）　戰後整個國際思潮是左傾，除了美國之外，不同程度的左傾思潮在歐洲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中佔主流地位。像約里奧——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這樣的諾獎科學家、畢加索（Picasso）這樣的頂級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就可見一斑。由於反法西斯戰爭之故，蘇聯的威信還相當高。這一國際背景不可忽視。

一方的恩威並施與另一方的自願與被迫

每一代新朝開始都有一番新氣象。最初的三年恢復期，從滿目蒼夷的戰亂中安定下來，如脫韁之馬的惡性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生活秩序恢

復正常，成績顯著。提出的口號是：獨立、統一、民主、富強、和平，這是國人嚮往已久的，當然衷心擁護。進入大城市後的「三斧頭」：平抑物價、掃蕩毒品、改造妓女，使人感到歷屆政府做不到的事，新政府能做到。

領導人的禮賢下士姿態做足，豈止三顧茅廬！例如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以年老為由，不願到北平參加政協會議，新任上海市長陳毅出面敦請還不夠，陳雲以原來商務老同事之誼登門遊說，終於說服其北上；黃炎培起初不願就任副總理，毛澤東親自邀見多次，懇求「幫幫我」；陳毅到上海就任市長，第一個提出要見的就是書法家沈尹默；陳到杭州還去拜訪馬一浮， 據說當時馬正在睡午覺，陳令人不要打攪他，竟在樓外等了一小時（時間究竟多長，姑從傳說），堪與程門立雪比美；熊十力在北方住不慣，要到上海定居，提出住房的種種條件，當局盡力予以滿足。還有陳寅恪，人們都津津樂道他堅持不進京、不學馬列，保持獨立人格的傲骨，但是這需要當局的容忍。筆者在改革開放以後到中山大學訪問陳的故居，是幽靜的小院內一所平房，陪同者專門指出屋門口一條通向大門顯眼的白色水泥路，說是當年主政廣東的陶鑄指示為照顧陳先生目力不佳，特意為他鋪這樣一條便於辨認的路。足見在開始需要「爭取」時， 可以做到這樣周到。

所有這一切，只能說是「好景不長」，但並不是突變，而是曲折的漸變，而且因人而異。從 1951 年大規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開始，到「文革」的十幾年間的政治運動是波浪型的，有張有弛，「恩威並施」，每次都宣佈打擊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其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以教育為主」，正如楊絳在一篇文章中所說，這促使人人都爭當那百分之九十五，以免於落入百分之五。另外還有「給出路」的說法，前期遭打擊的對象， 根據個人認罪表現，以觀後效，運動後期還有「落實政策」的希望。實際上幾乎每年都有「運動」：批《武訓傳》、「三反五反」、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等等。在這些運動中大批稍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都被捲入，必須公開表態、「站隊」。

在這之後，1956 年忽然出現小陽春，周恩來做「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被發展入黨，科學、教育界被要求制定十年發展規劃，提出「向科學進軍」。給人的印象是政治運動已經過去，知識分子經過改造已被接受，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這是當時常用的詞），全心全意投入業務工作。接着就是「雙百方針」的提出，傳達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凡是當時聽過傳達的都發現後來正式發表的版本與最初聽到的有所不同），其中明確肯定「疾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還放映 1949 年以前的某些舊電影，周璇的歌在青年人中流行傳唱。甚至還提倡婦女穿「花衣服」，打破千篇一律的藍制服。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破天荒地舉行了「布拉吉」（俄語連衣裙）展覽，各單位組織女員工去參觀提意見。小商販和私營小店被允許存在，一些著名的傳統風味餐館不但繼續營業，還往往得到高級領導人的光顧。在這種形勢下，全國舉行「大鳴大放」，要求各界「幫助黨整風」。明確保證「言者無罪」。特別是團中央專門佈置各級團支部組織團內外青年學習「娜斯佳精神」[2]，動員青年大膽給領導提意

見，反對官僚主義。如此這般，大小老少知識分子怎能不歡欣鼓舞，舉雙手擁抱「新中國的春天」？無論是從「明君」納諫的角度，還是從開放言論實行民主的角度，都符合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貫嚮往。除了極少數政治閱歷豐富，城府特別深的人有所保留外， 大多毫更不設防，盡入彀中。

以後風雲突變，一切都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言者都獲罪，自不必贅言。再後來，螺絲越擰越緊，不論自願與否，已無退路，直到「文革」遭「横掃」……這一套收放自如的手法，繼承了有千年積累的中國帝王剛柔並濟的統治術，再加以從外面引進的現代極權理論和制度，為古今中外所獨有。的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難望項背，史太林（Joseph Stalin） 則只知鎮壓，不知懷柔和「改造」。

被改造的另一方

第一課是學習《社會發展史》，接受「唯物主義歷史觀」， 承認勞動創造世界，說明猴子變人是從前肢發展成手開始，所以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由勞動發展出來的雙手。根據這一理論，大腦發達似乎不在人與獸的區別之列，因此腦力勞動不算勞動，據此，確立「階級觀點」，「勞心者」就是剝削階級， 而況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受高等教育者大多出身不是工農家庭。從這一命題出發，所有知識分子都有原罪。這與基督教眾生平等的原罪不同，承認了人以階級分敵我的原則，落入「敵」方就可能萬劫不復，很恐怖。但又有「改造」的可能。接下來否定自己、否定同儕，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前面提到，在這一切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前提，就是歷史潮流與國家利益。這是道義的制高點。個人思想問題是與帝國主義相聯繫的。1949 年美國國務院發佈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在附致總統函中提到寄希望於中國人的「個人主義與民主再抬頭」（the reasser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democracy），遭到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幾篇文章迎頭痛擊，其中不知是翻譯之誤還是有意歪曲，「個人主義和民主」變成了「民主個人主義者」，加了「者」字，就變成了某種人，「reassertion」譯作「再顯身手」。這樣性質就變了，由抽象的命題變成了具體的人的行為，於是，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者就是艾奇遜寄託希望的人，也就等同於帝國主義代理人，一句

「帝國主義正向你們招手呢」！嚇得一大群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知名學者爭先恐後紛紛表態，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與之劃清界限。

「反右」應該是一個節點，以後一浪高過一浪。如果說在以前還留有餘地、有所區別的話，到「文革」就一網打盡，全部斯文掃地，實現了在一切領域專政，包括最私密的生活，包括做夢（筆者親自聽到「文革」中進駐本單位的軍代表訓話稱： 做夢也有階級性）。

幾個典型事例

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有不少關於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筆者所見就有謝泳、傅國涌、陳徒手、楊奎松等學人的作品，還有他們的遭遇和事跡在網絡流傳甚廣。本文僅就親身體驗，舉例說明自己的一得之見，並非學術研究，也不是對人物的全面評論。所舉人物都是我敬重的前輩，這裏只是客觀地以他們的遭遇說明一段特殊的歷史，無所褒貶。這是需要事先說明的。

當局對知識分子總體的態度，顯然理工科與社科人文界是有所區別的。這與高校院系調整大力發展工科，壓縮文、理，基本取消社會科學是一個思路。到「文革」中，領袖曾有廢除大學之想，但「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這當然是從實用出發，只要物質生產，精神則靠一個人就夠了。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然科學不懂不能裝懂，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或是化學方程式，沒有學過就如天書一般。而文科（廣義的）許多學問， 貌似常識，誰都可以說幾句。而且表達離不開思想，思想必須定於一尊，連歷史事實都以一人的是非為是非，根本不能「研究」。所以「反右」時落馬的以人文社科領域的居多。但是理工科的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本能地尊重科學，到次年「大躍進」時，對種種違反科學常識之事無法接受，特別是直接關係到生產，稍有責任感就難保持沉默，所以 58 年以後，理工科的知識分子也難逃一劫。

對於文科知識分子也還有區別對待。今略舉幾個典型例子：

陳寅恪

前面提到他一開始就拒絕入京，拒絕學馬列，恪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如果不受到特殊的優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人能效尤嗎？他的特殊性何在？據說史太林曾向毛問起陳寅恪，使毛對他另眼相看。也許由於陳會突厥文，研究突厥史，引起俄國人的注意。毛是否從史太林才知道陳寅恪， 沒有考證。不過筆者直接從一位清華同班同學中聽到過的故事應該屬實：這位同學在 1948 年時已參加地下黨，她奉組織之命，特意與陳寅恪的女兒住同一宿舍（她是外文系，陳是歷史系，一般分宿舍是按系分配的，所以需要特意安排），任務是努力與她建立感情，爭取她認同，以便通過她影響其「國寶級」的父親留在大陸。那位同學說，第一次聽到人有被稱為「國寶」的，感到很新奇。足見在北平易幟前，陳寅恪已經在需要爭取的特殊人物的名單上。至於我那位同學對他女兒的爭取工作是否有效，陳以後決定留下，是否有他女兒的影響，不得而知。比較可靠的說法是說服陳留在大陸起決定作用的是當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因而 1948 年底陳在猶豫不決中離清華南下， 又從南京到上海，見到陳序經，接受陳的勸說留下，即應聘到廣東嶺南大學任教，1952 年院系調整後在中山大學任教，陳序經任副校長，對陳呵護有加。陳序經爭取陳寅恪事得到周恩來嘉許，告訴陶鑄。

陶鑄本人也是比較有文化，對讀書人有所尊重，所以直到「文革」前，陳還能安然渡過歷次運動，並埋頭自己的著述。這是他的幸運。到「文革」就失去庇護，慘遭折磨，於 1969 年去世。

我個人認為還有一層緣由，與陳寅恪的專業有關，他的學問冷僻而高深莫測，懂的人很少。其著作與現實政治意識形態似乎關係不大，他也極少發表與現實有關的意見，因而最高領導能放過他。他明智地選擇留在廣東，實際上雖受優待卻並不在中樞的視野之內，少一些干擾和麻煩。其他專業就有所不同，無法逃避。法律作為學科，是首當其衝必須徹底改造甚至消滅的。在院系調整中，法律系、政治學系都被取消，法學專家教授在「反右」中一律落馬，幾乎無一倖免，不論是否有言論。例如功勳卓著的國際法專家梅汝璈，曾參加審判戰犯的國際遠東法庭，維護正義，爭取依法懲辦日本戰犯，為中國人民爭取公道作出傑出貢獻，初期也曾受到一定的待遇，「反右」中照樣在劫難逃。他最後自歎如一塊舊抹布，用過就被扔掉了。至於歷史、哲學，已經自成一家有宏觀體系的，如雷海宗、馮友蘭、金岳霖等等，必須徹底批判、否定，因為這種「通古今之變」之學，都被認為有「階級性」，只有最高領袖、導師有資格做，只能有一個權威。容不得探討，其他「學術權威」當然在被打倒之列。

梁漱溟

與毛澤東公開爭論的事跡流傳甚廣，在人們心目中是剛正的典型。他對中國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始終不變。

事實上，這些人物的命運都在領袖掌心之中，座上客或是階下囚，只憑一句話。梁的學說在五十年代初期受過一些批判，以後除了「文革」中無例外地被紅衛兵抄家、搶劫外，基本上未有大起大落。反右倖免於難。他與毛爭論是 1953 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他是政府委員。另外，從第一屆起，連任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其中兩屆是常委。梁與中共的關係不一般，其「諍友」地位是歷史造成的。在二戰後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調停、國共談判中的故事眾所周知，此處不贅。新政權成立後，毛與周一再敦請他才從重慶到北京來參政，毛還多次以老友相見，親切晤談、共餐。所以到 1953 年那次爭論時，他還以這一層淵源，敢於當面直言。從另一個角度看，毛之對他當面痛罵，幾至失態，也還算是相對「平等」的，他人無此「榮幸」。以後其他人再無此種面折廷爭的機會。不必「欽點」，下面領會精神，直接打成「右派」或在其他運動中按個罪名，是平常事。公眾也就習以為常了。以上是講客觀條件。從主觀方面來講，梁漱溟為人耿直坦蕩是一貫的。他對毛的崇敬也始終如一。晚年提起那場爭吵，還曾表示自己態度也欠妥，沒有顧及領袖面子。另外，他尊孔觀點始終不變，在「批林批孔」中表示同意批林不同意批孔，當局也似未逼迫他。他至死對毛欽佩，也從不諱言。

雷海宗

論學問，為史學一代宗師；論愛國，在四十年代抗戰最艱苦時，有機會赴美講學（是中國政府與美方達成的學術交流項目，不止他一人），卻以國家和清華當時需要他為由，力辭不就，連梅校長和胡適等勸導也不為所動。須知當時教授們已經到了無米下炊的地步，這個項目也正是有改善這批最寶貴的人才的生活作用。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他的確有強烈的愛國心，乃至曾倡導「國家至上」。在中共這邊，他一直被列入

「反動」。一則因為他參加過國民黨，而且夠一定級別。更重要是他有一套歷史觀，自己建立一套宏大格局，與「歷史唯物主義」格格不入。在學術思想上不能見容，甚至被認為有法西斯傾向。他也是蔣介石要搶運的特殊人才，但還是選擇留下。

他不僅是思想改造的對象，還是「肅反」運動對象。1950 年被登記為「反動黨團分子」，受「管制」一年。他當然努力改造，兩次參加「土改」，朝鮮戰爭開始後，在報刊寫文章批判羅馬天主教廷和美帝國主義。1951 年解除管制，作為「內控」使用。解除清華歷史系主任職務，還保留教職。教授思想改造運動中當然是重點之一。被自稱受毒害的學生當眾指着鼻子痛斥。1952 年院系調整，他被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這種做法略相當於過去的貶出京城，被貶出京的不止他一人，據說是為削弱這些政治思想有問題的人物的學術影響力。南開大學反而因此受益，後來在一個時期內成為歷史學重鎮。當然還有其他教授，不過雷海宗奠基之功不可沒。日後他的學生或曾與他共事的青年教師提起來都敬佩有加。

儘管有此經歷，他仍然不減書生氣，在「鳴放」中侃侃而談，發表自己對社會科學應趕上世界新發展的看法。被捕蛇者抓個正着，雖然已經出京，其言論卻報到北京，是中央點名的「右派」。自此以後，他健康狀況急轉直下。1961 年被摘除右派帽子，獲准重上講台。他抱病堅持了一年，到 1962 年以 60歲盛年去世。

這樣他沒有活到「文革」，也逃過了以後幾年的折騰。當然更無須對「批孔」表態。

馮友蘭

名氣最大、經歷最曲折、最坎坷，爭議也隨之。

作為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馮是中國學術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同時他也是教育家。其早期關於教育的著作有許多真知灼見，基本上與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等教育家的思想一致

（詳見《馮友蘭論教育》一書）。總之他主張教育獨立、思想自由，他撰寫的《西南聯大碑文》稱「（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

獲民主堡壘之稱號」；他撰寫的對清華歷史的回顧，稱其成立是「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應，是融合中西新舊的成功」， 這兩句正是他所追求的教育目標。

另外他並非完全埋首書齋，還擔任行政領導，幾次受命於危難之中。例如 1930 年羅家倫辭去清華校長之職後，在空檔中代校長維持一年。他在抗戰前後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達十三年，繼基本上以研究舊學為主的國學研究所之後，建立起學科多樣、不拘一格的名師雲集的文學院，貫徹其「融合中西新舊」的宗旨，培養出眾多人才，這方面成績不可謂不顯著。抗戰勝利後，曾帶頭抗議軍政當局侵害學生反內戰的集會自由，在清華也曾掩護過在黑名單上遭追捕的左派學生。1948 年底梅貽琦校長臨走前指定他負責維持清華。這是幾乎不可完成的任務。他在最艱難的城內外隔絕、政權真空時期竭盡全力維持了近一個月，直到移交給解放軍軍管會。這一個月不但有炮彈之險， 還斷了財政來源，左支右絀，勉強發糧餉，應付師生員工的各種不滿。軍管會進駐後即被撤換，改為由周培源、葉企孫、吳晗組成的教務委員會負責。

他 1948 年原在美國講學，在北平易幟前夕特意中斷訪問趕回，是自己的決定，並未受「爭取」。以他的學術威望，當然是新政權的統戰對象，但是一開始就沒有獲得陳寅恪那樣的優遇。與梁漱溟相比，顯然親疏地位不同。在「左、中、右」排隊中，他被列為「右」。蔡仲德編的《馮友蘭年譜》和陳徒手根據檔案資料的力作《故國人民有所思》關於馮友蘭一章，都生動地說明他在每一場風波中被拋上拋下的尷尬處境，正是「恩威並施」手法最典型的承受者。以下所述有些是本人見聞，有些取材於這兩本書。

1949 年軍管會接管清華，任命新的領導班子，馮即主動辭去包括文學院長在內的一切行政職務，並且提出離開清華， 不再教學，到研究機關工作。當時的「高教委」批示是：「馮友蘭、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義任職，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據此，一開始就已定性為「反動」。從此他總是處於惶惶不安之中，不斷自我檢討，而同時遇事還得「表態」。1949 年10 月，新中國建立伊始，他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做一個總「表態」，要改正過去的錯誤觀點，學習馬克思主義，用五年時間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的回信語氣居高臨下，要他慢慢來， 最後一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顯然是不信任他，說明不是一次總表態就可以過關。從此馮進入漫長的自我否定過程。1951 年教授思想改造運動是第一次高潮，馮是重點之一， 大會小會檢討多次難以過關，一次比一次給自己上綱高。先生在台上檢討，師母在下面抹淚。1952 年「三反五反」重點是工商界，但是大教授們也得檢討，馮還是一次次難以過關，曾與金岳霖抱頭痛哭。

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受到「重用」和優待，除教學任務外還有許多社會活動。不少場面上的活動有他的身影，曝光率相當高。院系調整後，他被聘為一級教授，月薪加研究津貼達445 元（在當時絕對是高薪），1951 年即參加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並接受新德里大學名譽博士學位（這當然事先需要中方批准的），後來還多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作為河南籍人士，曾任第一屆河南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為主席團

成員。後任過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7 年 3 月，已是「鳴放」末期，馮參加政協會議期間， 在某次會議與毛澤東分在一個組，散會時，毛拉着他的手說：

「好好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嚒，你寫的東西我都看。」於是他在政協會上發言批評對「雙百方針」的懷疑論，此講話刊於《人民日報》。4　月，毛請吃飯，有馮友蘭、金岳霖、賀麟、胡繩等人。此時那些老教師們對於即將來到的突變還蒙在鼓裏，馮又寫《新風氣和新努力》，發表在《人民日報》。5　　月，風向陡變，「反右」開始，「百家」之說收回，變為「只有兩家」。馮當然代表資產階級那一家。他匆匆表態後，剛好有早已決定的出國任務，到波蘭和蘇聯逗留一個多月，也許因此他

「鳴放」言論不多，僥倖未打成「右派」。哲學系老教授雲集， 而戴右派帽子的只有張岱年一人。後來陸平接任校長還據此批評前校長江隆基嚴重右傾，在鳴放中「引蛇出洞」不力，留下

「隱患」。高層也不滿，說「馮友蘭他們從鬥爭中學到了經驗， 看形勢辦事，鬥一鬥，就縮一縮，因而不易抓到他們右派的證據」。不過馮在這期間還是忍不住提出了他的（對傳統）「抽象繼承論」，以後這一論點一直是批判的靶子。對他的大小規模的批判從未間斷，而馮對自己這一創造似乎比較珍惜，與多數情況下逆來順受的態度不同，常常為之辯解。

不斷檢討的同時，他的教學與學術活動仍然繼續，還常發表與哲學史有關的文章。五十年代前期還有與同行討論和商榷的餘地，後來的文章就只有視各種運動的需要不斷自我批判，　　兼批判他人了。他永遠是「唯心主義」代表人物，能否對馮友蘭及其「錯誤思想」展開有效的鬥爭，成為衡量哲學系黨組織

「戰鬥力」的標準之一。高層在內部講話中對馮用詞相當刻薄。康生說他懂甚麼哲學，只不過是「語言的詭辯」。連馮友蘭學識淵博、得「活字典」之名，都不能容忍，被看作是負面、有害的東西。他每發表一學術觀點，就召來眾人習慣性的炮轟，他的學術訓練方法，指定必讀的經典著作，也遭非議。青年學生對他很不尊重，往往頤指氣使。

到「大躍進」導致大饑荒之時，高層忙於解困，顧不上思想批判，需要安定民心，已達極左的鐘擺略有回擺，對知識分子做些安撫工作，又要聽他們的意見了。這期間馮稍稍大膽吐露一些心曲。在一次會上表示自我感覺是動輒得咎，不知所措，對學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感到「現在的教師相當於過去皇帝的侍讀」。這種感覺絕不止他一人。這還是在 1961 年，

相對寬鬆的年份。到 1972 年「復課鬧革命」，大學教師與工農兵學員的關係比「侍讀」有過之無不及。

「文革」風暴起，挨鬥、抄家、交代、檢討、關牛棚……這是共同的。馮的特殊性還在於其在恩威並施中過山車式的起伏。兩次生病境遇

的鮮明對比是絕好的例證。1967 年馮的前列腺需做手術，因「牛鬼蛇神」身份拖延了住院，釀成尿毒癥， 先在醫院急救插了導尿管，隨即掛着瓶子登台接受大會批鬥； 後來因病情加劇好不容易被批准做第二次手術後，傷口未癒， 又被趕出醫院。不久工宣隊進駐，被隔離審查，關進集體牛棚，席地睡稻草，繼續接受批鬥，同時不斷寫交代，並遵命寫各種人的材料。此時他已年逾古稀，若不是形勢忽然變化，生死難料。到 1973 年又一次生病住院，境遇與前次大不相同。不但順利住進醫院，還有當時的「文革」紅人謝靜宜來探望，轉達江青的問候，然後立即要他寫信致謝。於是他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對老年知識分子的關懷，由校黨委轉江青，這就是後來流傳他寫「效忠信」的由來。傷口未癒掛着導尿瓶挨鬥，在牛棚中九死一生，與住在舒適的病房接受最高領袖的眷顧、問候（可以想見，在那種情況下，醫院一定不敢怠慢），無論肉體還是精神，對身受者何啻天壤之別，何況當時還是在那樣的個人崇拜的氣氛中。

發生這一變化的契機是，高校運動中不斷有教師被迫害致死，包括 1968 年底翦伯贊自殺，於是領袖又發話要對資產階級學者「給出路」，馮及其他一些人遂被放回家，稍稍過正常人生活。隨即為準備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包括謝冰心、費孝通等一批知名知識分子被「解放」，因為尼克松訪華需要撐門面；記者要採訪；中美解凍後，不少隔絕多年的旅美人物首次回國探親，需要見故舊；洋人也會慕名求見。馮的境遇從而顯著改善，被佔領的住房返回了一半，周恩來迎送尼克松的國宴都應邀參加，還參加一些其他的外事活動。隔絕多年的大兒子也初次回國與家人團聚。這期間心情愉快，又感到沐浴陽光了，寫下不少歌頌的詩。他將其中一首送毛澤東，毛收到後派謝靜宜來致問候。馮又賦詩一首，最後一句，「朽株也要綠成蔭」，大約是當時的真實心情，認為自己枯木逢春，學問又可以見用了。

不久，「批林批孔」開始，第一批宣傳小冊子中，馮又被點名列入尊孔的反動學者，再一次陷入「戴罪立功」的境地。於是他又一面批判自己，一面開始寫批孔文章。他的兩篇批孔文章先刊於《北大學報》，立即受到毛澤東的關注，親自審批，幾家黨報同時刊載。在此之前，北大清華兩校成立大批判組，把馮及其他幾位教授列入「顧問」。這就是與「梁效」發生關係的由來。直到 1976 年 8 月，唐山地震後毛去世前不久，江青忽然於晚上十點鐘高調到北大探望馮友蘭，在地震棚中已經入睡的老人被喚醒起來倉促「迎駕」。同時北大高音喇叭廣播，外面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事後，校黨委又要馮寫「感想」。馮寫詩感謝「主席關懷」。毛澤東去世當晚，《人民日報》即來催稿，要求寫悼念文章，必須於次日四時前交稿，說毛「對先生關心」云云，北大黨委也幫着催，於是趕出一文刊於隔日《人民日報》。

「四人幫」打倒後，舉國歡呼雀躍，對多數知識分子來說， 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結束了無休止的自我批判的折磨。但是由於以上種種，馮又成為批判對象，除「梁效」外，地震棚中與江青合影是一大罪狀，被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關係； 停發了為他抄稿的助手的工資（他目力已經衰退，靠口述寫作），國外邀請他參加學術會議，校方要

他婉拒；學術刊物和北大校園大字報批他為「江青的馬前卒」等等，帽子不一而足。他又陷入一遍一遍地寫檢查，「提高認識」。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時的檢查還是着重說自己沒有意識到毛主席對江青等人的批評，總認為他們代表毛 ——把四人與一人區分開，是當時的口徑，也可能是他真實的想法。實際上這個口徑至今在主流宣傳中沒有變。

大約 1980 年左右，也就是 85 歲以後，馮友蘭終於結束檢討生涯，過上安定的生活，有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得以在 95 歲去世之前，完成他的煌煌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終於擺脫了定於一尊的思想，在《新編》的最後一卷中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剖析，有所批判，卻因此第七卷的出版遇到重重阻力。

本文對馮友蘭的情況寫得較為詳細，因為其複雜而典型， 與那一段荒唐的歷史環環相扣；還因為手頭正好資料比較多， 特別是《年譜》和《故國》兩本書，內容客觀、翔實可靠，是本文的重要參考。在梳理這段歷史的過程中，不禁感慨萬千。試設身處地想，一個以思想為業的人，經歷這樣的肉體和精神來回「折騰」，需要多堅強的神經才能維持正常思維和清醒的頭腦？《故國》關於馮友蘭的一章最後說：「細細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過那樣幾十年的暗淡歲月，大師確實不易。」

我還想起曾讀到過一篇回憶侯仁之院士的文章，其中提到「批林批孔」中撰寫了大量批孔著作而一度走紅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侯一向與楊觀點不同，對他不以為然。但是當文章作者在對楊有所貶抑時，侯對他說，楊在《文革》初期曾被造反派套上黑頭套暴打，幾乎丟掉性命。對於有過這樣經歷的人不應過多指責。（手頭沒有那張報紙，可能記憶不準確，但大意如此）。這表現了同代人的理解和侯老的寬厚。有些人早早地「迫害致死」了，也許是一種解脫。而忍辱活下去如太史公，也是一種選擇。馮先生最終還有機會完成他的巨作，了卻心願，還算是善終的。

馮友蘭的經歷有一定的共性，前面已經講到。也有他的特殊性。從客觀處境來講，由於他已經有的聲望和地位，一直是在漩渦中心，「恩」與「威」都不會放過他。也許他後期最好消極一些，有些詩文不必寫。這就是他後來自己反思所說的， 未能「修辭立其誠」，有嘩眾取寵之意。但是總的說來，旁人也許可以消極隱退，淡出視野，他是不可能被容許的。正如《故國》一書所說：「在政治風暴眼中，馮友蘭是無處遁藏，無一是處。」從主觀上說，竊以為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有柔、有剛， 與梁漱溟之剛直相比，馮柔的一面居多。我不研究「馮學」，不敢妄評，但憑粗淺的印象，感到馮在學術上也是妥協性較多， 他一生追求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國走進現代的大文化。一直在新舊之間設法融合、妥協。提出「新儒學」、「舊邦新命」、「抽象繼承」，都代表這一努力。後來又力圖把馬克思的理論揉進自己原來的思想體系。最後的《新編》序言中說此書是完全恢復獨立思考之作，而同時還表示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另外，與陳寅恪相比，可能他經世致用的傾向強一些，總是希望「朽株也要綠城蔭」。當然這是個人的揣測，不一定準確。

這個政權的特殊處是基本上政教合一，一位以哲學思想安身立命的學者，既然選擇了認同這個政權，那麼不論是被迫， 還是主動，總要設法與這個「教」妥協，這也許足以解釋很多文史類知識分子的言行。

蔡仲德在《年譜》後記中概括馮友蘭的一生三段是「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十分精闢，我曾多次引用，認為不止馮一人，而是普遍適用於一代或兩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只不過「失落」時間有長短，「回歸」有先後。說也可憐， 那時的老先生們儘管學富五車，而且還有出國開會的機會，但是對現實的了解還不如尋常百姓。到「文革」後期，已經小道消息滿天飛，我輩小人物常常竊竊私語交換各種後來證明是事實的「反動謠言」，而老先生們不論處於座上客還是階下囚，是接觸不到的，他們還只能靠官方的「傳達」。所以他們在「迷失」中覺悟也較晚。還有些人始終沒有完全覺悟。

今日如何？

關於當前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中青年，筆者在 2010 年發表的〈道統〉一文最後部分以及〈楊絳先生仙逝感言〉中有較詳細的論述。現在基本沒有改變看法。總的說來，現在的客觀環境與那時已大不相同。不論還有多少禁錮、壓制，包括文字獄，但還是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論空間，有自主選擇的餘地。單就獲取信息而言，互聯網時代與那時的閉塞不可同日而語。加之經過三十多年的解放思想（儘管遠不徹底），那個時代的迷信，現在應該早已打破。官媒雖然仍是定於一尊，民間的眾聲喧嘩是刪不盡、壓不住的，誰再想召回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 恐怕難以做到。本文不厭其煩地講述前輩的處境與遭遇，只是想多披露一些真實的歷史細節，幫助後世了解那一代人的苦難和所受的煎熬。相比之下，做到「修辭立其誠」，現在的風險要小得多。至少保持沉默，不「逢君之惡」、助紂為虐是可以做到的。可以說有一點有限的「消極自由」。

不過對於這點「消極自由」，很多人並不珍惜。就以 2012 年百位作家抄《講話》之舉為例。發起者出於甚麼考慮，姑存不論。居然有這麼多名噪一時的作家順從。我不由得想起「梁效」。二者的源頭是同一權威、同一思路。在本質上，《講話》對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的殘害規模要比「梁效」大得多。前者是頭，後者是尾。如果沒有與改革開放同時的思想解放，連帶打破那個《講話》的枷鎖，何來這幾十年湧現出的優秀作品和作家？是否必須「抄」？也許存在某種無形的壓力，但是個別作家拒絕了，也未見有何後果。這在「梁效」時代是不可想像的。應該說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人格（哪怕是「一定程度」），今天要比那個時代需要付出的代價小得多。也許對抄《講話》一事還可有不同的說詞，那些無可辯駁、更加不堪的言行，就不必說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哀樂，筆者不想對當代知識分子

（廣義的）提出甚麼要求。只是在臧否前輩時，可否先設身處地捫心自問。至少他們在抗戰最艱苦的年月，對民族文脈的存續是作出貢獻的。當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用腳投票，再無所謂「白華」之說，也

不必像前輩那樣以家國為懷，雖九死其猶未悔。但是十幾億人的大多數只能留在本土。凡事不進則退， 就是那點有限的「消極自由」也來之不易，如不努力推進，隨時有失去的危險。維護已有的，爭取更好的，努力阻止向「梁效」那個時代倒退的潮流，使不絕如縷的文脈免遭沉淪，只能取決於正當盛年的當代讀書人。

2019 年

慶賀宗璞九十大壽及《野葫蘆引》終卷出版雙喜

宗璞今年九十整了！驚回首，我與她相識、相交已整整七十年。9 月 9 日，參加了她的祝壽慶典，這是一次形式上別開生面，實質上意義非凡的壽宴。

這次活動由宗璞好友名作家張抗抗主持。共有五桌，以「界」分：1 桌，作家和文學；2 桌，同學同事；3 桌，音樂（宗璞已故夫君蔡仲德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4、5 桌，家人、親戚。我被排在「同學桌」，緊挨着宗璞。這一桌主要是她西南聯大附中和清華的同學，還有原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學專家朱紅。可以想見，在座者都是白髮蒼蒼，垂垂老矣，連互相交談都要大聲嚷嚷，除宗璞外，還有一人也坐輪椅。另外幾桌卻是老中青都有，還包括幾個幼兒園的小朋友，氣氛比較活躍。

除了與會者踴躍發言外，還有餘興，蔡仲德專攻音樂美學，生前深得師生愛戴，學院的領導和幾代學生都來祝賀。開頭由已屆耄耋之年的音樂學院原黨委書記、曾是蔡仲德「患難之交」的陳自明老先生演奏小提琴《聖母頌》與《送別》，然後蔡老師的學生陸續為師母演奏樂器和唱歌。有一位剛從伊朗回來的國際知名揚琴演奏家劉月寧女士演奏楊琴，最後是程乾女士帶着宗璞的外孫亮亮小朋友一同唱黃自的《本事》：「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這是宗璞點的她最愛的歌，也是當年我們在清華時女同學之間最愛唱的歌之一，在這場合聽到，喚起了多少美好的記憶……

可以想見，作為壽星，收到不少鮮花和有意義的禮物。但是我認為最重頭，意義最重大的，是她送給自己的大禮，就是終於完成了《北歸記》，圓滿結束了煌煌四卷的《野葫蘆引》。我有幸先睹香港版的完整全書，包括末卷《接引葫蘆》，這幾天胸中感觸洶湧澎湃，就是帶着這種心情赴會，這些感觸就成為我的祝壽詞。

已經多少年沒有看書落淚了，看《北歸記》、《末卷》卻看得涕泗滂沱。第一個感覺是震撼，沒有想到宗璞多年來疾病纏身，以衰病之軀斷斷續續寫了十年，竟然有這樣集中爆發的力度，有這樣充沛的感情。一路讀來，感受到作者心中的熱血， 與年齡和體力不相稱。書中眾多鮮活的人物已伴隨着四卷走過悠長的人生，經歷了時代的跌宕起伏。宗璞向來主張作家應該寫自己熟悉的事物，這些人物、情景正是她最熟悉，體驗最深刻的。作者筆底春秋，自有自己的褒貶，前幾集中有通常意義上的「反面人物」，已經交代過。這一集留下的大多數人物劫後餘生，更有共患難之誼。看得出作者對他們懷有深厚的感情， 有景仰、有柔情、有欣賞，還有對幼小者的寵愛。但是卻毫不留情，沒有給他們以比現實應有的、更好的遭遇和下場。是很殘酷，但很真實。作為時代的親歷者，我讀時感覺這些人和事都那麼熟悉，對他們的哀樂感同身受。小說當然是非紀實的， 最忌以真人對號入座。而各種類型的人物都可以從現實中找到。宗璞說她像一隻工蜂，在眾多的人物身上採蜜，然後揉在

一起。這也正符合文學理論中的「典型」（type），是典型情景中的典型人物。

這部書共四《記》：《南渡》、《東藏》、《西征》、《北歸》。背景是抗戰八年從開始到結束，北京各大學遷校、復校的歷史。這段歷史波瀾壯闊、驚心動魄。其中人物的經歷艱苦卓絕，宗璞寫作過程也備嘗艱辛。第一部《南渡記》初版於 1988

年；《東藏記》初版於 2001 年，隔了十二年，期間經歷了喪父之痛。此書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在四卷中，只有《西征記》所要寫的複雜、艱苦卓絕的戰爭是宗璞自己沒有直接經歷過的，儘管她已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但是為獲得感性的體驗，她還是不辭勞苦，深入當年滇西戰場的路線，採訪倖存者、知情者，儘量還原歷史情景。這就是一名嚴肅的作家的寫作態度， 儘管已名滿天下，儘管已屬「老弱病殘」，但對深入生活這一信條和文字的講究同樣一絲不苟，是對讀者，也是對自己負責。

2009 年出版《西征記》，期間又經歷喪夫之痛，原來體格健壯的蔡仲德君走得這麼早，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對宗璞打擊特別大。宗璞為《西征記》體驗生活，仲德還曾陪同她到雲南沿當年遠征軍經過的道路一行，可惜他沒有見到書的出版。

此後，本來體弱多病的宗璞健康日益下降，而且目力減退，發表〈聽書記〉一文，從此與乃父馮友蘭先生晚年一樣， 靠聽讀，寫作也只能口授。各種身體不適日益加劇，使得一天能夠打起精神與人交流的時間日益縮短，更不用說集中用腦工作了。加之近年來每年還要住幾次醫院。在這種情況下， 終於把第四卷寫完了，離前一卷出版又是十二年。從第一卷問世算起，歷時三十載——從 60 歲寫到 90 歲，「十年磨一劍」

云云，是小巫見大巫了。當然，在此期間，她也還有其他短文見諸報刊。

坦率地說，我一直擔心她有生之年完不成這部巨著。她自己精力時間已經有限，但是還總是要分心馮老先生的事。生前無微不至的生活照顧，以及種種交往、瑣事的操心、代勞；馮先生身後還陸續有遺著出版的事務，還要為一些議論而生氣、煩惱。我曾說她是京城第一大孝女，經常勸她，來日無多，最重要的是要完成這部巨著，以各種主客觀條件論，在文學界寫此題材，還在世的，不作第二人想，「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仲德生前也同意我的意見，一起勸她。不論如何，現在終於功德圓滿，連我都鬆了一口氣。

整個四卷（加末卷）涵蓋的年代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下半葉到八十年代上半葉，在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歷經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兩代乃至三代讀書人的事業、生活、親情、友情、愛情，悲歡離合，喜怒哀樂。貫穿始終的是對這片土地的刻骨銘心的大愛，主動或被動地與國家民族同甘苦。老中青幾代讀書人身上折射出傳統的「士」與現代精神相融合，其中包括了深厚的人道主義和本能的是非感、正義感。人物是

虛擬的，大背景的時代卻是真實的，不容虛擬。因此，無論對某個人物多麼崇敬或深愛，作者也沒有為他安排脫離現實的美好命運，也沒有按讀者的企盼有一個大團圓結局。無論多麼嚮往光明，也不能無視黑暗，或者指鹿為馬地把黑暗解釋為另一種光明。這種對現實的忠實，與馬克思（Karl Marx）曾評論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為偉大作家的偉大之處不謀而合。不過宗璞不是悲觀主義者。她曾說：我們奮鬥多年，走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但是畢竟不是在原地，是上升了一步，可以說是螺旋式上升。本書還是有一個光明的尾巴，書中倖存的人看到了希望。

在當代作家中，宗璞的文字修養是一大特色。她曾對我說，第四卷不夠精彩，因為目力不濟，是口授而成的，終歸不如自己一字一字寫下來。我也有此思想準備。但是捧讀之下， 發現文字還是有宗璞特色的精緻、優美，並沒有想像中可能出現的粗放。這十幾年來，她的健康每況愈下，體力衰退，近年來住醫院的時間越來越多，我總擔心她寫不完第四卷，現在喜見其完成，更加驚喜的是還有如此的力度和一絲不苟的精到。有的人正當盛年，身強力壯，卻精神空虛，而宗璞正相反，在衰弱的軀體中有無比頑強的精神和豐富的感情。肉體與靈魂的反差如此之大，令人驚歎。

這部大作波瀾壯闊，為時代立言，為民族精華立傳。首先跳入我腦海的是「史詩」。我曾再三斟酌，稱之為史詩是否因個人感情而有過譽之嫌，最終還是認為客觀地說，確實稱得上史詩，並非溢美之詞。一個作家，有這樣一部巨作傳世，可以無憾了。

當然，宗璞也有幸運之處，從生活到工作得到許多照顧和幫助。這裏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這套書的責編楊柳女士，從第一卷《南渡記》的再版開始，近三十年來一直跟蹤到終卷。作者寫得辛苦，可以想見編輯有多辛苦。可以說，楊柳從青年到中年，把青春年華的一部分獻給了這部書。在方今人事變動頻繁、人心浮動的時代，編輯與作者建立這樣的關係，對寫作跨度如此長的一套書不離不棄，精心配合，也算奇事一樁。楊柳當然出席了慶壽盛會，並講了話。我相信她對這套書一定不僅僅是出於職責所在，而是也傾注了自己的感情，有這樣一位編輯，是作者之幸，而有這樣的傳世之作為工作的成果也是編輯之幸。這應該是出版界的一段佳話。

這次盛會是宗璞的女兒小鈺（大名馮珏）精心策劃操辦的。小鈺辦這樣一場活動，忙前忙後，也顯示出組織能力。儘管她跳出了馮家的文史界，完全屬另一個圈子，忙於自己的工作、生活，但是繼承了馮家的家族觀念，以及「孝」的傳統，喜見宗璞晚年有靠。

最後多餘的話：沒有《野葫蘆引》，宗璞也早已無愧於當代名作家之聲望；有了這部長篇著作，分量又不一樣了。我渴望早日與廣大讀者分享讀到完整全書的幸運。

附：細哉文心 ——讀宗璞《南渡記》（摘錄）

陳樂民資中筠，本文於1990年發表在《讀書》雜誌

兩年前，宗璞六十歲生日，馮友蘭先生寫了一副對聯送給她：

百歲寄風流，一脈文心傳三世；

四卷寫滄桑，八年鴻雪記雙城。

宗璞在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的後記裏寫道：「當時為這部小說擬名為《雙城鴻雪記》。因不少朋友不喜此名，現改為《野葫蘆引》。」

馮先生的上聯特別有味道，宗璞這部小說（四卷中的第一卷）的特色也恰在於那淡雅而又深邃的「文心」。

有些小說以情節勝，《南渡記》同樣不乏引人入勝的情節。然而最值得稱道的是以下兩點：小說寫的是「史」，雖然二、三、四卷還沒有出，但「四卷寫滄桑」，全書必是一部抗日戰爭時期的北校南遷史，原書名的「雙城」顯即北京和昆明。此其一。第二是書裏有那麼多前一輩知識分子，再現了他們在民族命運垂危時的風貌、談吐、舉止。那一代知識分子一般不大會說好些擲地有金石聲的豪言壯語，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對自己國家愛得真摯、深切。像本書裏寫的，「大家雖都謹慎，沒有慷慨激昂的言語，卻於沉重之間感到腥風血雨之必來，而且不該躲避。」

（宗璞《南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9月，第6頁）。明侖大學（它的原型想來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孟樾的想法是：

「我輩書生，為先覺者。」（《南渡記》第7頁）孟樾有一個溫馨的家，「讓人心裏熨貼」：一位知書識禮的夫人碧初，相當有教養、帶着靈氣的兩女一子。那書房頗叫我輩書生羨慕：一排排書櫃，一張大寫字枱，一堆堆書稿，小長桌上的幾方「墨海」， 牆上的大字對聯。那副對聯，每個字一尺見方，是從泰山經石峪拓下來的：「無人我相，見天地心」。孟樾時不時地對着這幾個字默坐半晌。那時他正在構思他的《中國史探》。這幾個字也許正是「史探」要達到的天地混一的境界，是歷史，也是哲學。這一切都何等雅氣、何等幽靜呵！然而，孟樾的心境卻遠不是這樣平和，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關頭。看着這一切，孟樾喟然歎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孟先生兼着教務長，他此刻的主要任務就是遷校，校務會議已經決定了，孟樾忙着操持一切。「中國好在地方大，到危急時候，衣冠南渡，偏安江左，總能抵擋一陣。」話雖只有這麼幾句，烘托這幾句話的時代背景卻是驚心動魄的。

我們對作者說，看過這本《南渡記》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 它是一部以小說形式寫的「史」，把那個民族命運繫於一線的時期的知識分子的風貌和心態表現出來了。她似乎認可了這種看法，以為，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正在於它表現了歷史性的東西。

我們常想，中國讀書人的一個突出品質，或說優點，就是他們總是要把自己的命運緊緊地同國家民族的命運繫在一起。他們特別講人的氣

節，民族的氣節，在關鍵時刻能不能全名節是件刻骨銘心的事。在他們身上，「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個人氣節和氣貫長虹的民族氣節，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是統一在一起的。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傳統精神。作者定是把孟樾當作代表人物來寫的，孟為人平和通達，既有學識， 又能做實際行政工作，是那個時代的很典型的系主任——系主任首先必須是學通中西的學人，行政工作是第二位的。

書裏那位呂老太爺特別使人產生好感。一次，呂老人拿起床邊的一本《昭明文選》，說庾信的《哀江南賦》現在看感受不大相同了；「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為人不能再見故國，活着有甚麼意思！親人們發現他不只咳嗽厲害，有時夜裏還大聲哭，說要下地練拳。「碧初知是南京陷落之故，心裏酸痛。」（《南渡記》第175頁）作者喜歡淡淡地表現濃濃的感情，此是一例。

呂老人拒絕繆東惠勸誘老人出任偽職的幾段很是精彩，直如一曲正氣歌。搬上舞台一定會有強烈的戲劇效果。你看，繆東惠聲調抑揚頓挫地勸呂老人學作馮道，說了一番「我們是幸而亡國，不幸就要滅種」之類的鬼話。老人聽罷表情格外鎮靜，哈哈一笑說：「我無文才武略，怎比得古人！」老人沒有力氣拍案而起，心裏反覺平靜，目光又有些茫然。接下去，老人微笑，端起茶杯舉了舉，意思是送客。繆無趣而去。家人料想老人定會把繆某人痛罵一陣，但只見老人取下牆上掛着的龍吞虎靠鐫鏤雲的寶劍，說：「可憐這劍只掛在牆上。」然後慘然一笑：「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南渡記》第207頁）平靜之極，平靜得使人透不過氣來，平靜中含着憤怒和仇恨。倘有誰把這一段改編為昆曲，讓侯永奎樣的名家扮演呂非清，一定十分精彩，十分悲壯。

相比之下，凌京堯就活得太窩囊了。這類知識分子也見得不少，又學洋文，又是京戲迷；有些正義感，又每每意志頹唐——是一種提不起來的舊書生。可是，他良知未泯，所以當日本人羅致他任偽職時，起初不肯，還因此備受酷刑，後來終於受不住皮肉之苦，沒有堅持下去，怯懦地當了日偽「華北文藝聯合會主席」。他的良心受到強烈的譴責和震撼。我們不打算寬恕這種人，但也有些可憐他。他的女兒雪妍離他而去的幾段，寫得迴腸盪氣。對於這類情節，有一種慣常的寫法，就是讓雪妍乾乾脆脆地同他劃清了界線，把他痛斥一頓。這裏沒有這樣，只着意寫了她決意「脫離父女關係」時的內心苦悶、矛盾和痛苦。竊以為這樣寫真實得多，是那個時代的不少這類青年學生必定會有的「思想鬥爭」。將來雪妍有一天被批判為對反動家庭懷有「溫情主義」的「小資」情調，是不奇怪的。雪妍終究走了，這是書文最後幾頁的內容。雪妍離去的情景是淒然的，不過顯然懷着希望。她的命運怎樣，下卷裏當然會有。

碧初那樣的「教授夫人」，我們也感到不陌生。那時學生管教授夫人都叫「師母」。師母多出自書香門第，或本人也是教授。碧初這類師母是「高級家庭婦女」，一家的「內閣總理」。她們都很有獨立的人格，並非「紅袖添香」之屬。那個時候每班學生人數不多，輔導課時時在先生家裏上。每當這種時候，師母就備些小吃，款待學生。如果師母

是廣東人，則一小碗精緻的「魚生粥」是少不了的。閑談時，師母常是在座的，談吐同樣不俗，每每出口成章，有時調侃一下丈夫的「迂」，那是「其詞若有憾焉」……書中的碧初就是這樣的「師母」。《南渡記》中以碧初寫的最像，比孟樾更像。也許孟樾在首卷還來不及充分展現他的舉止言笑和內心世界。

顯然，書中人物，至少孟樾這家人，是有所本的。這「本」就在馮家。從孟樾，使人想到馮先生；從碧初，使人想到馮夫人。這並不只是因為許多情節與《三松堂自序》中的敍述吻合， 也不能同馮家的人勉強對號，而是人的「氣質」特別像，家庭的氣氛，包括生活習慣，都像。尤其是看到孟樾面對的那副對聯「無人我相，見天地心」時，不由得會引起聯想：這不就是馮先生嗎？

日本侵略軍統治下的北京城，讀來心痛！這是瀝血的歷史。盧溝橋事變那年，我們都已記事了，書裏寫的不少事還有印象。例如銷毀「禁書」，有些書成本成套地燒，有些書則用墨筆把有違礙的字、句或段塗抹掉，來查的日偽警察或保甲長只要看不見那些礙眼的字句，一般就不多管了。大人領着孩子用墨筆塗抹的情形至今還依稀記得。……想起「亡國奴」的日子，實在不是滋味。這種日子雖說一去不復返了，但卻是不應該從記憶中抹掉的。

俞平伯先生在甚麼地方說過：「文心之細，細如牛毛；文事之難，難於累卵。」揆諸「文心」、「文事」兩端，《南渡記》都該拿個好分數。以後的幾卷，定會看到更多的「高知」。似乎也該寫寫他們的幽默感；這在《南渡記》似嫌少了些。

2018 年 9 月

當年大學教授是如何維護學府尊嚴的

近年來聽說過不止一次，有大學生向當局舉報老師授課內容之事，有的是公開，有的是「告密」。山東某資深教師因校外群氓鼓噪而遭無理解職已是盡人皆知之事。聽說有的學生是有報酬的，美其名曰「信息員」。學生還未出校門，就已受到賣師求榮的培訓，相信強權而不相信公理，不禁為之不寒而慄，想起魯迅的呼籲：「救救孩子」，應該還加上「救救青年」，何況考上重點大學的青年應是佼佼者，是社會精英的預備隊，社會還會有誠信嗎？

誠然，老師不一定代表真理，授課內容也未必都正確無誤，學生完全可以質疑。韓愈老夫子早就說過：「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愚於師」，應該提倡學生獨立思考，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甚至展開課堂辯論。當然要有一定的規則和程序，以不干擾教學秩序為原則。這種討論和辯論是公開的， 以追求真理為目的，培養的是光明磊落、心胸坦蕩的品德，獨立、平等的人格，而不是見利忘義（甚至已失去辨別義利是非的能力）的猥瑣小人。而況其中一部分人今日為學，明日可能為師，他們成為老師後將如何對待學生呢？我只希望這是「極個別現象」，而不是高校普遍實行的政策。否則大學校長扮演甚麼角色？

近來又耳聞，有的高校教室安裝攝像頭，以監督老師講課內容。這無異於把老師作為潛在的犯罪分子來對待了。師道尊嚴蕩然無存。我衷心希望這是謠言，或者也是「極個別現象」， 是「極少數」教育外行，整人內行的行政官員想出來的，希望有人闢謠，或對育人負責的有司發現後予以制止，以免大學校園毒菌蔓延。

想起 1940 年抗戰最艱苦的年月，西南聯大一樁公案，引出一篇精彩的傳世佳作。發佈如下，以饗讀者。

西南聯合大學教務會議就教育部課程設置諸問題呈常委會函

1940年6月10日

1940 年 **6** 月，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身份三度訓令聯大務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統一考試等新規定。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常委會的方式，駁斥教育部的三度訓令。此函由馮友蘭先生執筆，全文如下：

敬啟者，屢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號、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號、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號訓令，敬悉部中對於大學應設課程以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 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

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 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師嚴而後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後師嚴。今教授所授之課程， 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與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 在學校則一籌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智周於萬物，人非至聖，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

然全國公私立大學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係專為比較落後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號等訓令之例外。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若何之處，仍祈卓裁。此致常務委員會。

教務會議謹啟廿九．六．十

2018 年 6 月

外交家顧維鈞的幸與不幸

——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感

我在不同場合曾引用顧維鈞的話：國家是不能玉碎的。此語來自《顧維鈞回憶錄》。這部自述較之一般回憶錄都客觀、冷靜而翔實。大部分涉及民國時期的外交，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珍貴參考資料。多年前我曾撰長文略述本人閱讀心得。現在着重介紹他關於外交的一些觀點，兼及可能從事與列強進行重要談判的中國代表應有的訓練。這是他根據豐富的實踐總結出來的，在當時既有針對性，對後世也有普遍意義。

外交工作原則：從《回憶錄》分散的敍述中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必須非常敏銳，注意每一個細節，看看有否隱藏的含義，遇事決不能想當然，不能僅看表面。必須非常謹慎，仔細觀察，小心從事，並永遠瞻前顧後，有進有退。」

此話所針對的主要事例是，1919 年凡爾賽會議期間， 正當中國竭力要求對山東問題做出保留，明確表示如達不到一定程度的滿意就不得不拒絕簽字時，中國代表團卻應會議秘書長的要求，先把代表的私人印章交了出去。要求代表交印章的理由是為了在最後儀式時節省時間。而交出印章的行動造成中國代表已決定簽字的印象，當時的負責人卻沒有考慮到。

（2） 需要知己知彼。「必須估計對方及自身的實力」。「中國大多數軍人，尤其是軍閥，只想了解其對手及可能的敵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點，結果造成毫無根據的希望和野心。」

換句話說，往往不自量力，在外交上提出過高的目標。

（3） 「在外交上不能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 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那就無法達成協議。……『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為口號，那是永遠成功不了的，那樣只能把談判搞糟」。

（4） 「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

（3）、（4）兩點所針對的情況，一是北洋政府時期南方代表曾自行其是，單獨與外國簽約。更主要是當時的群眾運動動輒以「人民外交」的名義對外交代表施壓。顧說：「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持，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是光考慮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恆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在中

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比較突出的例子是，1919 年巴黎和會時，中國各種勢力都擁到巴黎「觀戰」，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提出激進的要求，對中國代表團施壓，干擾談判工作。

關於「人民外交」，筆者一向認為應該慎言，不如代以「民間交往」比較確切。「外交」基本上是指國家間關係，此中錯綜複雜，縱橫捭闔，專業性很強，而且談判過程在沒有結果前是不宜公佈的。如果全民都參與，憑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詮釋，提出各種「見解」和口號，越是煽動性強越容易博得擁護，誤導群眾，形成壓力。在顧維鈞時代已經會「產生災難性後果」。在自媒體的今天可能放大不知多少倍。當然不是說外交決策者應當獨斷專行，相反，正如顧維鈞所提，必須「知己知彼」，也就必須重視真實的資訊，依據客觀情況而不是主觀願望，有足夠的雅量，集思廣益，做出判斷。而外交從業者也如顧所說，應只以民族利益為重，不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發言表態，考慮的是對外影響，而不是討好國內。如果做不到據理力爭，至少有對決策者全面彙報真實情況的勇氣。

（**5**）「在會議外交中，一個外交家必須時時注意會議講壇，尤其是世界報刊所代表的輿論。因此老派人士躲避報紙和輿論是大錯而特錯。」

顧比較了各國外交官的訓練，認為英、法、荷蘭等最好，美國略差，但正在努力發展並保留職業外交人員（按：現在美國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外交官受到嚴格的管理，必須在外務省和軍部之間抗衡，有時過於小心謹慎，不過也正在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風格，在與各國交往上發揮更大的影響。

外交使節聯名呼籲國內團結

不幸，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內部紛爭不已，國力孱弱，領導渙散，在此情況下，外交受到國內處處掣肘。發生過駐外使節聯名呼籲國內停止內爭之奇事。

那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調查團到中國東北調查，形成《李頓報告》，提交在日內瓦的「國聯」討論。中國外交代表顏惠慶、郭泰祺、顧維鈞三人與會，同心協力，力爭國際同情中國譴責日本。顧又發揮辯才，舌戰日本代表松岡洋右，獲得不少支持。然而當時國內形勢雖然號稱南京政府統一中國，實際四分五裂：四川劉湘和劉文輝叔侄內戰，山東韓復榘與劉珍年軍事對抗，北京有帝制復辟運動，還有「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等等。日本乘機大做文章說，不知道中國政府在哪裏，誰是領導。使「將在外」處境尷尬。於是三位中國代表聯名於 1932 年 10 月發回電報，呼籲國內各方停止內爭，加強團結，否則他們在外雖據理爭辯「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緊接着，根據外交部建議，中國駐外使節又聯名通電內戰各方首領，呼籲停戰息爭。措辭更為

強烈，其中有「中國內哄不已， 友我者歎息，忌我者訕笑。」「國將不國，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愛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等語。

他們的外交活動確實有了積極的效果，最後結果對我國相當有利。但是東北抗日鬥爭節節敗退，國土一片片淪喪。而收到國內指示卻叫他們予以否認，致使顧自己感到「台上說得天花亂墜，而台下發生的事實卻完全相反」，無法取信於人。

在這種情況下，顏、郭、顧三人聯名辭職，說是「心餘力絀，應付乏術」，要求政府「另委賢能接充」。當然這一辭職是不會被批准的。幾位代表只好繼續「鞠躬盡瘁」。但是如他們辭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經看透中國政府「勇於內戰，無意對外」，無所顧忌，卒至大舉侵略。誠如顧所預言，「歷時十七個月之外交努力亦將完全付之流水」。僅此一例可見當時內政對外交掣肘之一斑。當然絕不止此一例。

至於顧最後十年的駐美大使經歷，中心任務就是爭取美國援助國民黨打內戰。為此他以自己的外交長才，使出渾身解數，除到處演講宣傳外，還對美國各黨各派各部門的內部分歧瞭若指掌，甚至為親蔣國會議員起草發言稿，以及代國會議員提出援華法案中有關段落的措辭，等等，做到了任何外交官都做不到的事。

即便如此，蔣還沒有給予充分信任，曾認為他爭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為專門談判美援的全權代表，以至於顧以一國不能有兩個全權代表為由提出辭職（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而作罷）；還有一段時期蔣下野，李宗仁「代總統」，而實權仍在蔣手中，使「大使」不知聽命於誰，因此他常有「一國三公」之歎。他宵衣旰食，殫思極慮，客觀上卻是為黨派政治服務。正好違背了自己提出的外交原則：「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而且大勢已去，他從代表全中國退縮到代表「偏安」一島的政權。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

結論

唐德剛先生著作中說中國一共有兩個半外交家，顧維鈞算半個。竊意以為此說不公。顧維鈞無論如何當得起一個外交家，而且是傑出的外交家。每一個人都有時代的局限性，處百年動盪的中國而涉足政界的知識分子，更難掌握自己的命運， 顧維鈞也不例外。顧維鈞的職業生涯有他的幸與不幸。他本人的愛國心、學識和忠於職守都是沒有疑義的。若論個人名位和際遇，他少年得志，起點很高，沒有中國多數知識分子「懷才不遇」之歎。他前期服務的北洋政府，領導很弱，只顧內部爭鬥，在外交上對他倚重有加，干預較少，因此他反而比一般的外交官有更多的發言權、裁量權，發揮餘地較大，應算得幸運。在漫長的歲月中，既有經過艱苦努力，為中國爭得權益的業績，也有不得不經歷的屈辱外交。他見證了民國初創到衰敗的全過程，經歷了多次「城頭變幻大王旗」，還有兩次世界大戰。他面對無法抗拒的內外勢力，與列強周旋，善於提出在當時客觀條件下對我國最有利的方案，有時強硬，有時

妥協，一般說來審時度勢，進退有據。其特點是知己知彼，重實際而不憑意氣，在內憂外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另一方面，畢竟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顧維鈞所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支離破碎的中國，大多數情況下事與願違。他自己提出的原則並不能完全實施。以真正為國為民成就的事業計，他的才能和心計多半空拋。

外交官本來就位高而權不重，基本上是奉命行事。顧作為外交界幾朝元老，憑的是自己的專業才能，而並未依附個人， 很多次在重大事件中，勇於向上力陳己見，有自己的個性。在近代中國踉踉蹌蹌走向世界，由弱轉強的過程中，高級外交官不知凡幾，後來者所處世勢、國勢已非昔比，但是像顧維鈞那樣不僅是執行者，尚能有自己的外交思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帶有顧氏印記的遺產者，應屬鳳毛麟角。

2018 年

不該被遺忘的歷史人物

——袁昶烈士

袁昶何許人也，當代人除史學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變時，由於力諫朝廷不可縱容義和團濫殺洋人與外國開釁，而被處死的五大臣之一。（另四人是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和戶部尚書立山）。後世治史者稱：「袁昶名臣也，以忠諫至禍，同罹慘刑。丹心未泯，碧血長埋。」

本人曾寫過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事跡，袁昶正是袁同禮夫人的祖父，袁同禮之子袁澄是我清華同學，因此我對袁昶有所關注。另外，袁昶曾師從晚清名儒劉熙載，近年來我見到我外祖父童米孫的《遺言》，發現他也曾從學於劉熙載，就更增加了對袁昶的興趣。這些都是個人偶然因素，重要的是，袁昶其人是近代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人物，從他的事跡可以見到， 直到清末，仍然有一批這樣對國家忠貞不二，有膽、有識、有血性的士大夫，同時從他被害的背景也可見當時朝廷之荒唐與昏聵。

袁昶（ 1846 年 – 1900 年），浙江桐廬人。他於光緒二年（1876年）中進士，殿試二甲。從此一路為官，既有京官，也有外官。外放時，他曾任徽甯池太廣道道台，在任六年，興利除弊，有多項改革，政績斐然。他與張之洞交好，也信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安徽時引進西學，擴辦蕪湖「中江書院」，增加了輿算、格致等科學課程，這也是受其師劉熙載在上海辦「龍門書院」的影響。他博學多才，是同光體詩的代表之一，與很多名士都有唱和，其中知名的有劉熙載、黃遵憲、王闓運、沈曾植等。一生著作很多，還將農桑、兵、醫、輿地、治術、掌故等書編成一部《漸西村舍叢刻》。

1898 年，袁調任京官，在朝堂議事中一直秉承直言敢諫的作風。起初很受重用，兩年內一路擢升，在被殺前，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先是 1897 年發生曹州教案 [3]，德國借機出兵強佔膠州灣，光緒徵求大臣意見。袁昶上了二萬言的條陳，分析當時的形勢，做了詳細論證，認為德國佔膠州灣「禍急事小」， 而「俄國自西北至東北，與我壤地相錯」，「其禍紓而大」。也就是說，德國一案看似緊急，但是小事，從長遠看，俄國才是大患。接着借此機會系統地陳述時弊，說諸臣「相率為鄉愿，而舉國之人才靡矣！」。他舉金田之例，說，連洪楊這樣的小民都能鬧出這麼大的亂子，何況諸國互肆蠶食之心！他大聲疾呼帝國外患之憂，提出改革措施之綱要。光緒親自寫在冊子中，下發大臣們議行。到那時為止，他還是受到重視的。

庚子之變清廷向十一國宣戰

從山東發生的義和拳暴亂，實際是曹州教案的延續。1898　年清廷被迫與氣焰囂張的德國簽訂《膠澳租借條約》，答應了極為苛刻的條件，山東這一地區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教會與當地民眾的矛盾不斷。朝廷對於民間社團一向是敵視，以鎮壓為主的。但是事態擴大，外國捲入，官府又想利用其對抗洋人， 既「剿」又「撫」。原山東巡撫李秉恒被撤職後，繼任毓賢起初曾鎮壓義和拳，後又認為「民氣可用」，予以招安，改稱「義和團」，口號也從過去大刀會的「反清復明」改為「扶清滅洋」， 勢力越來越大。同年 12 月，袁世凱取代毓賢任山東巡撫，又大力鎮壓義和團。於是義和團由山東轉入直隸，蔓延至內蒙、東北，最後獲准進入北京。在北京大肆燒教堂、摧毀一切與洋人、洋貨有關之店鋪，包括西藥鋪，濫殺無辜，連支持義和團的貴戚家（例如徐桐）也有被闖入遭搶劫的。清軍有的也加入，　一起肆虐。軍匪混雜，京師大亂。期間發生了一名日本外交人員被殺，並剖腹挖心之事，引起各國震動。清廷拒絕各使館要求保護之請求，各國開始調軍隊進京保護使館。又發生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到總理衙門議事，途中被清軍伏擊殺死（清軍的說法是因為此人先殺過義和團團員，殺他是復仇）。這樣，事態擴大，聯軍佔領了大沽口炮台，形勢緊急，戰事一觸即發。朝中親貴如端郡王載漪[4]、軍機處協辦大學士剛毅[5]等主張借義和團之力與外國鬥，還主張圍攻外國使館。袁昶等幾位大臣則從一開始就主張鎮壓「拳匪」，與外國的糾紛按照以前的「教案」處理，避免事態擴大，消弭戰禍。主戰派認為「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慈禧經過來回搖擺，最終支持主戰派。

6　月　21　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宣戰。同時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負責指揮抵抗。然後是八國聯軍佔領天津，繼而攻破京城，西太后與光緒皇帝率隨從「西狩」，逃亡西安……不必贅述。

關於這段歷史細節有各種說法，專著已林林總總，不是本文的主題。這裏只是粗略概述袁昶被害的背景。

且不論國力如何，一國單獨向十一國同時宣戰，其「氣魄」可謂獨步中外古今。但是十一國中只來了八國，軍隊合起來一共只有三萬人（各種資料說法不一，姑取其中），當時在北京周圍的清軍連同義和團有十五萬人之多，卻不能阻擋侵略軍長驅直入，太后與皇帝棄宗廟與百姓於不顧，倉皇出逃了！如果原來真的準備打一仗，怎麼不做任何調兵部署呢？真如袁昶所說

「以天下為戲」！這樣的朝廷居然還維持了十年才亡！

遇害經過

從 5 月到 7 月袁昶被殺之前的兩個月內，形勢越來越危急，袁昶單獨或會同許景澄連上三道奏摺：《請急剿拳匪書》、

《請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和《請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疏》，提出：「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外釁不可開」。並在慈禧幾次召開的御前會議慷慨陳詞。同時，徐用儀、聯元、立山聯名支持袁昶的意見。最終未被採納。

聯軍佔領天津之後，有步軍統領衙門弁役到袁昶家，說諸大臣在總署相候議事，請他過去。那時情勢危機，議事頻繁， 所以並未引起袁懷疑。實際上卻把他送到刑部，不加審訊，第二天就在菜市口與許景澄同時被殺，據說是腰斬，十分慘烈。袁、許二人從容就義。誘殺之後才上報慈禧，是名副其實的

「先斬後奏」。第二天，慈禧下詔追述其「罪狀」稱：「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任意妄奏，莠言亂政……實屬大不敬」，這是以「妄奏」、「不敬」罪判死刑。徐用儀當時被慈禧派往外國使館談判退兵之事，主戰派稱之為「勾結洋人」。袁昶遇害後，家人已星散，無人收屍。徐用儀為其收屍，也遭忌恨。徐給友人朱彭壽寫信，最後一句提到此事「驚心動魄，千古奇冤」。朱怕惹禍，把信的最後一行撕下燒掉，可見當時的恐怖氣氛。這是殺人以堵天下之口。情勢進一步危急，朝廷再召開會議，無人再敢說話。不久，徐用儀與另外兩位曾支持袁昶意見的聯元和立山也被砍頭，是朱彭壽為徐收屍，並重賄劊子手把身首縫在一起。在當時的險惡環境下也算夠朋友了。

「力諫」的內容

以下選登一些袁昶等諸大臣的說辭，道理明白，文字淺顯易懂，就不翻譯加註了。

6 月初，身在外地的張之洞致袁昶信，表示為時局擔憂， 他概括局勢，言簡意賅：「拳匪大亂，外兵乘機，邪術豈能禦敵？大局危矣！」要求袁昶告訴他「政府主見，都下議論」。

事態緊急時，太后召九卿六部議事，人數眾多，一直跪到殿外，大家都匍匐不敢言，許景澄首先發言謂：「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許景澄還力陳：「兵釁不可啟，春秋之大義不殺來使，圍攻使館背公法。」他說：況甲午一戰， 中國對手是一彈丸小國日本，結果喪師辱國，如今再與眾國為敵，只怕國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轍。徐用儀、立山、聯元皆說：與世界各國宣戰，外侮一入，內亂隨發，後患不堪設想， 懇求皇太后、皇帝聖明裁斷。

袁昶跪在殿外，膝行而前，大聲說：「拳匪不可恃，外釁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又說：「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

袁昶還說：當下之急「莫急於先自治亂民，以示各夷以形勢，俾折服其心，然後可以商阻夷使添調外兵辦法」。對於慈禧以為要順民心（她認為義和團代表民心），袁昶說：「變者惟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撲殺為首要匪二三十人，亂黨烏合之眾，必可望風解散。我

自辦亂民，免致夷人調兵代辦，交哄輦轂之下，則大局糜爛，不可收拾。」總的意思是說，我們自己懲辦了肇事的匪徒，堵塞外人進軍的藉口，然後再談判。有書載其聲震屋宇，太后「怒目視之」。

袁的上疏中還有「千古奇事，必釀千古之災」語。他說：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於千古之奇事，必釀千古之災！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

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為橫挑邊釁，以天下為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　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誠恐幾日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之，悲來填膺。

最後一道袁、許二人的奏摺要求懲辦那些肇事大臣：

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剿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

這裏，他們已經孤注一擲，甚至表示只要辦了這些人，達到「宗社無恙」，自己準備把命賠給他們，在所不惜，真是此心可對日月！這道奏摺還沒有到達慈禧、光緒手中，他倆就被那幾個政敵誘殺了。

平反、追謚、立祠

一場災禍過去後，根據聯軍提出的議和提綱中的要求，光緒發佈上諭，宣佈為袁昶等人平反，「開復原官」。離被害約半年，這應該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卻是在洋人壓力之下。平反的詔書曰：（五人）「於垂詢時，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應即加恩，……均着開復原官」。明明袁昶等人是強烈、急切地反對開釁之舉措，甚至以死相諫，卻說他們「詞意均涉兩可」，當然責任全在「首禍諸臣」，「今上」沒有責任，現在平反是「加恩」。那幾個「首禍」是外國要求嚴辦的，正好應了當初袁、許等人的主張。經過一再討價還價， 剛毅已經死在西逃途中，只予革職，不再追究，載漪免死，發配新疆。其餘有自殺的、處死的、流放的，不再贅述。到宣統元年（1909年）又追謚五大臣：袁－忠節，許－文肅，徐－忠湣，立山－忠貞，聯元 － 文直。並下詔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三人。此時離清朝被推翻只有兩年了。

為權位，還是為社稷生靈，是分歧的核心

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 非痛加剷除不可」。這可算是「始亂終棄」！袁昶本來只主張懲辦幾個頭目，而慈禧下令剷除的是廣大的團員。義和團多數就是無知農民和流民，原來在朝廷鼓勵之下依附的人數越來越多，甚至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少年跟着起哄。結果在朝廷「撫」「剿」之間，都成了犧牲品。慈禧未必真相信義和團的「法術」。但是牽扯到內部「帝黨」、「后黨」之爭。當年康梁戊戌變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認為洋人企圖以光緒取代自己，懷恨在心。那些主戰派也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們自己各懷鬼胎。特別是載漪的一個兒子已經被慈禧封為「大阿哥」，原本就有取代光緒之意。他更加不遺餘力企圖借義和團之力推翻光緒。他們還曾率義和團企圖衝殺光緒，被慈禧制止，但未予懲罰。而主和派是被認為屬於「帝黨」的。其實光緒在此事件中完全是傀儡，並未有支持主和派的表態，那些後來被稱作「亂命」的詔書都是以他的名義發佈的。義和團的實力和影響的擴大，朝廷也不無忌憚，甚至於有人異想天開，企圖讓他們在前面與洋人戰鬥， 兩敗俱傷，清廷收漁翁之利。總之，從皇家到貴戚想的首先是爭自己的權位，國家安危是從屬的，至於生靈塗炭，對他們說來更不在考慮之列。當然還有無知、昏聵，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導致判斷錯誤，進退失據。而袁昶、許景澄等人處處想的是「宗社」、「兆民」、「生靈」。這就是區別所在。

「東南互保」之議與李鴻章的鞠躬盡瘁

朝廷逃亡後，還只能召李鴻章進京與洋人議和。李鴻章原任兩廣總督，朝廷向十一國宣戰時曾召他進京，他以「亂命」不從，從廣州到了上海，與張之洞、劉坤一等一批封疆大吏發起「東南互保」，不承認朝廷的「亂命」，稱其為奸人的「矯詔」（假傳聖旨）。參加者有當時的兩廣、兩江、湖廣、閩浙總督和山東、四川巡撫，還有時任鐵路大臣的盛宣懷。他們與洋人達成協議，外國不進犯他們劃定的地區，他們負責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他們還暗中議定，一旦京師不保，由李鴻章暫時主政。這一大片疆土，都是中國人口密集，最富庶、經濟最發達之地，就這樣保了下來，未遭蹂躪。如今，太后和皇帝都逃走了，李鴻章只得奉詔進京與洋人談判退兵。他充分發揮其外交手段，首先援「東南互保」同樣的理由，說那個以皇帝名義發佈的宣戰詔書不算數，是在「拳匪」逼迫下的「亂命」，所以根據國際法，中國並沒有與外國開戰，各國是進來協助中國剿匪的。這樣，根本沒有交戰，就不是戰敗國，避免了割地和出讓其他權益，只需賠款補償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以及「協助剿匪」的費用。還有就是開外國以保衛使館為名派軍長駐中國的先例，後來盧溝橋事變就是以駐華日軍為導火線。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只是一個中國與各國之間的「善後議定書」（Settlement

Protocol），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Peace Treaties）。這是在最不利的形勢下為中國保全主權，爭得了一點面子，避免了更大的損失。列強各自有打算，英美並不想佔領中國領土，而是旨在商業利益。德國已經佔領青島。正如袁昶所預言的，領土野心最大的是俄羅斯。俄國除了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乘人之危，另外從南北兩路派大軍進佔中國東北，到 10 月佔據了東北全境，以後再單獨與清廷談判，取得大量特權。另一有野心的是日本，日本在此役中掠奪財物最多，得到賠款也最多。幾年後日俄戰爭，日本取代俄羅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

賠款數目巨大，成為中國多年的沉重負擔。不過實際並未付那麼多。後來美國帶頭退還一半辦學，在中國外交官力爭下，其他各國跟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敗，在新形勢下中國有機會進行爭回部分權益的鬥爭。

在懲辦禍首方面「上諭」與洋人要求距離最大。慈禧鎮壓「拳匪」毫不手軟，但是對真正的禍首 ——那些皇族貴戚，卻竭力庇護，成為李鴻章奉旨與洋人討價還價最棘手的部分。這是李最後一次為朝廷效勞，在這場交涉中心力交瘁，到了生命最後時刻。各國還是看他的面子，不再堅持更高要求（有外國代表表示，實際禍首是慈禧本人，沒有要求懲辦她，已經給面子了）。剛簽了協議，李鴻章就去世了。聯軍退兵後，「御駕」又回到紫禁城內，暫時苟安了幾年，雖說有所覺悟，決心啟動革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但為時已晚，而且改革方案還是不能放棄親貴的特權。慈禧和光緒都未親見皇朝被推翻。

即便從保住自己的權位出發，殺諫臣、倚暴民，不自量力，開啟外釁，除了自取敗亡，還能有別的結果？而真正受害最深的還是千百萬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無辜百姓，先大規模慘死於本國土匪與官兵之手，後又成為外人報復的對象，橫遭暴行蹂躪。至於財產損失、妻離子散，更無法計算。

中國士大夫的悲劇

最近常見到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說，意思似乎是說自從南宋陸秀夫背着最後一位小皇帝投海後，中國「士」的傳統氣節已喪失殆盡。姑且不論從今天的眼光看，這種愚忠是否值得發揚，單以忠於舊皇朝為標準，此說也不符合史實。晚明、晚清忠貞死難之士史不絕於書。只是到了晚清，情況發生變化，面對的是以前沒有的外洋列強。朝廷昏聵至此，仍然有以袁昶為代表的死諫之士，以家國、黎民為念，視死如歸；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國門有限的開放之後，出現一大批有眼光的「能吏」，包括提出「東南互保」那些封疆大吏，可以說人才濟濟。但是挽救不了已經腐朽的皇朝。當時有一位同情袁昶的朋友說他有點傻，前兩道奏摺慈禧惱怒之情已經非常明顯，他還要逆其意堅持己見。實際上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第三道奏摺不但傻，而且迂，點了一連串權力炙手可熱的親貴之名， 要求朝廷懲辦，而且表示，只要宗社安穩，自己願意陪他們死。明知這份奏摺會先落入這些人之手。主要是當時的

確形勢緊迫，社稷「糜爛」「兆民塗炭」，危在旦夕，他甚麼也顧不上了，只有以命相博。

從今天回望歷史，袁昶的思想在當時還不能算最前沿的。有一些同代的知識分子已經超越他的觀念。康梁變法他曾是反對派，因此曾獲得慈禧好感。他沒有超出把愛國和忠君合為一體的觀念。「宗社」一詞經常出現在他的奏摺中，直到臨刑時， 口占絕命詩有「正統已添新歲月，大清重整舊山河」句，而且自比呂望和張良。不知道如果他再活十年，遇到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時將持何態度。

自屈原以降，「忠而見疑」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的悲劇。自從開始與外洋列強打交道，出現了在中外之間的「忠」與「奸」的衡量。於是多了一個罪名，就是「漢奸」或「二毛子」。明明是保一己之私利、權位，只要祭起仇外旗幟，把對立面說成

「漢奸」，就很容易動員愚民、暴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袁、許等人是漢人，被主戰派誣為「漢奸」，而載漪、剛毅等是滿人。在明清易代之際，降滿清的漢人被認為是「漢奸」，袁昶如此保大清江山，卻被滿清貴戚扣上「漢奸」的帽子，那麼那些滿清貴戚自己已經認同漢族了？袁被罵「漢奸」還因一事，就是德國公使被殺後，他着人予以棺斂。有人要開棺戮屍，把人頭割下來，掛在東安門示眾，袁反對，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人上告到端王那裏，說「漢奸」袁昶居然棺斂洋人， 竟表同情於上國仇敵，是「大奇事」。不能小看這種污名化對群眾的影響。直到徐用儀平反幾年後，他的靈柩回鄉，重新舉行大殮儀式時，圍觀的路人還有人說，那麼看來他不是「二毛子」了？

有年輕人問我，像袁昶那樣明知必死，而且無用，還要堅持，這樣的犧牲是否值得？這個問題值得深思。例如變法失敗後康梁逃亡日本，譚嗣同可以逃而不逃，主動付出流血的代價，留下千古英名，但是客觀上對革命的幫助如何，如果他不死，以後是否還會有更大的貢獻？很難衡量。當時袁昶等人內心深處的想法，後人難以盡知。我粗淺的解釋是：他們繼承了中國士大夫「武死戰、文死諫」的傳統。君主雖然掌握生殺之權，但是還有朝臣議政的機制，是有可能聽從建言的。至少當時還有「御前會議」，大臣們可以有機會發表意見。從慈禧在危急中頻繁地召開會議來看，可以認為她尚未做出最後決斷。

在那種制度下，天下安危繫於一人的一念之間，主和派的意見實際上都是常識，正如他們所說，「不待智者而知之」，他們可能還抱有一線希望，能曉以利害，說動慈禧做出正確決斷。既然召開會議，諸大臣是有發言的機會的，假設（只是假設）敢言之士多一些，造成聲勢，未始不可能有另一種結果。袁、許是被主戰派誘殺的。若是慈禧被激怒而直接處置，也可能有多種貶黜的選擇，不一定非死不可。另一方面，袁、許等人對危機的估計十分嚴重，他們預料，十一國發兵入侵中國，中國必亡，其後果必然是生靈塗炭，不堪設想。袁昶臨刑時說，我今天死在中國人手中，你們他日都要死在洋人手中。他設想的是列強攻進來比義和團更亂、更慘烈的大屠殺，大概沒有料到最後議和、退兵的結果。作為京官，又不可能去參加那些地方官員的「東南互保」。他們的

信念是與國家共存亡，在這種危急關頭，不可能為個人安全而不作聲，除了「死諫」，別無他法。

誰愛國，誰賣國、禍國，歷史已有公論。只是付出的代價太大。這段歷史已經過去百餘年，是非應該很清楚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但是似乎載漪、剛毅等人的思維和論調仍然陰魂不散，把「反洋」與愛國等同起來，以不同方式、不同規模再現。在某些人心目中，義和團暴行仍是「反帝愛國運動」，「漢奸」的帽子滿天飛。如果這樣一而再的慘痛歷史教訓尚不能使我同胞醒悟，還要犧牲多少真正愛國忠貞之士，中華民族還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呢？

2017 年

楊絳先生仙逝感言

楊絳先生仙逝。作為曾有幸在楊先生和錢先生課堂親受教誨的學生，自然心有所悼。我不但上過錢先生「西洋文學史」的課，而且錢先生還是我畢業論文的導師（全班惟我一人，不知此前或此後他還有沒有指導過他人的畢業論文）。不過他歸道山後，我甚麼紀念文字也沒有寫，因為他名氣已經太大，死後哀榮，紀念與研究文字不斷，我畢業後的工作遠離外國文學， 這方面不再有長進，愧對師長，不想套近乎。我上過楊先生一年英國十七、十八世紀小說史的課，後來也差不多都還給了先生，不敢再提。畢業三十年後，我到社科院工作，才又續上了聯繫，不過登門求教是極少幾次。隨着他們名聲日噪，門庭若市，不敢再打擾，只是逢年節電話拜賀而已。近兩年楊先生重聽，我連電話也不打了。現在她駕鶴西去，寫家蜂起，連同錢先生一起又成為熱門話題。對他們二位的褒貶，一時間沸沸揚揚。我忽然想起魯迅的幾句話：「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兩位先生生前不喜熱鬧，身後任人如此評說，如果真如楊先生相信的靈魂不滅，不知作何感想。

對兩位師長的悼念之情不在於一朝一夕，紀念文字留待以後再考慮。不過這次引發的種種議論涉及中國知識分子與公共事務的關係，對於這個話題，二十年前我寫過〈「平戎策」與

「種樹書」——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之後陸續發表過一些看法。2010 年我 80 歲時，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從兩千年的傳統到本朝，試圖捋清在中國特有的環境中「士」的處境及其複雜而曲折的心路。特別是該文最後關於當代部分，實際上融入了本人的切身體驗，也算是一個總結，自以為盡其所能對這個問題剖析清楚了。但是自那以後， 又見到和聽到許多對人對事的議論，或出於對國情和歷史的無知，或者就是為自炫而不惜損人，促使我感到言猶未盡，借此機會對這個話題再略抒己見。

正常的現代公民社會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為民請命

在正常的現代公民社會，人人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各類人群都有自己的組織和維權渠道，在權益受損，遭受不平時，從公開吶喊到訴諸法庭，到上街請願……不需要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為民請命。服務於媒體的「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揭露真相，對社會弊病行批判之責。至於各專業領域的知識分子， 則術業有專攻，做好本職工作就是對社會的貢獻，如果對政策有發言權，一般只涉及與本行業有關的，例如水利專家

對一項水利工程的取捨提出建議，等等，本不必人人都關心國家大政方針。「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對德國皇帝說，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學家，咱們互不干涉。這應該是正常的情況。一個民主國家，群體議政的地方在各級議會，參加者各色人等都有，代表各種利益訴求， 當然不限於知識分子。佔據了議員的位置而不為民請命，就是失職。只是在言路不暢、法治不彰、社會嚴重不公而百姓常常處於無告狀態時，才有先知先覺的社會精英仗義執言，形成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以別於一般只埋頭於本專業的知識分子。

從歷史上看，每當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起先驅作用，出現傑出的思想家。例如歐洲走出中世紀，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到科學革命，文人、思想家群體功不可沒。作為個案，知識分子對與己無關的冤案進行抗爭，擔負起為弱者鳴不平的批判角色，最出名的是法國作家左拉（Émile Zola）為德雷弗斯案（Dreyfus Case）的著名辯護書《我控訴》（J'Accuse...!），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那時法國雖已是大革命之後，民主還不完備，特別是猶太人還受歧視，左拉此舉是要冒風險，作出犧牲的，所以是勇氣和主持正義的榜樣。後來在俄國出現「intellegentsia」一詞，特指以國事民瘼為己任，專門關心社會改良，直至發動革命的社會精英。他們懷有超越自身利害的理想，並有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和行動。其中有許多就是作家。文學本身就是表現人和人心的，優秀的作家都應該是真情流露，最有赤子之心，對現實有直覺的敏感。所以在很多國家，不論是浪漫派還是現實派，虛構還是非虛構，散文還是韻文，作家（包括詩人） 往往站在社會批判的前沿，因而也常遭受橫逆和迫害，其本身的遭遇就有許多故事。十月革命之後，在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在高壓下的作家和廣義的文人仍然有令人矚目的表現。

中國古代的「士」肩負着為生民立命的責任

揆諸中國，古代的「士」大體相當。孟子主張「有恆產而後有恆心」，這是對一般老百姓而言，但又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也就是只有「士」能夠超越自己的切身利害， 為某個宏大目標鍥而不捨地奮鬥。在教育不普及的時代，少數有機會多讀了一些書，而且善於深入思考的人，就有責任為生民立命。即使在春秋時代，也不是所有的「士」都能如此，所以孔子告誡弟子：「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以後在漫長的專制皇朝歲月中，「士」與「仕」不可分，因為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為朝廷效力，也就是做官。基本上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但是即便入仕為人臣，也還有君子、小人，直臣、佞臣之分，有豁出性命也要「致君堯舜」的，有為私利而「逢君之惡」的。有以天下蒼生為念的，也有只顧自家榮華富貴，不顧「一路哭」的。皇朝循環，治亂興替，讀書人就有一個「出處（讀上聲）」的問題。孔夫子給出了一條原則：「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遇到無道昏君，就可以裝傻，消極抵制，至少可以避免助紂為虐。這就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

潔身自好，保持一點人格獨立的出路，於是出現一類人，稱為「隱士」。關於這個問題，我在〈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一文中已有詳述，此處不贅。

近代讀書人作為思想載體站在「救國」的最前沿

進入近代，中國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內憂外患不斷，始終處於不斷變革、社會轉型之中。外來的與本土的各種思潮在神州大地此消彼長，作為思想載體的讀書人站在「救國」的最前沿，作用最為突出。在朝有郭嵩燾、李鴻章、張之洞等一批名臣，還有辛亥革命志士及民國時期的某些正直的政治人物；在野有公車上書、六君子、七君子，以及新文化運動大批健將。面對日寇侵略，大批知識青年或響應國民政府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投筆從戎；或到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參加抗日，出現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志士。整個十九世紀下半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百年中，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在專業領域內成績斐然，為現代化打下基礎，另一方面遵循各自的信仰理念，為救國救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現在常常提到的「脊樑骨」，應該說從總體而言，那段歷史時期，讀書人的脊樑骨是沒有斷的，絕不止魯迅一人。當然還可以舉出種種相反的人和事例，賣身，乃至賣國求榮者，這是任何時代免不了的。但統而言之，那一百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視之其他國家在類似背景下的表現毫不遜色。

想起幾年前看過一篇文章，大意謂：中國知識分子在過去一百年尤其是過去七十年裏面對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之惡劣， 幾乎是無與倫比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真理和正義而傷亡的比例，甚至超過了上個世紀裏各國士兵的陣亡率……古今中外，哪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為了履行知識分子的責任和義務而遭受如此大的磨難，還依然前赴後繼？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絕對是對得起民族與民眾的……。我基本同意這一看法。至於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和蛻變，已有許多研究著述，我在〈知識分子的道統〉一文中也已經充分論述，不再重複。

改革開放前連保持沉默的權利也沒有

近六、七十年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為分界線，在前三十年，知識分子是沒有任何獨立的空間的。人們現在常提到的美國波士頓猶太人紀念碑的碑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殊不知，那個時期的中國，連保持沉默的權利也沒有。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找你。每次政治運動中，人人都被迫「表態」，批自己、批別人。每個人都是「單位人」，到哪裏去做「隱士」？現在披露出當時見諸報刊的許多知名大儒自虐之詞和批判別人的言論，令人震驚，不忍卒讀，他們如在世，也會自慚。這些是名人，所以言論被公開發表（發表與否

也由不得他們本人），還有無數知書識字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寫過無數此類檢討、批判以及「學習心得」，無人能跳出那張大網。記得改革開放之初，領導許諾不再搞運動，雖然許多人仍心有餘悸，不敢放言，但是大家都鬆一口氣 ——真話不能全說，至少可以不被迫說假話了！但是說真話的權利，包括保持沉默的權利，並不是那麼順利的，變相的運動也還是不斷。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有一輪被迫「學習」和「表態」，不過那時形勢、人心已經不同，齊刷刷按一個調門說假話的現象已經少多了。那時有一批短期出國進修的青年學子因此滯留不歸。我 1991 年在美國見到一名熟悉的青年，在那裏生活比較困難，而她在國內家庭條件還是比較優越的。我問她為甚麼不回去，在這裏有甚麼好？她說「可以不表態」！還有，她好讀書，這裏圖書館太方便了，她讀到了許多前所未聞的書，眼界大開，也是一大享受。精神上回不去了，物質生活苦一些，沒甚麼。我能夠理解，對於一個本質誠實善良的人，擺脫說假話表態的痛苦，享有保持沉默的自由， 有多可貴。

記者和律師仍是高危產業

從「文革」浩劫中脫穎而出的一批青年才俊曾經意氣風發， 特別表現在媒體和學術界，有一番新氣象。湧現出一批報刊， 此起彼落，前仆後繼，在繁榮學術、開啟民智、打開眼界方面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特別是有一批媒體人，關心民瘼，追求真相，主持正義和公平，成績確實可圈可點。世紀之交，我曾到廣州，袁偉時老師介紹我與一批媒體人聚談，他當時非常樂觀，說南方這個「蠻荒」之地，可能會出現三十年代上海的局面。事實證明，袁老師過於樂觀了，不久，形勢就有所變化，後來的情況盡人皆知，不說也罷。

另一個知識群體是法學界，包括律師和從事教學的專家。他們的貢獻切實而顯著，蒙受的打擊也令人唏噓。在過去「反右」運動中，除新聞界首當其衝外，為數不多的法學專家和教授幾乎全軍覆沒，其中有人一言不發，也未能倖免。因為法律本身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沒有想到，在弘揚法治的今天，法律專家和媒體仍是「高危產業」，說明知識分子要以獨立的人格，憑自己的良知服務於社會，道阻且長。

史學界在新時期的貢獻不應被埋沒

還有一個從自己的專業對開啟民智作出貢獻的領域是史學界，包括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特別是近現代史。有一批學人，孜孜以求，在人類發展規律的大前提中得出自己的判斷， 隨着檔案的開放，撥開迷霧，回歸真相，不但傳播了知識，還表現出史德和史識。我本人對歷史只是有興趣，知識有限，這些新的成果惠我良多，對啟發我反思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說中國治史的優良傳統在當代史學界得到繼承和發揚是不為過的，他們的貢獻不應被埋沒。儘管是在故紙堆裏耙梳，秉筆直書還是免不了觸犯忌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中國古代有「殉史」的，

是中國一大特色。今之學人雖然不至於因寫史而犧牲性命，但是遭到各種封殺和不同程度的打壓，甚至被扣政治帽子，卻常有發生。

至於上述本該站在社會批判前沿的作家群體，在媒體上只見各種評獎、頒獎，頗為風光熱鬧，卻很少聽見為公共事務發言的聲音，似乎不被認為是「公共知識分子」，這與其他國家， 包括前蘇聯和東歐，情況大不相同。

輕薄地諷刺、貶斥前輩知識分子是缺乏起碼的自省力

我無意對各類知識分子在新時期的表現一一評論，也不具備足夠的資料依據。只是有時見到有些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前輩的一些酷評，很不以為然。特別是現在，儘管言網時緊

時鬆，道路曲折，但是比起前三十年，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另外，由於開放，人們見識大不相同，打破了以前因無知和閉塞而造成的「真誠」的信服。說真話、主持正義的風險要小得多。但是當前，指責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軟弱、之「犬儒」，已不新鮮，而做出這種評論的，大半也是知識分子而不是草根百姓。有些人，同樣受過高等教育，對民間疾苦和社會不平，以及各種悖謬、禍國殃民之事沒有任何關注和義憤，相反，只見他們小心翼翼維護着自己已經享有的優越生活和名譽地位，與各種「潛規則」妥協，甚至加以利用。如錢理群老師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能，為求榮華富貴而不惜損人利己甚至為虎作倀，卻對當年處於「鼎鑊在前，斧鉞在後」的境地的前輩輕薄地諷刺、貶斥。這不僅是不厚道，而且是缺乏起碼的自省力。我絕不是說自己做不到的不能批評別人，例如不會寫小說就不能做文學批評；但涉及到良知和擔當，每個人都應該時時捫心自問。今天年富力強的新生代所缺乏的恰好就是前輩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責任感、骨氣，甚至起碼的正義感，而前輩所承受的高壓和身家性命的威脅，是當代中青年難以想像的。

錢楊二先生是不可複製也無法效顰的特例

由錢楊二位先生引發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擔當論述，在我有限的閱讀中，見到比較嚴肅說理的有張千帆、徐賁和張鳴先生的文章，徐、張二位還有一番爭論。但是我發現這幾位先生的意見我都同意。這不是滑頭、和稀泥（這從來不是我的作風），

而是他們所表達的價值取向實際上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 涉及的時空語境不同。由於《圍城》拍攝成電視劇，錢鍾書先生進一步在知識圈外的公眾中聲名鵲起，幾乎家喻戶曉。於是人們對他們夫婦以「公共知識分子」相期許，責其沒有更多關心社會現實，利用自己的影響發

出呼聲。另一些人則大力讚揚其獨善其身的「隱士」情懷，藉以為自己的自私、自戀、冷漠找藉口。

對錢楊二位師長本人做出評價不是本文的主題，只想指出，他們絕對是特例，不可複製，也無法效颦。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他們能夠不但「苟全性命」，而且「苟全羽毛」於亂世， 有其獨特的主客觀因素。從主觀上講，當然是清高自守，鮮有爭名逐利的欲望，也有足夠的明智和清醒，沒有事事盲目緊跟

（做到這點就不容易）。而客觀上更重要的是能被允許與政治保持距離，這是同代知識分子難以企及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 恰巧錢先生被徵調到《毛選》翻譯組，在那裏是不搞政治運動的，於是躲過了大專院校教授大規模「思想改造」，人人過關的一劫。如果當時他還在清華，如何能避免「表態」？還因為，錢楊二位先生回國不久，在當時的教授中屬於年輕一輩，尚未有著作構成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相容的體系，他們本人的名望還沒有達到被重點關注，必須「徹底清算」的地步。如雷海宗、馮友蘭、金岳霖、潘光旦等一批名教授是逃不過的。有一則流傳甚廣的「佳話」：艾思奇三進清華園，專門與金岳霖辯論，直至金「投降」，服膺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姑不論金岳霖是降於勢還是服於理，至少錢鍾書不會是被挑出來「辯論」的對象。楊絳先生先到了「學部」（社科院前身），比他受的衝擊就大一些。

他們二位自稱有「右派思想」而能忍住「無右派言論」，此後明哲保身，楊先生封筆，不創作，只翻譯；錢先生致力於注六經式的學問 —《宋詩選註》、《管錐篇》。做到這點也是要有識時務的智慧和定力的。關於楊先生的《幹校六記》，錢先生說過應該還有第七記，「記愧」，說明他對於這種沉默並非心安理得。

改革開放初，七十年代末，「學部」從科學院獨立出來， 成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不知幾顧茅廬，敦請錢先生出任副院長，錢力辭。最後達成協議：不管事、不開會、不上班、不要辦公室、不要秘書，純粹掛名。以後多少年，果然做到，得以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埋頭做自己的學問，未捲入社科院任何是非。這絕對是特殊中之特殊：首先是錢本人的學識淵博到有足夠的震懾力，使胡喬木這樣的「黨內第一支筆」由衷仰慕， 而且他本人真心不想出仕，並非待價而沽；另一方面，他遇到的是胡喬木這樣的學官，胡本人複雜的多面表現此處不論，至少他還算是讀書人，對學問有所敬畏，知所進退（他曾說在錢先生面前不敢多說話，怕露怯），知道即使純粹掛名，錢鍾書這個名字也能為社科院爭光。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大環境，正是萬物復蘇，撥亂反正，「臭老九」翻身，上面大力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之時。此三者缺一，錢鍾書先生不可能保持那樣的身段。不過，在關鍵時刻，例如八十年代末，錢楊二位並不是沒有是非，沒有態度，完全冷漠的，只是知之者少，而且不宜張揚。九十年代之後這二十年，錢先生開始遷延病榻，繼以愛女早逝，楊先生心力交瘁。在遭受人生至痛的情況下，期頤之年，以讀書寫作為精神寄託，達到超脫的境界，又何忍再予苛求？至少，他們還有起碼的傲骨，沒有攀附和媚俗之舉。

作為個人，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完全有不問世事，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權利。若有足夠的學養，專心注六經，對文化也可以有所貢獻。文人相輕，中外皆然，互不服氣，互相妒忌， 都不足怪。但是有一條底線。在很多國家，不論平時個人之間有甚麼矛盾，如果一位同行受到不公平的打壓，一般都會視為危及本群體的權益，物傷其類，以各種方式打抱不平，而不是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說不定為少一個競爭者而暗中落井下石，這就是底線的區別。如果有幸掌握最多精神資源的群體心靈長了老繭，失去是非善惡之判斷，甚至公開宣稱不相信公平正義，為自己的冷漠自私心安理得，對他人的真誠冷嘲熱諷，這種傾向若成為主流，就是全民精神的墮落。無論如何， 今天的時代與我的師長輩所經歷的已大不相同，人類總是要向前進的，中國也不能自外於人類。方今朝野各行各業中，正當盛年、可以稱得上知識分子的諸君，進退出處如何選擇，只有各自憑良心了。只是個人不論如何選擇，不必拿先賢說事。

2016 年

周有光文集代序

周有光[6]老先生一生的經歷差不多濃縮了中國的二十世紀近代史。我們這個民族多災多難，整個二十世紀內憂外患不斷。前半是外患為主，而後半主要是內憂。一波又一波的折騰，對民族精華的摧殘甚於任何一個朝代。有人比喻歷次運動就像撇奶油一樣，一次運動撇掉一層，最後幾乎剩下清湯。周老先生是沒有被撇掉的倖存者。能倖存到今天，是他的幸運，更是我們民族之幸。

由於醫學的進步，現代人的壽命比以前長了，百歲以上的老人也越來越多。但同樣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這樣的大智慧和貢獻。另一方面，中國百年來有大智慧、大作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師長輩就可以數出來一些，但是多數都不幸備受摧殘，壯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時我隨便舉出一位來，例如葉企孫先生，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學家，同時也是非常優秀的教育家，1949 年以後一段短暫的時期曾任清華教務長，但是不久就不斷挨整，直到文革中淪落街頭，形同乞丐。這樣悲慘的例子數不勝數。如果這一批民族精英都能在正常的環境中得到正常的發揮，他們也許活不過百歲，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與周老先生相輝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 也有幸運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說的，他如果沒有被調到北京來做文字改革工作，繼續留在復旦教經濟學，絕對逃不過「反右」，那就說不定被發配到哪裏，受到怎樣的摧殘，說不定甚麼時候就填溝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國語文現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沒有多少發言權。周老在這方面的成就、貢獻和影響當然非常了不起。不過他晚年對文化學、對人類文明的探索更顯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從第九集到十五集都是與這方面有關的。這一點與他的長壽也有關係。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賦，例如音樂、繪畫、詩歌等文學藝術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對人生的徹悟，特別是不僅限於個人而是對人類發展規律的探索達到大徹大悟，非有淵博的知識和很深的閱歷不可。不是單憑書本知識，在書齋裏能悟出來的。所以周老說他的生命從 80 歲開始，這不僅是幽默，還是有一定深意的。

單是年齡和閱歷也還不一定能達到這樣的智慧和覺悟。這需要幾個條件：

（1） 從少年時期的教養和薰陶形成一定的底色 ——對真理的追求；對知識探索的興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對大社會的關懷；在道德上的正義感。有了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可以走錯路，但一旦發現錯了，決不自欺，不為世俗的種種所羈絆，就能夠惟真理是從。

（2） 博大精深的知識。在高層次上各種專業知識是可以融會貫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載，放眼全球， 但都是有扎實的事實為依據，他原是學經濟學的，更重視數據，所以他的結論都不是空疏之論。這點很重要，事實 ＋ 邏輯 ＝ 常識，常識的積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對

甚麼都蜻蜓點水，隨便發議論，大體是大而無當的空疏之論。深鑽一門或多門專業，那麼條條大路都可以通向人類發展的規律。這是我體會的周老的做學問和追求真理之道。

（3） 更重要是完全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寵辱不驚。很多人自稱淡泊名利，其實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為個人，但還是擺脫不了中國人仰望明君的慣性思維，往往會為某位權貴人物的幾句話影響自己的憂喜、判斷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經徹底擺脫這一切，所以總能對自己的看法充滿自信，面對種種荒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無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類發展的規律是他的信仰，他堅信凡脫離軌道的早晚要回到軌道上來。

作為超過百歲的老人，周老最鮮明也是最可貴的特點是一直關注世界的最新發展，站在時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這同當前有些人處處強調中國特色成鮮明對比。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地球村的形勢下，人類需要面對的共同問題遠遠超過各民族狹隘的利益。強調「中國特色」往往是為一些負面現象辯護，掩蓋落後。我還有一個觀點和周老不謀而合，那就是反對把所謂「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東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為核心的「東方文化」的說法實際上是「漢族中心論」，連少數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漢文化是一回事嗎？古來新疆對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亞還是中國內地？所以自以為是「東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謂「西化」是站不住腳的，只能固步自封。

當前我國在思想上兩大危險，一個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我現在用國家主義，而不用民族主義，因為我們是多民族國家， 含義容易混淆），一個是民粹主義。這兩個正是當年希特拉（Adolf Hitler）法西斯統治的兩大思想基礎。納粹一詞就是德文國家社會主義的縮寫。我說的在我國最近的表現就是借釣魚島為題的打砸搶事件。這種情緒被煽動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壞作用，名為愛國，實際禍國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從世界看中國，不僅僅是哲理性的，在當下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的社會現在又處於轉折點，在長年謊言蒙蔽下，啟蒙工作還是任重道遠，特別需要像周老這樣的智慧之光驅趕蒙昧的黑暗。即將出版的《周有光：我的人生》從《周有光全集》十五卷中精選周有光先生與人生、信仰與研究有關的故事，彙集成一本濃縮了他的人生經歷的作品，讀者可以從吉光片羽體察和了解作者不尋常而積極有為的一生；了解他貫穿於實際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知識和智慧，理解他如何超越人生的狹窄和局限，將人類美好的目標變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本書中所選擇的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往往從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開始，但都包含着豐富的、對生活細節獨特的觀察體悟角度，別致的人生情趣，和豁達而開闊的人生視野。在幽默機智、簡潔明瞭、清新宜人的文字中，透露出他對生活和學術研究方面獨立、嚴肅和認真的思考和參悟能力，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

我希望這本書為更多人喜愛，並不斷從中得到啟示和激勵。

2013 年 7 月

近代中國各個時期留學生

——在加拿大一次華人集會上的講話

我講的不是中外交流史。只就自己注意所及，對近代以來不同時期中國留學生 ——包括回歸的和旅居國外的 ——與國內的關係和所起的作用發表一點自己的感想。因為我自己沒有留過學，最長的時間是兩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每次不到一年， 所以只能從中國這一頭的體驗來看。

另外，我講的只限於留學生，其他的移民不在這個範圍。

近代中國一般從 1840 年鴉片戰爭說起，以後開始西學東漸，這不必贅言。留學生大體分幾個階段：

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到1949年以前

（1）1872 年在容閎的建議下，首批幼童赴美，但留美幼童沒有學完就被召回（1881 年）。此時清朝的上層士大夫還抵制留學，認為是苦差事，出去的貧寒子弟較多，有的官宦人家子弟上了派送名單還找替身。我的一個親戚的父親就是當替身出去留學的。他原是一家高官的門房的兒子，這家被指派送一名子弟留學，就讓門房的孩子頂替去了，回來在外交部任職。這些人回國職位大多不高。不過還是有詹天佑這樣的傑出人才。這個時期還有福建船政學堂留歐，培養造船業的工程人員和海軍軍官，嚴復就是留英學海軍的。

（2） 甲午戰爭之後，又有一個留學高潮，晚晴派遣留學日本較多，有官費有自費。不過當時清朝已經是末路了，官費送出去的留日學生大多數搞反清革命運動， 極小部分學科學技術，回國從事技術工作或行醫。（日本醫學比較發達，在中國有歐美學派和日本學派的西醫。）歐美留學生大多傾向科學、教育救國，日本則起了西方文化二傳手的作用。

（3） 庚款留學生影響最大7。

《辛丑條約》賠款共 45,000 萬兩白銀，分 39 年還清，

年息 4 厘，本息共 98,223 萬兩，美國分得 32,939,055 兩，合 24,440,778.81 美元，佔 7.3%。美國退款共11,961,121.76 美元，從 1909 年 1 月開始實行，到1940 年止，逐月退還。

1911 年成立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此之前，從 1909

年起已經派過三期，共一百八十人。到 1928 年，國民政府提出教育中國化，凡是外國人在華辦的學校都由中國人管理，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成為正式的國立大學。抗日戰爭中，美國於 1943 年宣佈廢除不平

等條約，放棄庚子賠款，由庚款建立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全由中國人管，繼續資助留學生。庚款資助的留美學生大約三四千人。在各種動盪中，包括抗日戰爭，辦學經費源源不斷。

庚款留學規模大，時間長。在美國帶頭之下，同時經過中國政府的交涉，英國、日本、法國都相繼退款辦學。所以庚款留學不止是留美，當然留美人數最多。這批留學生對中國現代化貢獻最大，影響深遠，有以下幾個特點：

(a)　派遣留學生不是盲目的，確實是在全國招生，經過考試，選拔優秀生。例如第一期報名六百零三人，只取了六十三人。有了清華學堂之後，更加先有正規的基礎學習，然後出國，一般都可直接插班到大學二三年級，接着讀研究生。成材的效率比較高。

(b)　培養的目的比較明確：「吸取外人菁華，以灌輸文明於祖國」，「截他國之長，以補己國之短」。學習科目以理、工、農、醫、商為主，文、史、哲、政法次之，大約 2：1。

(c)　絕大多數學成回國，在各個領域起骨幹作用。無論哪個領域的開拓者都有留學生的身影：自然科學、工程、實業、金融、新聞、文化、教育以及政府官員，特別是外交方面的官員，等等。最多、影響最大的是教育。無論是學甚麼科的，分佈在教育界的比例最高，對辦學制度、學科建設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教育的特點是可以培養一代一代的學生，所以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

一般認為 1927 年至 1937 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黃金十年。對此，這批留學生功不可沒，可以說是人文薈萃，群星燦爛。我們現在可以舉出來的大師級人物絕大多數都是這批留學生：胡適、梅貽琦、馬寅初、葉企孫、蔣夢麟、潘光旦……按比例，成材率最高。

(d)　動機和效果問題。美國方面的動機：培養對美友好的知識精英，影響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態度（這是受到 1905 年中國反美浪潮的刺激）。所以美國堅持退款一定用於辦學，不得他用。

中國方面也需要培養建國人才。此時的清政府已經有所覺悟，痛感自己落後，所以才有「截他國之長，以補己國之短」的想法。當時的駐美公使梁誠是一個很有眼光的外交官，他自己就是幼童留美的學生，所以對留學的好處有切身體會。他向美國交涉，力爭退款，並且贊成辦學。所以這是兩廂情願。從客觀效果看，對中國更加有利。

教育界絕大多數是留美的，留英次之。留日的在這個階段較少，因為日本總想附加條件，加以控制。留法的在文學、藝術領域比較多。留日的回國後多數從醫、辦實業，從政的也不少。

抗戰勝利以後的留學生實際上是前一階段的繼續。用庚款成立的中華教育基金還沒有用完，另外還有一些其他來源，家庭經濟寬裕的，自費留學也增加起來。大部分 1945 年以後出去的學生都是準備回來的，但是由於內戰以及國內形勢的突變，就產生了因政治取向而選擇去留的問題。

（4） 總結 1949 年以前「海歸」的作用（除了庚款之外，還包括其他方面資助的，例如教會、基金會）。

(a) 外交：知道如何與外國打交道，出了一批早期的傑出外交官，如伍廷芳、王寵惠、顧維鈞等。

(b) 中國現代化建設：這個特別重要，遍佈理、工、農、醫、實業、金融、新聞、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各個領域。

(c)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建設從無到有，效率高，很快出成果、出人才。

(d) 作為西學東漸的載體，站在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高處，為新文化奠基，引進各種思潮，形成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引進的精華結晶為科學和民主。

(e) 這批人在抗日戰爭中成為最艱苦條件下的精神力量。

（5） 主客觀條件

(a) 主觀條件：這些人在出國前都有很深的中國文化修養，同時對近代中國之各種弊病刻骨銘心。無論哪一行都是抱着改造中國、振興中華的目的。由於自身的文化修養較高，對外來文化比較懂得取其精華。

無論從中國士大夫的傳統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角度，都保留了一定的人格獨立，就主體而言沒有被權勢所收買。即使進入政府的，貪官比較少， 也仍然保留了獨立的見解，如胡適、傅斯年。

庚款的條件是學成必須回國，實際上也很少人想留在國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化不了」，難以融入西方社會。同時，他們本來就有報國之志，回國後也主要在國內機構服務，極少數在外國公司工作，從社會地位來講，「洋行職員」在那個時期是被看不起的。到四十年代末，有些人滯留不歸是政治原因，但這些人心理比較矛盾，過得並不舒暢。

(b) 客觀條件：直到二戰後，歐美國家存在一定的歧視；華人得到高級職務的機會少。這批留學生大多出身中上層家庭，有很強的民族自尊，而回國則物以稀為貴，物質待遇上不亞於國外可以得到的，社會地位則更加優越。

無論是晚晴、北洋和國民政府都需要用人，一般風氣對文化人比較尊重。「海歸」大都受到重用。私人領域辦學、辦實業也比較自由，自主創業機會較多，所以發揮的餘地比較大。他們回國大都能一展所長。

另外，沒有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當然還有許多舊禮教、舊習慣思想的阻礙，而這批留學生恰好是新思想的載體。他們做的正是「吸取外人菁華，以灌輸文明於祖國」，所以被稱為「偷天火的人」。他們引進各種思潮，當時有百家爭鳴的空間。不利條件是政局動盪，政府財政拮据，辦不了大事。

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

過去留學生主要是學成回國的，很少作移民想，這點與底層勞動者不一樣。大批滯留海外是 1949 年以後。

（1） 滯留海外大多是不得已的，心情矛盾。他們對國民黨失望，而且在台灣狹小的空間也難以立足；對共產黨不能認同，實際上也難以見容。在國外謀職糊口可能不成問題，但是總感到流落他鄉。即使經濟上有一定的保障，也有一定學術地位，例如在大學任教等，但總有一種孤臣孽子的心理，因為他們還是有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有一位已經進入名牌大學相當受尊重的老教授寫的詩中有「忍教小兒學胡語」句，很能代表這種心情。

（2） 五十年代初，受到國內新氣象的感召，有留學生開始回國，想一展建設新中國的抱負，隨即為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嚇退，已經回來的除少數外都未能逃避厄運。

（3） 當局並不一定歡迎大批留學生回國。原來在國內的留學生或僅在國內受過「洋教育」的，都不受信任，需要經過徹底改造，對國外回來可能造成的思想影響更有戒心。大體上對兩種人有選擇地爭取回國，一是有國際名望的，可起宣傳作用；一是急需的科技工程人才，特別是軍工方面的。所以軍工方面反而對階級出身放寬，對人文和社會科學基本上是排斥的。當然， 無論何種人到「文革」都逃不過一劫。

八十年代出國潮和移民潮

經過長期閉關鎖國，一旦開放，出現了阻擋不住的出國潮。

（1） 八十年代出去的青年留學生滯留不歸的比例空前高。他們看到外部世界和宣傳的反差太大，有上當受騙之感。他們普遍對外面的感覺，用一名學生的話概括是richer、free（更富、更自由）。不少人是長期受迫害，

或者父母受迫害，感到寒心而逃離。另外，國外教育資源豐富，容易拿到獎學金，學習環境不可同日而語。

（2） 此時與戰前相比，客觀上歐美國家排外和種族歧視已大大減少，而且鼓勵中國改革開放，對中國留學生給予種種優惠待遇。從主觀上，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這一代人那種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和優越自尊已經十分淡薄，能夠較快適應和融入西方社會。

（3） 一部分人還是選擇回國，想乘當時改革開放的東風， 對改革作出貢獻，這點與早期的留學生有相通之處。實際上曾經起過作用的主要是經濟專業的，引進現代經濟學和市場經濟的觀念。一部分進入政府，企圖影響政策，勵精圖治；另一部分發展民營企業，相當成功。在教育學術界也有一些影響，不過不斷遇到意識形態的衝突，困難較多。

（4）1989 年是一個轉折點。本來準備回國的，又留下一大批。

（5） 當代的大背景是全球化，人才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民族國

家界線不那麼鮮明，個人的出路是決定性的， 世界公民的觀念開始普及，這無可厚非。如果中國本身不能吸引人才，而且浪費人才，這只能歸咎於體制、政策環境。除非大敵當前，戰爭時期，沒有理由要求國民犧牲。但是大批精英流向國外，對國家民族來說的確是損失。

九十年代以後的變化

（1） 八十年代的留學生大多在國內讀過本科，比較優秀， 在國外也刻苦學習，並且生活比較艱苦，還要勤工儉學。而九十年代以後的新現象是留學生年齡越來越小，自費生比例增加，主要是一批新貴和新富，把子弟送出去鍍金。有的就是在國內高考落榜而出去，學習目的也不明確，學校要求也不嚴格。有的國家有些學校以中國留學生為賺錢的來源。過去留學生中也不是沒有紈絝子弟，但是極少數。這樣大批的低素質、高消費的中國留學生是前所未有的。

（2） 另一部分不是紈絝子弟，而是由於國內的教育體制日益扭曲，學校風氣日益不利青少年成長，父母希望子女在比較健康、正常的環境中成長，也儘量爭取條件把子女送出去。

（3）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而不少國家經濟下滑，就業機會減少，「海歸」似乎又多起來。不過一部分海歸實際上是在跨國公司工作，因為有語言和對國情了解的優勢，被派駐中國。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受到客座教授的特殊待遇。但是他們多數已經入了外籍，或有長期居留證，隨時都可以離去。

當前整個體制和社會環境與二十世紀前半葉大不相同，所以儘管「與國際接軌」成為主流的口號，但是國人已經沒有那種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渴求，當政者甚至有種種疑慮和排斥， 海歸極少有可能像庚款留學生那樣真的「吸取外人菁華，以灌輸文明於祖國」，即使有心也無能為力。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想做哪國人，選擇自己認為最好的發展前途，可以用腳投票。就是有人為了呼吸新鮮空氣而移民，也可以理解，無可厚非。到了國外，不論是取得綠卡還是入了外國籍，對故國還有感情，念念不忘，想作出一點貢獻，也是人之常情。完全成為住在國國民，不再關心中國事， 只顧自己安穩度日，也沒關係，大多數老百姓都是如此。只有兩種情況不可取：一種是在中外兩邊以吹牛矇騙抬高自己身價，謀私利；另一種更惡劣的是有意與國內的權貴、貪腐勢力同流合污，為阻礙中國匯入人類進步文明製造輿論。自己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可以恣意批評住在國，卻力勸中國不要走民主道路，為專制唱讚歌。自己享受着新鮮空氣，竟然著書吹捧中國制度最適宜治理污染。中國現在處於非變不可的轉型關鍵期，問題很多，阻力很大。一些選擇留在這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冒着風險，頂着壓力，做着艱苦的努力，希望挽救民族的沉淪和墮落。在海外享受了優質教育資源，有了謀生或創業的能力和機會，可以不參與，可以保持中立；如果覺得在海外不如意，想回國來發展，當然也是自己的自由，但是希望能以所學對推動社會進

步作出積極貢獻，而不是助紂為虐。

現在中國有兩種有害的思潮：盲目排外的極端國家主義（例如釣魚島事件的打砸搶）、民粹主義（以反社會不公為名， 反對市場經濟，鼓吹倒退到高度集權）。在外面的華人當然希望祖國強大，但不要因此不顧事實，不分是非，鼓吹倒退，幫倒忙。

2013 年

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

——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

本文試圖將中國知識分子 ——略相當於古之「士」——的精神演變從一個角度理出一條脈絡，探求出路。重點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蓋一切，當然也不可能孤立於大的歷史發展背景。

中國「士」的黃金時期在春秋戰國，真正的「百家爭鳴」於此時發源。至今國人引以自豪的「幾千年的輝煌」，從思想層面說，實際上就是那個時期所創造以及後來的流風餘韻。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專制制度，到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一家之後，思想開始受到禁錮，難以出現在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但文化學術也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中國農耕文明達到的高度和精緻程度為世界之最，適應這一文明的專制皇朝制度也設計周到、高度成熟。所以憑武力征服中原的遊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漢化。當然同時也給漢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又由於地理的特點，可以長期封閉，「六合之外，姑存不論」。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中國是唯一未中斷的文明古國， 原因在此。所以筆者常說中華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歐洲史家把歐洲近代史從十五世紀中葉算起，因為那時開始出現與中古告別的文藝復興、宗教改良，以及各種新思潮，為後來的啟蒙思想家提供資源。中國的近代史始於十九世紀中葉，從那時起，極端封閉的社會被打開了一個口子，從此「以夏化夷」的途徑逆轉，西學開始東漸。所以中國的「近代」比西歐晚了四百年。以發展道路論，至少從明朝開始，就拉開了差距。這種分法不是主觀隨意的，也不是以歐洲為中心，而是根據文明發展的客觀標準。

源於古代的傳統

中國古代豐富的哲學思想，與古希臘差不多同步。不過西方的哲學重理性、邏輯，通向自然科學，造成以後的科學和生產力的大發展。中國的哲學通向道德倫理和政治，從「修身」到「治國平天下」，傳統的讀書人都致力於政治文化。正因為如此，人際關係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發達，而自然科學、市場經濟和工業化難以發展。

先秦時期，諸子百家是獨立自由的。孔子周遊列國，遊說君主採納他的意見，一國不行，就到他國，困厄、飢餓，在所不辭，到處碰壁，「吾道不行」則寧可「乘桴浮於海」，也決不妥協。他要求見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張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決不放棄自己的學說來迎合在位者。「鄉愿」被夫子斥為「德之賊也」。孟子的言論就更加鮮明，與「王」談話是教訓的口吻，一副「帝王師」的架勢，是後來的「士」所豔羨、嚮往而不可得的。孟子表達了當時儒家治國的最高理想，現在經

常引用的「君輕民貴」之類的話雖然不能附會為現代民主原則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級制度正在發展鞏固的時代，提醒在位者重視「民」，已屬難能可貴。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徹的風格提出的理想社會和對君主提出的要求是專制君主不願意也做不到的。

難怪到了朱元璋那裏，感到難以忍受，就大力刪《孟子》，幾乎把今天看來閃光之處全部刪掉[8]，甚至一度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

一般都把「春秋」與「戰國」相提並論，實際上到戰國後期，司馬遷所推崇的那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氣度已經大減，變得功利和實用，以《戰國策》為代表，一批舌辯之士用舌頭混飯吃。他們只能是「謀士」而不是帝王師。所以總是準備幾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選擇，其目標是助王稱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義。他們講究的是「術」，而不是「道」。從道德層面看，也不再堅持原則和人格獨立。自此以後，中國的讀書人日益與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經典著作也僅僅被當作治國的工具。

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如果秦皇朝得以鞏固，也許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國，但是時間太短，沒有來得及樹立自己的道統。到漢武帝從董仲舒建議獨尊儒家之後，在道統上儒家學說統治了兩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學對皇帝有所約束，但是儒家所主張的以德治國、行仁義、「內聖外王」那一套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是外儒內法，並雜以黃老之術。如毛澤東從柳宗元說：「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縣反對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專政否定仁政。不過對讀書人說來，還是以儒家思想為精神支柱，無論是倫理道德還是治國的理想都是從孔孟書中汲取資源。而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從政，特別是隋唐行科舉之後，更是如唐太宗所說，「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

這樣的歷史軌跡造成的「士」的精神傳統有三大突出的特點：

（1）　「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其依據的現實條件是「學而優則仕」。能有資格「憂國」的， 大小都做過官。即使暫時不「居廟堂之高」，而「處江湖之遠」，還是有官職，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憂國」，還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儘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還是視同己有，因為捨此無以安身立命。

（2）　重名節，講骨氣。「士林」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價值體系和判斷標準。「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訓是賴以立身的道德準則，從而鑄就了讀書人的骨氣，歷經朝代更迭而不變。他們自認為是儒家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顧炎武在明朝敗亡之際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意把「天下」和「國家」分開，他明確說「國家（指朝廷）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沒有責任的。那是因為朝代更迭他無能為力，只能努力維護作為精神支柱的道德體系。當然這裏「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儘管定於儒家一尊，對孔孟之道的傳承和解釋權在碩學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論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從沒有過「君師合一」，更沒有「漢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論」之說。「士」一旦入朝成為「大夫」，潛意識的還是繼承了為帝王師的想法，以「致君堯舜」為己任，還是努力企圖用道統來影響和規範皇帝。他們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評判標準，　　歷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視「佞臣」，不少當紅的寵臣位高權重，卻為同僚士林所不齒。文天祥在殉難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甚麼皇帝的訓誡。鯁直之士「雖千萬人吾往矣」， 是因為自以為真理在握，有這份自信。所以，儘管有殺頭、滅族的危險，面折廷爭，冒死直諫之士代代不絕。另外，君臣都重視身後名，對「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很在乎。這一點也是堅持原則的動力之一。

在學術層面，由於有一定的獨立性，較少受皇權的干擾，即使在「注六經」中也還能形成不同的學派，特別在唐中葉以後，書院興起，至北宋蔚為大觀。無論在朝在野，學者和書院對道統的傳承和豐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還能發展出疑孔、非孔之學。另外還有一條隱逸之路，在「邦無道」或自己想遠離「帝力」時， 還可以歸隱田園，保持一定的精神獨立，並創作出無比豐富的、燦爛瑰麗的文學藝術珍寶。「不為五斗米折腰」成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論是否能做到，卻無形中形成一種精神上的嚮往。

（3）　與以上二者並行的還有另一種傳統，我稱之為「頌聖文化」。就是把愛國與忠君合二為一，而且忠君是絕對的，「雖九死其猶未悔」。見用則「皇恩浩蕩」，「感知遇之恩」，萬死不辭；獲罪則不論如何冤屈，「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出自韓愈《幽拘操》。韓愈是最正統的儒家道統維護者，也應算是直言敢諫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論佛骨表》，遭貶黜在所不辭，「肯將衰朽惜殘年」！他以同樣的忠誠作《幽拘操》，想像當年周文王被殷紂王拘禁時的心情，寫出了這句也成為千古傳頌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嚮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時也有《歌》傳下來，　註家有不同解釋，此處不論。可韓愈覺得他應該抱這樣的態度。這種發自內心的絕對服從，其倫理的依據就是儒家的「三綱」，現實的基礎則是人身依附。因為在那種制度下，讀書人除了「報效朝廷」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用其學。冒死直諫、犯顏上書，都是出於忠心，就事論事，絕不是反對皇帝本人。無論哪朝哪代多麼開明的皇帝都不會容忍對本人公開的否定，連「腹誹」也是罪。為人臣者基本上自覺遵守這一條，因而天王永遠「聖明」的頌聖文化流毒久遠。

西學東漸以後的變化

中國近代史開始的標誌是，以鴉片戰爭為契機，古老的農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業文明，無法再照老路對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這「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促發了民族的猛醒和震盪，「士」的心靈受到

了空前的衝擊，少數先知先覺者開始新的探索，中國人的現代「啟蒙」於此開始，到清末民初漸成氣候，新潮不可阻擋。

這一探索持續百年。由於面臨的問題與以前完全不同，「亡國」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與「滅種」聯繫起來，那時所謂「滅種」，不是真的如希特拉對猶太人那種「種族滅絕」，而是指整個華夏文明的存續問題。所以讀書人的危機感特別強烈，探索也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傳統因素還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 憂國憂民的擔當與（2）骨氣和勇氣，在新的條件下賦予了新的內容，驅使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復興拋頭顱、灑熱血。在譚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產黨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傳統精神。不過他們不是為維護原來的「道統」，而是力圖打破它， 朝廷和國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為救國必須推翻朝廷，至少要徹底改造之。這種威武不能屈的骨氣與從西方引進的「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社會良知」可以相通，並相互加強。

他們告別的是上述第三點 ——頌聖文化。這是「新文化」的精髓，從嚴復的「開啟民智」[9]到梁啟超的「新民說」到五四一代人為「德先生、賽先生」的吶喊，都是企圖喚起民眾擺脫在頌聖文化下培養出來的奴性與愚昧。那種「鐵肩擔道義」的精神是傳統的，而所承載的觀念和思想是新的，從外面引進的。這是一場持續的啟蒙。如果說，中國曾經有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的時期，那就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經歷了百年的「新文化運動」（廣義的），現代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等事業初具規模，同時出現至少兩代在思想上和學識上堪稱貫通中西的知識分子。即使在抗日戰爭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文化教育沒有停頓，還在繼續發展，新舊結合的「士」的精神沒有出現斷層。甚而可以說，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中優秀的部分與新的思潮相結合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

現在常為人們所稱道的西南聯大那些人和事可以為代表， 當然不止西南聯大，還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學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現。那時政府也是專制，也有高壓，甚至還有暗殺，但是總體上，知識精英還是保持了氣節和一種價值共識。張奚若在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發言被蔣介石打斷，就拂袖而去，下次開會可以退回差旅費，拒絕參加；馬寅初公開揭露孔祥熙，把他罵下台；直到 1947 年已是內戰方酣之時，傅斯年公開發表文章《這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半個月後宋子文就被撤職。1940 年馮友蘭受西南聯大教授委員會的委託給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寫的那封信最集中體現了這種傳統與現代精神的結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達指令，要審核大學的課程和實行統一考試，受到全體教授的抵制，委託馮先生起草回絕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諸葛亮《後出師表》的語氣，內容是據理批駁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貫穿現代教育獨立於權勢的理念，擲地有聲。特別指出如果按此規定辦理， 大學將等同於教育部高教司的一個科，大學教授在學生心目中將不如科員，受到輕視。結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頂回，學校保持了獨立。這裏講的是一種精神。至於個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學說，在國家分裂時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是另一回事。

講「新文化」還應包括另一個群體，就是抱着實業救國理想的一批

實業家和他們成就的事業。從張謇到盧作孚到陳光甫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來。後來他們被歸入「民族資產階級」。他們不同於任何時代和任何國家的一般的企業家，因為他們身上也承載了中國傳統加外來先進文化，辦實業和金融帶有濃厚的「救國」目的。近年來從國外引進並自二十一世紀開始時興的「企業社會責任」（CSR）之說，其實在那個時候的企業界是普遍默認的一種價值觀。「為富不仁」、「見利忘義」、「背信棄義」都是為業界所不齒，一旦犯此惡行，難以在本行業立足。特別是在日寇壓境時，不少人毀家紓難，不當漢奸是區別良莠的底線。現在「儒商」成為一種時尚，成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裝飾。而在那個時期，不少企業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讀書人，他們的傳承與修養以及本身的優點與弱點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們的經濟實力支持了許多文化教育事業。這裏不談他們對民族經濟所作的貢獻，只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應該也是「啟蒙」的一部分。

這一百年「啟蒙」並非持續不斷，而是常為內憂外患所打亂。當時的環境是列強環伺，內政混亂，啟蒙和反帝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啟蒙需要向西方學習，反帝的對象則是西方列強， 從這裏引發出難以化解的矛盾。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之說似還不夠準確。最初啟蒙就是為了救亡，毋寧說是日本侵略打斷了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最後是革命壓倒了啟蒙。

1949年以後的「政教合一」與頌聖文化的新發展

六十年來，軍事成就最大：新政權剛建立十五年，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就造出了原子彈。在軍事領域對國際先進水平跟得最緊；經濟建設則走了大彎路，以至於到 1976 年瀕於崩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賴走向市場經濟和向外開放之力，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只是已經到了拐點，可持續性發生問題； 政治改革步履維艱，始終邁不出關鍵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則破壞大於建設。這種破壞是漸進的、逐步加劇、逐步擴大範圍，到「文革」達於全面摧毀。

以中國「士」的傳統而言，這六十年是「頌聖文化」一枝獨秀，發展到空前規模。為甚麼這麼快就達成輿論一律，多少碩學大儒否定自己積幾十年學而思、思而學之所得，放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在甚麼程度上是被迫，甚麼程度上是自願？這種情況是怎樣形成的？試從客觀、主觀兩方面因素探討：

客觀形勢

中國再一次出現大變局，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制。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中國讀書人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這是最根本的變化。如果說新政權廢黜百家，獨尊「馬克思主義」（加引號是因為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馬克

思主義），那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不在學院，而在廟堂之上。不但「朕即國家」而且「朕即真理」。過去天下士子考科舉，需要熟讀經書，而不是當朝皇帝的御筆批示。今之「政治學習」需要熟讀的不是馬、恩經典著作，而是領袖言論。「導師」也說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盤「馬克思主義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盤西化。這當然不可能，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如何結合？一種外來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資源上，結果不是嫁接到經過百年啟蒙，已經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學為目標的新文化上，而是越過兩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裏，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與馬克思的學說關聯甚少，而是「史太林加秦始皇」。這裏面多的是歷代帝王的統治術加現代集權，少的是以民主憲政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學。在取得政權之前則是嫁接到陳勝吳廣 ——李自成，「文革」期間則是二者的奇異結合。

以此為標準，進行全體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對是非的判斷權全部收繳上去，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愚民政策臻於極致，讀書人失去獨立思考的權利，逐漸成為習慣，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縮」的基礎上的，就是堅信自己是正確、有理的，如果這點自信沒有了，無所堅守，自然再難談甚麼骨氣和「浩然之氣」。於是「士林共識」沒有了，一人一旦獲罪，在親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徹底孤立，這是最可怕的境地，猶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門。過去中國的皇權體系，「政、教」相對說來是分離的，現在反而把對信仰的操控與政權合一起來，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論是大倒退。

做到這一點端賴持續不斷的、對全體知識界貫穿始終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初首當其衝的是最高級的知識精英，即大學教授和科學院的高級研究人員。他們之中被認為有「歷史問題」的，在之前的「鎮反」運動中已經遭難，知名的如雷海宗、葉企孫等。1950 年，燕京大學一位美籍教授回國，學生為之送行，送了一塊「春風化雨」的匾，受到上面嚴厲批評，燕大的黨支部做深刻檢討。借此，清華、燕京等與外國關係較多的大學展開了「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運動。抗美援朝開始後， 發展為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的運動。大規模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從 1952 年開始。各大學學識淵博、平時備受尊崇的教授們在大會小會交代歷史、檢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學術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難「過關」。下面坐的多為自己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幫助」老師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反動性」。緊接着「三反、五反」、文藝界批判電影《武訓傳》、「反胡風」、批判「紅樓夢研究」等等，再後來就是眾所周知的「陽謀」，精神領域無一倖免。許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選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今天看來，其自貶、自虐的程度慘不忍睹。刊登出來的是知名人士，實際上大小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寫過無數此類今天令自己汗顏的「思想檢查」（筆者當然不例外）。從此獨立人格蕩然無存，不但是非標準， 連審美標準也不再有自主權。

主要批判的內容恰好就是支撐讀書人精神的上述第二點傳統 ——重氣節。具體批判的重點為：「清高」（自以為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

你）、「骨氣」（有階級性，反對剝削階級宣揚的反動「骨氣」，對「人民」必須「折腰」），以及「舊」道德（家庭倫理、朋友信義等等都以階級劃線，反對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乃至鼓勵投（革命之）機（轉變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機」之嫌）。

另一條主線是追隨蘇聯。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氣大傷的改組就是依照蘇聯模式；那一次的「調整」特點是高度實用主義， 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純自然科學）也服從於工科需要。許多社會科學的學科乾脆取消。從此大學失去自主權，中、西的通識教育傳統都被揚棄，只生產「聽話、出活」的工匠， 再無獨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學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蘇聯大肆宣揚李森科（Trofim Lysenko）、米丘林（Ivan Vladimirovich Michurin）時，中國生物學界亦步亦趨批判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不少知名科學家放棄科學真理加入批判隊伍，而以談家楨、胡先驌為代表的堅持科學良心的科學家遭同行的公開批判。但是蘇共二十大前後，李森科在蘇聯失寵，於是中國科學界也奉命開始轉向。當時的科學院院長竺可楨「代表有關方面」向他們道歉[10]。僅此一例已可見即使在重實證的自然科學界，政治已經壓倒科學真理。多數知名科學家也屈服於高壓之下了。以後順應政治鬥爭需要，科學泰斗公開發表文章肯定「畝產萬斤」，原子物理學家發表文章論證大氣中核試驗的放射微塵於生物無害，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時恩威並施，或者領導層間或有較為開明的，最後都被壓倒。1956 年周總理的「關於知識分子報告」，在知識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團結知識分子，隨後一批高知被發展入黨。緊接着一場「陽謀」，知識分子又遭大規模洗劫。不少剛入黨的又變成右派開除出黨，有的還來不及轉正，就劃歸「敵人」了。在大饑荒尾聲的 1962 年，陳毅副總理作著名的為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帽」講話，使知識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額手稱慶。但是緊接着就是階級鬥爭

「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等於否定了這次講話，此後「階級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卒至列入「臭老九」，相當於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 1958 年，領袖已經為「一窮二白」躊躇滿志。「窮」者，全民皆被剝奪，私營工商企業完全消滅，農民失去土地， 再無人有恆產；「白」者，中華民族幾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斕的瑰麗畫面變成一張白紙，供一人在上面狂書亂畫。到「文革」開始，連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學教員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以至於掀起學生羞辱、毆打、肉體摧殘直至殺害老師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高潮。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一切基於人性的道德倫理蕩然無存，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劃線。古今中外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最後，文化教育領域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一個白卷英雄。斯文掃地、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者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中華民族文化浩劫於斯為最。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對計劃經濟導致「思想國有化」有透徹的論述，他指出：極權主義宣傳摧毀一切道德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對真理的尊重。在這種社會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 ——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個人等，都將消失[11]。這一論斷已經為事實所證明。這是新的道德淪喪的起源。

知識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觀因素

當然達到文化專制的前提是「武化」統治。勝利者挾雷霆萬鈞、橫掃玉宇之勢君臨天下，手無寸鐵的「秀才」們不由得不為之懾服。但是簡單地把一切歸之於高壓下的恐懼，完全是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導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層次的還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國情懷」的延續

中國人，特別是其精英，百年來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訴求是國家統一、民族興旺。這一訴求高於個人榮辱。所以，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下決心委身於新政權、追隨新領袖，其他的都可以放棄和犧牲。這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1949 年化學家傅鷹在美國正在猶豫是否回國，讀到解放軍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的消息，他根據以往經驗，以為仍將以中國政府道歉了結，沒想到新政府對英國態度如此強硬，大受感動，於是決心回國。這種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數知識分子擁護新政權，首先是滿足了外抗強權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 仍未擺脫寄希望於「明君」的傳統。革命領導的個人魅力、傳說中的長征英雄事跡，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沒有參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權開始正處於「其興也勃」的時期，與潰敗前的舊政權成鮮明對比，令人對它能掃蕩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升起無限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個人顯得十分渺小， 不知不覺間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統並不感到太勉強。

（2）二戰後的世界形勢和潮流

當時兩大陣營的對立，非此即彼。選擇留在大陸等於選擇留在一個「陣營」。二戰之後，國際知識界左傾也是一種潮流， 因此不少知識分子相信「這邊」代表未來，急於跟上世界潮流， 怕為時代所拋棄，作「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特別是朝鮮戰爭之後，中國與西方多數國家是敵對的關係。政治上的選擇與意識形態的「站隊」無法分開。思想上有任何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就有「裏通外國」之嫌。國家的敵人與思想的敵人相重合。儘管公開宣佈的政策有「將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的說法，在實踐中卻難得分開，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業業接受「改造」。外部「敵人」的存在被統治者充

分利用。所以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眼看自己在中上層幹部中一貫正確的威信有所動搖，領袖曾佈置高級幹部學習柳宗元的《敵誡》。用外敵的威脅轉移對內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鞏固其權威，是統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環境下，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有效。

（3）知識成為原罪

1949 年以前受過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農子弟，伴隨着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認同而來的是無法擺脫的「原罪」感，「階級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書香門第」不是榮耀而是恥辱，這是對幾千年傳統的逆反。即使貧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認為「變質」。除了少數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外，多數對「馬列」理論不熟悉，所以許多飽學之士都有一種自卑感，真心誠意願意重新學習，用新的理論來審視自己過去的學問。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開始學俄文，卻很少人學德文，可見實際目標還是學蘇聯而不是馬、恩經典。

（4）「頌聖文化」的延續和大發揚

如前所述，「頌聖」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無論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氣候條件下推向極致而很少遇到質疑和抵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論受到怎樣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確對待」，還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延續。後來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則感激零涕，「天王」更加聖明。「文革」之後，還有人發明了「娘打孩子」之說，一切罪責一筆勾銷，就此對絕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災難心安理得地拒絕反思。

以上幾點是最初階段接受「改造」的「自願」因素。以後，一輪緊接一輪的「階級鬥爭」使強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無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無，以至婚姻、親情、友誼的自由，一切操之於「組織」，想要「歸隱」也無可能。同時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達到「脫胎換骨」，就有希望被接納。這是一種漫長的修煉過程，或可比作經過煉獄達到天堂之路。有人將之比為「溫水煮青蛙」，每次政治運動是一次加溫，但又對不同人群有所選擇，所謂打擊 5%，團結大多數，於是人人爭相加入那 95%，直到「文革」95% 都被「橫掃」。

當然每個人的閱歷與處境不同，思想軌跡各有差異。每一輪的整人運動裏挾一大批人進一步喪失自我，同時另一些開始懷疑、有所覺醒的人數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飆使全民陷入瘋狂與愚昧，而混亂失控的局面又無意中提供了某種自由思考的空間，那種達於極致的荒謬反過來喚醒了許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經動搖，人性就從混沌中開始尋找回歸之路。這種情況在部分知青中尤為突出，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亂讀」了許多「禁書」，無意中大開眼界，吸取了迥異於官方

教條的知識營養，成就了新時期脫穎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幹， 有的後來進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間，成為今之頗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也有人「下海」成為新一代民營企業家，還有部分人從政，在一段時期為推動改革作出貢獻。

改革開放以後的曲折道路

以 1979 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誌，打破「兩個凡是」， 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對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出來，借此衝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像的都可以成為現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幸而長壽的老一代學人劫後餘生又煥發新的活力，恢復自信，在學術上仍能有所貢獻。恢復高考初期入學的青年學子有幸得到這一代老先生的親炙，在某種程度上，薪火得以傳續。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為 1949 年以來所僅有， 湧現出一批好學深思、勇於探索的中青年學子，如果有機會發展下去，有望繼承「五四」的傳統，對在新時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為。

但是這場思想解放與「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不可相提並論。其致命的弱點在於收放仍在「如來佛手心」。掌權者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務，給予一定的鼓勵，但不打算作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體系不容突破，舊勢力的阻力十分頑強，所以在前進中道路迂迴曲折 ——鎮壓「民主牆」、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人道主義……，知識分子仍然動輒得咎，心有餘悸，沒有安全感。這一輪新的啟蒙仍以「武化」手段結束。以此為分界線，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號下，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以在位領導的是非為是非。1992 年的「南巡講話」，挽回了經濟倒退，而對政治思想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鬆的思想鉗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義、商業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起到「逼良為娼」的作用，知識分子進一步犬儒化，文化進一步低俗化。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之事仍不斷發生，但比前三十年環境已相對寬鬆，也存在體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更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着國力的加強越演越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點傳統來看今之知識分子的主觀世界：

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這些在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體以外的報紙、雜誌以及論壇，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絡對衝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

的文化風景線。

但是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其原因是現在個人命運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繫。可以「用腳投票」，而且出路與才能成正比。合則留，不合則去。人才國際流動是大勢所趨，無可非議。同時，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　那麼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並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於是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留學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圖回國進行啟蒙，改變黑暗、落後的現狀；今之留學生則是主要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選擇回國來發展，大多不是改造社會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為維護現狀的吹鼓手。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少數有所堅守，進行了抗爭的，受到迫害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識者所憂慮的社會危機都是長遠之事，至少目前還能在歌舞昇平中苟安於一時，何苦自尋煩惱？

至於主流文化，一切新、老傳統的特點中惟有頌聖文化如魚得水。當下的「頌聖」不一定表現在直接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因經濟增長迅速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況下，直接或間接「頌聖」表現為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制，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　——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彌漫性的腐敗　——辯護。一部分所謂

「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　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醜聞，此舉招來網上一片罵聲，但是並未引起「輿論嘩然」，他們感受不到任何壓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為主流媒體所追捧，頻頻以「大師」面貌亮相。實際上這種「頌聖」充斥於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只不過那兩位的言論發生於國殤之際，特別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頌聖還有真誠的一面，出於對某種綱常的認同。今之「頌聖」多數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會、小會上一本正經地說、大小筆桿子成本大套地寫的內容，在茶餘飯後私人之間卻是諷刺譏笑的話題。人人都做兩面派，絲毫沒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來帝王還相信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所以史官還有一定的寫真事的空間。今之官史不但不發揚「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卻着力於屏蔽真相，偽造歷史，拒絕反思。這一點對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們對當代事、近代史完全無知，對古代史嚴重誤讀，重新陷入蒙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國學熱」，　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幾年經濟增長之力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傳統」（例如所謂三個傳統　——儒家、

【1949 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 ——一併繼承，就是不提 1840 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導「政教合一」，還有赤裸裸的恢復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極端國家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落腳在質疑或反對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制皇朝，通過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 ——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滿轉向洋人。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無論理論上如何不合邏輯、如何歪曲歷史，無視客觀現實，在表面上卻常佔領道義制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在位者以「XX 亡我之心不死」（過去是「帝國主義」、「帝修反」，現在是「境外敵對勢力」）來掩蓋施政的缺失，壓制國內的不平之鳴；搖旗吶喊者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聖」。上述「含淚勸家長」一文，用的藉口也是家長維權討個說法，就要為

「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罪名嚇人。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只能掩護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抵制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此種思潮再次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性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

有鑑於此，當前我國急需開啟民智，掀起一次再啟蒙，打破新老專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鎖，否則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縮之虞。在這方面，號稱「知識分子」者責無旁貸。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別人。其實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不斷撐開文化專制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扎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建設以民主和科學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

2010 年

關於我的履歷

不知從何時起，我在公共場合被介紹身份時主持人常提到「曾為毛主席和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做翻譯」，有時還要加上「參加過尼克遜訪華的接待工作」（內地譯尼克松，Richard Nixon）。起初我還不以為意，後來越來越感到不是滋味，於是有機會就要說明：我年輕時在外事單位工作，由於專業學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譯，重頭的是國際會議的同聲傳譯， 間或也為一些官員包括國家領導人見外賓做翻譯，但只佔工作的一小部分，臨時應命，絕非專任，那時候國家領導人並沒有專門的翻譯，只是有關部門掌握一個相對固定的各種語種的翻譯名單，以便隨時需要，臨時召喚。在 1959 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時期，看來我被列入了這個名單，所以不時應召接受任務，平時就在本單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對外交流工作，接觸的人中包括外國名人、要人，這也不足為奇。

最近作客「人民網」，關於我的介紹中又突出這一點。「天涯」網的介紹乾脆把這作為我的唯一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鄭重說明，以免被誤以為曾經是「首長身邊工作人員」。特別是前幾年有一本頗有影響的暢銷書，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譯兼英語教師，在特殊的政治風雲中曾紅極一時，書中的自述情節對不明就裏的公眾說來頗「吸引眼球」，可能給不熟悉當代歷史的人一個錯覺，以為曾擔任高層翻譯，就必然關係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覺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說明我不屬於那一類人，也算是愛惜羽毛吧。在我所處的年月， 工作秩序還比較正常，無論為誰翻譯，只是一項普通的工作， 最多說明在業務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認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況此類工作只不過「用其一技之長」，不會因此顯赫起來。

另外還有一層，我年輕時被分配做了十幾年翻譯，並非初衷。那時「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選的。後來越來越感到厭倦。對因工作關係而得以見「大場面」，接近「大人物」，興趣索然。旁人看來也許以為值得羨慕，我卻有莊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開放之初剛可以有一點選擇權，要求調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趕忙申請調到研究單位，以讀、寫為業。不論如何，總算有一點獨立性，從此告別整天重複別人的話之苦。（至於筆譯是我自己選擇的、自己欣賞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種「再創作」和自娛，又當別論。）

我工作了半個多世紀，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過為領導人翻譯的經歷，難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別是後半生雖然碌碌無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諸文字，任人評說。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無價值，以此為準。還不至於要憑藉曾為大人物（不論中外）服務來抬高自己。所以對此類介紹產生逆反心理。為甚麼外界偏偏注意這一點呢？也許是出於誤解， 以為說明一種地位，算是恭維；或是迎俗，大人物總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會，但是近來遇到此類介紹越來越

多，這一身份越來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態度不可，以免人們以為是我自己喜歡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認，也無須諱言我曾有此工作經歷。幸好，本人在「文革」開始後入了另冊，與紅牆之內絕緣，於是在我的翻譯經歷中沒有「四人幫」成員以及當時任何一位新貴，這是值得慶幸的。到了那個特殊年代，「首長翻譯」確實只限於極少數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設（只是假設） 我當時竟然也被召去執行為某人翻譯的任務，當然是無法拒絕的，那麼今天「曾為……翻譯」該如何介紹呢？

所以今天對「獨立」二字彌覺珍貴，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2009 年

附：簡歷（近有各種版本關於我的簡歷介紹，常有錯誤和不確處。以下附我認可的簡歷，事實以此為準，詳略可自行摘取。）

資中筠簡歷

（更新至 2019 年）

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於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

（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係，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並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尼克遜訪華前，從幹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以後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七十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後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研究員、所長。專業為國際政治與美國研究，旁涉中西歷史文化，近年來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改革開放後多次訪美，從事學術交流。曾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及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任研究員各一學年。

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誌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並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 1945–1950》、《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2007 年修訂版改為《冷眼向洋書系》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 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2015 年修訂版題為《財富的責任和資本主義演變》）、《資中筠集》、《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學術論文選集）等。

隨筆集：《蜉蝣天地話滄桑——資中筠九十自述》、《有琴一張》、《資中筠自選集》（共五卷：《士人風骨》、《感時憂世》、《不盡之思》、《閑情記美》、《坐觀天下》）、《思想不能用錢買》、《老生常談》、《美國十講》、《斗室中的天下》、《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學海岸邊》（與陳樂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紀的美國》、《財富的責任》以及收入《自選集》的文章）。

譯著：巴爾札克（法）《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薇拉·凱瑟（美）《啊，拓荒者》，阿蘭·德波頓（英）《哲學的慰藉》等。

一代風骨今何在？

——讀《民國那些人》

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人們慣於以「動盪不安」來形容： 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黨爭、內戰、列強瓜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近一、二十年以來，歷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視角，對民國史的研究逐漸採取比較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史學界有識之士的努力，那個時代的真面目連同其積極的建樹逐漸現出輪廓。其中最重要的、對後人深有啟發的，是在各個領域內的「文化人」或「知識人」所代表的精神。那個時代、那些人，其實離我們不遠，有一些還與我們共同經歷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風雨。但是其風骨、學養、識見似乎又離我們的時代很遠，我們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面貌已經模糊。近年來，經過一些有心人的鉤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輩或後輩的回憶錄，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評價，被遺忘的名字逐漸浮出水面，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實得以返真。現在，關於那一代文化名人的個案或集體的研究方興未艾，應該說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風氣中，學術文化出版界的一個亮點。

我手頭這本《民國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國青年報》「冰點」版 2004–2006 的一個欄目的專稿，每周一篇，每篇寫一人，約一千六百字左右，集結成書凡八十人。他們率多出生於晚清民初，卒於二十世紀後半，最早在 1840 年（馬相伯）出生，最晚在 2006 年（林庚）逝去，遍佈教育、學術、文化、實業、新聞、政治各個領域。其中有些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名字，我個人有幸親睹風采，曾沐春風的師長有梅貽琦、馮友蘭、葉企孫、梁思成、羅念生、李賦寧、潘光旦、雷海宗、馬約翰、金岳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羅先生的課是正式上過的， 李賦寧的課則是旁聽，而且還有一次特殊的關聯 ——李先生1950 年剛從國外回來，在工字廳舉行婚禮，我有幸應邀為他們

（鋼琴）奏婚禮進行曲，那恐怕是那個年代校園中最後的這種形式的婚禮了。潘先生作為清華圖書館長，我聽過他精彩的報告，至今還有印象，而且潘師母與我母親是同學，曾邀我到他們家過節。至於馬約翰，只要趕上他執教時段的清華學生都上過他的體育課，也都忘不了他對體育的獨特見解和別具特色、中英夾雜的訓話。以上提到的其餘諸先生在不同場合都有過一些接觸。所以讀這本書有特別的親切感。但是書中還有一些連我都不曾聽說的人物，遑論當代青年！其名已湮沒而其事卻值得大書特書。例如我自以為對歷屆清華校長都略知一二，但讀了這本書才知道還有一位周詒春校長曾對清華有開創之功，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他任內確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築：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是他親自規劃的。我前此竟然毫無所知，感到汗顏。實際上我當年執意要上清華， 那圖書館和大禮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當然書中這類被遺忘的人決不止這一例。只此一端就可見本書作

者「鉤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異，或生於世家，或起於貧寒，經歷極其豐富曲折，思想傾向不同，性格作風也各有鮮明的特色。如劉文典之狂傲，趙元任之瀟脫，傅斯年、馬寅初之剛正，梅貽琦之涵養和包容，曾昭掄之不修邊幅，葉公超之風度翩翩，蒙文通治經史、理學，趙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學……千姿百態。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只能擷其片段軼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讀之下，驚異於貫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風骨」，講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風骨」不論冠以甚麼名稱，講的是「人」，是一種「魂」。

這一以貫之的「魂」是甚麼？本書的〈序言〉題目一語中的：「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着」。中國的「士」的精神內涵又是甚麼？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訓，讀一點論、孟， 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等等。這些話總的精神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獨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面， 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而是對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有時退而「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內心的抱負都在「兼濟天下」。這種精神包含了中國讀書人最看重的「骨氣」和「擔待」兩個方面。保持人格獨立，如果沒有外界壓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無所謂堅持了。而在中國幾千年的特定條件下，卻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甚至以命相爭才能守住的。壓力不言而喻首先來自權勢，所以「堅持」的另一面就是不畏權勢，從孟夫子的「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我得志弗為也」，到魏晉名士的特立獨行，都有藐視王侯、不畏權勢的特點。來自另一面的壓力是「俗」，要「堅持」就必須不隨俗、不媚俗，不與「潛規則」同流合污。在上下左右的夾縫或夾擊中堅守自己的「志」，保持人格完整，心靈自由，方顯其風骨之可貴。

這種「風骨」是千百年錘煉出來的中國的「士」的精髓， 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時代特色，那就是中國人已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放眼看世界之後。自馬相伯出生的1840 年起，中國就身不由己地置身於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無法閉關自大。從那時起，西學東漸，有志之士就以變革圖強為己任，到「民國那些人」活躍於歷史舞台時，已經得到一代或兩代先驅之傳承。他們的言行、事業都已注入現代化的因素，或徑直以中國現代化為目標。他們是新文化繼往開來的一代人，有傳承，有創造。其中絕大多數都「留過洋」，不但在本專業學貫中西，而且立身處世也融中國「士」的堅守和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於一身，不過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罷了。他們還共同經歷了抗日戰爭的考驗。在民族存亡之秋，於艱苦卓絕之中，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與現代知識人的獻身精神高度融合，無意中寫就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輝一頁。近來關於繼承「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常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其實本書所寫的「那些人」就是中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

優秀典範。他們已經以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初步探索出以中國的精華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他們的存在反過來證明「新文化運動」（並不一定從「五四」開始，但以「五四」為標誌）絕沒有使中國文化斷裂，相反，使其獲得新生。如果有「斷裂」， 那是以後的事。

「那些人」的命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其中多數人都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換代，曾被要求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對自己前半生的功過是非重新評價，甚至顛倒過來。還有一個令人感慨的現象：其中「幸而」早逝者得全身而退，少遭劫難；多壽則辱；而再長壽一些，則又得以再現餘暉。本書對每一個人都摘出能表現其學術或事業亮點和人格魅力的片段， 同時也對整個一生的浮沉有所關照。作者本人的愛憎和感慨隨時流露於字裏行間，儘管着墨不多，而且相當含蓄。此類例子不勝枚舉。限於篇幅只舉一例以見一斑：

我認為寫得最精彩的篇什之一是關於馮友蘭先生的那一篇。馮先生學問博大精深，以及對教育的貢獻，自不待言。而作為「兩朝」學界耆宿，後半生在自我否定前半生中委曲求全， 至今遭到不少求全之毀。幸虧先生高壽，趕上在最後十幾年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得遂宿志，並為後世留下珍貴的遺產。後人學中國哲學史繞不過馮先生，而欲知馮先生，亦有皇皇巨著為憑。本書寫馮先生的精彩處在於於浩如煙海的著述中單單選出兩篇非學術性的文章：一是代表西南聯大教務會致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抗辯函，反對教育部核定課程、統一教材、統一考試的新規定；另一篇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這兩篇文章無論是在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價值再高評價也不為過。更重要的是兩篇文章集中體現了上面所說的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士」之精神。一篇是對最高權威的抗爭（誰都知道那陳立夫絕非一般的教育部長而已），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開始，然後是「未喻者一也……二也……」軟中帶硬，自是諸葛亮「後出師表」之遺風；另一篇是駢體文。它寫了西南聯大的精神，特別提到「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寫了馮先生始終一貫的對國家的希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更寫出了抗戰勝利的喜悅、深沉的歷史感和家國之思，有幾句特別精彩的話，書中沒有引：「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用典之當， 對仗之工，情景之合，含義之深，令人擊節三歎。以古文寫今事到這個水平，前或有人，後無來者是肯定的。這是馮先生自己最得意之作，也濃縮了那一代學人的學養、在強權面前的堅守，以及對這片土地的刻骨銘心的愛。但是後來呢？本書作者的眼光不但表現在選這兩篇文章，而且表現在標題、開篇和結尾。標題是：「兩束雄文，一抹背影」——以「雄文」始，以「背影」終。開篇第一句話畫龍點睛：「曾有那麼一個時代，大學教授們矜持而有尊嚴。」中間寫三十年後馮先生自己重讀這兩篇文章的自我評價：「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猶過於當日操筆時也」，作者說「馮氏的感慨豈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歷史慨歎」。因為「當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於是便只留下了一抹頹唐的背影」。一語道破，起馮先生於地下，當引為隔代知己。結尾是金岳霖和馮友蘭兩位大教授竟為檢討難以過關而抱頭痛哭。讀罷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舉出有關馮友蘭一篇加以剖析，是因為我對馮先生比較熟悉，對所舉的兩束雄文特別欽仰、激賞，而本篇又極為精當地概括了一種精神由盛到衰的各種元素。事實上，這樣的文章書中絕不止這一篇。例如在「東京審判」中壯懷激烈為中華民族討得正義和公道而名垂青史的大法官梅汝璈，晚年孤寂，「文革」檢討中說自己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詞典」。「巍巍乎南開大校長」張伯苓，曾為創辦南開付出一生心血，越挫越奮，自稱「不倒翁」，易代時選擇了留在大陸，卻欲返校小住而不獲准，校慶日不得進禮堂，自歎見棄於新社會，傷心以終。曾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以最大的魄力傾自己的船運公司之力， 完成號稱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盧作孚，竟以自殺終。其餘如葉企孫、陶孟和、潘光旦，等等等等，都有過閃亮的功業，而晚境淒涼，下場悲慘。身後再獲公道，以其精神嘉惠後世，但是斯人已逝，時光不能倒流，說「告慰於九泉之下」，還是為了活人取得安心，「九泉之下」是不會有知的。

最後，不能不提本書作者徐百柯。我與這位年輕人素昧平生，讀到這本書，看到封裏作者介紹，才驚異地發現作者竟是「七零後」！他寫此專欄時年齡不滿三十，出校門不久，可以算是「初出茅廬」。而書中所表現的識見、用心、滄桑感和文字修養卻大異於當代同齡人。一般寫長篇易，寫短篇難。難得的是作者在選人、選材和謀篇佈局中所表現的心有靈犀，在兩年的時間裏把握住前文所說的一以貫之的精神。當然此欄目已經得獎，無需我錦上添花。我只是作為一名讀者，在回味無窮之餘對作者生出讚賞；而作為一名老人，又對後生可畏感到欣喜。費孝通已經感到自己與乃師潘光旦有了差距（不僅是指學問），我自己也深感與書中所寫的前輩師長之間不可追補的差距。但至少還曾經滄海，雖不能至，尚知何處望之。再下來呢？存亡繼絕依靠誰？所以我在一片浮華喧囂中每當見到好學深思、有所守望的年輕人，總是感到欣慰，升起一縷希望。

欣慰之餘，又有另一種感想：這些文章還有一個特點是作者頗能拿捏分寸，一些話相當含蓄，點到為止，盡在不言中。這可能是在今日媒體的處境中練出來的功夫。一方面說明作者的聰明和文字能力；另一方面我略感遺憾，在這個年齡本該鋒芒更露的。書中所寫「那些人」在這個年齡時大多有過書生意氣，放言無忌的表現。而當代青年可能一出手就遇到「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聯想到「冰點」曾有的遭遇， 能連續發表這一系列文章實屬不易。我期盼着一個見識和感情不再受到羈絆的環境早日出現，庶幾當代有才、有識、有志的青年在鋒芒未磨圓之前得以俯仰自如，盡情發揮。

2008 年春節過後

宏毅之士，任重道遠

——悼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在國境內外，引起的反應之迅速和強烈、惋惜之痛切，為近年來德高望重的老人、名人逝世所少見。這是來自一種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力，同時也出自對他的境遇的同情和不平。與他生前有所交往的各輩人等對他的稱呼不一，我一開始就稱他為「老李」，生前如此，本文也不再改口。他倒下得太快，去得太突然。直到今天我總是無法想像他已永遠離去。

老李的平生遭遇在他那一輩的有理想、有思想的知識分子老革命中頗為典型：少壯慷慨悲歌，滿懷救國之志，投身革命，為實現自由、民主、共產主義理想（當時在他們心目中這幾項並不矛盾）；革命勝利初期被委以重任，意氣風發準備一遂平生志；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打擊，有早有晚（有人在延安時期就經歷了政治審查的煉獄）；然後劫後餘生迎來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擔起一定的職務，又是癡心不改，再次鞠躬盡瘁。不過此後二十年的風雨中各人的情況、取向就大不相同了。老李的貶抑從 1957 年反右開始，直到 1979 年復出，但是 1989 年的風波中又未能倖免。所以從 1949 年起到他於 2003 年齎志以沒，實際上正常工作的時間先後加起來只有十八年，以共和國成立到他逝世共五十四年計，還不到三分之一。能不常使英雄淚滿襟！這種生命的浪費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是我們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聽他家人說老李在醫院中直到最後倒下不能開口之前，還通過電話與朋友討論世界大事，以至於給大家以假像，對他的康復一度估計比較樂觀。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不這樣，就不是李慎之了。我在 4 月上旬從外地回京聞訊趕到醫院看他時， 他已進了監護室不能進去了，從門縫中張望只見各種機器、管子，從此再沒能開口。據說此時他腦子還是清楚的，只是不能說話。由於一切來得突然，他沒有留下遺言，最後一刻他在想甚麼，永遠無人知道了。

但是他平生一直在想甚麼，卻是昭然若日月的。概括起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前途。毋庸贅言，老李是堅決擁護開放改革的。在新的一輪「啟蒙」中站在思想前沿。世人皆知他上反專制主義，下反奴隸主義，倡導民主、自由，認為國人「啟蒙」遠未完成，並以此為己任。有人奉之為「自由主義」帶頭人， 有人責以「全盤西化論」。知之罪之，他的文章俱在，不必我來置喙。我個人體會到他氣質的另一面卻是非常「中國的」。他有深厚的國學底蘊，給他個人的道德、文章兩方面都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他基本上是繼承了「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有兼濟天下之志，而決不甘心獨善其身，無論「窮」、「達」，都是如此。

在政治思想上他強烈主張平等自由，而在個人修養、待人接物方

面，卻有許多「舊道德」的規範和底線，許多已經成風之事，在他看來屬於「君子不為也」。他曾告訴我，在剛被打成「右派」時，內心極為痛苦，幾乎不敢聽他最喜歡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因為那主旋律分明是在說「不要檢討，不要檢討」！最後他卻是用孟子的「動心忍性」，達到一種自我克制。他不止一次提到「動心忍性」，大概他委屈不得伸張的時候居多，這是他在高壓之下可以動用的一種道德倫理的資源。後來他看穿了各種在「革命正統」的名義下實際禍國殃民的荒謬政治，忽然悟出：以他們的這種標準，我就是「右派」，從此涇渭分明，也就心安理得，不再痛苦了。他主張平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又頗重「長幼有序」（不是指官位級別），在有比他年資長者在場時，我很少見他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這是一種本能的修養。他對人的第一印象很看重「談吐儒雅」，彬彬有禮。當然有時他也承認看走眼，因為有的談吐儒雅者其實文化修養並不高，情操也不一定儒雅。順便說一句，他不是詩人，也不常以詩示人，但我偶然見過他寫的舊詩，驚異於其格律之嚴謹， 風格之典雅，方知他這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也就難怪他提起有些號稱會寫詩的高官常常搖頭了。他喜歡引的一段論語是：「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從他一生的行藏可以看到這段話已經融入他的精神。

他也曾有過居廟堂之高的經歷。在他前八年後十年短短的兩次「出仕」期間，曾經三次隨國務院最高領導出訪，起過高級謀士的作用。尤其是第二個階段，在對外關係、對台工作方面他離最高決策圈是相當近的，而且曾參與十二大政治工作報告中有關外交方面的起草。他確實有中國知識分子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但在那個時候並沒有屈子的悲壯情緒，也不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基本上是樂觀的，我沒有感到他有甚麼「心有餘悸」，而是照樣沒有戒備、沒有保留地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在當時的政治空氣開明的氣氛下，他的見解、學識剛好得其所，本以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80 年以後他調到社科院，奉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隨後任社科院副院長，主管「國際片」的八個研究所。在那段期間，他基本上述而不作。他自己說對美國所「情有獨鍾」。但他又常說他其實興趣不在專門研究美國。這看似矛盾， 我體會其中複雜的心情，一是美國所是他長年受到不公平的貶黜復出之後創辦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又不僅如此，他復出是與改革開放同時，也正是由於改革開放才有此機遇。可以想見他辦美國所決不單純是為了學術探索，而是與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現代化相聯繫的。美國對於他來說，並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符號，代表着一種價值體系，一種參照系。同時他又反對把美國研究定位於為政府寫對策報告，而提倡對美國本身各個方面作科學的、客觀的、深入的學術研究。我在馮友蘭先生的著作中發現哲學家是「全民族的智囊」之說， 就在〈中國的美國研究〉一文中借用了這句話，認為同樣也適用於美國研究。此文登載於《美國研究》創刊號。老李對這一提法頗為讚賞，後來在很多場合提倡。從他後來的實踐來看，他不愧為民族的智囊，當然其範圍遠遠超過美國研究，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興趣並不在於研究美國。

1989 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折點。關於他那時的言行有許多傳說，不少是穿鑿附會。例如說他曾與學生一道上街到北京市委門前喊口號之類。這決不是事實。這不僅是一個細節的誤傳，我認為是對他為人的一個誤解。他的確不贊成戒嚴，更反對武力鎮壓，但是他從理論上對街頭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以他當時的實際職責，也決不可能去上街喊口號。相反，當時社科院多位領導都不在北京，他剛好留守在家，本着一貫高度的責任感，以保衛社科院，維持秩序為己任，一層樓一層樓地巡視。老李的文人氣使他不同於一般的「老黨員」，他的表達方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常常以言獲罪；但是他在行動上決不是魯莽漢（他在自述中說自己是「膽小鬼」，當然又是誇張語法，指行動謹慎則是符合事實的）。他在工作中有關政策問題的掌握從來中規中矩，我除了學術工作外，在對外交流，特別是對美、對台工作這一面與他接觸較多，他從來沒有出過格，犯過甚麼「外事紀律」。有的只是比較靈活、藝術，重常識而反教條，能以識見服人，從不使人感到與言無味。他對 1989 年的風波的態度和情緒實際上代表當時大多數，有人比他激烈得多。不過他在高處，而且以他特有的鮮明方式表現出來，容易被人抓住，不像有些人事後可以悄悄地轉變，或沉寂下去，小人物更可以略去不計。這也是「嶢嶢者易折」吧。單是他的文人氣和語言習慣平時在「革命隊伍」中就不大合眾，由於他對人不太戒備，許多私下隨口說的話，運動一來處處都是把柄。那場風波後，他在社科院領導層中為重點批判對象（那時的委婉語叫「反思」），一名原來對他常套近乎，尊敬有加的行政部門負責人，轉變了立場，參加了老李的反思會後表示不滿，說他檢討還掉書袋，用的成語典故人家都不懂。我不知其詳，但可以想見老李決不是故意「掉書袋」，是他自然的表達方式，而且用的典故也不見得太生僻。這個細節給我印象很深，因為那種氛圍我太能體會了，每當強調「階級鬥爭」時，讀過些書的人一開口就令某些人反感。就是他那篇著名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據我了解，原本也不是為發表的，而是自己發自肺腑的感言， 應該與日記差不多，只不過印出來給幾個朋友看看。不知怎地被放到了網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一方面，再次在體制內被打入另冊，進一步遭封殺；另一方面卻在海內外贏得了空前廣泛的聲譽。這是絕大的諷刺。

我在寫〈「平戎策」與「種樹書」〉一文（始發於 1997 年《讀書》雜誌，見本書第 159 頁）時，常常想到他。他更像辛棄疾和李白，而不像陶淵明。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不必哀歎「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他退居書齋筆耕不輟，卻不同於效悠遊林下以辭賦自遣。因為他可以放眼全球，從這個高度看人類命運，民族興亡，他的讀者遍及朝野。近半個世紀中他逆境多於順境，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與廟堂拉開距離，處江湖之遠，倒能作更深層次的觀察與思考，他的本色，他的學養可能得到真正的發揮，特別是最後十年，應該說是思想最閃光的時期。其一貫的追求老而彌堅，想得更深、更透徹，從心態上義無反顧，在時間上也有了更適宜的條件，潛心寫作，留下了可以傳世的文字。實際上他「在野」的十年中接觸面之廣， 影響之大遠超過「在位」之時，這是任何禁令無法封殺的。可惜天不假以年，使他言猶未盡。

當然老李更多是繼承了五四以來對科學、民主的追求。這些思想見諸文字是大量的。但是還有一些是沒有形成文字的即興之論。他在社科院時經常就一個話題即興發揮，或長或短， 有時演變為長篇大論，他有教無類，對各種水平各種年齡的人都一樣開講。那時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可能有點像古代的書院。他退下來以後大約聽到他的宏論的圈子更廣了，包括電話談話。可惜沒有錄音也沒有紀錄，其中有許多思想的火花和他親身經歷的有獨特意義的故事，還有許多警句，如水銀瀉地，無法收集。聽眾大概都各取所需，每人在記憶中留住一點，或無形中化為自己的思想營養。

我個人有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約是 1982 年）在赴美的飛機上第一次巧遇老李，而且恰好座位相鄰。當時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聞，竟也不曾聞其大名，社科院有美國所也是那次才知道的。他知道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美國，就單刀直入滔滔不絕地談起對各種問題的見解，許多看法在當時十分新穎。對於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坦率，沒有戒備，使我吃驚， 他完全不打官腔的獨特的語言也使我有清新之感。後來體會到這就是他作風的「特色」，也是少有的本色。那一席談似乎在我長久受到禁錮的腦子裏吹過一陣清風，也就乘機一吐「私心竊以為」的對某些僵化政策的看法。隨後他把我「挖」到美國所，從此我得以在他領導下工作，以及兩人都退休以後繼續交往共二十年。這二十年中他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 我們也並非在所有問題上看法完全一致，但是我對他的最初印象始終如一：襟懷坦蕩，議論橫生。總是單刀直入，很少拐彎抹角。時常一語驚人，發人之所未發。他的思想財富當然是屬於眾人的。對我個人而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在關鍵時刻對我的點播起了「再啟蒙」的作用。他是第一個從不跟我說「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領導。相反，他在對我有些了解之後，曾對我說，你應該相信自己決不會不愛國，決不會「立場不穩」，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對於習慣於戴着鐐銬跳舞的我真有豁然開朗之感。這是一種返樸歸真的根本取向，不是對具體問題的觀點。我終於擺脫從大學畢業前夕就開始的永遠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歸常識，回歸自我，進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於他的。

當然受惠的不止我一個。他沒有研究員、博導之類頭銜， 也沒有正式帶過研究生；但是許多人都稱他為自己的導師。他自己沒有固定的專業，卻推動了許多人的專業研究。人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是他的一片憂國憂民的赤誠， 追求真理的執着，至死靡它。這樣一個人，有滿懷救國之志， 強國之策而無所用；無「越軌」之行而有超常之見，卻屢屢以言獲罪，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未能免遭「誅心」，受到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軟性封殺，可勝浩歎！說明我們要在精神上實現真正現代化任重而道遠，還需要多少「宏毅之士」為之奮鬥。

2003 年

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

閑來胡思亂想，常引發一些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聯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魯諾（Giordano Bruno）即其一。他們兩個相隔千萬里，時差二百年，在腦子裏把他們聯起來的紐帶：一是他們各自所受的慘絕人寰的極刑（方孝孺被「磔於市」，也就是當眾凌遲處死，布魯諾則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二是他們兩人的事跡在我中學時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慘烈。但是，現在細想他們各自所殉的「道」是甚麼，引起我對中國和西方文明巨大差異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炆的老師，稱「漢中教授」。由於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後由皇太孫繼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當然地成為顧命老臣之一，儘管他年齡並不老（死時才 45 歲）。建文四年（1402 年），朱元璋的另一個兒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從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樂帝，惠帝則「不知所終」。當時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邊的，有死保舊皇帝的，後者當然都被殺或自殺，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滅族」的不計其數。方孝孺由於是當時德望最高的重臣，朱棣奪位成功後，召他起草登極詔書，方堅拒，投筆於地，又哭又罵，再強迫他寫，他就寫「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到那時為止，最重的刑律是滅九族，方被滅十族，第十族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學生。株連「擴大化」及於學生是從那時開始的。當然，後世的學生如及時劃清界限，揭發批判老師，則可倖免。據史書載，僅方一案，受株連而死的有數百人。我至今記得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一段時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們都對方孝孺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由衷敬佩。這也是傳統氣節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難時是 1402 年，是十五世紀的開始。斯時也， 文藝復興的朝陽在歐洲上空升起，驅趕着中世紀的黑暗，歐洲正在邁進蓬勃發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學、藝術大放光彩，人才輩出，以科學和民主推動人類文明，獨領風騷五百年。十五世紀的開頭，1401 年，德國人尼古拉斯·德·庫薩（Nicholas of Cusa）誕生，他的職業是主教，同時也是科學家和哲學家，是挑戰傳統、破除地球中心論的托勒密體系的先驅。一百多年後，波蘭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日心說」問世（1543 年）。哥白尼死後，緊接着布魯諾於意大利誕生（1548 年）。

布魯諾的一生既坎坷又豐富，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善於獨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藝的「文藝復興人」，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才華橫溢，著述甚豐。他的宇宙觀與庫薩和哥白尼一脈相承，並發展了哥白尼的學說，提出了宇宙無限論。他的哲學思想對十七世紀的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有重要影響，因此被認為是現代哲學的先驅。在當時，他所堅持的宇宙觀，既不容於舊的天主教，也不容於堅

持亞里士多德教條的新教。曾皈依新教，而加爾文教也排斥異端，被逐出教門。他周遊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凡十年，到處講學，到處與人辯論，同時找機會出版他的著作，最後在哪裏都難容身，終至回到意大利慘遭刑戮。

當時的歐洲雖然保守是主流，但並非鐵板一塊，學術空氣還是比較濃厚，留有一定的空間。法王亨利三世（Henri III）的朝廷一度是開明天主教派佔上風，布魯諾在巴黎被任命為王家講師，得以暫時棲身，並發表他的著作。其間，他作為法國駐英大使的客人到過英國，也曾為伊麗莎白女王宮廷的座上客， 但是他的學說不見容於權威的牛津學派，於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時亨利三世廢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魯諾卻不稍斂鋒芒，更加公開地與權貴論戰，以致在巴黎無法容身，跑到德國，在那裏遊蕩於各大學之間，繼續講學、發表著作，不但宣傳他的宇宙觀，而且主張各教派和平共處、自由爭論，其辯論的對象既有教會又有學術界權威。結果又被新教路德教會開除出教，德國也呆不下去了。此時剛好有一名威尼斯貴族「誠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導師。威尼斯在當時比較開明，而且布魯諾得知那裏的帕多瓦大學數學系主任一職正好空缺，他遂於 1591 年束裝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學。不過他沒有得到那個教職（一年後任命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就住在那位貴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師。與方孝孺株連學生相反，布魯諾是被他的學生出賣的。不久，這位學生就對老師產生不滿，向宗教法庭告發他傳播異端邪說，布魯諾遂於 1592 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審。他為自己辯護的說辭一直是堅持自己的理論只涉及哲學，與神學、教義無關（和伽利略一樣，他主張對《聖經》只遵循其道德說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觀）。在威尼斯他也許還有希望得到開脫，但是不幸他受到嚴厲得多的羅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羅馬。他在羅馬獄中受審訊長達七年，種種辯護都無效，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否定自己的學說，這點他堅決拒絕，最後終於判處烙刑，臨刑前舌頭給夾住，足見他的言論有多大的威懾力。在向他宣讀判決書時， 布魯諾有一句名言：「也許你們判決我時，比我收到判決時更感到恐懼。」不過布魯諾只一人殉難，未見株連到其他人（歐洲好像沒有「族滅」之刑律）。

從方孝孺到布魯諾殉難的二百年中，歐洲完成了源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發生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結束了神權統治，民族國家成型，為十七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掃清障礙。在天體物理領域，哥白尼開始的宇宙觀的革命經伽利略到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基本完成，最後到十七世紀中葉由牛頓（Sir Isaac Newton）集大成，他關於萬有引力的發現解決了「日心說」的最後一個疑點，並開啟了現代物理的新時代。布魯諾是這場持續的科學革命過程中的一位烈士，實際上此時的宗教裁判已是強弩之末。以後，儘管科學受到教會以及社會保守勢力的非難和壓制還時有發生，但不論是教會還是君主，再也不擁有對思想信仰的生殺之權了。布魯諾個人的結局雖然慘烈，但是， 實際上他生前還是有相當的活動空間，已經有機會到處傳播他的學說，並發表著作。那時的歐洲並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局面。

反觀這二百多年的中國，無論生產方式、上層建築，還是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明朝在內部殺戮、爭鬥中，在宦官、權臣、昏君專政中，在邊患頻仍、統治面積日益縮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諫之士人頭落地中走向衰亡。布魯諾殉難的1600 年是萬曆二十八年，當時的形勢是皇室、官府層層橫徵暴斂，內部民變蜂起，外部邊疆告急。這一年的大事：一是發動幾路大軍鎮壓西南少數民族叛亂；一是宮廷之內寵妃專權，威脅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貞之士」關心帝王家事，為維護太子而上書直諫，觸怒皇帝，遭到「下獄」、「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職給事中，如果沒有這件事大概是名不見經傳的。到1644 年，崇禎皇帝自縊，清軍入關，士大夫或殉舊主或投新主，又一輪生靈塗炭加道德危機。清朝之取代明朝， 只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儘管是另外一個民族，還是延續着大同小異的君主專制政體，重複着大同小異的歷史，憑據的還是大同小異的道統。「明主」繼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 士大夫的追求和價值觀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從哪個皇帝或潛在的皇位繼承人的角度出發。只不過這是最後一個皇朝，以後的歷史軌跡卻被歐洲人打亂了，從此發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說來也巧，滿清入關的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英國適逢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發起革命，戰勝王軍，五年後，查理一世（Charles I）被送上斷頭台。這件事與建文帝的「不知所終」，以及崇禎之死意義大不相同，因為它導致了君主專制制度結束。儘管以後還有反復和曲折，對克倫威爾其人其事史家也有爭議，但他發動的這場革命為二十年後「光榮革命」的先聲， 最後導致英國憲政民主的確立，對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變革都有深遠影響。而且， 歐洲文明加炮艦從此一路擴張開去，直到轟開中國的大門。

就抽象的個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 為捍衛自己認定的「死理」寧死不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對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來說，地球就是圍着太陽轉，這是他們已經發現而堅信不疑的事實，國王、教皇都無法改變，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學家以令人信服的論證推翻這一結論。這就是科學。與此有關的人，在壓力面前可能表現不一：哥白尼懾於可以預料的壓力，遲遲不敢公開其發現，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發表；伽利略有堅持，有妥協，在教會的淫威下也說過「違心」的話；布魯諾則剛直不屈， 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論怎樣，他們還是公開說出並論證了自己的科學發現，並且載諸書冊。他們的歷史貢獻是與先進的科學思想聯繫在一起的，本人是人類進步的歷史長河中的燦爛群星之一。

方孝孺維護的是甚麼呢？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另一個兒子當皇帝，這裏面有甚麼顛撲不破的真理嗎？於國於民究竟有甚麼區別？何況這甚至不是改朝換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說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說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從秦統一中國的兩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國士大夫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盡聰明才智，獻出理想、忠誠，多少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這種努力推動歷史前進了麼？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後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間。那時的希臘幾何學之父阿基米德（Archimedes）正在埋頭研究、發明一條一條的幾何定律。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是，國王叫他辨別工匠製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時偶然發現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聲「尤里卡！」貫穿時空，成為不朽的天籟。不論這一傳說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對數學和力學的貢獻以及他個人對此的着迷是事實。方其時也，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在做甚麼關心甚麼呢？那正是戰國後期，當時熱門的新學是「縱橫學」， 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他們與同時代的策士們正奔走於七國之間，憑三寸不爛之舌向居皇位者兜售他們的謀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戰國策》。在那雄辯的辭章中，充滿着縱橫捭闔、權謀計術，極盡坑蒙拐騙、挑撥離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之能事。其心計之深、思路之複雜，令現代人望塵莫及。如今，「博弈論」作為舶來品傳入中國，頗為研究國際關係的青年學子津津樂道，其實戰國策士們那種像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對方的反應，決定對策的「彎彎繞」，現代的博弈專家跟着轉起來恐怕也很吃力。這種思維的路數，其實與幾何學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處不同，結果也就不同。戰國時天下未定，思想還沒有定於一尊，蘇、張之流不必像漢以後的士大夫那樣對一位君主從一而終，也就無氣節可言。不過華夏文明到那時已相當成熟，縱橫家的計謀與儒家的忠君思想，同樣是留給後世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

自從與西方邂逅吃了大虧之後，中國人一直在思考中國為甚麼落後，以及從何時開始落後的。許多人不甘心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科學精神這一事實，總是舉出四大發明、古代諸多精湛技術的創造，還有祖沖之推算出圓周率早於西方人一千年，等等。事實上早已有人指出，技術不等於科學，因為沒有理論，不能舉一反三，無法普及。技術只是手段。印刷術和紙的發明確實偉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來的書傳播甚麼思想。「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志」是甚麼。古代歐洲哲人着迷於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奧秘，不惜為與人間利害無關的真知而獻身，中國人缺的就是這種求真知　——超越於「經世致用」的客觀存在——的「傻勁」。中國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處理人際關係。不過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傳統之累。當近代西方人爭取到了思想言論自由，建立了保護這種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異端」而獲罪，從而進一步釋放出無限創造力時，中國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讀書人皓首窮經，盡入彀中，一方面發明文字獄收緊文網，禁錮思想。其結果的差異是可想而知的。當然，涉及政治鬥爭，不論是一國之內還是國家之間，都有許多鉤心鬥角的「謀略」，也出現形形色色的

「謀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歷史上學而仕者只是少數，有大批超越於政治的獨立知識分子，而中國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貢獻給政治，而政治又等同於朝廷。「學得文武術，售與帝王家」，如果帝王不買，「經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還常見有文章強調，鄭和下西洋時中國的造船業比歐洲先進，說明中國本來可以從那時實現工業化，走向現代化。甚至有人假設，如果鄭和再走遠一點，到達美洲，今天在那裏的就是黃種人了，整個歷史就要改寫。姑不論這種假設如何想入非非，有一個基本問題是，鄭和出海的

目的是甚麼？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奪了侄子皇位的永樂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滿朝文臣武將都不用，單派貼身太監，絕不是有向海外擴張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尋那位「不知所終」的建文帝。因為關於建文的下落傳說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舊皇帝還有出現的可能，永樂的皇位就存在潛在的威脅，這才是他為之寢食不安、戚戚於懷的頭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當然還有向「化外」的島民宣揚我中華神威之意。所以，不論船隻如何先進，鄭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這與歐洲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於商業需要，推動航海業的動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說，本人未考證過鄭和的船比同時代歐洲最先進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傾全國的國力和能工巧匠為皇家造一條或幾條船，與能代表社會生產力的造船「業」的發達是有區別的。

布魯諾和方孝孺的差別，是他們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別。誰也不能否認我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我華夏民族智慧高度發達， 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歸決定了不同的歷史軌跡。這一歷史軌跡到了晚清終於給打亂了，中國近代史於焉開始。

2001 年

袁同禮

——我國現代圖書館的先驅

對我來說，人生最大的樂事莫過於坐圖書館，從少到老也坐過國內外不少有名的或無名的圖書館。一到裏面，總是可以忘憂，可以忘俗，到老來還可以忘年。而第一個給我以啟蒙的享受就是坐落於文津街的原北平圖書館。那是 1948 年夏，我剛在燕京上完大一，想轉入清華，為準備轉學考試，在北平圖書館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暑假。首先，圖書館是完全開放的，誰都可以進去借閱，只是一般不能把書拿出去。不過借書極方便， 座位寬敞舒適，光線充足，工作人員輕聲細語，態度和藹，業務熟悉（這些我當時並不感到特別，只是幾十年後在規模大大擴大的「新北圖」處處得到相反的感受，才回想起那時的鮮明對比）。我每天一早到那裏，基本上佔用同一個座位，上午看應付考試的書；下午自娛，從心所欲地借閱聽說過的古今中外名著；中午在附近小賣部買一個燒餅夾肉，那時沒有甚麼罐裝飲料，圖書館的走廊裏設有自動噴水的飲水機（稱「沙濾水」），清洌可口。還可以在背靜處的長椅上略事午休，也沒有人干涉。那時沒有空調，圖書館的建築卻十分隔熱，進去後溽暑全消。那一個暑假就這樣過來，其樂也融融。而且收穫甚大，終身受用。我雖已是大學生，但這樣一種無拘無束的讀書享受對我也可算「寓教於娛」。當時館長是誰這類問題不在我注意之內。湊巧我下學期考入清華後，因偶然機會，得識袁同禮的長子，歷史系同學袁澄，方知原來他的父親就是惠我良多的「北圖」的館長，而且也因他之故，得以到袁府，拜見過袁先生。只是少不更事，只隱隱約約知道袁同禮是文化名人，卻沒有意識到眼前這位恂恂長者是何等不尋常的人物。

不久，北平易幟前夕，袁氏舉家離去，記得是與梅貽琦校長同一飛機，從東單臨時機場起飛的。他們先到南京，後去美國。以後幾十年，在內地不再見提及，不過也沒有像胡適和其他一些人那樣受到批判，基本上被遺忘了。我再次想到袁同禮是在開放之後，一則因研究工作涉及中美文化交流領域，二則對國內外圖書館服務之差距有切身感受，袁同禮其人逐漸進入我的視野。九十年代初，在美做訪問學者期間，通過哈佛燕京學社吳文津先生，又與在波士頓執教的袁澄學長聯繫上，感慨話舊之餘，他送我一本袁同禮先生逝世後各方人士追憶文章的彙編，題名《思憶錄》。這些文章述袁先生一生行藏和功業內容極為豐富，同時也可看出中國公共圖書館現代化的歷史，使我原來對袁先生大致的模糊印象具體化了，更覺得其事可感，其人可佩。袁澄君表示希望此書能在大陸出版。我私心認為確有出版的價值，但是袁先生去世時（1965 年）中美尚未建交，兩岸也無來往，書中文章的作者多在美國和台灣，由於作者的立場，遣詞用語難免有違礙之處。我坦率說明因此之故可能公開出版有些困難，他說這類內容佔比例極小，個別地方還可作些處理，何必因噎廢食，共產黨當有此雅量。此事一直是袁君的一個心願，前幾年，他來北京訪問，我輾轉介紹他與新北圖有關負責人洽談出版事，事

後據他的感覺似乎有些希望，但是至今未有下文，看來我原來的判斷還是對的。

事有湊巧，前年在南京中美文化交流史研討會上驚喜地遇到袁同禮先生的幼子，在美國俄亥俄州賴特大學執教的袁清教授，他遞交了關於袁同禮與中美文化交流的文章。現在那次會議的文集即將出版，這篇文章也收在內，當能引起學術界一些注意。

袁同禮這個名字是不應該被湮沒的。二十世紀前半葉是中國走向近代的關鍵時期，特別是二、三十年代，儘管政局動盪，教育、學術、文化卻建樹甚豐，思想活躍，可以稱得起人文薈萃，群星燦爛，極一時之盛。今天回過頭來看，不得不承認，當代中國文化教育許多重要領域都是在那時奠定的基礎。近年來，在打破人為的政治障礙後，以蔡元培、胡適為代表的一批傑出人物的事跡經常見諸報刊，得到關注，恢復了應有的歷史地位。而袁同禮卻鮮為人知，今天的中青年讀書人幾乎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去年舉行圖書館節，報刊登載了大批名人寫圖書館的文章，似乎也未見有提及。其實袁同禮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只不過他的業績為圖書館本身的性質所決定，著述不可謂不豐，但多為典籍版本目錄之學，不同於文學作品或思想家的吶喊那樣引人注目，而是默默地為這些著作家、思想家提供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他不像教育家那樣桃李滿天下，卻以其鍥而不捨的圖書事業真正做到「潤物細無聲」，嘉惠無數學子。實際上他在圖書館學方面也培養了不少傑出的人才，早期國內各大學圖書館的重要骨幹和現在美國一些著名的東亞圖書館的負責人不少出自他的門下。既然紀念冊不能出，這裏根據個人體會，並綜合紀念文章所述， 對他的事跡略介紹一二，以饗士林。

袁同禮，字守和，（1895–1965 年），祖籍河北徐水，本人出生在北京。一如許多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幼承家學， 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後沐歐風美雨，接受現代思潮。袁之獨特處在於一開始邂逅西學就逢美國傳教士韋棣華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12在武漢創辦文華大學「公書林」，發起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因受其影響，立志專攻圖書目錄學，遂與圖書館事業結終身之緣。他是我國最早受過完整的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人士之一：1916 年北大預科畢業後即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參考部工作，1920 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兩年，獲歷史學學士，旋即轉到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畢業，接着赴歐考察各國圖書館及博物館，並在倫敦歷史研究院從事研究，1924 年歸國，任廣東大學圖書館館長，翌年回北京大學任圖書館館長及目錄學教授。由此可見，袁於圖書館學可謂道地的「科班出身」，這在我國當時知識界實屬鳳毛麟角，所以創建北平圖書館的專業人才自然非他莫屬了。

北圖是我國第一家大規模現代化公立圖書館，其前身是1926 年由「中華教育基金會」建立的「北平北海圖書館」，當時正副館長為梁啟超和地質學家李四光，袁為圖書部主任。1929 年正式創建「國立北平圖書館」，蔡元培任館長，袁為副館長。梁、李、蔡諸公都是以名望而任此位，他們的主要職務都不在圖書館，可以想見，實際擔當創業重任的自然是袁。當時的大背景是中國處於兩股大潮之中，一是從「五四」

延續下來的文化現代化運動；一是北伐以後掀起的教育國有化運動。一批教會大學實現「中國化」，以及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改造為正規國立大學，都是在那個時期。北圖的創建正是這兩股大潮交匯中的一環，確實有重大歷史意義。袁同禮先生以代理館長名義主持一切創建事務，從建築設計思想到規劃方案，到管理制度， 到圖書收集以及人才培養，都灌注了他的心血。就以位於北海「三座門」（今文津街）的老北圖的建築來說，設計師雖是洋人， 其主導思想卻體現了袁先生的「古代建築，現代設備」的精神。凡到過那裏的人都能感受到泱泱大國的文化氣派撲面而來，那莊嚴堂皇的建築與古都風貌和諧一致，內裏的設施卻很現代化，非常方便實用，佈局科學合理，是博採各國圖書館之長的結果。就這一點而言，也可算是中西文化以各自的精華相結合的典範。袁先生自創辦至 1948 年底全部精力盡瘁於斯，篳路藍縷，厥功甚偉。舉凡建立編目系統、出版各類目錄索引、建立館際互借、國際刊物交換等制度，都是看似貌不驚人的基礎工作，卻是開創性的，在當時也屬於國際前沿的，非真正的內行和有遠大的眼光者莫辦。新中國所接收的舊北圖本身就是最好的「物證」，不必贅述。他的著述和實績難以盡述，這裏只舉最打動我的幾件事：

其一是善本書的收集和保存，特別是在日寇眼皮底下搶救其中精華運美之經過，帶有傳奇色彩。北圖成立之始所繼承的古籍來源依次上溯為：「京師圖書館」（北洋政府）→「內閣大庫」（清）→「文淵閣」（明），實際是宋、金、元、明、清遺留下來當時中國所存的古籍之精華。袁先生又在此基礎上在國內外廣為收集，歷年來孜孜以求，得不少珍本秘笈，還有敦煌寫經近萬卷以及金石碑帖等，許多都是袁先生一點一滴收集而來，所以北圖所藏善本書為全國之冠。「九一八」事變，日寇佔領東北後，蔣介石政府即作華北不保的準備，決定將故宮國寶南遷，其中也包括北圖的一部分藏書，分別寄放在上海的租界裏和南京，於是北圖就有了非正式的上海分館和南京分館。蘆溝橋事變後，袁率北圖與北大、清華等大學一道南遷，同時急派其得力助手錢存訓到上海主持分館業務。但是緊接着上海也淪陷了，租界號稱孤島，日本特務密佈，也很不安全。袁即與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取得與美國政府和國會圖書館同意，將一批善本書運美保管，並說好待和平恢復後即物歸原主。但是這麼多書籍不可能全運。袁先生為此於 1940 年冒險從內地秘密到滬，親自挑選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計二千七百餘種，三萬餘冊，精心組織，裝成一百零二箱，都有防水處理。但是如何運走卻是一大難題。當時上海海關已為日軍佔領，檢查甚嚴，這麼大批貨物要繞過檢查幾乎不可能。袁及其部下與美國駐華使館共同策劃，設計了好幾個方案，甚至包括美國派軍艦來接， 實際都行不通。最後，在絕望中竟因偶然的機會，得以通過錢存訓夫人的間接關係，由一位在海關負責檢查的張先生幫忙， 在他值班時秘密運送，交一張假的發貨單，由他簽字放行。這樣，那一百多箱書化整為零，分十批交運，每當得知那張先生值班時便送一批，為期兩個月，最後一批是 1941 年 12 月 5 日運走，而兩天後珍珠港事變即爆發，日軍立即進駐租界。這簡直像驚險小說一樣。

剩下的部分秘密分藏於上海英、法租界。1942 年，美國國會圖書

館就中國善本書抵達華盛頓發了消息，引起日偽方面注意。當時在淪陷區的北圖改名為「北京圖書館」，「館長」為偽

「華北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兼任。他曾派實際負責館務的秘書到上海查訪這批書，由於早已分散保管，只找到一部分運到北平。解放以後，想必其餘部分都已回到北圖（這是想當然，實情不得而知）。存放於美國的一百零二箱書，於日本投降後即有歸還之議，後因中國內戰爆發，拖延下來。一拖就是二十年， 於 1965 年始由美國運往台灣，那一年正是袁先生在美國病故， 終於未及親見，確是終天之恨。那批書至今保存在台灣「中央圖書館」，以上經過，當事人之一錢存訓先生在紀念袁先生的文章中述之甚詳。

1933　年初日軍迫近榆關時，國民黨政府一方面訓令各大學不得提前放假，「妄自驚擾」，一方面開始運文物出京。魯迅曾有雜文和詩諷刺這件事：「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傳誦至今。嗚呼！ 國家多難，政府無能禦敵。作為一介書生，無能為力，用袁先生自己的話說，「報國有心，請纓無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保存國寶不落於侵略者之手，為此也算嘔心瀝血，克盡厥職。今天回頭來看，當時他當機立斷，沒有因循延拓，搶救工作得以「險勝」，確實表現了相當的膽識和高度的責任感。以後又國土分裂，致使國寶分散。至少這批無價之寶如今總算完好地留在中華大地，海峽兩岸都應記他一功。據說那一百多箱善本書在台灣仍作為北圖的財產另行存放，希望終有一天得歸故土與其他部分團圓。

上面提到了周作人的名字。以民族大義論，在這件事中， 袁同禮和周作人剛好處於正反兩方。使我想到近年來周的名字在我國文壇頗為熱鬧，他的附逆並不妨礙他的文學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揚。而袁同禮卻湮然無聞。世事之不公也如此。

與保存善本書的旨趣一致的是，袁先生極重視流失海外的文物典籍的調查和集錄。今天《永樂大典》的去向又成為熱門話題。而早在二十年代，袁就留意《永樂大典》的佚本，曾經到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尋訪，於 1924 年在《學衡》發表過《永樂大典考》，以後從 1925 年到 1939　年間陸續發表有關《永樂大典》現存卷目、文獻和考據文章，計有十多篇。我於此道為門外漢，不敢妄評其價值，但就他連續追蹤十幾年，直至抗戰時到了後方仍然不捨的情況來看，想必有獨到的內容，專家們當早已留意，毋需我野叟獻曝。不過袁先生所刻意搜尋流落海外的決不止《永樂大典》，也包括其他古籍和藝術珍品。他晚年最後一部未完成的心血結晶是《海外中國藝術珍品目錄》，是他多年苦苦探訪所得，可惜最後一次在歐洲調查未竟，癌症發作返美，終於不治，賫志以沒。關於袁先生對這件事的良苦用心， 其長子袁澄在紀念文章中曾有敘述：袁在留美讀書時見到英國人斯泰恩在《千佛》一書中自鳴得意地敘述其掠取我敦煌文物的經過，深受刺激，再加以在遍訪各國博物館過程中目睹我國無數珍品散落在國外的情況，感觸更深。明知國勢如此，暫時難有收回之望，但是如果再不注意，這筆文化的損失就永遠無法算清，遂以為我國文化保存一點記錄為己任，「終生默默的從事典籍調查

工作」。調查海外《永樂大典》佚本、收集和組織敦煌抄卷以及編纂海外藝術珍品目錄等，都是出於這一用心。這也同在日寇鐵蹄下搶救善本書一樣，在對大局無可奈何之中， 以一人之力鞠躬盡瘁，我在肅然起敬之餘未免感到一絲悲劇色彩。

抗戰開始後，袁率領部分北圖人員南遷，先後與長沙臨時大學和昆明西南聯大合辦後方大學圖書館，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不但使大學師生不致斷糧，而且還把圖書事業向前推進。他以自己的國際名望和關係，用「中華圖書館協會理事長」的名義發起向國外徵求圖書運動，主要通過美、英兩國的圖書館協會做這件事，引起廣泛的同情和熱烈響應。美國圖書館協會1938 年的年會上還宣讀了袁同禮的信，並成立了國際徵書委員會。結果在太平洋戰爭前的三年中收到英美贈書數萬冊，以及贈款和圖書儀器、縮微膠片等，從香港經滇緬公路運進內地， 再通過一定程序，根據需要分給後方各大學。筆者在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查閱與中國有關的檔案中，就意外地發現抗戰時期袁同禮與美國圖書館協會以及洛氏基金會大量通信，都是關於支持中國圖書的項目的建議，賴先生之力，爭取到洛氏基金會資助中國選派人員出國學習圖書館專業和邀請國外專家來講學、購買急需的圖書、編印書目、出版北圖書目的英文版和年度工作報告等。特別是在勝利在望的 1944 年，袁就開始為恢復全國各地的圖書館，補償戰時的損失而作準備，為此積極呼籲國際援助，也卓有成效。

此外，袁還利用後方的特殊條件，廣為收集中日戰時史料和西南地方文獻，使這方面資料之豐富也成為勝利復員後的北圖館藏一大特色。

在抗戰顛沛流離的情況下，能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將這些工作堅持下來，可以想見需要怎樣的毅力，沒有堅定的意志和信念是難以支撐的。這種精神非袁先生所獨有，而是整個大後方高等院校師生在艱難卓絕的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的一部分。在國土淪喪、生靈塗炭之中，大批知識精英恪守教育和學術領地，耕耘不輟，使文化得以賡續，保存了民族精華，靠的就是這種可以稱之為「民族魂」的精神。

袁同禮 1949 年赴美後，除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學任職外，一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直到 1965 年去世。以他在國內的地位和在國際圖書館界的名望，僅擔任東亞圖書部的一名普通編目員。八十年代筆者在美國遇到知情者談起，都為袁先生流落異國受此委屈表示感慨和不平，同時都盛讚袁先生為人的淡泊和勤奮。他對於職位問題處之泰然，反能利用這一崗位的有利條件盡其所長，成就了後半生的業績。他除了對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書目整理作出貢獻外，完成出版了多種有價值的目錄集，其中價值最高，耗費心血最多的是《西文文獻中的中國》

（1921–1957）（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書為十六開本，八百零二頁，洵是煌煌巨冊，收集了那個時期內發表的英、法、德文有關漢學和中國問題的著作和論文共一萬八千種，其分類和索引體現了編者的匠心，查閱極為方便。難得的是凡涉及中國人名和書名都註中文原文，內行人當知道，只此一項就極為複雜艱巨。美國著名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Hummel）為之序，稱編者為此書曾遍訪美國各地及歐洲

各國的著名東亞圖書館，幾乎對每部書目及原著都一一核對以辨真偽，因而所收作品比任何一家圖書館的目錄都全，都準確。這裏所耗費的心血和時間，所需要的學識和精神非同一般。在此以前僅有的同類著作是十九世紀法國漢學家考狄埃（Henri Cordier）所著《漢學書目》（Bibliothca Sinica ），於 1887 年初版，最後修訂版是 1924 年。袁氏所編有意與之銜接。1992 年我在美國研究的課題涉及美國的中國學，知道此書後，特別希望能長期擁有一冊， 但當時早已絕版。蒙袁澄君大力相助，搜尋到一本相贈，盛情可感。此書的材料截止到 1957 年。此後四十年間西方有關中國的著作又不知凡幾，如果繼續編篡這樣一本目錄可能還要厚得多，分類也複雜得多。現在有了電腦、光盤等等檢索工具，而當時卻完全是手工操作。不過，不論手段怎樣發達，在浩繁的秩卷中去偽存真，對分類歸屬作出準確的判斷，註明中西文對照等等，所需的學養和功夫決非電腦所能代替。至少至今我還沒有見到可以作為這本書的續集的綜合性工具書。除此之外， 袁先生在美期間還編纂了多種學術價值極高的分類目錄集和叢刊等，都與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有關，為學術界所推崇，袁清教授的文章中敍述較詳，這裏不再一一介紹。

袁先生的著述、業績當然遠不止這些。縱觀他的一生，可謂「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他逝世之後中美兩國生前友好、長輩後輩都紛紛撰文追憶其人其事，其中頗多知名之士。文章對他的人品、德行、功業評價甚高，而決非溢美。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寫道：「袁先生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以他的才力、精力及想像力，為學術努力。他不僅在他自己國內工作，也時時關懷到中西關係。只要他任官或居商，以他的才華，不難富敵陶朱。然而，袁先生把他自己奉獻給文化學術的進步。」一個美國人能對中國國情如此了解，從而對袁的為人作出這樣的評價，也可謂異國知己了。《思憶錄》由顧維鈞為之序，稱「此編不獨為追念守和先生之作品，亦是我國近年學術文化之一頁」，洵是至言。袁先生後半生客居異域，名位不顯，而從去世後受到的紀念和評價來說，也可以算得死後哀榮了。

袁同禮夫人袁慧熙為名門之後，她的祖父即晚清著名烈士袁昶，因力諫朝廷不應支持義和團圍攻外國使館，並反對向十一國宣戰，而遭刑戮。《思憶錄》有她的親筆手書「前言」， 文與字俱佳。據袁澄君稱，她和袁先生一樣，都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憂」的修養，住廣宇華屋和蓬戶甕牖都安之若素， 在抗戰後方生活極度艱難，她親操井臼，維持全家生計，毫無怨言。而我上大學時見到的金魚胡同一號的袁府卻另是一番氣象，單是那前廳之寬敞就有王府氣派。據說袁先生有兩好，一好古董，一好廣廈。後者不是為了擺闊而是為了陳列那些古董，隨時欣賞。以他的鑒賞力當然收集珍品不少，在他離開北平時勢必不可能帶走，就托給一位朋友。解放後，那位朋友都交給了政府。九十年代袁澄見到我後，托我打聽這批古董的下落，因為他聽說這邊落實政策，許多充公的財產都物歸原主了。我回來留意此事，輾轉探詢，真的打聽到確有其事，當事人當然早已作古，這批古董就保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但是因為其中有些屬於國家保護的一級文物，博物館無權處置。我體會袁君也

不是一定要收回這批文物，只是要確認一下，討個說法，或作一些適當的安排而已。不過要做到這點，所需的層層批示的手續之複雜，很難隔洋操作。我只得覆信勸他以「楚人失弓，楚人得之」的態度豁達處之算了。他以後也未再提起。這件事和出版《思憶錄》事，我一件也未能幫成忙，為之歉然、憾然，但也無可奈何。

圖書館工作本身比之其他文化事業是寂寞的後台工作，卻是一個國家文化水平的標誌。民國以來對我國圖書館現代化默默作出貢獻的還有相當一批人，名聲都不顯赫。袁同禮先生無疑是這一領域的泰斗和先驅，功不可沒。

2000 年

黃遵憲的《今別離》詩

愛情和死是文學的永恆的主題。此說來自西洋，也已為我國文學界所認同。但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中還有一個獨特的永恆的主題，就是傷別離，所謂「黯然神傷者唯別而已」。從詩經到楚辭，到古樂府到漢賦到魏晉駢文和五言詩到唐詩、宋詞、元曲，寫離愁別恨、相思之苦的名篇名句，信手拈來，比比皆是，而且涉及的關係和場景極廣：有生離、有死別，有遊子思鄉、慈母盼兒、摯友惜別、夫妻遙相掛念，情人咫尺天涯，還有專寫良人遠征的「閨怨」詩，專寫亡妻的「悼亡」詩，等等等等。兩千年的離人淚似乎已盡收於那數不清的摧人心肝的瑰麗辭章之中，似乎無論哪一種相思的心情古人都已表達過了。然則到了晚清，誰還能寫出甚麼新意來呢？此人就是黃遵憲（公度）。

黃遵憲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曾出使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著有許多倡導憲政、民主，反對專制的書和文章。同時有大量詩作，收入《人境廬詩草》，梁啟超對他的詩推崇備至，許為「近世詩界三傑」之一，稱「其意境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又說他「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飲冰室詩話》中收入多首黃的詩，大多氣勢磅礴，如萬馬奔騰，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悲憤之情，而又眼界開闊，囊括全球。其中有一首寫印度的兩千餘言的長詩，梁啟超比之於荷馬的史詩。然而在所有這些詩中最精彩的當屬四章《今別離》，是寫夫妻眷戀之情，與其他的風格迥異，充滿柔情密意，可謂一奇。此詩被當時人公推為「千年絕作」。梁啟超先見過片斷，未得全文前「憤恨無任」，得了全文後「距躍三百」，「亟為流通之於人間世」，而自己希望以此因緣，以此功德能進入「詩界天國」，其評價之高可見一斑。本人讀後確與梁任公有同感，亟於與讀者分享。

詩分四章，每章一韻，二十六句，讀來琅琅上口，非常容易記誦，而又完全是古詩風格，有點像古樂府。從內容看， 顯然是寫黃本人出使美國之事，口氣卻是代擬留在家中的妻子的，婉轉情深，十分動人。原詩每章本無題目，為敍述方便， 姑妄揣其意給每一章點題。

第一章送別。開頭四句：「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接下來一連串的抱怨現代交通工具之無情：「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看來離人是乘輪船走的。鐘聲一響，即刻開船。不像舊時，陸路可以多送一程；水路則至少可以要船慢些解纜，或可再同飲一杯送別酒。儘管明知送君千里終須別，但總不像現代的輪船那樣冷酷，毫無商量餘地。去時惟恐其速，當然歸時惟恐其遲，最後筆鋒一轉：「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科技發達， 還有比輪船更快的可以為我所用呢！多情而又俏皮，躍然紙上。

第二章接電報。「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 云是君所寄。」一天之中，早晚傳書，多麼殷勤體貼！本該有慰遠念，而問題

就出在這「云」字上，「據說」是你寄來的，可是「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電報不是手跡，而且沒有親筆簽字，怎麼看怎麼不像。「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這現代化的通訊太冷冰冰了，沒有一點個性，平時並坐談心尚且不一定能完全達意，就電報中的廖廖數語如何能盡訴衷腸？（當然，我們都知道，電報本不是用來談心的，黃公如能用上今之電子信箱不知還有何說，一笑）。何況一天通兩次信息也不夠：「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相聞，使我容顏瘁。」恨不得每時每刻接連不斷地收信才好。最後兩句又一轉：「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關於電的新知識就這樣巧妙地融入詩境了。

第三章見小照。「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 入妾懷袖中。」這是見照片後的驚喜。接着描寫仔細端詳照片中人的形象，情景交融：「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然後找出自己的照片回贈，「開篋持贈君， 如與君相逢」。旋即又不滿足了，照片怎能代替真相逢？「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好個「對面不解語」！一語點出照片的局限。科技無論怎樣發達，終歸與血肉之軀有所區別。那時還沒有錄音錄像，如今又進了一步， 但是能代替面對面的交流嗎？最後兩句是：「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唯一的通話途徑只能求諸夢中了，因而引出下一章。

第四章夢尋。這是全詩的高潮，也是最精彩的一章。「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夢魂真的漂洋過海去尋所思了。但是仍不能如願：「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夢裏相尋也見不着，人不在帳中，原來是時差在作祟！這邊「明月方入扉」，那邊「侵曉剛披衣」，不論你來我往，都見不着，相隔實在太遠了：「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夢魂難相依。」由此可見黃公度是到了美國，有了時差相距晝夜的經歷。現在到過大洋彼岸的人不少，可有這種與親人

「眠起不同時，夢魂難相依」的體驗？最後是詩人發自肺腑的呼喊：「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是怎樣的無奈，怎樣的情深意切， 又是怎樣的苦苦相思！

題為《今別離》，可以有兩解：一是指時間，剛分離不久， 因而感情更加強烈，更加難以自遣；二是指時代和內容：乘輪船、收電報、寄照片，還到了晝夜相顛倒的西半球，都是古所未有，方今才出現的新鮮事物。同樣是離愁，其獨特的感受卻為前人所未有。而惟有詩人的敏感和豐富的想像力才能產生這樣的聯想，同時也只有黃公度才能把這些現代事物這樣天衣無縫地融入古體詩。梁啟超說，「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信然。讀罷這首詩，再讀黃的其他氣吞山河的詩篇，特別是其二十四首《出軍歌》，讀來如聞戰鼓咚咚，始則很難想像是出於一人，繼而更加感於其心靈之美與人格之豐滿。本來，如魯迅言：「無情未必真英雄」。如黃公度者，可謂真性情中人。

「平戎策」與「種樹書」
——中國讀書人的入世與出世

卻將萬字平戎策，
換得東家種樹書。
——辛棄疾《鷓鴣天》

中國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詡，或相推許，有許多隱逸、放達的佳話。從詩詞來看好像很多人都嚮往出世。但是細細一看，卻不盡然。這清高大多是逼出來的。有人說過，中國知識分子得意時信孔孟，失意時信老莊，可謂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達當屬魏晉南朝的名士。其產生的獨特背景當然是長期的亂世。政權更迭之頻繁，使一個人一生可以經歷幾個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危險，就是在本朝，宗室奪權也很激烈，一不小心就「站錯隊」。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氣節失去了依託，該把忠誠給誰？誰是值得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換代於國於民何干？對士大夫來說，從老莊學說中找出路比較順理成章，玄學、清談於焉成風。有所謂「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實上他們大多數並非出世的隱士，大小都做過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賢」而言，其中與司馬氏有親戚關係的山濤，先仕魏，後仕晉，官至吏部尚書；嵇康與曹家有親，在魏是做過官的，不過拒絕仕晉。劉伶原也在朝，因倡導「清靜無為」與晉武帝主張不合而被罷官。那王戎則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財奴。所以這些名士確實有反傳統的處世哲學，以為世所矚目的怪誕言行表達強烈的憤世嫉俗之情，但是並不是真的淡泊名利。所謂「大隱隱於朝市」，他們多半是「隱於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實際不做事，照樣遊山逛水，縱酒清談，身在官場，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談誤國」之譏。如果不在位，如何誤得了國？這種情況只有在魏晉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為高官的職務為幾大家族所壟斷，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權，同時也只有出身名門，才能成為名士，一句俏皮話、一種怪癖都有人傳頌，還有人記錄，流傳後世。若是一介寒士，誰來注意呢？ 以那個長醉裝瘋「能為青白眼」的阮籍為例，時下已被用濫了的「青睞」一詞即典出於他。主要因為他是名士，時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倍感榮幸，這才成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認為有眼疾，誰理他呢？還有那先於現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體的劉伶（這倒可以為「西學東源論」做一旁證），一絲不掛在家接待客人，還說是「以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若是窮措大為此，大約是要以有傷風化捉將官裏去的。所以放誕和名士互為因果，因放誕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為放誕才有意義。不過，同為「竹林七賢」，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識超常之人， 而且獨具風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態看得那樣透，那樣不屑

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說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詠懷詩》所表現的那種深刻的悲憤和絕望，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達到極高境界。這批名士的行徑帶有個性解放的傾向，但只能是消極的而不是奮進的。

處亂世暫隱以待機而出是有抱負的讀書人常取的道路， 自秦漢以來每當末代都不乏這樣的人，諸葛亮是先處後出的典型。在那種情況下「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可能是真心話， 但是他決不甘心就此無所作為，否則見了劉備怎能有那樣現成的「隆中對」？也有下決心避世不出的如東漢嚴光（子陵），他是漢光武劉秀的「老同學」，無論漢光武如何敦請、禮遇，終於不受官而隱於富春山。後人譏嚴子陵矯情，說他「一着羊裘便有心」，因為他披着羊皮襖在江邊釣魚，被劉秀派去的人發現， 若是和漁夫一樣穿蓑衣，就根本無處尋，也就無人知。不論此說確否，隱士而知名總有各種途徑。在那個時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這種風氣東漢已有，李固《與黃瓊書》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就是黃瓊屢征不應，李固勸他該見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來，人們的期望就越高，落盜虛名之譏。那前提是終究要出的。這個過程在晉朝稱為「養望」。「養望」最成功，「隱」與「出」都達到最高境界的是東晉謝安。他隱居東山近二十年，享盡詩酒山水之樂，自己琴棋書畫無所不精，謝家子弟個個如芝蘭玉樹，才華出眾，在朝在野都表現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廣為傳頌， 而且爭相效仿，有點「領導新潮流」的味道。那「隱居」是一點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堅決不應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呼聲。到了晉穆帝時，他覺得時機已到，居然應召出仕了，在位大約也是二十幾年。一旦進入官場，他的老莊之學化為極其高明圓滑以靜制動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權力。在他主持朝政時內舉不避親，重任侄子謝玄，立下了淝水之戰大敗苻堅的不世之功，謝安本人由風流名士成為一代風流名相，謝氏家族的顯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見疑，功成身退之古訓，已經開始準備退路，只是還來不及再歸隱東山就死於任上。終謝安一生可謂

「隱」與「仕」都極盡輝煌，死也恰得其時，令後世讀書人羨慕不已。不過這是特例，幾乎絕無僅有。他的子孫就沒有那麼幸運，或隱或仕既沒有那麼瀟灑、自由，也沒有那麼輝煌，顯赫。在皇權更迭的腥風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終，包括以山水詩聞名的謝靈運和謝眺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進退失據而召禍，但有的禍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現代名言：「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

所以興於東漢（再早期的暫時不論），盛於魏晉南北朝的隱逸之風是「士」為保身而逼出來的，是不得已的。東漢有那麼多「高士」、「逸民」，大約與王莽奪權而未能長久，東漢朝政清明的時候又不多有關。而朝廷方面卻有以「舉逸民」為德政的風氣，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總不大好看，總要下功夫軟硬兼施地去請，甚至去逼。隱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經在朝的忠臣卻常不見用，甚至身遭刑戮。就說李固，他忠心耿耿為朝廷求才，終於說動並舉薦黃瓊出來做官，自己卻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滅門之禍，只有一個小兒子逃脫，連黃瓊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觀者寒心？因此才會出現

一批真心誠意堅決不仕，終老山林的「逸民」。他們與魏晉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當布衣百姓，藐視王侯，寧願以放豬、採藥、甚至當長工為生，如蓬萌、梁鴻者流。

與「隱於朝」的魏晉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隱得徹底的是陶淵明。從全部陶詩來看，他不是一個沒有濟世抱負的人，詩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魯迅所引的一處。但是無論如何「金剛怒目」決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論是從自己的切身經歷還是從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險惡，對歷代良士之不遇感觸極深， 不存可以有所作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潔，與那名利場就是格格不入。「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於王、謝之類的世家，既沒有那樣的機遇， 也沒有那樣的麻煩。他與黎民百姓同感離亂之苦，才幻想出一個桃花源的理想境界來。他是真淡泊、真隱逸，歸於田園並非「養望」，只是想逃到皇權統治所能及的範圍之外，享受「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雖然也離不開酒，卻不必故作怪誕引人注目之舉。那個亂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園詩、山水詩，也開創了中國讀書人的一種獨特的保持獨立人格的方式。

那麼處盛世當如何？李白是一種典型。我少時讀了那麼幾首《三百首》裏選的李白詩，一方面懾於那海闊天空的氣勢，　一方面惑於「詩仙」之名，把他想成一個真的志在「散發弄扁舟」，或入山遊仙的人，所以讀《與韓荊州書》覺得大煞風景， 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夠肉麻的。「生不用封萬戶侯， 但願一識韓荊州」，實際「識韓荊州」就是為了「封萬戶侯」，　因為「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還露骨地要求「收名定價於君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詩仙」怎麼能那麼庸俗？這是少不更事之見。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極重的。他做夢都想上「天子堂」。他確實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業，情之所繫在長安。謝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羨慕之情溢於詩文之中。但是時代和門第都不允許李白效謝安那樣「養望」待出。他又自負才高，不屑於考科舉，猶今之不願一級一級評職稱，而求破格，一鳴驚人。於是他選擇了「干謁」的途徑， 也就是奔走於公卿府第，以詩文自薦，企圖遇到慧眼識英才，　一舉登上天子堂，然後大展鴻圖，得成大業。這是李白的如意算盤，像《與韓荊州書》那樣的信和詩文他給不同的人寫過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還寫。但是對於官場政治，他實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謝安那種天生的意識和手腕？他把官場晉升想得太簡單、太公平了，真以為「天生我材必有用」，何愁不遇？結果他二十幾歲離家周遊全國近二十年，歷盡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這條通向天子堂之路比考科舉還長。並不是沒有人賞識他的才華，他也敲開過一些朱門，成為座上客。但是說穿了，只不過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風采、談吐、詩才點綴高朋滿座的華堂，為酒筵增色，為主人增光，最後得一筆盤纏繼續走路。況才高只有遭嫉，遑論推薦！與此同時他創作如泉湧，詩名滿天下，而政治才能卻始終得不到承認。他終於見召進京時已是四十二歲，接詔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興奮就別提了。不過不久就夢想破滅。他被放在翰林

院「待詔」三年，曾有過皇帝賜食「親為調羹」的殊榮，卻根本沒有獻上治國安邦之策的機會。唐玄宗所需要於他的只不過是陪着尋歡作樂，賦詩湊趣，本質上與優伶差不多。使他獲寵也使他遨謗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調》，作為詩，美則美矣，而想到那寫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緊急奉詔寫出來給李龜年唱的，真為李白難堪。他的「倚馬才」用來體會上意，寫出「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這樣的句子。同是寫貴妃得寵的題材，杜甫刺楊家權勢炙手可熱的《麗人行》與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見（這裏無意對李、杜詩作全面比較）。當年漢文帝召見賈長沙「不問蒼生問鬼神」，也還比這尊重些。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機會，卻連個正式的官職都沒有。以李白狂傲不羈的本性不可能長期委曲，皇帝一時興起的優容也是有限度的，　終於「賜金還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對仕途險惡有所悟， 曾一度有入山當道士之意，但是實際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亂之後，還錯誤估計形勢，做了皇家宗室奪權的犧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長流夜郎。但是他僥倖遇赦後還是不放棄干謁求進，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實際上一生都在曲意求進；　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但是他在干謁途中的那些詩文，那一次次的扣門，非此而何？「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簡直到了碰得頭破血流的地步！他到晚年哀歎：「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實在有椎心泣血之痛，關鍵就在於他太入世了。他是死在最後的希望（或幻想）中 ——投奔李光弼的路上的。執着如此，令人擲筆三歎：嗚呼謫仙，執迷俗緣，蒙塵忍辱，長歌當哭，情可憫兮為君惜，何其癡兮不可及！

有點才識的人在朝廷為官而沒有被貶過的大約不多。先有屈原，後有賈誼，是想不開的典型。其實賈誼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幾歲就得漢文帝親自賞識，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馬遷也說他「不可謂不遇」。對於那點暫時的挫折那麼經不起，表現出心胸狹隘，儘管才氣過人，恐怕是難當大任的，與屈原的處境不能相提並論。想得開的，因而形成另一種豁達、豪爽的典型而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的是蘇東坡。他也是「聰明天成」的不世出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賞識。神宗時因反對新法而遭貶，其政見的是非姑且不論，他的態度是堅持自以為正確的意見，自知「滿肚皮不合時宜」，既不妥協也不牢騷滿腹沒完沒了。每貶到一處，總為當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時寄情翰墨，出入於莊、釋，旁參孔孟、名法，清風明月都能助其參悟人生，寵辱不驚，出處自如，達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脫，而詩、文、書、畫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學史上蘇、辛是並提的，但是從本文主題的角度來看，二人的「出」「處」情況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蘇東坡沒有辛棄疾的國土淪喪之痛，也就沒有那樣強烈的悲劇色彩。憑我的寡聞淺嘗，一直特別心儀辛棄疾 ——人品、胸襟、才略、辭章都有一種特別的震撼心靈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壯歲旌旗擁萬夫」的武將，同時是戰略家，主要的抗金復國的韜略都陳述在《美芹十論》和《九議》中。我覺得他不當宰相也是兵部尚書的材料，結果卻成了光照文學史的一代詞宗，真是命運的諷刺，也再次證明才智達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現出來。辛棄疾「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那功業就是北復中原，與陸游一樣，這

是他最執着的夢想。然而他只做過幾任地方官，正當壯年就被迫賦閑，未告老而還鄉（還不是真的故鄉） 達二十餘年，其痛苦可想而知。與許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瀟灑以風月自娛，就是醉了也是「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他詞中不止一處表示他不要效張季鷹那樣想起家鄉蓴菜鱸魚就棄官而歸，也恥於求田問舍，於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幾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認真造福百姓，所到之處政績斐然，而且對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許多高明的見解。但是他事實上歸隱田園二十多年，當然要設法求精神的解脫，否則是活不下去的。在這方面從他的文化積澱中還只能想到莊子，能調動的先例還不外乎「陶縣令」、「阮籍」、「謝東山」，還有那個梅妻鶴子的林和靖等等，能做的也還是以酒澆愁，以詩（詞）言志， 儘量在自然中求超脫。從量來說，《稼軒詞》中寫這種意境的相當多，而且回歸自然確實達到「入化」的境界。「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簡直美不勝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縈繞於懷無法排遣的悲哀在於眼睜睜看着北伐無望，國事日非，空懷良策而無所用。「卻將萬字平戎策， 換得東家種樹書」才是他發自肺腑的長歎，也道出了千古報國無門的愛國志士的共同悲憤和無奈，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從屈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君王都有一種單戀情結。不論走到哪裏，不論受到甚麼樣的虐待，心之所繫，情之所鍾還是魏闕之上那個君主，簡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離騷》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那心情與失戀差不多。李白有詩為證：「卻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夠直露的了。賈誼先見寵，後見疏，到了長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棄婦。杜牧的《阿房宮賦》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說的是宮女望幸，用之於歷代懷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見召的心情也很恰當，宮女們是致力於「一肌一容，盡態極妍」，讀書人則致力於策論辭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對象都是一個人：當朝皇帝。除少數幸運者外，其命運也常是從青春到白頭，空望帝京而不見者幾十年，光景也真堪憐。

這樣說似乎過於尖刻，太不堪了。但我無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寧是充滿同情。中國才識較高的傳統知識分子有兩大特點，一是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二是多少有點傲骨，有點傻氣，甚至有幾分狂。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報國之途是極其狹窄的，唯一的職業是做官，唯一的機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國」和「君」是一回事。辛棄疾要收復失土是為了「好都取山河獻君王」，是「了卻君王天下事」，然後才「贏得生前身後名」。不像西方知識分子，可以獨立研究許多與政治無關的事，對人類作出貢獻，「遇」與「不遇」的觀念如果有，也要寬泛得多，不必總是盯着那個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說出國王與哲學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應該互不相擾（大意）這樣的話，中國士大夫說得出來麼？敢這麼想麼？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個特點促使他們熱衷於求仕進，企盼皇恩； 第二個特點又使他們很難適應複雜黑暗的官場政治鬥爭。何況天意高難測，即使能受重用於一時，也極少能持久到足夠完成一項自己的救國或建國宏圖。好容易有了機會，他們

憑着自負和責任感急於「力陳」的政見大半不會是歌功頌德而是直指時弊，不中聽的，不遭貶黜者鮮矣。這就造成了中國一大批有濟世之才的士大夫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矛盾和痛苦。況亂世多，盛世少，「你才唱罷我登場」，處於夾縫中的「士」為避禍保身計， 也只有隱逸之一途了。魏晉之風提供了一條退路，一種解脫， 在無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靈的淨土，人格的尊嚴。在經世致用之外出現了優遊林下寄情煙霞泉石以詩酒自娛的另一種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種為士林認可的價值觀。否則永遠想不開， 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賈誼憂傷而死，沒有活路了。這樣，讀書人根據各自不同的處境、氣質和旨趣，在「出世」與「入世」這兩極之間在不同層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傳承，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還能保全性命的話，結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頹唐，這種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其實不僅是老莊，在儒家那裏也還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這「愚」就是裝傻，比裝瘋含蓄一點），「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這類意思在《論語》中多處可見。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紀美國的著名隱逸思想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竟引《論語》中的這些話作為他倡導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參照。從這裏倒回頭去想，這種「隱」的確含有某種消極抵制， 不合作的內核。

既然不能見用於朝廷，滿腹才學就都化作詩、詞、書、畫，於是出了那麼多偉大的文學家、書畫家，卻都是業餘的， 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懷成了主流，其比例超過真實的思想情況。這裏還得有兩個條件：其一，他們回歸鄉里似乎都不需要為稻粱謀，即使清貧也不必多考慮「吃飯問題」這樣的俗事。我沒有研究過古代文人的經濟生活，猜想大約多少總有幾畝田，幾間房。陶公顯然是有片田園作後盾才能賦「歸去來」，雖然詩中也出現「飢來驅我去」之句，大概總不至於真的挨餓。沒聽說過中國古代大文學家以賣文為生的。其二，明清以前文字獄還未大興，好事之徒尋章摘句告密以邀寵的風氣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議論朝政，言論有相對的自由。因此那些懷才不遇之士可以從文學藝術中盡情抒發，也有所用其才華。這樣的作品既不必考慮市場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錮而欲言又止。寫作的動機就是為抒胸中塊壘不能自已，擺脫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見真性情，想像力得以恣意馳騁。至於有多少讀者，並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味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許，互相欣賞，這才值得為之推敲琢磨精益求精。於是產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學、書畫。其瑰麗、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緻、其宏偉，從內容到形式創造力之豐富，達到了人類藝術創造的高峰。但是假設（當然只能是假設） 這些曠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經國濟世的抱負，使太白扣開了九重閶闔，使稼軒得擁十萬貔貅，他們一個個都成賢相、成良將，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我們還有這樣的文學遺產麼？人類文化的寶庫中還有這樣瑰麗的奇珍麼？對我中華民族來說，這禍福得失該怎麼算？噫嘻！？

1997 年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學生辯論競賽

病中閑翻錢基博著《中國文學史》，見宋朝有一汪藻（字彥章），是四六駢文大家。文章上承蘇、歐，集宋人四六體之大成，論者稱他「屬對精整，擅絕一時」，「感激頓挫，意到筆隨」。他不但擅長駢文，古文也寫得好。此公歷仕徽、欽、高宗三朝，都是專職「筆桿子」，絕大多數作品是為皇帝或主政者代擬的制詔，往往一文既出，天下傳誦。現代人很難想像這類為首長代寫的發言稿、聲明、文電、訓令能變出甚麼花樣，寫出甚麼文采來，竟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而汪藻的這類文章寫得實在精彩，讀之不得不歎服。不過他之為人，包括文德， 卻是「為士論所薄」，何以故？且看他的生花妙筆：

金人陷汴京後立張邦昌為楚帝，張迫於時論，不敢稱帝， 請出孟太后垂簾聽政，並迎立康王。汪藻奉命為太后草詔，實際是秉張之意。文章洋洋灑灑，先說：「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這是為張邦昌辯護，曲盡委婉。又說「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這是勸進康王（因為康王曾「力辭」），比之晉文公、漢光武，用典也煞費苦心。及康王即位為高宗，決心治張邦昌罪，又要汪藻草制。於是藻寫道：「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方宗社有非常之變，　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多麼義正詞嚴！張邦昌是死罪難逃了。但是高宗暫時還不想殺張，怎麼辦？文章到此筆鋒一轉：「尚以本由於迫脅，惻然姑示於衿容，出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真是體會上意，天衣無縫！

又如一貫主戰的抗金名相李綱，初因朝廷屈從金人壓力而罷相，士民上書請願，宋欽宗乃二度起用為尚書右丞。於是汪藻投啟祝賀，引經據典，推崇至極，總之是千古一人，張良、謝安、李晟、郭子儀都各有缺陷，只有李綱是「永惟元勳， 絕前古」，「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汪本人高攀不上，不能追隨左右「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 續山林之野史」！吹拍至此，算是到頂了。到高宗時，李綱仍堅持抗金立場，並直陳時弊，終不見容，罷相，貶鄂州。又是汪藻為高宗草制，羅致罪狀，同一個李綱變成了：「空疏而不學， 凶愎而寡謀」，當初士民為他請願是眾望所歸，「非雅望孰為之師表」？皇帝讓他復出是帝從民望；現在變成了「信狂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朋奸罔上」，「欺世盜名」。真是有筆如刀， 生死操之寸管！如果單看一篇，似乎都無懈可擊，文章不可謂不高明，然而作者心中的是非究竟何在呢？

於是不由得想起大學生辯論競賽。我得首先聲明，我並不反對舉辦競賽：不但鍛煉口才，更可以培養思辨能力和邏輯的嚴謹，而且辯論的

題目常是社會熱點問題，也可使學生更關心和思考書齋以外的大世界。問題出在「正方」、「反方」是抽籤決定的。在知道了這一點之後，每當從電視上看到那些才思敏捷，詞鋒犀利的青年學子唇槍舌戰咄咄逼人時，我總是要想， 他們的真實主張究竟是甚麼？因為，雄辯的力量在於堅定的信仰，大至哲學思想，小至解決一個問題的具體方案，總是認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才值得竭盡全力為它鼓與呼；抽掉了這點「自以為是」，等於抽掉了辯論的靈魂。雄辯之才並非自今日始，是一門極為古老的藝術，差不多與人類的思辯能力同時發展起來，而且中外皆然。試看多少流傳千古的名篇巨著都是為自己所堅信的真理而辯。中國最早、最發達的時期當然是春秋戰國，所謂「爭鳴」，就是辯論。實際上，從兩漢至晚清的多少名篇相當大量的也是辯論的產物。有時裁判和辯論的對象都是皇帝。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辯輸了，輕則遭貶黜，重則掉腦袋。中國士大夫有許多缺點，但是有一個極寶貴的優良傳統， 就是講氣節，「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而且有高度的責任感。就在那伴君如伴虎的時代，仍有不少人敢於面折廷爭，為自己堅信是利國利民的主張而窮盡其理，不惜以身殉。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策論文章（有些就是奏摺），或說理縝密，或氣勢磅礴，主要是裏面有作者的靈魂。

外國也一樣，從蘇格拉底（Socrates）到十九世紀法國德萊弗斯一案中的左拉，到近世法庭上的革命者，其演說詞都是擲地作金石聲，源出於堅定的信念。後來西方言論自由多了，很少以言獲罪，而且有意識地培養口才，大學都設專業。卻發展出了一種政客式的辯論術，稱作「Demagogy」，我們一般譯作「嘩眾取寵」倒也貼切。那是目的只在於要把政敵辯倒，維護甚麼反對甚麼倒是次要的，為此可以昨是今非，面不改色心不跳。其演說辭以機智見長。若以此為「現代化」的典範而大力「引進」，那是莫大的不幸。

其實，當代中國也有自己的特產。有一個委婉用語，非從政治運動過來人是難以體會的，那就是「說過一些違心的話」。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幾乎人人有份（包括筆者自己）。既然是「歷史造成的」，也就心安理得了。然而，驚回首，中國知識分子那一點骨氣、正氣、傲氣從而銷蝕殆盡。而今，又有商業大潮帶來的高度實用主義。我們不愁沒有能言善辯的年輕人， 我們需要大力挽救的是一份真誠、執着、追求真理的勇氣，乃至傻氣。我不會天真到以為而今而後再也無人需要說「違心」的話了。但是退一步，非不得已（是不得已）而說時，總該心裏感到痛苦、勉強，不那麼積極主動，口若懸河吧！？再退一步，至少知道自己「心」在哪裏，而意識到是「違」了，那還有點希望。時至今日，對下一代精英首先培養真誠，其意義想必超過商品的「打假」。

或曰，大學生辯論不過是練習，題目又不涉及大是大非， 以追求真理來要求，陳義未免過高。可如果培養辯才也是總體教育的一部分，那目標就不能是單純的舌辯之士，至少要和認真的獨立思考能力結合起來。首先得弄清楚自己贊成甚麼反對甚麼，而不是別人要甚麼我有甚麼，翻過來掉過去都有一套說詞，先有結論，再找論據，連思辨的程序都顛倒過來了。青少年是可塑性很強的，這種辯論會又很有吸引力，不

論是對參加者還是旁觀者，不可低估其對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影響。所以， 辯論會不論組織程序如何，應以自願選擇某一「方」為原則。甚至選拔到最後各方的人數也不必一定相等。設若有一方只剩下一人，堅信自己正確，以「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舌戰群儒， 未嘗不能獲得優勝。

文章做到像汪藻那樣真也非常人可及，而終為士林所不齒，況等而下之乎！？

1996 年

無韻之離騷

——太史公筆法小議

從小聽說太史公久曆名山大川而為文有奇氣，頗心嚮往之。但是過去讀《史記》常覺得不過癮，找不到我想像中的「奇氣」。那時總以為只有莊子的汪洋恣肆、一瀉千里，戰國縱橫家的辯才和詞鋒，蘇東坡的豪放瀟灑，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華麗鋪陳，才稱得起文「氣」。後來稍諳世事，從同情司馬遷的遭遇出發，逐步體會到他的筆調之深沉、雋永，不同凡響。然而，還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那種風雨如晦的日子裏，懷着壓抑無告、欲哭無淚的心情，通讀了《史記》，才真正感受到那強壓在字裏行間的滿腔悲憤之情，對司馬遷自稱修《史記》是為了「意有所鬱結」，「以舒其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終於找到了太史公文章之「奇氣」所在。

這「奇」，不僅在於以極其簡潔、凝練的文字囊括了廣袤的空間和綿遠的時間 ——縱橫萬里，上下千年；也不僅在於生動地刻畫了數以百計的文臣、武將、帝王、遊俠、騷人、處士， 個個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尤其在於以克制、含蓄的筆法，表達了深沉的感情和強烈的愛憎。通篇沒有雕琢的形容詞，也極少激昂慷慨的議論，而在那貌似平淡的敍事之中，卻蘊藏着極大的感染力。千載之下，仍然能使讀者不知不覺跟着作者去愛、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李將軍（李廣）列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誰都知道，司馬遷由於為李陵說了幾句話而獲罪，遭受了宮刑。他對漢家天子的刻薄寡恩有切膚之痛，對李陵始終抱着惋惜和同情。但是他既不能作不平之鳴，也不能發怨謗之聲，只好把種種複雜的感情通過為李陵的祖父 ——一代名將李廣立傳抒發出來。

《李將軍列傳》全文不過三千字。從李廣的祖先寫到他的孫子，也就是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歷經一百餘年。寫了李廣身經百戰、屢立奇功的英雄業績；寫了他一生坎坷、淒涼悲慘的下場；寫了他多少次化險為夷、驚人的大智大勇；寫了他廉潔、樸實，身先士卒的品德。還從文帝的讚歎、士兵的愛戴、匈奴的畏懼和百姓的懷念，多側面地反映出他的可敬可愛。這裏面有千軍萬馬鏖戰方酣的古戰場情景，也有單槍匹馬深入敵陣的驚險場面。如果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筆法，恐怕再加一倍筆墨，也不足以充分表達這一切。更主要的是，作者通過精心選擇的事例，刻畫出李廣的鮮明性格；而且處處使他的英雄事跡和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自然形成對比，在人物形象一步步完整和深化的同時，李廣一生的悲劇也一步步推向高潮。試舉幾段為例：

第一次，李廣從周亞夫伐吳楚軍，把對方的帥旗奪了過來，「顯功名昌邑下」。這時是一個初露頭角、猛衝猛打的青年英雄形象。但這一次的結果是，「還，賞不行」。

再一次，李廣以百騎深入敵人陣地數十里，消滅了對漢軍的很大威脅、佔據了要害地勢的射雕手。他歸途中遇到了匈奴的數千騎，不退反進，從容不迫，使匈奴疑有伏兵，一夜不敢動，最後他得與大軍會合。這裏的李廣，已是成熟的、智勇雙全的將軍了。但當時他是上郡太守，戰績作為守邊份內之事， 也沒有記功。

還有一次，為了執行他本來不同意的上級命令，使他又處於眾寡極為懸殊的境地，以至受傷被俘。李廣以傷病之軀，奪得敵人好馬，邊射，邊跑，一連數百里，終於進入塞內，敵人竟奈何他不得。當讀者懷着緊張的心情，屏息讀到這裏時，誰都會對這位將軍非凡的謀略和英雄氣概無限欽佩，期待着他得到應有的榮譽。然而，結果如何呢 ？ 文章至此，筆鋒一轉，出現了這麼幾個字：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　當斬，贖為庶人。

這短短的、冷冷的二十幾個字，吐露了多少冤枉和不平！ 還需要再多說些甚麼呢？

寫李廣最後結局的一段，是全文的高潮：那時李廣已經老了。在他自己再三申請下，隨衛青大將軍出戰匈奴。這次是有機會活捉單于的。他懇切陳辭，請求打前戰，但是那位與皇帝親上加親的國舅衛青要把立頭功的機會留給自己的親信公孫傲，硬是派李廣走那明明是迂迴而難走的東道，限期與前戰會合，結果迷了路，誤了限期。衛青自己把單于放跑了，還要問李廣失道之罪，再次叫他去與「吏」對質。李廣最後說：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於是，廣「引刀自剄」了。

這短短的一段話，概括了李廣一生的悲劇。對於一個畢生以征戰為業的武將來說，還有甚麼比生擒敵酋更大的滿足呢？ 但是眼看到手的機會，偏偏被無理剝奪了。而這樣一位力能射虎、曾統帥千軍萬馬、使敵人聞風喪膽的「飛將軍」，到白髮蒼蒼的晚年還要交到為虎作倀的刀筆吏手裏去挨整，最後迫得只好自殺。讀到這裏，誰能不為之扼腕、太息，拍案憤起！在對李廣無限惋惜、無限同情之餘，總不能不想一想，這悲劇是誰造成的，是誰之過？我們自然會想到漢朝賞罰制度多麼不合理，對待功臣多麼不公平，刀筆吏又多麼可恨（順便說一句， 司馬遷本人也是「下吏」治罪的，所以他對刀筆吏有特殊的惡感）。這樣，作者的目的達到了，雖然他自己一句評論也沒有。

文章到此，沒有結束，而是以平常續家譜的方式輕輕帶過李陵，筆法依然是那平淡的客觀敍述。但是惜墨如金的太史公在三千字的李廣傳裏給了李陵三百多字的篇幅，這本身已見其偏愛，而對李廣為人和遭遇每一個細節的描述，處處都使人聯想到他的祖父，不禁歎息：「何其相似乃爾！」通過這，作者頑強地堅持了他的觀點：李陵也是傑出的將才，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他降匈奴是不得已的。並且以單于對他的器

重，進一步反襯出漢朝統治者的不知愛惜人才和殘酷無情。

全文最後的結尾是：「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這就不僅是李廣一個人的悲慘命運，而是進一步作為武將世家李氏門第的敗落。再回過頭來看文章的開頭，李廣的祖先就是當年逐得燕太子丹的秦時名將李信。首尾呼應，兩相對照，在重門閥的封建時代，使整個悲劇的意義更加深刻，更加典型。

人們有理由以為，作者如此克制自己的感情，寫完本文之後，在篇後的「太史公曰」裏，總該發一點感慨和議論吧！ ——還是沒有。「太史公曰」只正面稱道李廣的為人，無一字涉及他的遭遇。最後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結。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嘗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寫照！

堪與《李將軍列傳》相表裏的另一篇，是《孝武本紀》（即漢武帝劉徹）。（此文一說非司馬遷所作，但我認為還是能反映他的觀點的。）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傳記。漢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別是以開拓邊疆著稱，但是他的傳記中絲毫沒有反映。文章開宗名義就說：「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從此，通篇都是求神、煉丹、封禪、怪異之事。給人的感覺，似乎一個漢武帝一生沒幹過別的。而且他還常常為方士所騙，發現之後，就殺掉一個，接着又去上另一個的當。儘管司馬遷自己也崇尚黃老，儘管在那個時代這類事還不像科學發達的今天看來那麼荒誕無稽，但無論如何，一個英明有為的皇帝總不能以求神煉丹為其一生的主要活動。所以，太史公筆下的漢武帝是相當不堪的。與《漢書》中所寫的「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相比較，簡直判若兩人。好在《史記》不是編年史，那個時期的重要史實都記載於當時的文臣、武將，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傳中。例如拓邊之事主要在《衛將軍（衛青）驃騎（霍去病）列傳）中，後人是不能責怪太史公不忠於歷史的。

如果說，在《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是通過正面的敘述， 以弦外之音暗示他對李氏祖孫的同情和不平，那麼，在《孝武本紀》中，他是以獨特的省略來表達他對漢武帝的怨懟。這省略，這沉默，遠勝過一篇洋洋灑灑的檄文，可以收「此時無聲勝有聲」之效。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當然，為項羽立「本紀」，把當朝開國皇帝手下敗將寫成悲壯的英雄，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筆，關於這點，論者已經很多。可惜，後世修官史的再無此襟懷。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人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馬遷的觀點。但是，至少，他雖身遭刑戮，卻絲毫沒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那種精神狀態。他不加迴避地寫了大量本朝歷史，始終堅持對劉家天下的獨立見解。

正統觀念比較強的班彪對《史記》頗有微詞，說它「是非頗謬於聖人」。殊不知太史公以刑餘之身，不阿世，不迎俗； 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用他的筆寫出了自己的心聲，這是班氏父子不能望其

項背的。這也正是一部《史記》千百年來，無論是在史學史，還是文學史上始終閃耀着不滅的光輝原因所在。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算得千古知音之談。

1980 年

啟蒙・教育・愛國

哀清華

近來，由於一名教授受到不公平的處理，清華大學又進入輿論的漩渦。這回挑起的不但是一片輿論嘩然，而且是學界的良知和良心。「哀清華」字樣又在我腦海中浮起。

這一擬寫的文章題目最初出現是 2010 年，聽說「清華學堂」失火，與大禮堂、圖書館並列的一座清華標誌性建築付之一炬。其起因雖然後來照例歸咎於一名工人的操作失誤，實際是校方不可原諒的錯誤裝修決策。這種錯誤源自於方今流行的盲目追新的虛榮，對傳統缺乏敬畏，無知又輕率。這所建築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主要就在於構成其主樓的珍貴的木結構建築。它沒有毀於戰爭，沒有毀於日寇的鐵蹄，甚至也沒有毀於「文革」的衝擊。據說「文革」結束後清華復課第一任校長也曾有對之修繕之意，但是他還比較懂事，有一份謹慎，召集了建築系的老師徵求意見，了解歷史和建築情況，得知木料之貴重和該建築之不可複製，必須極其慎重對待，於是打消了重新裝修的念頭。而如今這所近百年的老樓毀於所謂「盛世」， 為紀念百年大慶，顯示輝煌而大興土木。我收到這一消息時正值午夜，在網上看到許多新老校友痛心疾首悲憤之詞，深有同感，為之徹夜難眠。痛感到這一事件是有象徵意義的，隨着這一把火，燒掉的不僅是一座樓，而是清華之所以為清華的精神傳統。現在清華最不缺的就是錢，在廢墟上無論重建的大樓如何講究、光鮮，作為那座建築的核心的木樓是回不來了。「哀清華」的悲歌縈繞於心中，然而終於沒有成文。當時考慮，正在籌備百年校慶，猶如人家辦喜事之際，就不以哭喪煞風景了吧。

轉年百年校慶，由於國家領導人是清華校友，成為國家大事，不在學校，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慶典。主流媒體大肆宣傳，其中一幅海報為清華二校門「清華園」的圖案（那座拱形門也是清華象徵之一），門框上面密密麻麻佈滿頭像，卻是以官位排列，頂上面赫然幾幅大頭像是當時位居高位的大官，我想找過去的校長和幾位名師的像需要耐心搜尋，直到最下面才發現，擠在一堆，小到幾乎難以辨認。這使我大為憤慨。無論以年資、以學術地位、以對學校的貢獻論，均不該如此排列，這是赤裸裸的官本位。因此接到校方電話說要給我送請柬，核對地址，被我拒絕。「聚天下英才而摧毀之」一語，也是因此而發。所謂「摧毀」，當時的直覺是培養趨炎附勢的風氣，使莘莘學子一心崇拜大官，校長老師則等而下之，如何有心向學？實際上，現在說聚「天下英才」已經不確切，當時想的是能考入清華的大多是智商很高，學習能力很強的少年才俊。而今出現了許多瘋狂的「魔鬼訓練」學校，專門標榜考上

清華、北大的升學率，在這種訓練之下，意味着這些青少年在入學之前已經被「摧毀」了，清華召來的「英才」率將大大下降。

然而，彼時之「哀」，還沒有料到幾年之後竟至墮落到如今這般令人髮指的地步。大約兩年前已聽說有學生在課堂上舉止可疑，教授詢問之下，該生坦言是領受了任務，記錄彙報老師的講課內容的。據說每月有一定報酬，而且持續三年就可以保研，此職務還有一名稱曰「信息員」。而這名學生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之不光彩，只當一份勤工儉學的工作（！）從那時起，這就不是個別現象，培養學生告密、揭發老師成為學校的

「正常」的「教育」內容。那麼我所為之痛心的趨炎附勢之風已是小巫見大巫，徑直培養「東廠」、「西廠」人才了，中國的高等教育將伊于胡底？至於新一輪焚書坑儒早已開始。在各個領域劣幣驅逐良幣，豈止學校為然。只是以清華的名氣，影響更大。最近一段時期清華的舉措也有高度象徵意義：一名罔顧基本事實，口出狂言，為國人所不齒，為天下笑的教授，偏偏不久之後就被授以學校最高榮譽的「資深教授」；而以品德、學問享譽士林的名師始而遭受各種壓制，卒至被粗暴剝奪教學權利。是非黑白顛倒如此鮮明。嗚呼我的母校！

我個人對清華有特殊感情。當年不惜破釜沉舟離開享譽國內外的美麗燕園，轉入清華，在那裏度過短短的三年，留下美好而溫馨的記憶。離校多年，清華在成為一場浩劫的中心「兩校」之後，逐步恢復正常，而且又重建已被取消的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招攬人才，新一代優秀教師開始聚集。老校友額手相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恢復校慶返校，相聚一堂，同溫舊夢。我也寫了不少憶當年的文字。然而自 1991年九十周年校慶紀念活動起，就開始變味，校慶的「正日子」因有「首長」（並非清華校友）蒞臨，警衛森嚴，校友按「級別」發出入證，「普通」校友則只能在第二天來校聚會。到百年校慶則官氣更濃，已如前述。我上清華時有幸趕上梅貽琦校長在大陸的最後幾年，雖然除了在校園遠遠望見外，沒有任何接觸，也沒有聽過他做甚麼「大報告」，但是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們都不自覺地以作為門下弟子為榮，對他懷有發自內心的敬重。2014年我赴台灣一遊，得以訪問新竹清華校園，主人特意領我們到梅校長墓和紀念亭，我不自主地在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這種不由自主的行動自己原來也沒有想到。試問如今的清華校長，學生對他還有這樣的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感情嗎？可能留下的記憶是甚麼呢？誠然，也可以說種種悖謬之舉是奉命而行，校領導不負主要責任。這種藉口越來越難以服眾。有不少情況是主動邀寵，至少是無擔當，並非完全是不可抗拒的奉命。即使奉命，也還有自己的是非判斷，也有「槍口抬高一寸」的裁量。幾年前就有一位以敢言著稱的大學副校長對我說，其實有些人們普遍詬病的政策和做法，只要有十名大學校長肯聯名或分別提出意見，並非不可撼動，至少可以提上討論的議程。然而私下議論紛紛，看法大致相同，卻無人願意發聲。這是將近十年前的事，現在新一輪的學界「新貴」可能連這點私下的共識也難有了。

再說梅校長，當年在內戰方酣時，他能堅決抗拒軍警進校抓學生，並通知黑名單上的學生逃走。梅校長自己是國民黨員，他也明知這些學

生是地下黨領導的運動成員。此事無關政治和政見，而是校長的天職，第一保護校園和師生不受強權侵害；第二，尊重思想自由。另一個例子是流傳較廣的，抗戰最艱苦的時期，西南聯大的教授集體上書駁回陳立夫主持的教育部企圖干涉和管制教材與教學的指令。兩件事都發生在戰爭時期，一是外戰，一是內戰，尚且能保持校園的淨土，學術的尊嚴。方今是和平時期，中國從未如此強大繁榮，以空前的姿態「崛起」，高等教育空前普及，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諾大校園奈何竟容不下一位憂國憂民、有獨立思想的教授？尤其是，在倡導建設法治，而且「法治」也納入官方發佈的「核心價值觀」之際，法學教育卻重點受到禁錮，法學教授不能見容於三尺講壇！

所幸從最近的事件所引起的輿論反應可以看得出公道自在人心。被整肅的教授心胸坦蕩，處之泰然，表示求仁得仁， 亦復何言。然而，百年樹人，每年有幾百萬大學畢業生走向社會，特別是名校出身，「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棟樑」，　而今而後，將是何等樣的「社會精英」左右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

2019 年 3 月

啟蒙與愛國
——在青島海洋大學行遠書院講話

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五四運動以後）「救亡壓倒了啟蒙」——原來「五四」要做的事情是啟蒙，但後來由於抵禦外侮，大家都忙着救亡，結果顧不上啟蒙了，這是我的理解。如果我沒有記錯，這是李澤厚教授首先提出的。這一說法可能有一定根據，但是我認為從根本上講，啟蒙就是為了救亡。中國整個現代化和民族救亡的過程，也是啟蒙的過程。因而我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思考。

首先，甚麼叫啟蒙？我一直都在提倡啟蒙，但有一些人覺得知識分子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誰需要你們來啟我們的蒙？所以我想解釋一下，啟蒙並不是說某一種人教育另外一種人，可以是自我啟蒙，不斷想明白一些事情；也可以互相啟蒙。即用自己的思考和常識的判斷，慢慢接近真理。人類從野蠻到文明是不斷啟蒙的過程，原來不認識外部世界，逐漸提高認識。如最開始的時候認為地球是方的，後來知道地球是圓的。這也屬於開啟智慧的過程。有人先發現了，然後普及了這個知識，最後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圓的了，是不斷啟蒙的過程。但是「啟蒙」還有一個特定含義，歐洲十八世紀一批先哲集中提倡的，我們稱之為「啟蒙運動」。所以我先講歐洲的啟蒙，再講中國與之有何關係。

歐洲的啟蒙運動

「啟蒙」英文是 enlightenment，法文是 lumière，這兩個詞是光的意思。即用理性的光亮，來驅趕蒙昧（obscurantism）， obscurantism 原義是黑暗或遮蔽。用光把黑暗驅散，是謂啟蒙。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是用理性的光照亮被蒙昧的心智。理性還有一個對立面是迷信。歐洲的歷史背景針對的是教廷的專制，天主教還沒有革新之前，是政教合一。教皇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不但管人的靈魂，也管世俗的事情。像我們知道的布魯諾，因為要講日心說，為宗教裁判所定罪，受到火刑。後來史家把這一段叫黑暗時期。十七世紀最早是從宗教革新開始，大家都知道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我認為宗教改革與啟蒙的關係中有一點很重要，即並不是反對宗教，而是主張每個人按自己的想法來解釋《聖經》，所以第一步是把《聖經》的拉丁文翻譯成各種文字，有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等。過去只有拉丁文，百姓看不懂，與上帝的溝通只能通過神父，神父告訴你耶穌怎麼說，你就聽他的。宗教革新就讓人人用自己的語言都能看懂《聖經》，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革。這有點像中國的白話文運動。現在有人攻擊白話文運動，說是把漢文都糟蹋了，弄得現在年輕人看不懂文言文，使傳統文化失落。但是我認為白話文無論如何是功大於過，使一般人能將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並且大家都看得明白。這與把《聖經》翻譯成各種文字是異曲同工的。

也就是說，不讓少數人壟斷文化，欺騙多數人，我怎麼說，你就得聽。當然宗教革命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但使得一般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途徑去接近信仰的真諦，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想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是信仰自由，宗教開始分派別。不同人群對聖經有不同的解釋，有不同的側重點，就分成了教派。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流血，原來把持宗教的人，不能容忍有新的解釋，利用原有的權力，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宗教戰爭。從宗教革命開始到十八世紀，就有了啟蒙運動。大家都知道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康德，都是啟蒙運動的健將。總之，啟蒙運動所提倡的就是解放人的思想，獨立思考，不必追隨權威，而且想了之後可以表達出來，沒有一個權威能禁止個人把想法說出來。這些先賢們是先知先覺，每人發展出一套理念，像一盤棋，經過艱苦奮鬥， 慢慢形成了大家公認的一些價值觀：第一是自由，啟蒙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自由其實也是人類的天性。有的人說某個民族是不適合有自由的，我就想自古以來，全世界各地域之間沒有交流之前，不約而同都用監獄來懲罰罪犯 ——剝奪人的自由被認為是最基本的懲罰，中外都一樣，說明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要求。最大的懲罰就是把自由剝奪了。但只是這樣還不夠，因為小鳥、各種動物也是要自由，把它們關在籠子是不高興的。一開籠門鳥就飛出去了。那麼人跟動物有甚麼區別呢？就是人是有思想。所以人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有兩種辦法可以壓制人的思想：一是不斷宣傳一種觀念，從小就灌輸，使他生來就只知道這是天經地義，不能接觸其他，因而也不知道還有其他思想。另一種情況是沒辦法強迫人怎樣想，就壓制他不許說出來，這就是以言獲罪。這就涉及表達的自由。思想是別人拿不走的，如果表達有自由，就可以傳播了。一個人不能老是自言自語，需要跟人交流，希望更多人聽到他的想法。人有了文化，就要寫作，發表出來給別人看，於是就有新聞、出版自由。光說還不行，思想相同的人需要在一起做一點事情。就開始有了結社。

歐洲經過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約翰• 穆勒（John Stuart Mill）寫《論自由》（On Liberty）是集大成，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為甚麼要有信仰自由，到言論自由，到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從啟蒙一直到四大自由，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用甚麼來保證人享有這樣的自由？於是就出現了民主法制。如果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一定是叢林法則。誰力氣大， 能打敗別人，把東西搶到手。所以需要政府。政府是做甚麼的呢？根據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政府是保障人的私有財產。原始時代，在森林裏的獵物是無主的，人人都可以去打獵、去捕魚。你一旦花了力氣，得到的獵物就是你的私有財產。因為付出了勞動。沒有付出勞動的人不應該從你手裏搶。但叢林法則是可以這樣做的。於是大家推舉出比較公平有能力的人來保障誰打的獵物歸誰。定出一些規矩來規範人的行為。這就是政府的開始，所以開始要政府，是為了保障私有財產不被侵犯，定出規矩來，後來形成法律。

當然以後越來越複雜，到了工業化時代，人的社會生活越來越複雜。你的自由妨礙我的自由怎麼辦等等？就開始制定出各種各樣的法

律。從啟蒙運動開始，有非常複雜的民主制度的設置。但總的說來，從人的思想來講，啟蒙就是從迷信解放出來，有勇氣用自己的理性來思考問題，而不是跟着哪一個權威走。不能憑權勢、軍隊，或財富說了算，是根據事實，而不是指鹿為馬。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但歐洲用了好幾百年才搞清楚。而且要揭發權威說教的虛偽性。教會的虛偽在甚麼地方呢？我們都知道天主教是主張禁慾，主教是不結婚的。對百姓也是宣傳各種各樣禁慾的主張，婚姻戀愛都不能自由。但這是違背人的天性。實際上宣揚禁慾的這些人私生活是非常亂。歐洲有些國家，經常看到有些豪宅，據說是當年某某主教金屋藏嬌的地方。許多主教都有情婦。宗教也造成很多悲劇，例如美國著名小說，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就是講一個神父跟一個女子談戀愛生了一個孩子，那個女子從此就背上恥辱，衣服上繡了一個紅字作為標記。可是那神父還道貌岸然地傳教。啟蒙運動時期就把這些事情揭露出來。揭穿虛偽，回歸人性。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是顛峰之作，是當時的禁書。提倡回歸人的本性，去掉虛偽。如伏爾泰、康德等大批啟蒙的著作形成一種潮流，把人從迷信中解放出來，才有後來歐洲幾十年的繁榮， 有工業革命、科學革命，以及制度的創新。這是歐洲從但丁（Dante Alighieri）開始，到十九世紀達到比較成熟。

與中國的關係

近代中國的啟蒙是從鴉片戰爭以後，所謂第一批能夠睜眼看世界的人開始。在中國的特殊背景之下，啟蒙和救國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中國人是被外國打懵了後才開始睜眼看世界。當時比較關心國家的仁人志士的第一個問題是「他們怎麼會打敗我們？」我們這樣一個有幾千年輝煌歷史的了不起的國家， 是如何被打敗？他們是甚麼人，怎麼能打敗我們，打敗的原因是甚麼？鴉片戰爭是個契機，一般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可是還沒有完全震撼中國。真正把中國震醒的是甲午戰爭，一敗塗地，實在是太慘了，而且是被「倭寇」給打敗，奇恥大辱， 很難接受。朝野震動，無論在朝在野，有知識的人都在考慮這個問題，怎麼會被一個小小的島國給打敗？而且敗得這麼慘。從這一刻開始，中國的士大夫們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思考的答案，簡單來說，就是先從船堅炮利，武器好，然後發現武器是要有工業做後盾，而且要買船、買武器也得發展經濟，才有財源，然後才發現之所以他們經濟發達，是因為政治制度先進，然後再進一步到思想文化。承認船堅炮利要發展工業，這是比較好辦的。但要承認政治制度比我們先進，就要經歷非常痛苦的過程了。

郭嵩燾是發現這一點的先進人物之一。他到國外考察回來，寫了很多東西，其中有一些是關於政治制度、議會制（大家一起討論問題，然後公推出一個領導）的優越性。他寫了很多報告回來，說現在西方看我們就好像中國三代時看夷狄一樣。也就是我們成了夷狄，他們是文明的中心了。這句話是非常振聾發聵的，所以不能被當時的權貴接受。回來

之後就有人舉報他，崇拜西方，對天朝大不敬，結果他被貶了，他的報告被毀版。所以中國本來可以早一點啟蒙，結果就晚了好幾十年。最早開始覺悟的人常常是不幸的。在當時郭嵩燾思想可以說是在士大夫中最先進的人之一。

還有一個是嚴復，他可稱「翻譯救國」。他原來被派到英國學海軍，因而會英文，結果翻譯了一大批書，這是功不可沒的。如大家都知道的《天演論》，還有穆勒的《論自由》，他給這本書起的中文題目叫《群己權界論》，這題目我認為起得很有道理，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認為「自由」是想幹甚麼就幹甚麼， 無法無天。有一個很有名的電影明星說「中國人不應該有自由，因為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本身就不合邏輯。中國人需要管，外國人就不需要管嗎？哪有人根本就不需要管的呢？認為自由就是誰也管不了誰，無法無天。這是對自由的曲解。所以嚴復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就是說群眾跟我自己權利的界線在甚麼地方，這是自由的邊界。我覺他真高明，能夠體會到這麼一個自由的核心意義。我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自由是權利，但我享受這個權利的時候，不能妨礙別人的權利，自由的邊界就在這個地方。這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要是隨地吐痰， 我說是我很的自由，我願意在哪吐就在哪吐，可是這妨礙了公共衛生，妨礙了別人的健康，妨礙大家享受一個清潔的環境， 群體的自由被你一個人的自由妨礙了。所以嚴復起這個題目， 非常高明。嚴復翻譯了很多東西，《論自由》應該是 1903 年出版，嚴復認為制度的改變，必須有人心先改。「民智不開，何以共和為？」大家都很愚昧的情況下，搞一個共和制度，是行不通的。雖然名字不叫啟蒙，但已經有了啟蒙的思想。而且這個思想是從西方引進，因而他翻譯了這麼多書。

講一個我個人經歷：我的外祖父晚清在浙江做過地方官， 我最近回到我母親的家鄉浙江湖州。湖州有一個我舅舅的紀念館（因為他在紡織界有一些建樹）。在裏面看到我外祖父的一個遺囑，其中對他的孩子們說「近時提倡西學，汝輩生此時代， 凡東西之語言、文字、及格致、算術、實業、法政之學，亦不可不並習之」這個遺囑是在 1903 年立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一個清朝的官員，當時已經要孩子們學習西方的東西，不但要學算術格致，還要學法政之學，一個晚清的地方官已經意識到應該學西方的法制和政治。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啟蒙從一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為甚麼在這時候他們會知道這個東西呢 ？ 這與嚴復翻譯的書有很大關係，我沒有考證過我的外祖父有沒有看過嚴復譯的這些書，但稍年輕一點的沈鈞儒那時肯定已經看到。他在1903 年參加科舉考試，過去科舉文章當然都引四書五經裏的東西，但沈鈞儒的應試文章已經提到「英儒亞當斯密」如何如何說（這是沈寧的回憶文章中提到的），他知道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概也是從嚴復翻譯的《原富》而來。所以嚴復對中國士大夫的啟蒙，是功不可沒的。而且嚴復啟蒙的對象就是士大夫。他之所以用那麼古奧的文言來翻譯，就是因為當時很多士大夫看不起西學，更加看不起翻譯這樣的事。所以他要說明這個東西是高深的學問，能夠站得住腳。他的譯介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在辛亥革命前沈鈞

儒他們已經開始搞立憲運動了。沈鈞儒考取後當了體制內的官員，清朝政府派他到日本去學法政，回來後以在職官員的身份在浙江發起立憲運動，雖然沒有成功，卻也沒有遭到鎮壓。所以說中國士大夫的啟蒙並不晚， 從辛亥革命之前就有。像著名企業家張謇，已經發展民族工業，並具備現代的眼光。

那時的啟蒙和救國確實是一致的，所以做甚麼事情都同救國聯在一起 ——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金融救國等，凡是要做點事情目的都是救國。這說明從晚清到民國，從傳統的士大夫轉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這個過程就是啟蒙的過程，也是西學東漸的過程。我們不能諱言啟蒙是從西學東漸開始的。沒有西學東漸，我們就沒有現代的啟蒙。也就是從「他們為甚麼打敗我們」這個問題開始，答案從船堅炮利，最後達到制度和文化。

後來有人說五四運動是民族虛無主義，因為打倒孔家店。當然我們現在完全可以重新研究儒學，我也不認為全部都應該否定掉。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之下，這種古老的觀念和文化確實是束縛中國人的思想。有一個詞：「離經叛道」，一有新思想就離經叛道了，是嚴重的罪名。經是不能離的，道是不能叛的。那就永遠只能按祖宗的陳規辦事了。所以在當時的背景下，在文化上反傳統是必然的。至於說在反的過程裏，再慢慢研究哪些是精華應該保留下來，那是另外一回事。啟蒙的過程就是中國從傳統士大夫轉變成現代知識分子的過程，然後才有民國的制度，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最後是革命救國。革命就把清朝給推翻了。推翻清朝的那些人，像孫中山、同盟會等，認為推翻清朝是救國之大道。那麼推翻後建立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呢，就不再是一個皇朝，而是一個共和國，至於這個共和國是否完善，成不成功，又當別論，起碼不是皇帝了。所以想復辟帝制的張勳、袁世凱，是成功不了的。這也是一種啟蒙。過去中國人認為不可一日無君，無論如何改朝換代也是要一個皇帝的。從辛亥革命開始，覺得皇帝是可以不要的，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推選一個領導或政府。這是很大轉變，這也是從啟蒙來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啟蒙：過去認為我們的種種不幸都是因為外來的壓迫。後來才發現，我們最重要的是自己不爭氣，最大的問題在內部，而不在外部。外國人之所以能欺負我們，是因為我們制度有問題，文化有問題，這是很大的覺悟。最早明確提出的人之一是梁啟超。

康、梁一向是相提並論，但我個人認為梁啟超的思想遠遠超過康有為。梁在 1901 年，寫的《新民說》，把這個問題說得非常清楚。他說假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自己國內總是受壓迫和奴役，沒有尊嚴的生活，一旦外人來侵略，需要他們為保衛國家鬥爭，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先要有有尊嚴的國民，才能有有尊嚴的國家。所以他說：

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人人之共有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國民在吾國之權與他國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

這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我們的民眾在國內不享受平等的權利， 讓他愛國，怎麼個愛法？他愛哪個國？那時自由平等的思想已經傳入中國，而北洋政府統治者常以中國國情特殊為理由，剝奪國人的權利。梁啟超

認為，只有讓國人享受與別國人民同樣的權利，才能指望他們保家衛國。他說，國民在本國沒有尊嚴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尊嚴。梁啟超說的非常清楚，如果老百姓在國內受地方官的勒索欺壓而沒有保衛自己權益的途徑，那麼外國人來了，他也沒有辦法去抵禦以保衛國家。這個思想在當時應該是非常先進的。所以我認為《新民說》也是振聾發聵，當時起了很大的啟蒙的作用。

後來魯迅也說過同樣的話：

在訴說淪為一國之奴隸之苦時，千萬不要得出還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好的結論。

外國人欺負你，當然要反抗，但不能說還是做自己人的奴隸好點。如果非常愚昧、迷信、只崇拜領袖，那麼外國人打進來的時候，照樣可以說根據某種原因，從現在開始由我來統治你， 老百姓照樣會做順民。所以梁啟超和魯迅這些思想，說明愛國跟啟蒙有很大關係。

我們在講抗戰歷史時，總是講全民抗戰如何英勇，電視劇電影都是這麼演的。百姓為了掩護抗日戰士，不惜犧牲自己。非常艱苦非常英勇，的確有這樣的事實。但怎麼會有這麼多偽軍？就從人口來講，用人海戰術，我們也不至於敗到這種程度。可是日本每到一個地方，「皇協軍」都是中國人，為甚麼有那麼多百姓不反抗，正如梁啟超所說，因為他們沒有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也就不能指望百姓挺身而出抵禦侵略者。中國人從來就沒有過主人翁感。那時候軍閥混戰，哪個軍閥來了，就得聽他的，不殺我就是好事，軍閥稍好一點的，能少交點稅、不強佔地就已經很好了。如果換一個軍閥或者換成日本人來了，有甚麼區別呢？但是另一方面，應該說抗日戰爭也是加強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凝聚力。經過抗日戰爭後的中國，民族意識要強了很多。畢竟已經是民國，和清皇朝不一樣，這有賴於前面提到的晚清以來士大夫的啟蒙。

愛國和啟蒙就是這樣的關係和過程。另外，還有一個愛甚麼國的問題，是愛國還是愛朝廷。從前的士大夫愛國和忠君是一回事，必須要忠於當朝皇帝。所以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時候， 士大夫都非常糾結。承認新朝，就是背叛原來的朝廷。有一種說法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給自己找一個出路，說是後來的統治者更加英明，或者是順應天意。顧炎武提出的說法叫做「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就是我不在廟堂之上，明朝亡了我不為之負責，是當政的那些人把明朝折騰亡了。可是我要負責的是天下興亡，「天下」指的道統。過去的士大夫是要為道統負責的，所以他引用了一大段孟子的話，說現在人心不古。其結果就是顧炎武自己既不勤王，也不事清。即不為快要滅亡的明朝殉葬，也不到清朝做官，自己躲在一個花園裏讀書。我去參觀過他的花園和讀書樓，覺得他很幸運，當時清朝沒有把他抓去逼他做官，也沒有剝奪他的園子，他在兩朝換代時可以自己躲起來。但是清朝立住腳後，就不允許有這樣的前朝遺民，一定會把他們找出來做官，要不就為明朝殉國。他的幸運應該是特例。那麼從現代國家觀念，忠君和愛國應該怎樣看？

我以前就這個問題發表過文章，概括而言，國家有三個層次，一是

「鄉土」（country），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無論到世界哪個地方，我都想念它。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情。二是「民族」（nation），是包括文化和歷史的，浸潤民族文化越深的人，越對民族有感情，到世界哪一個地方，都會想到我是中國人。例如我在美國遇到一些差不多與我同代的華人，成年以後才過去的，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浸潤比較深的，雖然他們生活得還不錯，但總覺得格格不入。不論政見如何，總是關心祖國的命運，希望它好。這就是民族感情。但到了下一代就不一樣了， 因為沒有這種文化薰陶，完全可以融入所在國。這是一種愛國，不論誰執政我都愛這個國家，懷念這個國家。不光是一個鄉土的概念，還包括歷史和文化。第三是政權的觀念，過去是明朝就忠於明朝，是清朝就忠於清朝，忠於皇帝。但是辛亥革命的志士為了救國，以愛國的名義推翻了清朝。我的外祖父曾跟我的舅舅說：「我是食君之祿，只能忠於清朝了，但你們不一樣，所以你們可以按照如何對國家最好的方式去做。」他已經看到清朝不行了，快滅亡了，就鼓勵孩子們去迎接新的國家。但他又擺脫不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就有這樣一個矛盾的說法。

從「食君之祿」到納稅人養活我，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也是一種啟蒙。是納稅人養活我，我對這個社會也作出了貢獻，很多人作出了貢獻，不是朝裏哪一個領導或政府養活了我們（所謂「吃皇糧」），因此我不是對他負責，這是很重要的觀念。所以孫中山等一批人不認為忠於清朝就是愛國。後來共產黨以愛國的名義推翻了國民政府，也認為自己是救國。就是說一個政府一個黨一個政權，不一定要永世代表你所愛的那個國家。你愛的是這個 nation，你希望民族不沉淪，希望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希望人民聰明起來，不要一直蒙昧。至於是哪個朝廷，顧炎武就說了我不為你負責，那是肉食者謀之。愚忠和真正的愛國的區別就在這裏。所以這也是啟蒙和愛國的關係。

我曾一度心血來潮，從頭到尾看了《我的奮鬥》，研究了一下希特拉到底是甚麼思想。我們之前把希特拉想成一個狂人， 在電影裏瘋子和小丑的形象，其實他是有一套完整的思想，而且離我們不遠。為甚麼他能夠成功，一定是有很多人擁護他， 德國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擁護他，他才能夠成功。不管是專制還是民主，如果絕大多數百姓反對的話，是成功不了的。他的這一套思想，能夠一段時期內在德國掌握那麼多群眾，讓人相信大日爾曼民族優越於所有民族，用完全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思想來團結民眾，說明那時德國人很容易被某一種迷信的理論所掌握。後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在回憶錄裏說，德國人之所以曾經一度受法西斯的蒙蔽，追隨希特拉，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德國人缺少個人主義，就是個人獨立思考、維護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的意識不夠，而被所謂的國家至上、大日爾曼民族主義所壓倒。說白了就是缺少啟蒙。幸好德國還有另外一條線，德國的傳統不光是民族主義或者專制，德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也是宗教革命的發源地。啟蒙思想在德國也是有傳統的，還有十八世紀的康德，有許多啟蒙哲學家在這裏。後來德國能夠反省得比較徹底，跟這條傳統有關係，而日本就缺乏這條線。

所以，往往在某些時候統治者或某一種革命的思潮壓倒了啟蒙。以愛國的名義行實際上是禍國殃民之事，把民眾的思想引入蒙昧。德國納

粹是一種典型。

我想我們國家最近一次較大的啟蒙，是 1979 年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兩個凡是」。從那之後，很多過去不可以想的事， 不可以說的話，都可以了，儘管到目前為止還很不徹底，但對現在還是有利的。比如在「兩個凡是」沒有打破前，我不可能跟大家講這些話，我自己也不可能有這些思想。我自認為這幾十年也是祛魅啟蒙的過程。自己啟蒙、互相啟蒙。因為有了1979 年以後的思想解放，出現了一大批思想文化類的刊物，此起彼伏。很多文章給我不少啟發，其中近代史領域的一些學者功不可沒，他們發現了很多新的材料，打破了過去一些陳見。如李鴻章是「賣國賊」，現在已經有了比較公正的評價，承認他其實是晚清非常有先進思想的人。好多這樣的事情，我自己被啟蒙，也希望跟大家分享我想明白的一些事情。

啟蒙並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勞永逸的，其實人的思想是在不斷發展。我自己到了這個年齡，並不認為已經想到頭了，也許再過幾年我會覺今是而昨非，有一些新的想法，或看到一些新的變化。其實這個世界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常常對於外部世界的看法，是出於一種成見，例如認為西方民主是某種定型， 假如西方社會出了問題，就說明民主制度不行。其實他們的制度是一直在演變，一百年前列寧（Vladimir Lenin）寫《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時候， 他預言西方的帝國主義是沒落腐朽的，他說的那些現象，的確存在，如到壟斷資本階段競爭就乏力了，然後市場經濟就會衰退；貧富懸殊過大，會引起群眾反抗等等。但資本主義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夠改造自己，由於社會批判始終存在，不斷揭露弊病，會留下改造的餘地，不斷革新。以美國為例，歐洲暫時不說，1900 年以後，美國就有一個進步主義運動，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如果沒有那一二十年的改革，就不會有美國二十世紀的繁榮富強。所以列寧說美國那時候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拯救資本主義，他是作為貶義來說的，實際上真的拯救了資本主義， 然後有了一百年的繁榮。現在又遇到新問題了，他們還在繼續改革。我的新書，寫美國的新公益，為甚麼這本書題為《財富的責任和資本主義演變》，資本主義演變是他們自己用的詞，政商學精英，包括大資本家，都意識到需要進行深刻的改革，實現「資本主義演變」。他們自己批判時弊的話語比我們批判他們的詞還要深刻、尖銳得多，而且有很多數據來說明社會矛盾的嚴重性。所以現在他們正在進行新一輪的改變，這改變過程裏可能產生新的啟蒙思想。所以人類是在不斷自我啟蒙，不斷地演變，啟蒙體現到行動的時候，就是社會革新、制度的改變。沒有甚麼事情是千秋萬代一成不變的。

綜上所述，啟蒙與救國、愛國是一致的。如果民眾大多數脫離愚昧，更加明事理，更加理性，更重視人格尊嚴，對社會更有主人翁感，豈有民族不興旺之理。

2015 年 11 月

同中小學校長談教育

——在全國優秀中小學校長教育論壇上講話

聽說你們是全國優秀的中小學校長，所以儘管是七月三伏天，我還是應邀跑到杭州來和大家交流。我當老師的經驗極少，同諸位講教育是班門弄斧。但是我當學生的經驗很多，所以我講的主要是根據當學生的經驗，和今天現狀比較，可以發一些議論和感慨。

教育者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

為甚麼我覺得你們的職業非常重要？我想也許有的老師看過我另外一篇文章，題為〈國家興亡，匹夫無責〉。那是闡述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家喻戶曉的話。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不是「國家」興亡，他明確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才是匹夫的事情。他所處的時代是明亡之時，「國家」指的是朝廷。他的意思是朱姓的明朝亡了，在野的讀書人沒有一點責任，是當權者和在位的人給折騰的，我們在野的人沒責任。可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所謂的「匹夫」，還是指的讀書人，也就是在野的「士」。這個責任是甚麼？就是維護道德水平和精神，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文化傳統。他是正統的儒家思想，所以引了一大段孟子，對很多讀書人投降清朝，喪失了氣節，痛心疾首。他躲起來隱居昆山。我理解他所說的對「天下興亡」的責任，就是要傳承民族精神，維護其中最寶貴的東西。這個精神快亡了，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也就是說士大夫的堅守沒有了，這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這句話的意義。

從這一點說起，那麼我們今天負起這個「天下興亡」責任的人，應該是教育者，因為教育者在塑造下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方面有很重要的影響。我這樣說，也有點站着說話不腰疼， 因我不具體做事，不要面對那麼多矛盾。我也知道今天的教育出了這麼大的問題，不一定是老師和校長的責任，整個社會如此，有很多無奈的事情，無能為力，我完全理解。不是要給大家加上負擔不起的責任。也不是真的說天下興亡就都是老師的責任。因為我們國家的體制，作為「士」這個階層，很多事情無能為力。這個現實我是意識到的。

但是我還是要講我認為教育應該是甚麼樣的。法乎其上， 僅得其中。我們說的比較理想，可能做不到，但要有這樣的一個目標，知道應該是這樣的，至少要向這個方向努力。有沒有這個目標是大不一樣的。這是我的開場白，為甚麼我覺得校長和老師的作用如此重要。

方今教育出了甚麼問題？

講到教育，我看到你們已經印刷出來的小冊子，其中也有我過去說過的話。也許今天講的有一些重複。我曾說過兩句話，現在也一直在流傳。一是說清華大學「聚天下英才而摧毀之」。二是「如果當前教育狀況不變，中國人種會退化」。這兩句話是極而言之，先解釋一下，因何而發。

甚麼事情引發我說出「聚天下英才而摧毀之」這樣的話呢。應該說不只一件事。當然也不只是指清華。當時最使我生氣的是，在清華百年校慶時印發的宣傳資料中有標誌性的清華二校門「清華園」圖，門框上從上到下印滿了很多與清華有關的重要人物頭像。我想要找梅貽琦校長和一些知名老師的人頭，非常費勁，最後在靠下面的地方找到，小得幾乎難以辨認，有的名師就根本找不到。在門框上方顯著地方的大頭像的全是國家領導人，是按級別來排列的。你要找歷屆校長和名師，卻小得看不見。我對此很生氣，這是典型的重官輕學，重權勢輕道德文章，這種風氣很嚴重。像這樣歷史悠久的名牌大學，所傳達的，是非常趨炎附勢的精神。這樣塑造出的人格是甚麼樣？能考上清華的學生至少大半是非常聰明、用功的，應該是可教的英才，可是一進門就受到這樣的一種薰陶，從價值觀上就給摧毀了，就是培養勢力小人，所以我說了這樣一句氣話。

這是當時的感慨，但這個感慨由來以久，最近幾十年這種趨勢急劇加劇。1991 年清華八十年校慶，我作為校友返校，情況還比較正常，跟很多老同學按班級或當年的社團自己找地方組織聚會。到九十周年校慶時就不太正常。因為據說國家領導人要來參加，正日子校園戒備森嚴，大禮堂的慶祝會按級別和知名度發票，有身份有地位才能進去。一般校友的活動前一天進行。第一位講話的「傑出校友」卻不是清華畢業生，但他是最高國家領導人，以他為中心。從那時起，返校節已經變味。到了百周年校慶，就完全變味，在人大會堂活動，完全是官方活動，不在校園，按級別講話。清華是我的母校，我有很深的感情，但變成這樣，我特別生氣。那麼，學生無論有多優秀， 在這樣的氛圍下，他的價值觀、世界觀、是非觀會如何？是非常值得憂慮的，所謂天下興亡，指的就是這個精神取向，要往哪個方向走。

2003 年清華文學院重建十周年的時候，我也講過，一個大學的文科目標是出大儒還是出大官？以甚麼為榮，哪個更重要？因為那次大會在我講話之前，一位先生大講了一通清華出了多少部長級以上幹部，中央領導人等等。所以我說的「摧毀之」，首先指的是官本位。另外是崇富。清華培養高科技人才， 可能出很多企業家和科學家，很多人因此致富，這是好事。但每個同學心裏想的「成功人士」以甚麼為標準？如想到比爾·蓋茨（Bill Gates），是想到他的幾百億財富，還是想到他當時出於好奇心和探索的精神，創造出微軟這樣的新事物？喬布斯（Steve Jobs）也是一個榜樣，當想到榜樣的時候，是想到結果發了大財，還是一無所有時的好奇心，對科學的探索，有所創造發明，這個價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還有一位大學教授（不是清華的）居然對學生說，到你 40 歲的時候沒有賺到四千萬， 不要來見我，而且還理直氣壯，教育理念墮落到這個程度，幸虧從反響來看，還沒有為多數老師所接受。

最近又發生了一件事，證實大學的精神是相當墮落的。北大、清華爭高考狀元，簡直不可思議。我碰到好幾位北大的教授，覺得很丟人。這與現在的評比制度應該是有關係的。就是要爭學校有多少成績優秀的學生，但學生又不是自己培養出來的。學校有本事，應該把差生培養成優秀學生，那才是教育的宗旨。搶現成的算甚麼本事？而且是頂級的大學，做這樣丟臉的事情。更糟糕的是用獎學金引誘，等於學生要選擇誰給錢多上哪邊。學生還沒進學校，就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誘惑，我有本事的話，人家拿錢買我。本來他的志願是上甚麼系，學甚麼專業的，這個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哪個學校給的錢多上哪個學校。整個教育觀念在頂級大學都扭曲到這個程度，我們的民族在精神上從來沒這麼墮落過。我們有過腐敗的皇朝，有糟糕的貪官，但在教育的領域還沒有到過這樣的程度。

在我說了「摧毀之」那句話之後，我想一定會有非常多人反對。結果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多人同意，並且有人告訴我，「摧毀之」到大學已經晚了，從中小學就開始。中小學生在受學教育的時候，就在被摧毀中，極端的例子是據說考上重點大學比例特別高的那個對學生進行「魔鬼訓練」的中學，而且受到家長歡迎，當地政府引以為榮。還有別的學校也想效仿。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這與單一的升學率導向以及社會上的一些壞風氣傳到學校，是有很大關係。所以我認為假如再不改變方向的話，人種就會退化。一代不如一代，原來的學生變成老師， 慢慢的，前人所堅持的教育理念就失去了。我說的是「將要退化」，但有教育界的人告訴我，其實已經退化了。所以這種狀況非常令人憂慮。當然不是一切都已如此，沒有亮點。我也遇到一些有理想的有志於教育的人士，而且都是正當盛年，執着於教育事業的理想，我想應該是有希望的。我想在座的一定多數有自己的想法，比我看到的要深刻。

自己做學生的經歷

我就想到我自己從小受的教育。比如，我現在對一些是非有一些看法，我要講真話，這個性格與底色，來源於哪裏？

我也曾在 1949 年之後，經歷各種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 有過迷失、狂熱和迷信。只是在環境改變、迷霧散去後，自己可以有些思考的時候，還有一個精神家園可以回去。這個家園來自哪裏？還是從中小學時塑造的。也就是塗上了人格的底色，是甚麼東西呢？是很平常的東西，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西學東漸以後的自由民主博愛融合的人格教育。

從前的學校，和一般有點文化的家庭，教育理念基本差不多。現在所謂「西化」和傳統好像水火不容，其實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沒感覺有甚麼衝突。例如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都認為做人應該誠實，不應該作弊。應該關心他人，不要太自私。我記得小學一年級第一堂課，唱一個歌，《禮記 · 禮運》篇裏的「大道之行也，天地為公……」那一段。後來在初中時唸英文， 朗誦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感到跟我原來背的東

西有衝突。從我家教開始，做人必須要誠實，我父母奉行「坦白從寬」原則， 做錯了事情，坦白就不會受到懲罰。後來在小學課本裏讀到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小時候砍櫻桃樹的事，在盛怒的父親面前他坦白承認了，父親沒有懲罰他。說明中西道德標準都是一樣的，哪一個民族說假話都不能算成美德。古今中外，基本做人道德是一樣的。

中國的倫理道德有很多君子不為也 ——一個正直的人不能做的事情。這跟《聖經》裏的「十誡」是重疊的。佛教也說「出家人不打誑語」。我覺得這類潤物細無聲的薰陶應該是在小學完成。到小學畢業後，基本的做人道理有了一定薰陶了，自然分得清好壞。再進一步，現代的社會與古代有所不同。比如說自由平等博愛，平等是現代社會的要求，因為在封建社會是承認人生來就不平等的，等級森嚴。平等觀念與啟蒙有關，從啟蒙運動開始承認天賦人權，就是人生而平等。這個平等的觀念，從歐洲幾百年來慢慢深入人心。以社會主義為口號的革命更強調平等，要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可是到現在，我們國家很多人還不認為自己與別人是平等的。我看見過很多小孩非常不尊重清潔工之類的勞動者。家長的教育是讓孩子好好讀書， 為的不做「下等人」，在職業上的不平等，中國遠遠超過西方發達國家，而且被看得起的職業越來越少。只有賺錢多的被人看得起。拜金主義在當前中國特別嚴重。孩子拼家長，家裏是做甚麼的很重要。比如教師節給老師送點禮物表示感恩和尊重。現在送禮也變味。過去是小孩子親自製作一樣作品表心意，現在是需要有含金量。小孩子過生日也開始越來越奢侈，這跟我過去上學時的風氣非常不一樣。過去我上的學校達官貴人的子弟很多，他們在學外的生活也許也很奢華，但是在學校不能特殊，老師也不管你家長是誰。誰也不敢在學校炫富，這是要遭恥笑的。

1949 年以後，最開始的時候，幹部子弟集中在一起了。像現在說的「二代」們都在幾個特定的學校上學。我上學的時候沒有這種特殊學校，當然學校的質量水平是有差別的，好學校為上層家庭之首選，但這種學校是分散的、沒有規定甚麼人家的子弟都在哪一個學校上學。而且好學校入學門檻高，紈絝子弟考不上，照樣進不去。等級觀念和不平等的觀念，我覺得方今反而比以前越來越厲害。而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又特別講平等，與現實反差很大，結果就特別虛偽。所以反對趨炎附勢， 就要確立人是生而平等的觀念，要成為深入人心的價值觀。從小就要培養。

還有一個跟現在風氣有關的是暴力，過去比較少。最近在新聞上傳的比較厲害，幾個在美國上學的中國女孩殘酷虐待同學，在她們心目中，認為不算事，但在美國是犯罪，要重判。在開始施虐的學生被拘留，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時候，家長首先想到的不是應該對受害的小孩子道歉，或教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趕快賄賂證人。就是現在為人父母的觀念，認為甚麼事都是可以用錢擺平的。這對下一代當然產生深遠影響。我看到一則消息，有一個小孩子把同學打殘了，知道自己犯事了，給媽媽打電話，讓他拿錢擺平，說將來賺錢還給你。一切圍繞錢轉， 這樣的人出了學校，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權力，會做出甚麼樣的事？

這種情況，不知道佔多大比例，我沒有做科學的社會調查，但是就

我間接了解到，似乎也不是個別現象。每個縣城中最重點的學校，也許秩序正常一些，教育局重點管，升學率全靠它，集中優良師資。其他學校就「放羊」了。這個很可怕， 這一代人成長起來會如何。這跟 1949 年以後，講階級鬥爭，對敵人要殘酷的教育有很大關係。在很多國家，可以允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批評領導人，但只要一使用暴力，一定是犯法的，這是界線。中國現在相反，只要是階級敵人， 你對他怎麼殘暴都是可以的。已經定位某一群體是階級敵人， 怎麼對待都可以，像希特拉對猶太人一樣。

很難想像，「文革」中那麼多校長和老師，被天真活潑的學生給打死，這種惡性從哪來的？從一種觀念，只要說他是壞人是敵人，就可以用各種手段。就是人性裏最殘暴的東西，爆發出來。例如前幾年在反日遊行時，有人就會莫名其妙的把一個開着日制車的中國人打成重傷，這股氣從哪來的？從民族大義嗎？由於這件事後果太嚴重，影響太大，那個人受到了法律懲罰。但大多數以「愛國」為名的暴行是不受法律處罰的。在一般輿論和形成的價值觀裏，好像暴力是被允許的。如兩個司機打架，男司機把女司機打傷，結果大部分輿論好像在說女司機常常違反交通規則，要並車，使別人惱火，打人的司機反而給這些人出了氣，反而是被打的在輿論壓力下要道歉，不管她有沒有違反交規，輿論的這個傾向很不正常。對於暴力，沒有一種強烈的反感。這是幾十年「鬥爭哲學」養成的。我覺得在我上學的時候情況很不一樣。在學校裏，小孩子打架是有的，女生動手的很少，男孩會有，但很少有故意用那麼殘酷的手段， 而且打架一定違反校規，老師一定干預，要受到懲罰，老師還要進一步問清是非，主持公道。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如果將來的社會是這樣弱肉強食，這個社會就沒有正義公平可言。

所以現在在教育裏，一是趨炎附勢的拜金主義，二是崇尚暴力。至少我小時受的教育環境中這個比較少。

接下來講德、智、體、群、美

（1） 智：現在最集中的是要好好讀書。

確實知識爆炸，需要了解的東西比過去多的多。過去沒有電腦、數字經濟。我上中學時背化學元素表只有九十八個。總之，科技日新月異，需要灌輸的知識很多。生而有涯，知而無涯。灌輸知識是永遠沒完的。重要的是培養求知欲。

好奇心：我自己的經驗，吸收的知識絕大多數不是課堂教科書，而是憑興趣讀的課外書。即使後來大學寫論文或做學術研究，課題本身是選自己感興趣的。首先要培養興趣，聽說有甚麼事情就特別想知道，然後找書、找資料、問人，一路像開花一樣蔓延開去。知識面是從小到大，蔓延來的。

我小時有一種興趣，看到有字就想看。比如包花生米的紙，攤開看上邊有一個小故事，或者走到街上看到的對聯等。不知不覺就吸引過

來。我現在特別怕人問我，看哪本書對我影響最大。我真是講不出來，就像問我吃甚麼東西長這麼大的。就是五穀雜糧慢慢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科學是探索來的，不是先想好了，發明了這個東西就可以得諾貝爾獎，然後成名成家，得到一大筆資金等。像比爾 · 蓋茨當時要搞電腦創辦微軟的時候，就是從興趣出發，不是想到將來可以賺大錢出發的。所以知識首先要有興趣，然後鍛煉吸收知識的能力。有的人特別用功，但真的學不進去，因為不是出於好奇心。一個好的老師就是要教學生怎樣吸收知識。我的的中學數學老師特別好，我就對數學特別感興趣，能讓學生開竅的老師是好老師， 不是專背公式定理，而是啟發你運用思維方式。學校裏要把學生的碗做大，有足夠填知識的空間，暫時空一點沒關係。這也是學校潛移默化的教育。

思辨能力：有一次我在報上看到幾個國家的高考和高中畢業會考的題目，很有意思。法國的題目是考思辨能力，如某某哲學家說過一句話，你是否同意。同意理由是甚麼，不同意理由是甚麼，有甚麼代替的說法嗎？只要言之成理就有分。美國的考題，是一種現實的情景，把人陷入兩難境地，讓考生提出最佳解決辦法，這是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韓國的就是知識，哪年哪月發生了甚麼，死記硬背。亞洲國家的教育方式有相似之處。從這裏看到，訓練思辨能力，是有必要的。自己愛琢磨。我看過一個美國發明家的故事，他從小老在想草為甚麼是綠的，想得頭疼。後來他搞了很多發明，建立了一間很有名的光合研究所。

小孩子要有一定的思辨能力，還要有一定的邏輯推理能力。我看過現在的一些學術文章，特別是為政策辯護的，缺少邏輯，很武斷。我在燕京大學一年級時， 上過張東蓀的邏輯課，他不是常規地講課，因為他常常要發揮，發表政見，但是這一門形式邏輯課對我非常重要，懂得看問題要嚴密推理。我認為在中學就可以教一些邏輯課，就是學會講道理。

科學思維：現在在這個方面有所倒退。科技是發展了，某些方面也達到了世界水平。但很多人的科學思維倒退了。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節目。一個母親要立遺囑，捐遺體。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他兒子堅決不同意，說我怎麼能這麼不孝。這個節目的傾向性也不鮮明。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早就解決了，人死了後，是沒有知覺的，是可以捐遺體和器官。現在開始規定死刑犯不能隨便摘取器官，以後器官的來源減少。這在很多發達國家不是問題。這個觀念，在民國時期至少在受過教育的人間已經解決，只是在農村有一大塊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傳統觀念很重。現在反而城市裏的人越來越迷信。

我們在解放後宣傳火葬，已經被廣大人民接受了，現在又回來。佔地造墓，好多地方已經開始宣傳二十四孝了。我不是主張不要孝道，但這種糟粕正在沉渣泛起。所以我覺得在智育方面要講真正的科學的道理， 不只是技術，而是科學的思維。現在莫名其妙的迷信特別多。社會、老師和學校應該注意到這些事情。

（2） 德：主要是培養公德。

學校有甚麼好處呢？學生最相信的還是老師。比父母的話管用，學

校是個群體，大家都不這樣做，自己也不這樣做。老師說應該把垃圾扔到垃圾筒，學生就會記住。我親眼在路邊見到有父母不讓孩子扔到垃圾筒，說垃圾桶太髒不要碰，小孩子說，老師說應該扔垃圾桶，還是跑過去扔了。說明老師的話是管用的。

老師和家長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但有些家長的家教是要不得的。而且我知道有一些老師很糾結，他想教小孩子一些現代化的東西，可是家長的思想很落後。但相反的情況也很普遍，老師非常強勢，只考慮自己的業績，不從學生的需要出發。

錢理群先生辭去大學職位後，想去中學教書，失敗了。他去南京的一家中學，按照他的理念教書，但被家長給抵制掉了。因為他們認為這妨礙小孩子的升學競爭力，他很傷心。家長不見得都是明智的。一個好的學校和好的老師非常重要，對於學生的影響還是比較大。

確實現在有很多學校老師是受賄，要給老師送禮。我家的保姆是農村來北京打工二十年，全部心血培養她的兒子，最後總算考上了大學。要有希望上大學就必須上縣城最好的高中，一般的普通中學幾乎沒有希望，為此又必須上好的小學，就近沒有，還得依靠親戚，送到別處上小學。這個過程除了付雙倍學費外， 每一步都要送很多禮。據說上了重點中學以後，一個班人數太多，坐在後排不容易專心，大家爭着把孩子放到前六排，為了得到一個好座位，也要送禮。總之，為此不知花了多少本不屬於教育的錢。越是處於弱勢，教育資源少，花錢越多。她還算是幸運的，為兒子教育很執着，終於如願以償了。而很多農村留守兒童就得不到這樣的機會。德、智教育都談不上。

教育普及，形式上都上學，但不見得普及了文化。民國時期文盲多，教育不普及，但是凡是辦學的，大多好好辦，也有成效。是一些有志於教育的人士辦學， 招來的老師一般比較合格。那時教育不普及是現實， 很多小孩上不了學。現在教育普及了，但吸收到的文化含量有限，人格的塑造是很欠缺的。觀念和知識面非常狹窄。我見過一個考上理工科大學的學生，歷史知識幾乎為 0。我問你們中學不學歷史嗎，他說老師說跟考試無關的東西，不要學習。近代史課就是背不平等條約，至於條約來龍去脈全部不知道，出了學校全都忘了。但可以工作，搞軟件等等。全面的薰陶到大學再補課就晚了，應該從初中就開始人格養成。義務教育階段的基礎知識和人格的養成很重要。

（3） 體

我的體育很糟糕，打球哪隊有我，哪一隊就輸。但是我的中學和大學都很重視體育。在清華有個體育老師叫馬約翰，教我們體育。他強調體育不是競技，最重要的是培養堅忍不拔的意志。不知道現在學校對體育的要求如何，因為一到應試教育，很多都免了。有的學校以體育為「特長生」，那是為學校體育比賽服務的，我們重視金牌，但對日常的體格鍛煉、體育的普及，重視少。

（4） 群：跟各種各樣人打交道的能力、是否合群。不要變得很孤僻。

過去科舉時代一般小孩都在家裏上私塾。有了新式學堂後，大家一塊上課，這很重要。現在有一些家長不滿意學校的教育，發展一種「家庭學校」（home　school），可能各科都請好老師，水平比較高。但我認為不能代替學校。在學校裏培養群體觀念，很重要。現在競爭太激勵了，大家都是對手。一排名次， 一定要把旁人壓下去。從小形成敵對的關係，關係很緊張。從前學校也有名次，但不那麼緊張，不是唯一的標準。同學關係很好，一起學習一起玩，有話跟同學講，我有一些中學同學是我終身的朋友，關係很純潔。一個人在學校裏建立的友誼應該是最純潔的，沒有利害關係。現在的競爭把利害關係和家庭背景帶到學校。所以窮孩子就有自卑感。我過去上的學校有不少富家子弟，也有貧寒子弟。但在學校交朋友不會有這個考慮，大家是情投意合的，那時的學生之間沒有互相請客的風氣。我想在學校裏培養互助的精神和純潔的關係很重要。過去我們的班長是自己選的，不是指定，她是沒有特權，主要要有服務精神。我中學有一個同學經常當選班長，她功課也不錯，但不是年年考第一那種。最重要的是人特別好，愛幫助人，大家就喜歡她。跟老師一點關係沒有。

老同學聚會，過了多少年，不管各人的地位怎麼樣， 工作怎麼樣，同學聚會就是忘掉一切，回憶過去美好時光。現在中年人的同學聚會也變味了，有人自以為「混得不好」，就不願意參加同學會，好像低人一等。這些東西，跟全社會的缺乏平等的精神，趨炎附勢嫌貧愛富是有關係的。所以學校裏就應該講究合群，培養健康的、平等的人際關係。

別看美國很講個人主義、個人奮鬥，但同時也很重視團隊精神。考核學生中，團隊精神和與人合作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項。還有一個是志願工作做了多少，就是服務精神，真的無償的義務工作，養成的一種為社會服務的風氣。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學校比較欠缺的。

現在學校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團隊」，實際是幫派，出現所謂的「大哥」，暴力也就產生了。這絕不是健康的團隊精神。

（5）　美：提到美育，可能會想到美術，音樂。

聽說有些學校取消了這些課程，因為如果不考藝術院校，高考沒有這一項。為了保升學率，就取消這些課程，另外師資也不夠。大城市的重點學校與二、三線城市以及小縣城的學校這方面區別很大。這樣一來， 人的培養當然是不完整。美育不一定是從音樂或畫畫而來。其中還有審美的薰陶。這可以貫穿到所有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語文課的文學欣賞。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不少糟粕，至少不適宜於今天，但是最優秀的傳統是審美，中國的文學、藝術有很精緻的審美，達到很高的境界。養成教育，雅俗的區別、琴棋書畫等，這些都是無形中養成的。課堂上的文學課，課外各種欣賞，歌詠、舞蹈等團體活動，其他的一些培養情趣方面的東西，女生學刺繡，男生學木工雕刻之類，都是培養審美興趣，同時也是一種勞作。老師有指導，各人發揮自己的審美情趣。這是潛移默化的，審美的情趣提高後，暴力、戾氣就會排出去。

「文革」中形成了痞子文化。舉止言行越痞、越粗魯， 越神氣，趣味越來越低。關於審美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個人口味不一樣，但是

青少年時見過真正美的東西，就好像曾經滄海難為水，再看痞文化、低俗的東西就本能地抵觸。普及美育可以提高全面的精神境界。蔡元培說外國人是宗教，中國人沒有統一的宗教，所以用美育，等於是一種信仰，一種薰陶。

現在有一種說法，女孩子要富養？這是反其道而行之。讓女孩習慣物質享受，不用艱苦奮鬥，嫁一個有錢人，會享受生活，熟悉名牌等等。這是一種奇怪的旨趣。過去歐洲和中國的中上層家庭，是怎麼培養「淑女」呢？是給他們各種美育教育，首先是舉止談吐，再學一點音樂、美術等等，是一種教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有很多有名的女作家，因為不能出去工作，就在家裏寫作。中國過去也一樣，說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但實際上很多女孩子也很有才。很多書香門第的女孩琴棋書畫都學，她們不能出去工作，就在家寫詩，寫文學作品，或畫畫。即使讀書不多，也知書達理。許多大學者、大才子受母教的影響很大，是一種無形的品味的薰陶。所以美育的教育是一種無聲的培養，美育與德育一起，培養人的人格。有了這些品味以後，就很難做壞事，因為跟你的審美觀念相悖。比如說，老人倒地，人家扶，他反而訛詐人家，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我相信他一定沒受過美育教育，當然首先他的德育更不行。

有一位已故長者說過一句話：現在的教育是倒過來的，小孩子時教他「愛祖國，心懷天下」，宏大敘事。等長大了才開始學習基本禮貌，說謝謝，對不起。特別在「文革」之後社會充滿暴戾之氣。「文革」剛結束時，店裏貼着服務員守則，要說謝謝、對不起，不打罵顧客等。所謂美育跟人的禮貌和行為規範是合在一起。人的品味和德行應該是合二為一的。過去的所謂的書香門第，是傳承下來，待人接物自然有一定的禮數，不管你多不喜歡這個人，不能口出惡言。所以做人的底線和規範，和跟他的行為，德育和美育是相融合。

我發現在座有很多女老師，不只是半邊天，這是很好的現象。我覺得現在婦女觀大大倒退。甚至倒退到一百年以前。連我母親那輩人都已經否定的，現在又回潮，包括主流媒體宣傳的價值觀念讓我吃驚。

我小時候的女學生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在中學高三時，有幾個同學年齡比較大， 個別的同學家長讓她結婚，我記得跟同學去她家，她丈夫家裏很有錢，我們絕對不羨慕，而是覺得她真可憐。那時候的女學生，一般不羨慕老大嫁做商人婦。然而現在卻流行甚麼「學得好、做得好，不如嫁得好」，這些觀念是最近幾十年的大倒退。我特別強烈感覺到在城市受過教育的人群中婦女觀倒退了一百年。

我不知道現在女學生在追求甚麼，心裏想甚麼，將來做甚麼，這個跟自己的前途非常相關。婦聯一直有個口號，自尊、自愛、自立、自強。這些觀念在中小學就應該培養。有了這種觀念，到了大學以後，對於腐敗和各種誘惑就有抵制的力量。現在整個社會的誘惑力非常強，互聯網也泥沙俱下，希望老師們能夠在教學中貫穿自立自強平等的精神。男女的權利應該一樣，責任也是一樣的，真正的平等是在職業上的平等，尊重各種各樣的勞動。男女、貧富，在人格上平等。還有官民平

等。方今官民不平等最嚴重。造成對權勢的畸形畏懼和崇拜。

從小培養孩子人人平等的觀念，然後理直氣壯地說真話。心裏怎麼想就怎麼說，說錯了沒關係。不要作文裏都說假話，按「應該」的編。按「口徑」說話是外交官的事情，有一句諺語：「一個誠實的外交官為了國家的利益對外說假話」，那是允許的。但不能讓所有人都是外交官。而且外交官不辦外交時也應該像普通人一樣說真話。現在我們所培養的是應該怎麼說，而不是我想怎麼說。有人做了一個調查，據說假如中日開戰的話，日本願意上戰場的是 30%，中國是 70%。首先本身我就非常反對這個調查，根本不能想像中日開戰。但是這個調查結果，我高度懷疑這 70% 的真實性，我不是不相信調查者，而是不相信有這麼多人願意上戰場。但是在被問到時，說話的人一定認為應該表示願意，中國人習慣於說應該說的話，實際上言不由衷，很多人可以表態，但是一旦有事，不但不願意上戰場，讓他犧牲一點小小的利益可能都不願意。

基本的品德培養，基本的善惡是非美醜，精神面貌的審美，全世界應該是一樣的。除了一些具體的審美， 例如有人認為皮膚黑好看，有人認為白好。這是另一回事。

德智體美群，這些都應該在中小學培養，而且應該在初中以前打基礎。

現在有個極端是重學歷。其實真正的學識和能力不一定與學歷成正比。例如已故大出版家范用先生，他小學學歷，但出版眼光很高，讀書很多，知識淵博。「文革」時，他竟然從垃圾筒裏揀出非常珍貴的莎士比亞畫冊版本，一張一張整理出來， 予以出版。這是怎樣的眼光和對職業的熱愛！他後面的兩位接班人，也是沒有上過正規大學，但都非常好學，有出版家的眼光，出了許多好書。這說明做文化出版行業，能夠博覽群書， 但不一定有高學歷。所以初中以前培養的文化口味、讀書習慣和興趣很重要。

總的說起來，教育就是使人脫離野蠻到文明狀態，這樣的教育普及了，整個社會文明程度就提高。有些人學歷很高，但行為野蠻，品味低俗，這是基礎教育的失敗，其結果是高等教育大普及，而全社會文明程度退化。我開頭借用顧炎武的「天下興亡」的責任，就是指這個以甚麼精神育人的責任。

2015 年 7 月

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 哪個是手段？13

改革開放之初，我首次作為訪問學者訪美，參加了一次中美歷史學者的交流會。有一位美國歷史教授講了一段見聞， 他問美國學生為甚麼要學歷史，絕大多數的回答就是感興趣； 他問過台灣的學生，得到的回答是，為興趣而學歷史對我們太奢侈，我們是為了救國而學歷史；後來他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竟如出一轍，當時兩岸處於對立狀況， 各自所謂「救國」的含義可能相反。

把學歷史和救國聯繫在一起，令他這個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鮮。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學習和研究歷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世界上歷史悠久的民族頗有幾個，好像沒有像我們那樣特別重視歷史文本，對史書賦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見的說法是「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這裏「替」是關鍵，為甚麼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後被下一個朝代「替換」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家族掌權，然後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為了本朝能千秋萬代永遠繼續，避免被別的朝代「替」掉。

誰最該吸取這個教訓？當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謀士、帝師的職責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這個皇位，老百姓是無權參與，也無能為力，所以歷史首先是寫給皇帝看的。中國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記》例外，是異類。儘管司馬遷本人的職務是史官 ——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是為了皇朝的延續。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個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規律，不是為了漢朝統治能夠永遠持續。所以他膽子很大，一直寫到當代。他是漢武帝時代的人，《武帝本紀》他也寫出來了，而且對武帝沒甚麼好話，並非歌功頌德。要是看《史記• 孝武本紀》，對漢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記》還有點像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提倡的寫生活史，給各類人都寫列傳，包括《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貨殖列傳》等。中國人歷來是輕商的， 但司馬遷給商人也列傳。還有酷吏、循吏，都分別列傳，按照他自己的評判標準。

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歷史書裏的一個異類。是為記錄史實，也是寄託他自己的情懷，不是給皇帝看的。但從此以後，包括《漢書》，歷代所謂「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資治通鑒》的最後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

沒有列入二十四史，卻最權威、最重要的一部編年通史乾脆就叫《資治通鑒》，顧名思義，目的鮮明，是幫助統治者鞏固統治權的。

作者雖然也姓司馬，但司馬光與司馬遷的角度非常不一樣，他在《資治通鑒》的最後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大意說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經放到這裏了，此書是在宋英宗時奉命編寫的，完成時已經是宋神宗當政了。他請當朝皇帝好好讀一讀這部書，並明確提出，每一個朝代的興衰有甚麼樣的規律，宋朝應如何吸取經驗教訓，才能持續興旺下去。

說穿了，歷史著作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夠千秋萬代永存下去。為達鞏固統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條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說民眾的需求和他們的福祉，是必須要顧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不顧及，但這是手段，目標是為了維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膾炙人口的話： 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權。

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因為水還是最基礎的。但歸根結底，水的功用是甚麼呢？是為了承載上面的皇權寶座。能夠明白這一點，重視民眾這個基礎，就算明君了。但後來因為在皇宮裏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後，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了，習慣於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結果起了風浪，把船給掀翻了。

不論如何，歷史著作的最終着眼點是鞏固一家皇權的統治。

從這一功能派生出來，史書還有一個功能是對當朝統治者起一定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這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古代史書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這是從孔子著《春秋》時定下來的。遣詞造句都代表着褒貶，叫做「春秋筆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 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國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更在乎，他們特別在乎自己死後的歷史地位，史書上是把他當成明君還是昏君。

要想歷史把他寫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歷史上就會是昏君，亡國之君。所以對於皇帝或統治者來說，史書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使他們還有所敬畏。所以顧準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這個傳統在皇權專制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後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就逐漸多了起來。不過總的來說，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

擺脫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

自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開始放眼看世界以來，再講歷史，就不限於中國，而是世界各國的歷史了。「以史為鑒」也包括以他國的興衰為

鑒。中國人研究外國歷史，最開頭的着眼點是：為甚麼他們能打敗我們？這也就是我開頭講的中國學生回答美國教授為甚麼學歷史的問題——是為了救國。不管學中國史還是學外國史都是為了救國，這是當時知識精英的共同情結。

但是「他們」為甚麼強大，就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了。因為歐洲從中世紀以後的發展途徑，就不是一國一家的王朝興衰。歷史發展是以生產力、思想的進步和制度的改變為主線。因此，我們在學歐洲的歷史時，總是要學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業革命，甚麼時候有了蒸汽機之類。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國界。

作為現代人，放眼世界，是否還能立足於朝代的「興替」？ 既然號稱「共和國」，又以馬克思理論為主導，那麼，歷史觀就應以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為標準。評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視角。眼睛不是總盯着國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甚麼器皿，甚麼時候機械化、電氣化了，以及風俗的演變等，而統治方式、政權的興替以及制度的變遷只能成為手段。

幾年以前，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曾引起熱議。一般觀眾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崛起」，思考從其他國家的興衰中看出甚麼規律。比如紀錄片中提到荷蘭這個蕞爾小國，卻曾經一度因其最自由、最開放、最有創新而領先歐洲，稱霸一時；比如德國作為歐洲的後來者，特別重視教育，十九世紀德國的教育在歐美國家處於領先地位，德國也以此興國。

這實際上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歷史，脫離了帝王家譜的體系，顛覆了為皇朝服務的歷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國崛起》這部紀錄片無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評價蘇聯解體？

自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其原因和經驗教訓是中國政界、學界戚戚於懷，揮之不去的心結和話題。總結蘇俄歷史經驗教訓的紛紜眾說，大體上有兩種視角。

人類文明史的視角

從這一視角出發，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原來的統治制度對人類的兩大訴求：生產力的發展和公平正義都無法滿足，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殺了文化底蘊深厚、優秀的俄羅斯民族的創造力，給俄羅斯及其周邊的民族帶來的禍多於福，因而難以為繼。

不論以何種方式，最終必然要拋棄舊的制度，轉到人類共同發展的軌道上來。這一轉軌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過暴力。俄羅斯得以和平邁過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規模的破壞，是其人民的幸運，也說明

民眾的文明程度。總而言之，這是歷史的進步。

沿襲朝代興替的視角

這一視角奉蘇共的統治為「正朔」，以同一政權千秋萬代永遠持續為理想，是非褒貶以此為準。於是得出的「教訓」是： 從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開始揭露史太林暴政的真相（儘管只是一小部分）動搖了對史太林的迷信；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進一步「公開化」、「新思維」，「擾亂」了人心；吸取的教訓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強控制。在這裏，廣大百姓的意願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計。

歸根結底，最高準則不是社會進步、人民福祉，而是鞏固已經奪得的政權。民眾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標。為達此目標可以適當照顧民生，也可以不顧民生，但必然犧牲民權。

告別「打江山，坐江山」思維

「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歷史本身客觀存在，如何「滅」得了？這裏指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歷史文本對過去重大事件的說法和解釋，更重要的是對史料的取捨。對於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歷史的作用之一是講祖先的功業如何輝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續下去的責任感。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圍繞着為史太林專政的合法性辯護而撰寫的。現在已經知道其中謊言甚多。中共過去也是以這部歷史為國際共運標準文本，所以整個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真正起到了「滅史」的作用。

1951 年胡喬木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曾經在短時間內為欽定官史。但是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又有所變化，後來為進一步神化領袖，「大樹特樹」，黨史也就完全以「路線鬥爭」為綱，以說明領袖一貫正確，也就是進一步篡改歷史。真可謂「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周密《齊東野》序）。1989 年胡喬木訪美時，自己都認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學術著作， 不同意放入履歷中。

不同的歷史觀，歸根結底是不同的國家觀，涉及對政府和政黨存在理由的根本認識。百姓是主人，還是在皇恩浩蕩下的臣民，各級政府官員是「食君之祿」，還是納稅人養活？這「誰養活誰」是問題的根本。

中國由於皇權制度歷史悠久，「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保江山」的觀念根深蒂固，而對現代民主、共和制的認識歷史較短、遠未深入普及，卻又經歷了以人民的名義行高度集權的歷史。現在要把觀念扭轉到以「民」為目的，政權為手段，十分困難，況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但是中華民族畢竟是要匯入人類文明滾滾向前的洪流。歷史，不論是本國的還是他國的，已不是只寫給君主看，而是面向大眾的。

培根說「歷史使人聰明」，其前提是寫真相的歷史，長期生活在歷史謊言宣教中的民眾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點清醒地對待歷史，明確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 最終要「保」的是誰，這是百姓禍福、民族興衰的關鍵。

2014 年

花蕊夫人與「男兒」卸甲

最近由於一句詩忽然流行起來，想起了詩作者後蜀孟昶寵妃花蕊夫人。此詩題為「述國亡」，全文是：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　更（一作寧）無一個是男兒。

我初見此詩大約是初中時代在一本雜誌上，還有畫像，覺得很美，立刻記住了，是我「過目不忘」的詩之一。這首詩從來都作正面解釋，同情都是在這位美麗的夫人一邊，有一種悲壯之情，讓人覺得，從君王到那十四萬男兒實在不及一位弱女子「愛國」，有骨氣。與「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商女」形成對照。

多年以後，「更無一個是男兒」句曾一度在我腦海中湧現出來，是與彭德懷遭殃的廬山會議有關，不過不是在 1959 年， 坦率說，那時我還處於蒙昧狀態，不可能有此聯想。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打破迷信，我第一次見到私下傳閱的《廬山會議紀要》。忽然覺得，事實和是非都那麼清楚，幾天前那麼多人都是基本上同意彭老總的意見的，怎麼風向一變，立刻轉蓬，那些代表最高權力的袞袞諸公竟無一直言敢諫之士站出來主持公道，伸張正義？那些平時我比較尊敬的人物，特別是在「文革」後把他們列為正面人物的，其表現也如此軟弱。我當然還沒有見到全部紀錄。據說如果見到全部與會者發言的紀錄，那是很不堪的，足以使所有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坍塌。那一次「男兒」句在我腦中出現，也只是曇花一現，沒有進一步深想。只是自那以後，我每見各種老革命回憶錄，或他人寫的傳記中提到在黨內鬥爭，或政治運動中表現「錚錚鐵骨」之類的詞，都打一問號。

最近，這句話又被翻出來古為今用。我現在已經習慣於從「人」的角度、從大歷史走向看問題，感覺完全不一樣了。五代十國是中國分裂、混亂時期。特別是南邊的十國，混戰不已，疆土不斷變化，每個朝代只有幾十年，超不過三代。這改朝換代當然是打出來的，所以戰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可以想像生靈塗炭，血流成河，受苦受難的是老百姓。而這些「興亡」之事與他們本來沒有甚麼關係。從歷史發展看，趙宋統一中國，又出現了幾百年的安定局面，與民休養生息，正是百姓所盼望的，是有利社會進步的。

再說後蜀，孟知祥從後唐手中奪得帝位，當年即去世，傳位給三子孟昶，這個「國家」一共只有二世，實際只能算一世。孟昶在位三十一年，史稱其前期勵精圖治，征伐、擴土，盡有前蜀之地，成一時之盛。在文化上也有建樹，據說用木版刻書肇始於他。後期坐享天府之國的富庶繁榮，縱情享樂，極盡驕奢淫逸之能事。他本人文藝修養很高，擅詩詞、音律、書畫， 這點與另一位亡國之君南唐李後主有相似之處，而壓榨民力、揮霍國庫，奢靡無度，則遠超過李後主。那花蕊夫人投其所好，以其才藝、聰明，在飲食、聲色方面別出心裁，多有「創造發

明」。這個宮廷以它統治範圍的全國之力供一人、一家的揮霍，財盡、民怨，最後眾叛親離，連最親信的大臣也逃亡降宋，「亡國」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在趙宋大軍壓境時， 士兵「齊解甲」，「君王」不戰而降，恐怕是最人道、明智之舉了。而那位花蕊夫人卻滿腔怨恨，責怪十四萬「男兒」沒有奮力戰鬥保衛他們孟家的「江山」。須知，那「十四萬」不只是一個數字，每一個「男兒」都是血肉之軀，都是人生父母養，如果君王決定號令他們奮力抵抗，讓他們橫屍城下，為自己繼續在那豪華的宮殿中過驕奢淫逸的生活，以供妃子一笑，人性何在？退一萬步說，假設那一場戰鬥暫時退了宋兵，「王朝」苟延殘喘，終究也挽救不了最終滅亡的命運，不過百姓多受一些煎熬，沙場多一些枯骨，於民何利？

至於花蕊夫人本人，貌似風光，實際只不過是高級性奴隸，她若真有頭腦，應該想到殷鑒不遠，假設君王決定抵抗， 官兵還有鬥志，說不定馬嵬坡一幕會重演，首先犧牲的是她本人。君王豎了降旗，她沒有死，卻被另一君王霸佔。據說，宋太祖見到她之後，為之驚豔，孟昶七日而亡，死得不明不白， 她隨即應詔入宮服侍新主。她最後的下場有各種版本，供文人騷客演繹。

再說那「玉樹後庭花」的作者，南北朝時期的南朝陳後主（叔寶），也是亡國之君，也是有一位美貌寵妃張麗華陪他縱情聲色，其宮室豪華和生活之奢靡也是歷史有名的。亡國時他還偕寵妃一起跳枯井，被隋軍俘獲。不過張麗華命運與花蕊夫人略有不同，沒有活下來。隋文帝滅陳之後本來也是想循例「接收」這位美人的，但是他的忠實戰友高熲深信「紅顏禍水」之說，沒讓楊堅見到她就一刀給殺了。陳叔寶卻得以苟全性命， 直至病死。

在統治者眼裏，美人也好，「男兒」也好，都是命如螻蟻， 一切服從某個家族的「君王」的利益、好惡。從這個意義上看，　沒有被選入宮，身處江湖，以賣唱為生的「商女」還是幸運的。

「後庭花」照唱不誤，作者是誰，哪一姓的「國」亡不亡，跟她們有甚麼關係？「恨」從何來？

這些都是古人的事。今天呢？

聯想起「文革」結束後，兩個最高家族（一家的家長被另一家長害得死無葬身之地）的後人在被害人遺孀主持下聚會， 握手言和，拋棄恩怨，媒體曾炒作為「佳話」。如果只是兩個私人家族，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與旁人無涉。但是「文革」受害者絕不是一家人，涉及千百萬家庭，上億人口，更不用說全民族的危機了。按照葉劍英主席 1978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鄧小平說，國民經濟瀕於崩潰。兩個家族之間的恩怨可以一筆勾銷，但代表不了對全國人民，以及子孫後代的交代。既然號稱「共和國」，畢竟不是兩家或幾家的天下，這樣的國家大事是斷不能「私了」的。

至今，國事是少數人的「私事」，還是全民的「公事」，在某些人

心目中不見得很清楚。例如彭德懷一案，現在回頭看，　也不能以是否「男兒」來衡量與會者。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在對「敵」鬥爭中還是很英勇的。據說彭本人委屈認罪，以及與會者「千夫諾諾」，都是為了顧全「大局」。那幾億百姓的生計、全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由於當時錯誤不得糾正而導致以後幾年中幾千萬餓殍，與「天子一怒」相比較，哪個是「大局」？現在還有人公開說，個人挨餓事小，不要因個人受苦而不顧大局。問題只是少數「個人」受苦嗎？政治鬥爭中兩家的恩怨和億萬生靈的命運，以及公平、正義、人權、憲法相比，哪個是大局？只有弄清甚麼是「大局」，那麼在關鍵時刻真「男兒」當如何，才能說得清楚。二十一世紀的共和國民的思維模式總該比活在十世紀的宮廷中的寵姬有所超越吧！？

2013 年 8 月

教育與啟蒙

——在「為中國而教」2013　級項目成員培訓班上講話

剛才那位同學介紹我，說有一個特點是愛講真話。如果講真話變成一個特點，而不是常規的話，那就有點問題了。按道理，愛講假話才應該是一個特點，講真話不應該算特點，這也說明我們現在社會是有點問題。

現在講所謂教育與啟蒙的關係，這是你們出的題目，也是我願意講的。

啟蒙

我先講一下甚麼叫做啟蒙。有些人不同意啟蒙，覺得啟蒙，意思就是先把別人說成是愚昧的，自己是聰明的，然後就是去給人家啟蒙，因此就對「啟蒙」反感。但啟蒙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誰比誰特別高明，我來啟你的蒙，而是說人們常常處於一種比較愚昧的狀態，需要想明白，有時靠外力，有時自己也可以給自己啟蒙，也可以互相啟蒙。原來沒懂的道理，忽然一下豁然開朗，懂了。為甚麼會懂了呢？也許是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是讀到一本書，或是聽到一個人講話，發現事情原來是可以這麼看的，原來我這麼看這個角度是不對的，這就是啟蒙。為甚麼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啟蒙）還一直存在呢？因為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被愚昧的，我們是處於愚民教育時間比較長的一個民族，所以啟蒙的任務對每一個人來說都還是很重要。應該說從改革開放以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 我忽然覺得自己有所悟，對一些問題明白起來，意識到自己原來非常迷信、非常愚昧，有這樣一個過程，也不是一朝一夕達到的。對很多問題都慢慢地明白起來。那麼你自己了解到了， 你自己見到了光明，你就特別希望和別人分享，當你發現別人還在那糊塗着，你就特希望他也弄明白這個事，這就是我理解的啟蒙。

教育

那麼教育呢？為甚麼有老師有學生呢？應該老師比學生明白點，就是「聞道有先後」，老師是先聞道的人，所以他就有責任對學生進行啟蒙。從前，開始進私塾讀書，一個字不識的小孩開始認字，叫做「發蒙」，從懵懵懂懂的狀況到開始知道很多知識，人就會變得慢慢地聰明起來。教育的目的，就是把真相、把真理告訴別人，讓原來不懂事的人或者是原來不懂的事，慢慢懂起來了。這就是通過教育啟蒙，其實是很

樸素很簡單的，沒有甚麼太高深的道理。

現在我跟大家討論一下，我對教育的看法。

第一，教育的目的是甚麼？教育的目的當然就是育人，怎麼樣改善人，培養這個社會的人。因為一個社會歸根到底是由人組成的，假如大多數人比較文明的話，這個社會當然就是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假如要改善一個社會，當然要從改善人開始，由人來做。想要破壞社會也是由人來破壞的，想要推翻一個社會也是由人來推翻的。所以人是非常主要的。教育就是把一個自然的人變成社會的人，把原始的人變成文明的人。所以簡單地來講，教育就是要培養一個文明的人。一百年以前，梁啟超說過：「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之競爭也。」梁啟超寫《新民說》，它的意思也是說那個時代中國人都是痛感自己是貧弱的，被人欺負，但是問題出在甚麼地方？不在於船堅炮利比不上別國，而在於國民，有甚麼樣的國民就有甚麼樣的國家。他還說：「國之見重於人也，亦不視其國土之大小，人口之眾寡， 而視其國民之品德也。」這個我們現在太有體會了，一個國家， 受不受到別的國家的尊重，不在於你的疆土有多大，中國本來是個大國；也不在於你有多少錢，現在中國 GDP 很高；也不在於人口有多少，中國人口世界第一；而是要視國民之品格。那麼我們看來，中國人的品格在世界上是不是受到尊重？顯然不是。首先有一點，中國人的誠信度，在世界排名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我剛才說，說真話變成一種特點，這樣的民族是不會受到世界尊敬的。所以教育的目的，第一是品德，第二是知識。當然，一個老老實實的人，非常愚昧，甚麼事都不知道， 那當然也不行。所以知識也是很重要的，但第一是品德。

受教育在現代國家，是基本人權，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教育不是消費，有人把學校看成一種消費產業，那是不對的。在現代國家，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因為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平等，才能保證競爭的起點平等。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公平競爭，我們是要講競爭的，不是絕對平均主義，那是不公平的， 因為人的才能是不一樣的，努力程度也是不一樣的。要把所有人都變成絕對平均，幹好幹壞都一樣，就像過去那種大鍋飯， 看起來公平，其實不公平。那麼，公平在於甚麼呢？公平在於在平等的條件下，在平等的起點，大家各自發揮所長，比較聰明、比較能幹、比較努力的人，就可以有更大的成就。那麼假如教育的機會本身是不平等的，比如讓文盲和大學生去公平競爭，當然是不可能，文盲是很難取勝的。他為甚麼會變成文盲呢，因為他沒有機會受教育。所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應該算作一項公民最基本的權利，這一點在發達國家早就已經承認了，我們國家在原則上也是承認的。

教育也是公益事業最普遍關注的內容。各種公益組織從事的項目有各種各樣，有的是專門搞環保的，有的是專門扶貧的，等等。但是全世界大多數的公益組織，有兩類共同的基本項目，一個是教育，一個是醫療。如果受教育機會不平等，他就很難加入平等的競爭。還有一個是健康，如果保證健康的條件不平等，那麼你就沒辦法加入競爭。健康醫療這方面不是我今天講的題目。在一個經常產生不平等的、貧富懸殊擴大的市場經濟裏，怎麼能夠緩解機會不平等，怎樣造成更加公平的機會，

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應該屬於公民權利的一部分。

不同社會教育的目的不同

在不同的社會裏，不同的人對於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受教育方的動機

從受教育的人這方面來講，比如說，家長為甚麼要把小孩送到學校去受教育？最原始的動機是甚麼？

最原始的動機是不受騙上當

在貧困的農村，希望將來不受騙，算賬的時候不上人家的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過去很多文盲，跟人家一打交道就被算計進去了，經常受騙上當。一直到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事情。例如我親自聽到的一件事：前幾年安徽有些地方遇到一場大雪災，有一家農戶屬重災區，房子也塌了。政府有一筆相當多的撥款，專門用於救濟、補助那些受災比較重的農戶。那家戶主是文盲，被叫到村政府，村幹部對他說：「政府撥款下來了，給你六十塊錢救濟。」他還挺感謝人家，在上面按了手印。後來他的兒媳婦回來了，那兒媳婦是唸過書的，就說：「不對， 怎麼可能只給這麼一點兒？我們這裏是重災區。」於是她就跑到村政府去抗議，說：「我要告你！」村幹部很害怕，下回就補助了他們家不少錢，實際上六百塊錢都不止。所以這位老人深刻體會到唸過書，就可以不上當。以後教育普及了，信息通了，更多的人知道政府給了多少錢，我們應該有多少錢，還可以看到賬上是甚麼樣子的。現在村幹部就不敢欺騙他們了。這就是一個很原始的要受教育的動力。

我也認識過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志願者，他以一個人的力量，在貴州一個特別貧困的村子裏進行扶貧，辦教育。那裏的人均壽命只有 45 歲（現在我們全國的人均壽命已經接近 80 歲了），他們那個村子一是營養不良，還有就是大家都是文盲。所以他開始在那裏辦小學，教那些小孩兒，第一件事情就是問他們為甚麼願意來上學。他們說：「趕集的時候可以不受騙。」他們一個月到鎮上去趕一次集，拿家裏的東西出去賣，換一點錢，或者買一點必需品回來，但是常常要上當吃虧。所以他們認了字，會算術以後，就可以不上當了。這是最原始的受教育的動力，應該說是在很多國家已經沒有這樣的一種教育動機了，但是現在我們國家有些地方還存在。

謀生，進而改變社會地位

現在無論如何，一個文盲到處求職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你必須認字、會算，還有一門技能。再進一步是改變社會地位。現在很多農村家裏父母出來打工，自己再怎麼樣吃苦受累，也要把小孩送進學校，要送進大學，為的甚麼？為的是改變社會地位。我知道有的高中畢業生，他考的分數線夠上大專的，但是夠不上「大本」（這種區別也是我們國家特有的）。然後他就無論如何要復讀一年，家長也甘願為此吃苦受累，為的是上「大本」，因為「大本」畢業和大專畢業在他們看起來社會地位是不一樣的。所以這是一個社會地位的問題。再更進一步的人就想當官，可以光宗耀祖，做人上人。現在學歷很重要，碩士怎麼樣，博士怎麼樣。他們重視的不是知識而是學歷。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有社會地位做人上人，這一點很需要。

為了某種理想，做對社會有用的人，開啟智慧，推動社會進步

這是一個比較高的境界。這是到目前為止比較少數的一種追求。但是事實上，真正的教育，整個教育的目的，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應該是最後這一種。當然獲得謀生的技能，各種各樣的職業技能專業知識，這是很需要的。但是總的來說，是為了改善這個社會，教育出來良好的公民，能夠不管你幹哪一行，簡單的職業也好，複雜的職業也好，首先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是一個心智比較健全有基本品格的人。總的來說，這樣的人多了，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可以使得社會不斷向文明方向發展。這是我們教育的最終目的。所以作為一個以教育為專業的工作者，不管你教甚麼，你也許教的是一種很簡單的技術，但是心目中應當有這樣的理想。大的方向應該是教出一個身心健康對社會有用的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施教者的目的

那麼施教者方面，辦教育的、制定教育政策的人的目的是甚麼呢？在不同的社會當然是不同的。

皇權專制時代：培養統治者、官僚階層

首先，在過去皇權專制、封建等級時代，有貴族和奴隸的區別。受教育的基本上是在高層的貴族階級，而奴隸是沒有機會受教育的。中國科舉制度下，平民也可以讀書，但目的是「入仕」——擠入官僚階層，所以教育是教育統治者，教育馭民術，你怎麼樣去統治百姓。而其他大量的是愚民，不需要知道甚麼道理，只要知道一套等級制度的規矩，忠於這個君主就可以了。這是最早的教育，對廣大草民來講，受教

化的結果還是做順民、臣民。

教育普及的觀念實際上是從工業化開始

工業化發展需要技術工人，一堆文盲不可能操作比較複雜的機器，所以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資本家就需要去培養技工，從而開始有教育普及這麼一說。那麼隨着社會的發展，需要的知識和有知識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教育普及的程度也越來越高，再加上經濟發達也提供普及教育的可能。在最開始、最原始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只保障四大自由，在此基礎上自己去競爭，政府是沒有責任扶貧的，雖然也有救濟，比如教會， 政府也有一定的法規，例如在十七、十八世紀時英國法國的「濟貧法」等。

受教育既是公民權利，也是義務

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才開始在政府層面上有了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策。教育成為政府的職責。比如說，失業救濟、福利、養老、扶貧，所有這些觀念開始進入政府的責任，從那個時候開始義務教育的觀念就出來了。義務教育在國外還有一個名詞叫做「強制教育」，也就是說政府有義務免費給公民提供教育，而公民有義務必須上學，所以你要是把小孩放在家裏不去上學，是非法的。你必須要去上學，但是如果沒錢上學，政府可以提供免費教育。這樣，義務教育才慢慢發展起來。從這個開始，教育變成了既是公民的權利，又是公民的義務。父母沒有權利把孩子放在家裏，不讓他去上學。這是在發達國家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一個觀念。所以，義務教育覆蓋多少年？也是看社會發達的實際情況而逐步發展的，最開頭的時候是小學六年，其後是九年到初中，現在是十二年到高中，大體上是普及到高中。然後上大學就不是義務的了。可是，現在對於上不起大學的，也慢慢地有各種各樣的獎學金、補助或貸款，有各種各樣的辦法。這是一步一步來的。這跟社會的發展也是有一定的關係。

義務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程度相適應

義務教育的長短是逐步到位的。開始教到 12 歲，或者教到14歲……比如說一個小商人，我們叫夫妻店，他家裏孩子常常也在櫃枱上站一站，父母去幹一些別的事情，他來服務一下， 也應付一下櫃枱的事，從 12 歲開始他就可以這樣做了。早期美國在討論限制童工法的時候，這個問題就爭論了好半天。如果你硬要說 14 歲以下的孩子不允許這樣做的話，那麼有很多貧困的家庭很難做到。他們的小孩在放學以後去站站櫃枱，你說算不算童工？所以義務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程度是相適應的，也不是一天到位的。這些都說明了甚麼呢？說明了教育不是一個

空想的事，教育的普及不是一有理想就可以辦到的，必須要跟社會的發展、跟經濟的水平、跟生產方式各方面都要配套。到了今天，包括像中國這樣 GDP 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的國家，那麼至少九年制義務教育是可以普及的。而且現在從法律上從國家的政策上來講，我們已經是這樣規定了。但是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地方辦不到。為甚麼辦不到？這個我以後再講。

以上講的是世俗化社會的發展情況，至於宗教、寺院等有時也起某種學校教育的作用，這是另一範疇的問題。

1950 年代初中國教育「改革」

大學院系調整後的人才目標：「聽話、出活」

現在我們回到施教者的目的這個問題，培養有技能的勞動者，這是一個目的。另外一個呢，我記得清華大學在 1952 年院系調整的時候，從原來的綜合性大學改成一個純工科大學。在蔣南翔當校長的時候，提出過一個培養學生的標準：「聽話，出活」。第一是聽話，是聽黨的話；還有就是出活，那時還是重視業務的。另一個說法是「又紅又專」，意思差不多。清華變成了工業大學，是為了迎接國家的工業化大潮。那個時候清華有一個口號，就是「工程師的搖籃」，要培養優秀的工程師。那個工程師是聽話的，同時是有比較高的效率、比較高的技能的人， 而原來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沒有了。從院系調整開始，就取消了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雖然這兩句話不一定是各大學的校訓，但是原來中國大學的精神都包含這個內容。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實際上，現代社會的教育本來就應該培養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我們經常說創新人才，說我們中國缺乏創新人才。所謂創新就是說有很多新的發明創造，但是這個創新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培養出來的。到了大學，忽然說你創新吧，他就能創新，這是不可能的。這也都是要從小培養的。為甚麼中國的科學不發達？因為從小就不好奇，其實小孩本來都是很好奇的， 但是不培養他的好奇心，你不要多問只要聽話就行了。其實這個「聽話、出活」不是蔣南翔發明的，中國人從小對小孩總是說：「哎，你要聽話啊。」外國小孩，不用這個話來教育的。中國人從來就是說要聽話，聽誰的話呢？聽大人的話。就是說， 大人肯定是對的，你肯定是錯的。就是在這樣的培養下，孩子的創新精神是很難發揮出來的。所以，教育比較高的境界，應該是培養獨立的人格和能夠獨立思考，至少能夠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這就是啟蒙。

甚麼叫啟蒙？就是不糊裏糊塗地人云亦云，人家說甚麼你就聽甚麼，如果能夠在課堂裏發現老師講得不對，這個在中國是大逆不道的，但事實上應該是可以的，老師應該加以鼓勵。這樣對老師也有幫助，也許那個學生本來就錯了，那麼你也可以知道他錯在甚麼地方。這種情況在我們國家的教育裏是很少見的。

教育機會不平等

現在更重要的是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教育機會不平等的由來，當然最重要的一個是經濟能力，窮人家的孩子就很難和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孩子受到同樣的教育。義務教育的出現就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應該不管家庭的貧富，至少在義務教育的六年或九年裏是有平等的機會。但事實上我們現在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過去民國時期，還沒有通過六年制或九年制的義務教育的法律，但是事實上還常常有公立學校彌補這樣的不平等，很多縣、市都至少有一家公立中學是不收學費，提供當地最優質的教育，比如說是市立一中、縣立一中，當然還有省立中學。過去都是這樣，一中就是市裏、縣裏最好的重點中學，是不收學費的，有的還有二中、三中。國立大學，過去像清華、北大、北師大，最好的大學是不收學費，所以貧寒子弟比較能夠通過競爭，憑成績來上這樣的學校。包括過去軍閥割據的地方都有比較好的學校，並以此為榮，作為他的一個政績。當然現在大家也都知道，像劉湘這種軍閥，他絕對不允許縣政府的辦公樓超過學校的建築，這個都是當時的一種理念。

那麼現在我們反而不一樣了，我們有了義務教育制度，說是免費，理論上是應該不收錢。但是呢，相當多的學生反而受不到好的教育，為甚麼會這樣？因為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有問題。他們並不認為教育不發達是他的恥辱，他認為他們蓋高樓或者修公路，或者是弄得市容非常漂亮，那是他的一個光榮。可是一個學校的豆腐渣工程，或者是教育質量很差，或者老師的待遇太低，招不來比較優秀的老師，這些他們都不在乎，整個執政理念出了問題。上級考察他政績的時候，也不考察這個，只是考察他們這裏鬧沒鬧事兒、穩定、不出事，或者是說你的 GDP 是多少，上繳多少利稅，而不考察你這個學校的教學質量怎麼樣，有多少學生。但是教育部門又考察升學率，所以大家都奔着考上大學的升學率去了。為了升學率就可以不擇手段。不管你怎麼樣，只要你能考上了就行。所以凡是沒有把握考上大學的學生就被放棄了。教育資源高度集中，這也是現在我們教育的不平等的一大因素。本來並不一定人人都要上重點學校。過去有少數幾個被認為是重點學校，其他大多數都是普通學校，都還過得去。也有幾個特別爛的、特別不好的學校， 所以呈現出是橄欖型的。而現在的學校也變成金字塔型，就是只有在幾家重點的學校，你才能受到像樣的教育，而大量的本來不錯的普通學校，乾脆自暴自棄了，或者好老師都集中到重點學校、重點班去了，因為其他地方反正是沒有升學率。甚至於重點學校的非重點班，也自暴自棄了。比如說一家著名高校附中，高中一個年級有六個班，三個班是用來考大學，那另外三個班他們就「放羊」了，還不如普通學校。老師的職稱待遇都靠升學率，對教差一點的學生就沒有任何積極性，乾脆就不理那些學生了。這樣的一種完全以升學率為考核標準的教育結果就變成了這樣，你不上重點學校根本就沒希望了。我並不反對應試教育，在目前中國的現狀，要是不考試的話那就更沒有公平了，如果憑推薦的話就更不知有多少腐敗。但是完全以升學率為唯一標準的這樣一種教育制度，必然造成嚴重的扭曲， 造成教育資源高度向上集中，與真正的教育目的背道而

馳。

再者，過去像縣立一中、市立一中，都是免費的，就憑你的成績考上去，對優秀的貧寒子弟是很大的鼓勵和機遇。但是現在這種重點學校反而收費昂貴，也許有一部分人是憑分數考進的，但是有的學校自行規定分數線之下的學生，每差一分就要補多少錢。有的學校呢，就儘量提高分數線，從而加大低於分數線的考生比例，以便高額收費。現在很多家長即使允許生兩個孩子也生不起。一個小孩，就已經使他的負擔重得不得了。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明明現在的法律是義務教育，應該說至少六年或九年之內家長是輕輕鬆鬆的，沒有甚麼負擔的，但現在從幼兒園開始都貴得不得了。所以，這是非常扭曲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現在教育機會不平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結果使得正常的教育劣質化，就像一個社會沒有中產階級，只有兩頭，兩極化了。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大量改進、發展的不是重點學校，而是普通學校，能夠給予正常教育這樣的學校。

全社會腐敗最可怕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腐敗。我曾經說過，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為它腐敗。但是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的社會腐敗得還不夠，就是說只有官場是腐敗，譬如像文化界、教育界、知識界都還沒有腐敗，所以大家還有非常強烈的正義感， 看見政府腐敗覺得簡直是難以忍受，要起來反對它、推翻它。但現在是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是腐敗的，大家都覺得這種潛規則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覺得官員腐敗有甚麼了不起，除非是他貪得實在太多了，覺得他很可恨，但是總的說來，連教師本身都是行賄的對象，全社會都腐敗了，想要對腐敗的力量做鬥爭的健康力量日益萎縮了。所以反而現在比過去容易統治，因為社會普遍接受這樣不正常的非道德的潛規則。所以教育面臨非常大的危機，這個危機使得我們整個民族退化。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在老一點的老師還有老的想法，常常有人說你們這一代的想法跟我們可不一樣了，怎麼不一樣呢？他們說我們就比較實際，所謂「實際」，就是說可以接受一些現在的潛規則，接受一些現在的腐敗現象。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告訴我不知道怎樣教育孩子，甚至於有一些年輕的夫婦不敢生孩子，因為不知道將來會受到甚麼樣的教育。應該教育他誠實呢，還是應該教育他搞邪門歪道，如果要教育他誠實，也許以後到社會上去沒辦法立足了。還有這樣的情況，怎麼對待老師？不送禮行不行？等等。這樣的事情都使得比較有良知誠實的父母非常糾結。那麼這樣的教育制度教出來的小孩會是甚麼樣？用比較極端的話來說，一方面是培養奴隸，一方面是培養市儈。最好的也不過是培養出能出活的高級工匠，很難培養能獨立思考、有創新精神、推動社會進步的好公民，這個教育危機現在是存在的。

推薦民國元年的小學課本

想給你們推薦一個民國時期的課本，去年我發現有一套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元年的國文課本叫《共和國教科書》。民國元年就是 1912 年，那個時候還沒提倡白話文呢，所以那個國文課本是文言文的，不過是比較好懂的文言文。那時候已經廢科舉了，實行新式的小學教育，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這個六年的課本，主要是國文和修身。

這個課本第一課就寫一個大寫的「人」，就是說做一個甚麼樣的人，然後講抽象的人是甚麼，具體的人是甚麼。然後開宗明義，說學習的目的是甚麼，是「讀書明理」。做一個明理的人，就是說你這個人要懂道理。這個是當時的教育目的。這個課本的序言講教育的宗旨，特別強調是「共和國民」的教育， 要培養的是共和國民，而不是大清王朝的臣民，因為辛亥革命後建立的這個叫做「民國」。這套書的內容甚麼都有，非常豐富，但都是圍繞着這一目的 ——培養共和國民，還有參政議政的知識和能力，其中還包括做「大國民」之道，其精神大體上和我開始引的梁啟超的話差不多。（以下略，參閱〈百年中國「人」〉一文，本書第 255 頁）

這是民國元年的課本，說明我們過去並不是沒有過這樣的現代化教育，如果一直延續這樣的教育，一百年後我們的國民素質會大不一樣，就不會有人說我們現在國民素質太低了，不適合實行民主、不應該讓他們選舉，等等。

教育的核心是教師

最後我講，教育的核心是甚麼？是教師。有甚麼樣的教師就有甚麼樣的教育，教師本身就應該是好公民。因為現在教師認為的好學生可能將來不一定是好公民，所以教師應該對好公民有正確的認識。另外，自己在精神上應該有獨立性，就是你在教學生的時候應該滿腔熱情，特別想把知道的東西跟學生分享。有一個人告訴我，他有一個語文教師對他影響特別大，就是因為那個語文老師每次講一首詩或是一篇課文的時候自己欣賞得不得了，然後就拿自己的熱情來感染學生，希望所有的學生都能感受到這種美。這樣的教師是成功的教師。還有，師道尊嚴在於以身作則，你拿自己的精神力量來感染學生。要是一個老師老讓學生送禮，他就肯定沒有師道尊嚴了，學生一定不會在心目中尊重這個老師。而且一些有錢的家長就很有可能把他當作自己家的一個僕人了，很可能就以這麼一種態度對他。還有很重要的是，不要說假話，鼓勵學生誠實、守信，考不及格也沒關係，但這很難做到。

最近我看到一個消息，讓我感到非常沮喪，哪一個縣或者市我忘了，就是高考請了外地的監考老師，由於他們比較認真，把學生作弊的那些東西都給沒收了（現在是高科技作弊），引起家長造反，把那些老師給揍了一頓。而家長居然理直氣壯地說作弊是他們的權利，說如果他們不作弊的話，他們就沒有公平，所以為了要達到公平競爭他們必須作弊。這是甚麼邏輯！但是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過去作弊是很不光彩

的，我記得我們從前在學校的時候，如果哪一個學生被老師抓到作弊的話，他簡直就抬不起頭來，整個學期都很難見人了。結果呢，現在作弊變成了有理，家長居然指責老師不網開一面。如果讓大家作弊，那麼這樣的考試還有甚麼價值？但是他們認為如果不作弊的話，是對他們不公平，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普通老百姓，那些當官的不需要作弊，就已經通過其他的途徑讓子女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東西。整個社會根本不相信人可以通過誠實的勞動、真實的成績來取得他應該得到的東西，如果人人都到了這樣一個地步的話，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社會。

所以我就覺得，你們諸位都是能夠志願地到農村去教學兩年，有這樣的心、這樣的理想的青年應該都是願意為推動這個社會的改良作出自己的貢獻的。雖然現在整個社會環境問題很多，但是還是事在人為，假如有更多的人願意堅守一些其實很普通的原則，並不需要你特別大公無私，特別怎麼理想主義， 但是就是堅守某種底線，做一個誠實的人，然後把這個誠信傳到下一代，這樣的話，這個社會還有一些希望。這個也算啟蒙，就是說誠信本身也是一個啟蒙。

2013 年

百年中國「人」

2011 年，在學術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這一紀念掀起了重新審視的熱潮。有關文章、著作、紀錄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發表的對各種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見解，內容十分豐富，呈現出小小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使我對史學界和出版、傳媒刮目相看。在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書：《共和國教科書》。《南方周末》做了「中國夢」的專題活動，包括對這套書的摘評，曾邀我參加，我因時間不巧未能出席，允諾寫一篇讀後感。

這套書於 1912 年出版，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國過來人，當時尚未出生。而見報道，我的師長楊絳先生正好用過這部教科書，算起來，我的父母從私塾進入「新式」小學時， 學的也應該是這套課本。如今披讀後，不禁感慨萬千。撫今思昔，較之百年前的先輩，我們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當然是指精神、人格層面。

這是辛亥革命後出版的第一種新編小學教科書，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國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話文運動之前，所以還是文言文。而其內容，從今天的目光看，還遠未過時，其觀念甚至可以被認為「超前」。翻開首頁的「編輯大意」，就令人精神為之一振。高小課本的「編輯大意」，第一條開宗明義：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義，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粗體為本文筆者所加，下同）

寥寥數語，包含了現代公民教育的要義。請注意：最終目標為「共和國民之人格」，這是鮮明地區別於大清皇朝的臣民。

接下來幾條簡明扼要，完整地表現了「共和國」教育的特點。不忍割愛，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華固有之國粹特色以啟發國民之愛國心。三、矯正舊有之弊俗，以增進國民之愛國心。

四、詳言國體政體及一切政法常識，以普及參政之能力。

五、提倡漢滿蒙回藏五族平等主義，以鞏固統一民國之基礎。

六、注重博愛主義，推及待外人愛生物等事，以擴充國民之德量。

七、注意體育及軍事上之知識，以發揮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國民生活上之知識技能，以養成獨立自營之能力。

九、關於歷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興趣者為主，與各科無重複之弊。

十、選錄古今名人著作以養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種文體略備，使學生知其梗概。惟詔令奏議二類，非共和國所用，故不採。

初小課本的宗旨大體相同，與高小不同者是更強調「合於兒童心理，不為好高鶩遠之論」，注意循序漸進，結合生活現實，還特別提出關於花草景物的課文應預算就學的日期，按照時序排列，使兒童易於隨時實驗。

課文內容由淺入深，極為豐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歷史、科學知識、日常生活、器物常識、實用技能（如「簿記」、各種書信體等）、國家政體以及倫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貫穿其中的是「共和國國民」的精神。課文之外，還有為教師準備的《教授法》，難以一一盡述。只能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提出特別打動我的幾點：

一、第一冊、第一課，赫然一個「人」字。配圖七個人，顯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懷中嬰兒。一個「人」字，如何講滿一堂課？《教授法》中從各個方面加以說明，除書寫、讀音外，列舉具體的人的不同特點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個性、有共性。還有人與動物的異同。畫龍點睛之筆是：人之區別於鳥獸者，為「讀書明理」。試設想，一個小學生第一天背着書包上學，進入腦海的最初知識，就是對「人」的認識，接受了讀書的必要性和讀書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維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發點。

二、初級課本中充滿了日常生活常識，由家庭到社會，而且兼顧農村和城市的生活環境、勞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調、不矯情、不煽情，符合兒童心理。兼顧識字釋義，由易入難，穿插其中多有花鳥魚蟲、美景、遊戲，活潑而有情趣。不知不覺間培養一種健康、衛生、勤勞的生活方式，尊重勞動的觀念，文明禮貌待人接物的作風，還有美育、趣味、情操的薰陶。

三、從初小第七冊（小學四年級）起，即有以「共和國」、

「平等」、「自由」為題目的課文。「共和國」講國家制度結構；「平等」課講專制與共和之區別，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兩課，上一課講身體、財產、言論、居處、信仰自由，「即國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課講自由的界限，必須在法律範圍之內，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後幾冊，此主題重複出現，不斷加深。在高小的課文中詳述各種國體 ——共和、專制、君主、憲政，切實貫徹「普及參政能力」的宗旨。

四、歷史地理知識極為豐富，深入淺出。對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國家都有介紹。有一課題為「共和國模範」，主要介紹了當時中國精英心目中嚮往的那些國家。

高小一年級的課本中有兩課連續講「華盛頓」，統共不到五百字，把華盛頓其人與美國獨立的起因和過程都說清楚了，簡明扼要，十分到位。難得的是關於美國獨立，課文指出是從抗稅開始，而且稱「英僑」，而不是模糊地稱「美國人」，因為那時還沒有美國。說明當時的編者對外國歷史的把握已達到相當水平，能夠準確地在幾十個字中表達清楚：

（英國）乃徵美洲重稅，關禁甚嚴。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

英國舊律，更定稅則必由民選議員定之，因請立美洲議院，如英制。英廷不允，僑民大憤，不奉令，雖婦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與英抗。

本文特別引出這一小段文字，是因為上世紀下半葉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大陸普遍的觀念是把美國獨立納入「資產階級武裝革命」的一部分，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抗稅」的觀念對當時的國人是陌生的。直到 2005 年，我應某電視片的採訪，談到美國獨立時抗英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在播出時還被刪掉了，這可是百年前小學生從課本中學到的知識！

五、愛國與愛人類都是本教課書的重要主題。不少課文都有激發愛國情懷，提倡團結自強的內容。關於中外關係，初小四年級的課本中有三課連續講「清季外交之失敗」，把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列強對中國的侵犯以及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的經過做了扼要、客觀的闡述。

中國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國」，一切自大與自卑的複雜情結由此而來。且看此教科書關於「大國民」的定義：

所謂大國民者，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奢侈也。所謂大國民者，人人各守其職，對於一己，對於家族，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斯之謂大國民。

接下來，講述為「大國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體育的全面培養。

另一方面，愛人類的課文也多次出現，反復論述平等對待一切國家民族之人，不分膚色、種族。《修身》課本中更有好幾課講「博愛」、「國際道德」、「對外人」之道：例如「應對不可以不謹，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禮往，彼以禮來，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對於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於外人絲毫無損， 特以野蠻示人耳。」

在戰爭中對於「敵軍之失戰鬥力者」，也應以常人待之，這就是優待俘虜的原則。課文中專有對國際紅十字會的介紹。

我們不應忘記，那是列強環伺，國人深感積貧積弱之痛的時代，理所當然要強調愛國、自強，乃至專有「軍國民」，培養尚武精神之課文。但與此同時，仍倡導人類博愛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態度對待外人，培養寬廣的胸懷，而不是片面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第六冊最後以一句格言作結：「一國之強弱，視人民之德行。」

對照今世，何其難能，又何其可貴！

六、信仰自由也是重點之一，對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蘭教）諸教都有介紹，強調宗教平等，不應互相歧視。對於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學說都有簡述，並強調儒學不是宗教，老子的學說與道教也不是一回事。這些都只是作為一家之言。此外還有不少課文介紹中外歷史人物，領域甚廣，既有秦皇、漢武、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又有花木蘭、秦良玉、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南丁格蘭（今譯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從人物的選擇來看，體現了多元化的取向，並不一定代表編者的好惡。

七、特別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貫穿在課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後一冊後半部分，也就畢業班最後學的課文是「共和國公民須知」專題，共五章十五節，大約佔半個學期的課時。

（1）　「總論」給出定義：「公民者，享有公權利之國民也」，並詳述公民之資格；

（2）　「公民之權利」——自由、平等、選舉、從政；

（3）　「公民之義務」—— 納稅與公債、服兵、守法、教育；

（4）　「地方自治」—— 戶籍與警察、公益機關、公安機關；

（5）　「國家之組織」——國體與政體、立法、司法與行政。當然，小學的科目不僅是國文和修身，應該還有算術、常識（或稱「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學知識）等。不過我一向認為，國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蘊和思維能力的決定性科目。這一套國文課本不負所望，深與廣都達到一定程度。到五四運動之後，教科書大多改成白話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別是公民教育還是一脈相承。在價值觀上所謂傳統與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問題。從《修身》課本的章節看， 私德與公義並重，中國的傳統美德和現代社會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講謙謹、仁愛，又講堅毅、勇武；既講孝悌忠信，　又講尊重人權、人格獨立，而且調動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種實例。

可以想見，讀完這套書，一個高小畢業生已獲得基本文化知識、文字修養、做人的道理，並且具備現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礎上，若繼續深造，研習一種專業，無需回頭再補基礎文化課；若無力升學，進入社會，也具備了基本謀生手段和自學能力。我見到過不少前輩，或是老革命，參加革命前只讀過小學；或是後來成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規教育也不過小學或初中。但是學識淵博，視野開闊，即使歷經思想禁錮、扭曲的年代，在環境許可時，還是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這固然與他們各自的天分和後來勤奮自學有關，但也是拜那時的小學教育所賜。

這套書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主持編纂的。民國建立伊始，立足未穩，即以教育為重。1912 年 1 月教育部即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清朝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 小學讀經科一律廢除，同年 3 月，南京臨時政府頒佈《臨時約法》又規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必須從教育宗旨中刪去，所以小學廢尊孔讀經。孫中山也力主此議。由此可見，蔡元培固然主張兼容並包，連辜鴻銘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課，但是他主張自由、民主，共和政體的傾向是很鮮明的。

與此同時，在康有為推動，其弟子陳煥章主持下，掀起了強大的「孔教」運動，聲勢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較量。後來到 1917 年

新文化運動時期又有一次較量。在那以後，新學開始佔上風，「民主與科學」成為知識界的共識。平心而論， 就純學術思想而言，這種復舊的主張也不是全無道理。因為在政權新舊交替中，整個局面是很混亂的。舊的秩序「禮崩樂壞」，而新的道德倫理不可能立即樹立和普及。還有不少政客以共和為名，行爭權之實，真偽莫辯。所以客觀上呈現出來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倫失範。一部分士人懷念舊秩序， 企圖從復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體現在當時的政局上，這種尊孔運動必然符合頑固反對共和的政治勢力的訴求。所以，伴隨着這一文化上的較量，先有袁世凱稱帝，後有張勳復辟，及其隨後的覆敗。百年後的今天又出現尊孔讀經之論， 又有人提倡定孔教為國教。不知這是與甚麼樣的政治訴求相伴，是耐人尋味的。

誠然，同樣的教科書，不一定培養出同樣的人，社會環境千變萬化，進入社會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齊。但是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教育方針的指向至關重要。百年樹人，如果十年為一輪，按照這套教科書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輪輪少年的「讀書明理」的基礎，今日為生，明日為師，再加以隨着經濟的發展，　教育普及，擴大覆蓋面，到百年後的今天，人心世道會是怎樣景象？公民社會還會那麼遙遠嗎？

現實中，一方面瘋狂拆除歷史遺跡，任意塗抹屏蔽歷史； 一方面又大肆宣揚復古，動輒兩千年，甚至五千年。為甚麼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時代才算是中國文化？我常說「愧對先賢」，就是我們沒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繼續向前，而是像俗話說的「狗熊掰棒子」，拿一個，掉一個，永遠積累不起來。甚至捨珠璣而揀瓦礫。而曰，向世界弘揚中國文化。其可得乎？

2012 年

國家興亡，匹夫無責

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長期流傳，「天下」被改成了「國家」。這不是顧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 顧炎武的原意是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無責的。按《日知錄》明明是這樣說的：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 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這段引語中間刪節處是批評魏晉之士無父無君的話。這是顧炎武的儒家正統思想。姑存不論。他的本意很清楚，「國」指的是政權，政權的興亡，也就是改朝換代，那是在位的皇帝與大官們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統，用現在的話來說，是民族精神，社會正義，那是「匹夫」有責的。顧炎武說這話的時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將亡之際，有一些士大夫已經紛紛降清，如錢謙益之流。顧對此十分憤慨，認為統治者荒淫無道把政權給折騰完了，我們沒有責任，但是「匹夫」應該堅守的是道義原則， 不論誰入主中原，這一原則不能變，也就是「士」的氣節。其實他所謂的「匹夫」還是指士大夫，只是暫時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車賣漿者流也是無法負起這種道義責任的。

從何時起「天下」變成了「國家」呢？我沒有考證，估計大約在晚清時期，眼看列強環伺，清政府無力保國，民間仁人志士蜂起，不論是否喊出這一口號，心中都存此意，認為挽救國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謀之，需要民眾擔起責任。那時的「國家」絕不是滿清朝廷，而是中國的疆土，實際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權、民主、憲政等概念輸入之後，這種「匹夫有責」的觀念導向了通過革命，推翻朝廷來救國。

根據我自己的切身經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流傳最廣的時候是抗日戰爭時期，那時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這個口號確實深入人心，而且覆蓋到每一個人，包括販夫走卒，農夫農婦，此時「天下」和「國家」是合而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愛國主義、民族氣節與現實的保衛主權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時期。然而在平時，細想起來，在專制制度下，「匹夫」對政事既無知情權，又無參與權，如何能負起責任？責與權應該是相對應的，這是公民社會的觀念，與顧炎武所處的時代不同。不過顧炎武也已認識到，國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謀之，「匹夫」是無法負責的。至於道義上的擔當，也就是他所說的那個「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當於知識分子）都是引以為己任的。為捍衛自己認定的真理或道義原則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證。專制統治者一方面剝奪民間人士為「天下」負責的權利，遇到危機

時卻又要他們對「國家」負責，其得可乎？

還有，顧炎武所說「率獸食人」，當然不是真的有人領着野獸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可悲的是，這種現象還沒有完全成為歷史，顧炎武如看到那些講究的「寵物醫院」，同時許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會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獸食人」，至少也由於「仁義充塞」之故，當屬「天下」範疇， 因此應在「匹夫」責任之內。但是，我輩「匹夫」怎樣對此負責呢？

2010 年

為實現「為民喉舌」的神聖職責而努力14

在美國，新聞媒體已被公認為堪與「三權」並列的「第四權」。筆者在論述美國二十世紀的漸進的改良時，曾把社會批判運動列為這種改良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其中報刊媒體又是社會批判的主要載體。

中國的傳統中是沒有「大眾傳媒」的，新聞成為一個行業是舶來品，是近代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從西方引進的先進事物之一。的確是「先進事物」，因為幾千年來，中國統治者實行的是愚民政策，老百姓從來不知道甚麼叫「知情權」。

民眾知情是民主的基礎

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名言：

在一個文明國家，若指望在無知中得到自由，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決辦不到。

這主要是指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同時也使用於新聞事業，所謂informed public。

傑弗遜另一句名言：

若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新聞業的出現源於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所以西方早期的辦報人多為印刷商。造紙和印刷都是中國人最引以自豪的對世界的貢獻，這點西方國家也都承認，並且有活字板印刷是馬哥波羅（Marco Polo）傳到歐洲去的之說（儘管此說不一定可靠）。但是新聞報紙的發展，中國卻大大落後。顯然，印刷術是必要條件，卻不是充足條件，更重要的是印甚麼，給誰看。以公眾閱讀為對象的新聞報刊與公眾參與的需要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早期的改良家也從開啟民智做起。嚴復是主張最力的。「民智之不開，何以共和為」？王韜對引進新聞事業起了開創作用。像康、梁等都辦報紙。所以報紙第一個作用是開啟民智。讓老百姓了解情況才能參與和監督。

新聞業的發達對普及（廣義的）教育、開啟民智起着重要的作用。歐洲人認為美國能如此迅速地在全國範圍提高啟蒙水平是有魔法相助，這一「魔法」就是印行報紙。報界的力量並不在於以意見勸服他人，而在於傳播信息以及喚起人們對或深刻或膚淺的問題的興趣。美國早期拓荒者經常處於遠離文明的邊遠地區，他們每到一處首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學校、三是郵局。報紙就是通過郵局送到每一個拓荒者手中的，而且價格低廉，使窮人都讀得起。今天，我們把印刷品的郵費低於信件視為當然，殊不知它的創始者是本傑明 •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任郵局總長時制定一項政策：報紙編輯可以在郵局免費交換各自的報紙，報紙的郵費低於成本，並使郵局定期為報刊服務。這樣，分散的人群可以互通消息，這是在美國立國初期把分散而脆弱的民族團結起來的幾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充分的言論自由是輿論監督的保障

我在《冷眼向洋》中寫過一段話：

輿論真正能起監督作用的關鍵在於是否有充分獨立的言論自由，這種言論自由是公開的，受到憲法保障的，適用於每一個公民，任何人不得壓制。這與某些意見只許「內部」說，說給皇帝一個人聽，或只供決策者參考，聽不聽在他， 有本質的區別。誠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這個世界每一個毛孔中都帶着血污，那麼，言論自由就是其淨化劑。可以說資本主義從誕生起就伴隨着對它的批判而成長……這一源於歐洲的傳統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在美國得到充分發揮。這種批判形成一種拉力，使美國不至於滑向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

不過這種不受壓制的監督權即使是在西方國家也不是自然而然得到的，是經過長期鬥爭而獲得。早期歐洲報業曲折的發展史正是與反對專制、爭取自由民主的進程同步。權力集中的專制王朝有必要也有可能對出版和公眾輿論嚴加控制。王室的原則是：要確保「安定」就必須對異見人士進行鎮壓。從 1534 年英國亨利八世首創「許可證」制，即印刷商在開張營業前必須先獲得皇家的許可，到 1702 年出現了第一張具有現代報紙要素的英文報紙《每日新聞》（Daily Courant），中間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戰爭、宗教革命、貴族造反、國王統治削弱、政治分化，特別是資本主義興起，出現公民社會，經過許多先進人士的吶喊和不屈不撓的努力，包括許多報業人士因「煽動罪」而坐牢，新聞報刊得以在日益擴大的夾縫中衝破障礙，發展壯大。其間詩人密爾頓（John Milton）的「論新聞自由」成為新聞史上的不朽篇章。

人們有理由認為，既然在英國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已經有了一定的成績，那麼，對那些為爭取信仰自由而到北美大陸的殖民者說來，新聞自由理應不成問題。事實卻不然。從十七世紀後半的殖民時代到美國獨立之後的一百年間，新大陸的出版和新聞業不斷受到權力的干涉和壓制。因為，「新聞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而對於在位者，運用手中的權力予以壓制是很難抵擋的誘惑。當然，與王權專制政府不同，還得有法律依據。在早期的美國，政府運用的武器還是來自英國的「煽動罪」和「譭謗罪」。因此，美國現代新聞報刊也是在與政府干涉的鬥爭中成長起來，而且同法律的完善過程相一致。在反抗英國爭取獨立過程中，革命的輿論應運而生， 出現了一批報紙和小冊子，以自由的名義宣揚獨立的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恩（Thomas Paine）撰寫的《危機》（Crisis） 和《常識》（Common Sense）。獨立之後，那些高呼「不自由， 毋寧死」的開國元勳們成為執政者。他們如何對待反對自己的輿論，關係到美國向何處去的選擇：是繼續進行社

會變革，把那些戰鬥口號付諸實施，還是把財產權作為最根本的考慮來鞏固自己的政權。美國的憲法是二者妥協的產物。但是緊接着保守派作出的一個重要讓步 —《權利法案》（即第一修正案）的通過 ——至關重要，因為它保障了言論出版自由。沒有它，就沒有以後如此發達的新聞業。儘管如此，在實踐中還是經過曲折鬥爭的。以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亞當斯（John Adams）為首的聯邦黨人與民主派傑斐遜的對待新聞自由從一開始就代表了兩種理念。聯邦黨人控制的政府於 1798 年通過

《外僑法》和《煽動法》，以此來限制對他們的批評言論。這一政策遭到以傑斐遜為代表的民主派的抨擊。

《美國新聞史》的作者邁克爾• 埃默里（Michael Emery）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新聞出版自由的發展史告訴人們：新聞出版事業是屬統治者的。假如權力集中於一個君主或者一個精英集團之手， 那麼對於公眾來說，就根本沒有必要去了解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信息和觀點。的確，提供消息（新聞）給公眾，事實上會釀成對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威脅。因而在這種制度下，新聞報道必須嚴格限於消遣娛樂，或是不痛不癢的評論。另一方面，如果公眾參與政治，那麼他們必須有機會了解與其在政治體制中的地位相稱的信息。

從這段歷史中還可吸取另一條教訓，那就是：一個政府越是鞏固，它就越不怕別人挖它的牆腳，它給予新聞報道的自由就越多。直到目前為止，情況依然如此。15

輪到傑斐遜當選為總統之後，他對待反對政府的輿論是否「叶公好龍」，才是對民主理想的真正考驗。須知那時的反對言論並非溫文爾雅的說理，而是包括無所不用其極的惡毒漫罵乃至人身攻擊，並且對公眾是有影響的。這種攻擊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總的說來，他還是忍了下來，堅持「保護他們撒謊和譭謗的權利」作為對民眾判斷力的信心的考驗，「看一看不借助強制，光憑自由討論，是否不足以宣傳和保護真理，是否不足以使政府在行動和觀點方面保持純潔和正直」。當然，百分之百做到這一點也不大可能。特別是過去的法律還沒有廢除， 在忍無可忍時，傑斐遜也曾援用有關法律把一名記者以「誹謗罪」告到法庭，並且勝訴。有意思的是，為這名記者辯護的律師卻是漢密爾頓。儘管最後敗訴，但漢密爾頓提出的原則：報界「有權利本着善良的動機，為了正當的目的，發表事實真相而不受懲罰」，幾年以後成為法律，確立了「只有事實真相才可以用於誹謗訴訟辯護」的原則。1812 年最高法院宣佈聯邦政府不得依據舊的法律對新聞界提出起訴，至此，英國習慣法中關於「煽動性譭謗」的影響完全退出了美國。這是向前進了一大步，把政府與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從此新聞界對政府以及上至總統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對私人一樣，只看是否屬實，不存在「煽動」或危害社會的問題。

南北戰爭期間以及戰爭結束之後，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也面臨類似的考驗：主要問題一是對戰事的報道是否實行檢查；二是如

何對待一切有利於「敵方」（特別是分離主義） 的言論。那時新聞業已很發達，在國內政見分歧極為尖銳的情況下，對林肯及北方軍的攻擊十分激烈，就是在戰爭結束以後，儘管北方獲勝，輿論並不利於林肯一方。在軍隊堅持下， 內戰期間是實行了新聞檢查，不過林肯還是堅持了他對言論自由的信仰，多次取消被軍隊處罰的報紙的禁令。事實上，南北戰爭中對戰地記者的限制是所有戰爭中最少的，劃定的唯一界限是不向敵人洩漏正在進行的作戰部署的機密。事實證明，記者基本上能夠自律，沒有發生過洩密的情況，而許多載諸史冊的優秀戰地報道由此脫穎而出。書中沒有提到的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越南戰爭時，約翰遜總統（Lyndon B. Johnson）又面臨同樣的抉擇：對於強大的反越戰的媒體攻勢和群眾運動是否加以壓制。那時可以動用的是危害國家安全法，但是他沒有這樣做，據他後來自己說，不是沒有人建議過，但是他對麥卡錫主義記憶猶新，不願出現那種歇斯底里氣氛。

美國媒體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

美國一直是兩黨制，社會思潮也在偏右的保守派與偏左的自由派之間搖擺，新聞界自然也反映各種不同的派別取向，早期的報刊政黨色彩更加鮮明。不過總的說來新聞界的主流率多為自由派，宣揚自由、平等、人權的價值觀，為弱勢群體伸張正義。自有新聞工作以來就有社會改革精神。「在美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當需要喚起公眾輿論來保證經濟、政治的進步和一種更公正的社會模式時，新聞和文學起到了它們的作用，並從中產生了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例如獨立前的吶喊、最早的廢奴主義言論和長期對種族歧視的揭露和抨擊、二十世紀初期的「扒糞」新聞和文學、六十年代的反越戰和民權運動中的「五角大樓文件」的揭露以及兩名新聞記者頂着各種壓力鍥而不捨， 把他們認為破壞了基本民主規程的尼克松總統拉下馬，等等。其中特別是二十世紀初期，新聞界同文學家、政治家、勞工領袖、改革家鼓動家、教授、牧師以及社會慈善工作者一道，對「淨化」日益走向腐敗的美國政治和制止兩極分化的惡性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造成了美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進步主義」時期，新聞工作者獲得了「人民鬥士」的美譽。

這裏講美國。實際上這一傳統還是來自歐洲。1989 年BBC 紀念The Spectator 250（？）周年，電視上相繼播出自雜誌問世以來一連串的首相的肖像，直到當時在位的撒切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一個個頭像出來時都面帶笑容，然後慢慢皺起眉頭，變得愁眉苦臉，都是因為看了那雜誌。也就是說， 這份雜誌最驕傲的就是能使每一位最高執政者頭痛。說明媒體的天職是報憂不報喜，是批評而不是歌頌。任何一個社會，腐化現象總是免不了的，權力、財富都足以導致腐化。我們常有印象，西方國家「醜聞」不斷，其實有「聞」就有希望，因為「醜事」是免不了的，怕的是沒有醜聞。我想是不是可以有這樣一個公式：

社會自我調節程度 = 醜聞 / 醜事 x 時間係數

也就是社會黑暗面被揭露出來的比例越高，社會越有希望。還要加一個在一定單位時間內的條件。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再曝光就是另一回事，只能起歷史借鑒作用了。這就是輿論監督作用，可以叫作社會的淨化劑。

屈從權勢與商業化對媒體的腐蝕

另一方面，如果認為西方的新聞媒體有了言論自由就一貫堅持真理、主持公道，那也不符合事實。反面的因素有多種， 就對抗權勢而言，固然有法律的保障，但是無形的社會壓力和個人或報紙的利害的考慮總是存在。在某種政治形勢下，使多少人由於恐懼而不敢自由地發表言論；或者在利誘之下，轉而與本應反抗的對象合作，這兩種情況時起時落，只是在多數情況下是無形的。不過，促使媒體墮落的最大的內在拉力還是商業化因素。北美大陸的報紙從一開始就是為傳播和交流商品信息而出現的，也就是後來的廣告。在它的發展和普及過程中從未離開過廣告商的支持。這與發行量當然相輔相成。爭取讀者有兩種取向，一是靠提供鮮為人知的與大眾利益攸關的事實真相，並作為公眾的喉舌發表犀利的社論和評論；一是迎合低俗的趣味，靠暴力、煽情、揭人隱私以及言過其實的商業廣告， 所謂「黃色新聞」由此而來（這裏「黃色」不一定是色情，但包括色情），後來發展到追星的「狗仔隊」等等。從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報紙開始平民化時，後一種傾向就日益發展。不過有時與前者合二而一，達到同樣的效果。例如「扒糞」新聞一方面出於主持正義，同時也迎合小市民對富人政要的秘聞隱私的興趣。只要是符合事實的，都無可厚非。當然，美國新聞界也存在對黃色新聞的批判，稱這類報館為「把青年訓練成永遠遭人唾罵的人」的「地獄」。《紐約時報》就是在這種氣氛中異軍突起，開闢了另一種模式：不靠煽情、噱頭迎合大眾，而要用一種簡明動人的方式，「用文明社會中慎重有禮的語言」來提供所有的新聞；並且使報紙的各欄成為探討一切與公眾有關的重大問題的論壇。目前一些全國性的嚴肅的大報和一些摒棄廣告的純新聞或教育文化性質的電視台就代表了在這條道路上的努力。

問題是：在新聞界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為營利而不擇手段、不顧事實、不問社會效果、喪失新聞道德原則的現象難以遏制，特別是在電視出現之後，受眾不是通過閱讀而是視覺形象，低俗化和節目讓廣告商牽着鼻子走的情況就變本加厲。媒體培養公眾口味，反過來又需要加以迎合，這種惡性循環有可能把社會淨化劑的角色變成社會腐蝕劑。還有一個新的因素，就是媒體由個人或家族決策變為公司決策，其本身也是產業權勢的一部分，這樣，利益的考慮更加容易壓倒從業者的個人操守和傳統原則。在多元化社會裏各種利益集團也有自己的喉舌。在好的方面，代表健康的不同聲音的爭鳴，在惡性發作時就走向極端。至於真正底層的老百姓能得到媒體的關注還是比例很小的。

美國媒體對國際事物比對國內事物更加缺乏客觀公正。除了越戰後期外，對於美國對外的征戰以及我們稱之為「霸權」的行徑，主流媒體

的態度往往是附和或推波助瀾。二十世紀初在美國開始向外擴張時，美國媒體是「顯然天命」論的鼓吹者； 二十年代的「恐赤病」與五十年代的冷戰，涉及反共主義，很少有冷靜客觀的報道。例如對中國的報道在尼克松訪華前幾乎一邊倒全是負面，尼克松訪華後轉變又比較明顯；「另類」刊物當然也有，例如《民族》周刊一直特立獨行，還有一些左派刊物，但是處於絕對劣勢。又以當前為例：對於以「安然事件」開頭的美國公司腐敗問題，美國媒體甚為關注，有許多對布殊政府尖銳的批評；但是對於美軍轟炸阿富汗平民的婚禮這樣嚴重的事件，以及事後軍方傲慢的態度，很少見到義憤和公正的批評。又如「李文和事件」，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主流媒體一馬當先大肆炒作，美國公眾幾乎家喻戶曉，而等到判定是冤案之後，卻悄然無聲，也很少媒體置疑這種做法的違反民主原則。現在對打伊拉克問題，雖然也反映不同的意見，但是其比例是不相稱。卡特（Jimmy Carter）這樣一個人物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大事，媒體興趣就不大，一筆代過。美國新聞業雖然已經居於世界頂峰，美國的影響在全球無處不在，但是美國一般公眾從美國媒體中卻難以得到關於外部世界客觀、完整的信息。究其原因，新聞從業者本身的意識形態和利害關係兼而有之。

當前，從美國揭露的公司腐敗的冰山一角來看，從小布殊政府對內政策全面右轉、對外空前的一意孤行（即所謂「單邊主義」）來看，從美國社會問題嚴重、兩極分化有增無減來看， 似乎美國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需要再來一次「進步主義」運動的衝擊、淨化，達到改革。美國媒體是否還能發揮當年的作用，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還有足夠的活力自我完善，都面臨考驗。再說，新聞媒體現在自己已經是一方權勢，而且是產業集團，那麼也就會遵循權力造成腐化的規律，其自身也有一個淨化問題，誰是監督它的有效力量呢？

西方媒體對我國的影響和啟示

遠的不說，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媒有很大進步。主要表現在觀念的更新，有了輿論監督的概念，也初步出現了這種版面和電視節目；真話率大大提高；信息量大大增加；從業人員的素質水平也與以前不可同日而語。決不是貶低老新聞工作者，但是形勢不同，過去沒有「搶新聞」的觀念，搶了也沒用，只能按一個來源、一種說法發。例如焦點訪談的記者冒着生命危險明查暗訪，還有一些專為弱勢群體講話的報紙和記者，很令人感動。這些都是以前不能想像的。當然舊體制的束縛還頑強地存在，眾所周知。

現在要講的是外來的負面影響，我認為主要是商業化的問題。西方媒體的獨立和言論自由，我們尚不能完全引進，但是商業化的負面效應，讓市場和廣告牽着鼻子走卻已經不可阻擋。特別是電視，對億萬人的潛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現在有兩個極端，一是沒有人看，甚至令人生厭的所謂「主旋律」節目，同以前的教條主義一脈相承；另一頭是高度商業化，只問收視率，也就是廣告率，迎合低俗品味的節目。由

於廣告佔據各種節目，包括天氣預報，的比例越來越高，有喧賓奪主的趨勢，廣告的內容和形象的影響就很重要。這點，我認為我們各電視台比之西方所佔的份量和所起的負面作用要大。

我國國情與西方不同，因為教育不普及，又長期閉塞，開啟民智的任務較重，其中媒體應負一定的責任。連農村不上學的兒童也能看到電視。一個嚴重的任務是反封建。向甚麼方向引導，建立甚麼樣的觀念。我感到電視文藝節目在這方面問題很大，有意無意宣揚封建思想。那些辮子戲、宮廷戲批評意見已經很多，不過沒有用。就是現代題材，甚至自以為是宣揚主旋律的，也是事實上貫穿封建、落後、專制的觀念。例如一切寄希望於第一把手的清官，例如婦女的角色和地位。媒體的自我吹噓並不反應全面意見。本來報紙、電視是天下之公器，卻用來炒作自己。

不公平競爭：如果說媒體逐步推向市場不吃皇糧是方向， 那麼應該有公平的競爭。如果完全放開的話，健康的、高品味的媒體不見得沒有讀者、觀眾和市場，如當年《紐約時報》以獨家新聞和嚴肅題材的獨到見解、尖銳的評論戰勝黃色報紙，　贏得讀者。但是我們一頭是受控制的，另一頭是放鬆的。既在經濟上推向市場，又沒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就使媒體難以健康發展。

最後，我也不主張休克療法，一下子甚麼都揭發出來，也像西方媒體那樣報憂不報喜。因為國情不同，老百姓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如果一天醒來一看到處都是兇殺、黑幕以及領導人的醜聞，可能真的會人心大亂。就像八十年代放寬物價一樣。我國人民幾十年來都沒有經歷過物價波動，老一輩的有國民黨垮台前夕的物價飛漲的經歷，所以稍微動一下就引起搶購風， 後來慢慢過渡，現在就不怕了。所以輿論放開也需要逐步實現，但是方向是明確的，既需要上面的開明政策，也需要從業人員的敬業和勇氣。

2003 年 4 月

與師友同遊水木清華

——《世紀清華》序

本書編輯田苗女士囑我寫一篇序。出於對母校的熱愛，並為田女士的至誠所感動，我不假思索一口應承下來。及至真的動筆時，卻不勝惶恐起來。那《世紀清華》所包含的業績是何等豐富，何等恢宏！就是這一篇篇文稿的作者，以及文章所回憶的人，其中有許多名氣也大得嚇人，好多是世界級的：從國學、史學、哲學大師到不朽名著的作者，從中國「兩彈之父」到諾貝爾獎得主，還有多多少少在某一個領域內作出里程碑式的貢獻的傑出人物，何況還有季羡林先生華章在前……這樣想下去就只有打退堂鼓了。但是我終於沒有，最主要的是因為在翻閱這些文章中深深為那些樸實無華而感情真摯的文字所打動，同時也使我換了一個思路：權當是老校友聚會談心。

我常覺得老校友聚會是最放鬆，最平等，最率真的場合。可以忘俗，可以忘年。「忘俗」是忘記各自的身份、地位、境遇、名望等等，唯一的身份是校友，共同的關係是同學，大家在一起，超越世俗的、人為的界線，坦誠相待，暢所欲言；「忘年」是越過歲月的風塵，回到青少年時代，有時還激發出童心，爭相追敘那錦繡華年，老師的音容笑貌，同學的趣聞軼事，還有校園裏的一草一木，相互勾沉，相互感染，有說不完的故事，引起對母校的無限思念和眷戀，真的是春風化雨，終身難忘！這正是我讀本書的文章的感覺，正如幾代校友的一次大聚會，各抒胸臆，表達對母校的真摯感念，又如與許多不論是否謀面，卻神交已久的師友同遊水木清華。此時此情，使我驀然想起一段往事：

七十年代末，有一位闊別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清華故人不期而至，探望正在病中的我。那時大家都是劫後餘生，但又餘勇可賈，在新時期的曙光中期待着再有一番作為。在共敍往事之中，那清華園的歲月顯得格外的燦爛、鮮亮。事後情不能已，在日記上寫下了以下的文字：

……錦瑟華年，恍如隔世，而往事歷歷，宛如昨日。驚流光之飛逝，覺此生之須臾，歎人事之滄桑，恨聚散之無常，感故人之不我忘，惜來去何太匆忙。又喜歷盡坎坷而赤子之心未泯，昔日豪情猶存，而今而後，庶幾可以有所為矣！　……思緒萬端，不能自已，捉筆填詞，辭不達意，聊以遣懷於萬一耳。

清華園內少年遊錦繡歲月稠

揮灑書生意氣花落不知愁

陽關唱，管弦休，水東流

今夕何夕，共此燈光，別夢從頭

東風何事催白頭壯志今須酬

嫵媚不讓春色

芳菊傲霜秋

重試手，展風流，與誰儔

夕陽無限，肝膽依舊，心照神州

（調寄《訴衷情》）

實際上當時我們還屬中年，說「夕陽」有些誇張。從那時起，又過去了近二十年，真的是「夕陽」了。今天從塵封中翻出這篇「私語」來，皆由於本書的篇章所引起的強烈的共鳴， 感到以上的文字似乎有普遍意義。各篇作者除了少數外，大多是白髮蒼蒼的老者，而字裏行間所流露出的卻是「赤子之心未泯，昔日豪情猶存」，想見他們的精神風貌，當是「嫵媚不讓春色，芳菊傲霜秋。」常有人問：甚麼是「清華精神」？很難用幾個字來概括，但是我想，這種在心靈上永遠年輕，壯志豪情永不衰退，總是有所作為的特點應該算得是「清華精神」的一部分。和全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清華師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經歷過各種苦難和艱險，即使在抗戰遷校那樣艱苦卓絕之中還能治學不輟，成績斐然。個人遭遇儘管坎坷，但是只要一有機會，就如一首歌詞所唱：「跌到算甚麼，爬起來再前進。」遠的不說，在我國「史無前例」的浩劫之後，進入新時期的近二十年來，清華老學人「重試手，展風流」，又做出多少新的業績，而一代新的清華學子也已脫穎而出，正躋身於世界潮流中大顯身手。

處中西文化之交匯點，不斷求知、求新，是清華一大歷史傳統。中西文化「聯姻」的甘苦成敗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 本書徐葆耕先生文有獨到的敍述。無論如何，正如徐文中所舉的，從梁啟超、王國維到馮友蘭、錢鍾書等等一大批學貫中西的通人曾在清華園中孜孜以求，在催生現代中國文化的艱苦努力中厥功甚偉。清華園曾經擁有在這方面這樣為數眾多的大師不是偶然的，也是清華歷史上光輝的一頁。至於理工科方面群星燦爛，趕超世界新潮流，更是清華的強項，始終保持前沿地位，這是毋庸贅言的。

對於大學的功能應該是甚麼，有種種說法，我比較贊同的提法是：一則培養有獨立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一則培養各行各業的專門家。後者所有大學都應而且都能做到，前一種功能則很難說，而清華大學原來是具備這兩種功能的，只要把本書的文章作為總體來讀，就能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在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積極匯入世界前進的大潮的今天，衷心祝願站在時代前沿的母校能繼續不負眾望，恢復和發揚這兩種功能不偏廢的傳統。

費孝通先生一篇文章中提到馬約翰先生所提倡的

「sportsmanship」和「teamwork」，也可以算是清華特色之一。凡是老清華都對馬約翰先生的體育課印象深刻。當時大約中國的大學中沒有哪個這樣重視體育，強迫鍛煉的。也沒有哪個體育教師對體育賦以這樣豐富的含義和崇高的精神使命的。其用意顯然是要一掃「文弱書

生」的形象，轉變傳統的重智輕體的教育思想。同時這兩個英文字加在一起所代表的一種精神，我體會就是現在常說的「團隊精神」，這是與「一盤散沙」相對立的，也和懶散、頹唐、陳腐無緣，而是朝氣蓬勃，團結向上。這是我當年在校時就有的感受，這也是清華精神常新的表現之一。

清華精神當然不止這些，有許多可意會而難以言傳。這種精神及於海外。我初次訪美時就驚奇地發現美國竟有那麼會員眾多而積極活動的清華同學會。八十年代初，我在紐約參加過一次頗為盛大的同學聚會，那時我國駐美大使章文晉和公使冀朝鑄剛好都是清華校友，成為會上的嘉賓。與會者從一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畢業生都有，大家齊唱清華校歌，人人為之動容。最老的學長之一顧毓琇先生作主要發言，大講清華個性，他強調的是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爭取成功的精神，給我印象很深。

本書的文章看似駁雜，隨意，內容卻極為豐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許多是大手筆寫小文章。如果從布勞岱爾年鑒派史學的角度看，也可以當作本世紀的一個歷史側面來讀。也許有的讀者會覺得作者多半是老人，為甚麼不在年齡上有所兼顧呢？原來起意編這樣一本文集並非是為了某個特殊的紀念日， 而純粹是出自田苗女士的興趣和一片熱忱。收入的文章也不是專門約來的，而是編者不辭辛勞從校刊和其他刊物上一篇篇收集起來的。文章的作者正好老人居多，是客觀現實。我想這也是自然的。記得有一次清華返校節上聽人說，最熱心返校的有兩種人，一是剛畢業的一兩屆，因為熱乎勁還沒過去；一是接近或已經退休的老校友，到了懷舊的年齡，加倍珍惜老友相聚的機會，也更容易有追憶逝水年華的心情。而正當盛年的中間一大批則散見於五湖四海，各自投身於自己的事業，自然很難有這種時間和心情。我想，寫懷念文章也同此理。除此之外， 香遠越清，陳酒更醇，經過歷史的沉澱，隔開一定的距離，許多深層的底奧，內在的美，可能體會更深，這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時所無法理解的。總之，這些文章決不是應景之作，都是有所感而發，是最自然的真情流露，反映出一片赤子之心。這正是這本集子最可貴之處。

當然，清華園裏並不全是像這本書裏所反映的那樣只有桃李芬芳人文薈萃。人們在回憶往事中總願意敍述美好的篇章，　而把創痛深深埋起，這是人之常情。但是有一些重大歷史是不應被遺忘的，例如在十年浩劫中清華之被蹂躪、被破壞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這是應作為「校恥」來紀念的。在這裏提到這一點似乎有點殺風景，但是這段歷史我們無權忘記，因為它不屬於一校，而與整個國家民族息息相關。

最後，我願以書中深深打動我的，一位學長的短文中的兩句話作結：「為學在嚴，為人要正」。這就不僅是清華人，而應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座右銘了。

1998 年

愛國的坐標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提倡愛國，但是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像近代中國那樣以之為最高道德標準，尤其對知識分子來說「民族大義」高過一切。中國古代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國家」的含義隨時代而異，「愛國」和「忠君」緊密相聯。應該說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是鴉片戰爭之後被列強的炮艦激發出來的，所以愛國也有了新的內涵，那就是面對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何以自處，何以自救。在這一時代命題的召喚下，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的半個世紀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從事各種革新探索的思想家，學術討論終於跳出了「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圈子， 也可以說是自春秋戰國以還第一次出現了接近於百家爭鳴的局面。對於這一批人物，站在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在中國人又經歷了一次災難性的閉關鎖國之痛，再次帶着複雜的心情面對世界的時候，我們用甚麼標準來衡量誰個進步，誰個反動，誰個愛國，誰個賣國，也就是把坐標放在哪裏給他們定位？如果說「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那麼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了。相當一個時期以來這個問題一直沉浮於我腦海中，近讀《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袁偉時著，海天出版社，1992 年 12月版）一書頗受啟發，史學非我專，不敢妄寫書評，只是借此抒發一些久積於胸之見。

抵抗侵略、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這是每一個愛國者的本能。但是當時嚴酷的現實是敗局已定，中國已無可否認地落後了，惟有反躬自省奮發圖強才能自救，而圖強之道又恰恰需要向給自己造成了這麼多痛苦的西方列強學習。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有識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之間的區別以及他們的不同遭遇正在於這「不同程度」：中國究竟落後在哪裏？在當時力量懸殊的形勢下如何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對自己最有利；如何全面、客觀地認識西方國家；學甚麼，改甚麼才能徹底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推動歷史前進，這是衡量每個人的言行主張的坐標。一系列的人物：魏源、林則徐、郭嵩燾、徐繼畬、王韜、鄭觀應、洪秀全、洪仁玕、曾國藩、李鴻章等等都要以這個坐標重新定位。

《晚清》一書從林則徐與郭嵩燾的榮辱對比開端，層層深入。林則徐是偉大愛國者，也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史有定論。他除一度遭貶抑外，生前身後備受尊榮。但是比他晚二十年走上歷史舞台的同樣也是堅決主張禁煙並積極參加兩次反侵略戰爭的郭嵩燾，命運卻大不相同。他生前遭到朝野的非議，戴着「媚外投降」的惡名鬱鬱以終，直到今天的某些歷史著作中對他仍有貶詞。二人差別究竟何在？事實上，正是由於郭嵩燾晚了二十年，對中國的根本弱點認識更加深刻， 主張向西方學習方面更為徹底，走得更遠。作為第一任駐英國公使，他有機會親眼考察西方國家，最終痛苦地得出了中國不但在物質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教養上全面落後的結論。他徹底改變了幾千年的夷夏觀念，甚至說西方「視中國亦猶三代之視夷狄也」。這在當時可謂石破天

驚，怎麼能被接受？他還認定英國之強，在於其立國之本是議會民主制加民選市長制，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二者相輔相成以成其富強， 而造船、制器等等又是「其末中之一節」。凡此種種不但主政者聽不進，也遠超過傳統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觀念。所以他報送朝廷如實記錄他所見所聞的出使日記，不但沒有起到應有的振聾發聵的作用，反而在大臣中痛遭詆毀，竟至政府下令毀版也就不足為奇了。

實際上在郭嵩燾之前與林則徐同代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已經批判了華夏中心論，已經認識到朝政的腐敗不在於明主還是昏君而是制度問題，並對西方民主有了模糊的嚮往，不過當時他的言論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就免去了因此獲罪。與郭嵩燾差不多同時的王韜、鄭觀應、馮桂芬、薛福成以及第一個留美歸國的容閎，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相同的思想。他們在向西方學習問題上的主張歸納起來就是說，西方的長處並不止於物質文明，同時也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中國要改革應學其根本，包括改革政治制度。不過他們本身是傳統的士大夫，而且為了能為當世所接受，都煞費苦心儘量從傳統文化中找依據。王韜提出了東西方「聖人之道」相通的理論，而且說「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受欺凌之後能夠看出對方所恃之強正是實現人類共同進步的條件，這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是何等的眼光和識見！當然他不可能與差不多同時代生於歐洲的馬克思那樣提出人類發展普遍規律的理論。

另一個不斷遇到的問題是主戰與主和之爭。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郭嵩燾、王韜、徐繼畬等人都是基本上主張對列強以和為主的方針，避免主動挑釁。其所根據的第一個前提是敵強我弱的態勢，要奮發圖強也需要時間，這是和的必要性；第二個前提是對西方國家對華政策目標的估計，他們的基本看法是認為西方國家確有「囊括四海」的野心，但是其手段是通過貿易，對中國的基本要求在於通商求利，而不是滅亡和佔領。從這一估計出發，中國「迎其機而導之，即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為我用」，這是和的可能性。再進一步是與外國交往中占不占理的問題。侵略與被侵略者之間有沒有理可講？郭氏仔細研究釀成「夷禍」，一辱再辱的慘痛經驗教訓，發現清政府處理失當，站不住理之處甚多：

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

這幾句話擲地有聲，生動地概括了清王朝外交的昏庸和進退失據，《晚清》用了「泣血自省」字樣，確實道出了郭氏深切痛苦的心情。

這裏涉及一個具體問題：對於已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該不該遵守？中國過去盛時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國之道是否還適用？揣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條約是戰敗後被迫簽訂的， 那麼這一條約也就是當時力量對比的紀錄。更何況它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戰場上的軍事強弱之勢，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 改變之道在於先自圖強。同時，即使是不平等

條約，也是國家信譽所繫，今天簽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禍又必然進一步失去尊嚴。例如僧格林沁誘擊根據《天津條約》而來的英國船之役，一時「天下稱快」，結果招致一八六○年第二次英法聯軍，造成更加慘重的破壞，最後續訂更加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對於僧氏之舉，從郭嵩燾到曾國藩都曾強烈反對，曾國藩甚至認為他闖下這麼大禍「義當殺身以謝天下」。但是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世，僧格林沁氣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認為是愛國義舉，雖敗尤榮，而郭、曾的見解則有提倡媚外降敵之嫌。問題在於審時度勢，靠這種突然襲擊，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扭轉局勢推翻剛剛簽訂的條約？誰的主張更能保護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損失？如果不從意氣出發而以理智的負責的態度考慮，答案應該是清楚的。

由此派生出的問題是：群眾性的排外行動與同仇敵愾的民族正氣如何區分？英明的統治者應善於區分不同情況，正確引導，用今天的話來說是「進行政策教育」。再進一步則是把「民氣」引導到勵志革新圖強以取得真正與外國平等的資格，如以明治維新為開端的日本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昏聵而懦怯的清政府完成不了這一任務。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無能保護國家人民的權益，也不敢真正發動和依靠群眾抗擊侵略，卻幻想個別、零星、自發的反抗，甚或是烏合之眾的盲目行動可以推翻自己訂的城下之盟，始而鼓勵群眾以卵擊石作無謂的犧牲，失敗招禍之後又屈從於外國的壓力翻手加以鎮壓。慈禧對待義和團當然是眾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晚清》一書所舉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福州神光寺事件，雖是小事一樁，卻也頗說明問題：兩名並未見劣跡的普通英國人在福州城裏租屋半年，卻引起軒然大波，以告老在家的林則徐為首的一派主張立即強行驅逐其出城，並且擺出不惜為此一戰的姿態；閩浙總督劉韻珂和福建巡撫徐繼畬則出於「不敢啟釁邊隅」的考慮，主張採取緩和手段擠得他們最多住到租約期滿就離去。就是這一緩急的分歧在當時卻驚動了朝廷，徐氏等人被皇帝斥為「抑民奉夷」，屢次降旨追查。半年後兩個英國人被迫離去，實際上是按照劉、徐的方針平息的風波，但二人旋即被免官。今天看來如此小題大作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在徐、林之間，顯然徐的主張較穩妥而負責任。當時皇帝不察，處理不公，這在君主專制制度下也不足為奇。問題是至今在有些歷史著作中對這一事件仍以強硬主張為是，以徐繼畬為對外妥協投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長期以來我國無論是在寫歷史中或是在現實的宣傳中有一種塑造完美無缺的英雄形象的習慣，進而在意見上也變成絕對正確，這種不客觀的態度比比皆是，豈獨對林則徐一人為然！ 其實林則徐在這一件小事上意見不當決無損於他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思想上，到十九世紀中下葉不少人物已經比他更為前進，視野更加開闊，這也是事實。不過徐繼畬等蒙冤更本質的原因還在於在是非判斷中一個最經常起作用的因素， 那就是把排外與愛國混為一談。因此自鴉片戰爭之後幾乎所有中國人驅趕和打擊洋人的舉動不論情節如何都受到謳歌，包括上述僧格林沁大沽口之役。

當然，進、退、和、戰都只能審時度勢個案對待，不可一概而論。暫時忍讓與一味退讓以求苟安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有一套利用爭取來的

和平環境勵精圖治的方略以及付諸實施的決心。這也正是這一批改革者與腐敗的清廷的根本區別，自不能以「主戰」還是「主和」劃線。

同樣，撇開傳統的定論，從思想史的角度，以是否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思想發展提供新的內容為尺度評論洪秀全與曾國藩的思想和言行，就很難得出曾國藩一定反動，洪秀全一定進步的結論。洪氏所設計的和部分實施的「天國」藍圖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權而等級森嚴的專制王朝，在經濟上是小農經濟和企圖消滅私產的空想平均主義，高度集中，一切官辦，適足以限制生產力發展，卻不足以限制特權的膨脹。他以基督教為旗幟，吸收的並非它的現代精神而是中世紀的神權統治，實質上也就是篝火狐鳴的翻版。按照洪秀全的理想，如果成功地取代了清王朝，不可能推動中國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他的思想實際上落後於前面提到的一批知識分子。太平天國有一個洪仁玕提出了代表當時先進思想的建國方案《資政新篇》，但是他到南京時已是「天京事變」[16]之後，這個政權已經腐朽，洪秀全雖然在短期內曾讓他總理朝政，卻不可能也無力採納他的改革方案。所以洪仁玕的思想不能代表太平天國的主流。

從這裏聯想到對中國歷史上農民運動的看法。如果從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有助於還是有礙於人的解放和文明進步這個標準來衡量，就很難得出農民運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個普遍意義的結論。試看歷史上各種聚眾造反的農民領袖哪一個提出過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先進思想，或有別於建立君主專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中國歷代農民運動由於沒有先進的思想指導，所以都歸於失敗，這已是共識。既然沒有先進的思想指導，如何能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如果成功了又當如何？《水滸傳》作為文學作品確是不朽名著，但是試設想， 這批梁山好漢如果真的坐了天下，會有比宋王朝更利民的治國方針嗎？當然文學作品不能當歷史教科書來讀，過去賦予它這樣的角色是不正常的。誠然，反抗總是由壓迫而來，是「官逼民反」，百姓總是願意安居樂業，忍無可忍才會揭竿而起，因此「造反」可能有一定的「理」，並且值得同情，但造反不等於一定具有進步性，不能以唯成分論對待之。相反，這種造反的手段往往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壞性，規模越大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破壞越嚴重。農民運動固然有迫使地主階級實行讓步政策的作用，例如輕徭役、減賦稅，但是並不能改變生產關係， 無法打破壓迫——反抗——改朝換代——新的壓迫——新的反抗的循環模式，而正是這種模式使幾千年中國的生產力發展緩慢，政治上更跳不出君主專制的體制。馬克思說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馬克思：《中國紀事》）。這段話過去一向為我國馬克思主義者所迴避。不過話又說回來，太平天國確有與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運動不同的歷史作用，那就是它所衝擊的是中國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的皇朝。如果說彼時的中國只有徹底推翻這種皇朝統治才有出路，那麼太平天國在破壞生產力的同時，給了本該滅亡的清皇朝以致命的一擊，客觀上為以後的種種改良和革命掃除了一定的障礙。也就是它的作用恰恰在於「破」，而不在於「立」。當然不可能要求馬克思預見到此後中國發

展到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

至於曾國藩，對這個複雜的人物已有許多雄文巨著予以評說，近年來漸趨公允平實。就以與本文主題有關的那部分而言，曾氏所提出的改革主張以及一整套思想顯然更切中時弊， 更富建設性。他以吸引和培養人才著稱，許多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包括第一批科學家都曾是他的幕府。他所創始的洋務運動儘管有種種缺點，發展工業總比太平天國的小農經濟進步， 從中國經濟發展史的角度論，多少向前推動了一步。但是曾國藩致命之處在於沒有擺脫愛國與忠君相聯繫的傳統，他的政治主張及其實施結果都是鞏固清皇朝的統治，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悖論，最後連他自己都只有急流勇退以避禍。正因為處於這個悖論之中，功之、罪之，令史家爭論不休。撇開政績不談， 曾國藩至少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

晚清這一批改革派所見所識，不論自己主觀上是否意識到，必然會從根本上動搖存在了三千年的社會秩序，甚至觸及許多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這種思潮之能夠形成，而且居然能成一定的氣候，是與外來的威脅分不開的。不管國門打開的過程是多麼痛苦多麼屈辱，在此之前，在封閉的自我循環的封建社會中即使偶有足以引發根本性改革的新思想，如魏源在二十年代的某些識見超前的言論，只能停留在思想的火花，沒有成長的土壤，形不成思潮。到了外來威脅使朝廷時時刻刻有危機感的時候，執政者多少也意識到需要某種程度的「變」，所以對改革論者才能容忍於一時。但是這容忍是極其有限的，一切應變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保住搖搖欲墜的皇權以圖苟安，而不是從根本上強國富民，只有在二者暫時吻合之處才採納一些積極的建議。無知、顢頇加偏見和私利，這個政權已徹底腐敗，註定了不可能完成自我革新的歷史任務。

不幸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依附性決定了他們無論有甚麼真知灼見只能借助掌握政權和軍權者來實現。王韜的曲折的經歷最能說明這一點：出自傳統士大夫的本能，他先也曾走向統治者建言的道路，以冀自己強國克敵的主張見用於當朝，在太平軍席捲江南時還曾為「平叛」上條陳；但是在回了一次太平軍佔領的家鄉見到洪仁玕之後，又對太平天國產生希望，化名為之出謀劃策，為此以「附逆」罪被迫逃亡香港；他在去世前三年還曾見到孫中山，為他潤色上李鴻章的意見書。從傳統的道德觀來看，他是變節動搖，不能始終的投機分子；從以農民運動為革命正統的觀點看，他有「反動」歷史；從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看，他先在上海租界受僱於洋人，後又在英帝國主義庇護下苟活，堪稱「洋奴」。但是從怎樣才能救中國這個標準看， 那麼王韜處大動亂之世，來往於當時中國僅有的兩大政權之間，向在位者推行自己的救國主張，與當年孔子周遊列國在本質上並無大區別；流亡香港非其所願，但恰恰在此期間他建樹最大，為開創中國現代新聞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所以，無論在朝在野，這一批以救國為己任的飽學深思之士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熠熠閃光的篇章，其中許多思想直到今天仍未過時，而改革的實績卻不大。儘管他們所承襲的是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是非常入世的，他們也的確曾不遺餘力地為自己的主張鼓與呼，但最後，罷官的罷官，退隱的退隱。兩個曠世奇才：魏源最後皈依佛門，王

韜晚年耽於酒色甚至吸毒。著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到後來迷信道教到了荒唐的地步。《晚清》的作者在熱情讚賞他們的遠見卓識之餘，責其「思想敏銳而行動怯懦」，「甘當配角」。當然就個人而言，每個人都有其弱點，但是就總體而言，與其苛責於前人， 毋寧說這是時代的悲劇。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他們只能提供一些思想，卻不能提供中國所需要的改變政體的革命。至於自己到前台唱主角，獨樹一幟，直接喚起民眾，以先進的思想領導和組織人民革命，那是下一個世紀的事了。不過作為思想家，他們所起的開拓作用功在民族，不可磨滅。

圍繞着愛國問題的爭論歸根結蒂是國門打開以後的中國究竟應該怎樣對待外部世界之爭。每個愛國者心目中都有一個問題：甚麼是救國利民之道？猶如天下父母莫不愛子女，但是有的溺愛護短，有的愛之深而慮之遠，而責之切；父母多有望子成龍之心，而如何培養子女成才取決於父母自己的眼界和世界觀。重要的還是本文一開始提出的衡量愛國和賣國的坐標放在哪裏的問題。這個問題今天仍需要一再提出，是因為無論是在對待歷史和對待現實中並未完全解決。有意思的是，《晚清》的作者自己還認為有必要在卷首表明：「本書嚴厲譴責了列強的侵略和壓詐」，只是由於旨在本着孟子「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的古訓進行探索，因而沒有把大量篇幅放在分析眾所周知的事實上。這一申明看來似乎多餘 ——本來每一本書都有特定的主題，不可能面面俱到 ——其實並非多餘，正說明我國特有的國情。時至今日寫這樣一本書還需要做這樣一個說明，是發人深思的。

愛國本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如同愛家、愛親人一樣發自內心，不是別人強加的，當然也和愛家和親人一樣包含着道義和責任，乃至犧牲。但是外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愛得這麼痛苦，「雖九死其猶未悔」；為愛國而要在本國忍受那麼多誤解、屈辱，甚至累及生前身後名。近鄰日本是民族主義極為強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現在處於弱勢時「反求諸己」的能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從一開始就伴隨着知識界、政論家以及文藝作品對時弊的深刻尖銳的揭露和批判而發展起來；近年來「美國衰落說」在國際上頗為流行，其中討論得最起勁， 危機感最強的可能倒是美國人自己，當然也有相反的意見，但是根本不能想像在兩派辯論中會涉及愛國與否的問題。衰落論者也不必先表白這是出於愛美國之心，並無滅自己威風之意。同樣，他國持美國衰落論者也不會被認為是對美不友好。為甚麼國人在愛國問題上有那麼多複雜的心態呢？輝煌的古代史與屈辱的近代史造成了種種扭曲心理，把盲目排外與民族氣節、一味封閉與抵禦外侮、正常交往與卑躬屈膝、學他國之長與崇洋媚外、審時度勢維持對己有利的和局與賣國投降，混為一談。深層次的是自卑和缺乏自信，儘管有時表現出來的是虛驕之氣。新中國成立之後又有一段與世界上幾乎所有強於我的國家處於敵對關係的經歷，新仇加舊恨，正當的民族自尊心與歷史遺留下來的扭曲心態交雜在一起。在一切服從現實政治需要下，學術界對待歷史也只能遵守劃一的教條主義標準。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發展到登峰造極時竟至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發生了火燒英代辦處那種與義和團如出一轍的群眾「革命」行動。

現在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全面開放的歷史時

期，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關係空前緊密而複雜的世界中何以自處，仍是不斷向每一個中國人提出的問題。愛國主義仍然是當前倡導精神文明中的主旋律。如何理性地、從中華民族的根本需要出發對待歷史，評價歷史人物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我想，二十世紀末，乃至「跨世紀」的在位與在野的思想精英們理應比十九世紀中葉的先輩心胸更為寬廣。甚麼時候中國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對待世界一切強於我或弱於我的國家，既充滿民族自信又虛心學習他人長處，既懂得保持民族精華，又能以開闊的胸懷對外來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們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時候。

1996 年

清華園裏曾讀書

也許是由於幾十年前曾有幸在清華園裏讀過書，〈清華園裏可讀書〉（曾召奮 —《讀書》，1994 年第 7 期）一文引起我特殊的共鳴，讀罷掩卷長思，無限感慨，浮想聯翩，有不得不一吐者。

首先浮現在眼前的是那所風格獨特的圖書館。記得當年考大學，發憤非入清華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學術地位之外， 實實在在的就是那圖書館了。清華的老圖書館當時在高等院校中是頗有名氣的，除了藏書之外，那建築本身與大禮堂同為清華園的象徵。單是閱覽室的地板是用貴重的軟木鋪就以免走路出聲這一點就可見設計之考究。那時大圖書館的常客一般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座位。一進入那殿堂就有一種肅穆、寧靜，甚至神聖之感，自然而然誰也不會大聲說話，連咳嗽也不敢放肆。借書手續簡便，不存在管理員態度問題，以至於我根本不記得書是怎樣借出來的，似乎到圖書館總可以讀到自己想讀的書，一切都那麼自然。我那時除上課和參加音樂室的活動外， 差不多時間都是在圖書館度過。在那燈火通明的大閱覽室，浸潤在知識的海洋裏，有一種無限滿足和心靈淨化的感覺。我並不都是在老老實實地讀老師指定的參考書，或是與課程有關的書。在那個年齡（現在時髦話稱為「花季」）對知識世界充滿好奇，求知欲旺盛，腦子像海綿一樣，吸收力也強，聽到過的中外名著恨不得都流覽一番，與古人、洋人神交，其樂無窮。這些大雜燴究竟對我起了甚麼作用，實在也說不清，那時還不懂得用某一個標準和理論來批判、選擇，大約是未免泥沙俱下的。不過養成對書，特別是對圖書館的特殊感情是真的。每晚坐到閉館（大約九點或十點鐘），然後戀戀不捨地回宿舍。宿舍十點鐘熄燈，決不通融，許多同學都備有油燈，一燈如豆繼續讀書，到夏夜燈罩上佈滿撲燈自焚的小蟲，看書看累了數數蟲子也是一趣。那種「開夜車」純屬自覺，決非為應付作業或考試。平心而論，文學院的功課比起理工科來是比較鬆的，或者說彈性很大，考試不難應付。主要是那些學識淵博的教授們在課堂上信手拈來，旁徵博引，隨時提到種種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歷史公案，像是打開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發起強烈的好奇心，都想進去看個究竟，讀到勝處不忍釋手，只好挑燈夜讀。（也許我有幸遇到的都是好老師， 自小學開始，享受到的讀書樂遠遠超過讀書苦，似乎很少有時下學生負擔過重叫苦不迭的體驗。）

到了四年級，因為要寫畢業論文，開始享受可以入書庫的特權。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樓梯進得書庫望着那一排排淡綠色磨玻璃的書架，真有說不出的幸福感，外加優越感 ——自以為是登堂入室了（現在想來當然是不知天高地厚）。同時又有一種挫折感：這一片浩渺的書海何時能窺其萬一？不由得心中默誦「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驚歎兩千年前先哲的睿智。從此以後經常發此感慨。但是說實在的，那種感慨還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之作，明知「殆而已矣」，卻不妨礙我孜孜於「以有涯逐無涯」，樂此不疲。那時圖書館的地位是很高的，館長多為名教

授擔任。例如胡適、李大釗曾主管北大圖書館，這一事實之為眾所周知恐怕同中國革命的歷史偉人與之發生聯繫有關。而潘光旦曾任清華圖書館館長大約現在很少人知道或記得了。我對此事印象深刻是因為有一次，不記得是在甚麼場合，潘先生在學生集會上講話，其中說到他抽查了一下圖書借出情況，發現最多的是「中文——白話——小說」（他說時每個詞都頓一下， 加重語氣），說明現在學生有多懶，光看小說不說，連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麼得了。他講這段話時很激動。我沒想到，潘先生管圖書館一直管到同學借書。直到多年之後從回憶他的文章中讀到他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那次講話陡然浮現在腦海中，似乎感受到了當時沒有體會到的深切的憂思。他憂的是學生不讀書，不讀要動腦筋的書 ——怎麼得了！當然他沒有想到以後種種。

彼時的清華園決不是田園詩般的讀書勝地。我在校的年代剛好跨越解放前後，前期學生運動 ——反飢餓、反內戰，然後迎接解放，後期思想改造運動、鎮反、抗美援朝、參軍參幹、土改……整個期間經常聽到被引用的是「一• 二九」運動時蔣南翔的名言：「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了！」在那敵寇壓境， 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這句話曾喚起多少熱血青年投筆而起， 走出書齋，走向街頭，奔赴戰場！而從那時以來的近半個世紀中，總是處於動盪多事之秋，校園內的書桌似乎從未放穩過， 投筆從戎，投筆從政者陸續不斷，《可讀書》一文說到清華多出大官恐怕也與此有關。余也不才，總是眷戀那讀書的生活，但是並非沒有受到時代的衝擊。記得在抗美援朝運動高潮中，我正從錢鍾書先生做畢業論文，題目屬比較文學領域，我是班上唯一選此類題目的，能得錢先生親自指導當然是畢生的幸運。但是當時氣氛決不容我安坐圖書館，埋首故紙堆。我也着實痛下決心放棄這一切，堅決報名參軍。儘管未被批准，我的論文計劃和校園內轟轟烈烈的氣氛已很不協調，一位同學在圖書館見我翻閱那些書，責備說，你還看得下這樣的書！令我汗顏不止。按照原來的框架做不下去了，只得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至今想來愧對老師，但是當時老師還是很體諒，寬厚地給了一個高分數。

那一年我還帶頭幹了一件「掀書桌」的事，即作為班長（那時稱「總幹事」）代表全班向系主任吳達元先生請願，要求乾脆取消畢業論文，讓同學們有更多時間投入各種社會活動，結果被訓了一頓，碰釘子而回。事實上我們是文科最後一年做畢業論文的，下一年就取消了，直到「文革」結束後才恢復。1952 年院系調整，清華不但文、法學院，連理學院也分出去了，變成了純工科大學。這項措施之為一大失誤，而且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大約已成共識。從根本上說，「大學」（university） 的本義，以其多學科，包羅廣也。學固有專長，但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應是全面發展的。何況清華本來有極強的文科（這裏作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統稱，下同），曾經群星燦爛，名家碩儒輩出。且不說〈可讀書〉一文提到的國學大師王國維，隨便扳起手指數一數就可數出一系列熟悉的名字來：聞一多、陳寅恪、朱自清、張奚若、金岳霖、潘光旦、費孝通、沈有鼎……我在校時的文學院院長是馮友蘭先生，法學院院長是陳岱蓀先生，各系都有一些名教授，當時錢鍾書和楊絳先生剛從國外回來，風華正茂，雙雙執教於外文系，到院系調

整，實際在清華時間很短，我有幸趕上，得沐春風。過去清華還出一套《清華叢書》，文、理、工都有，例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最初就是作為《清華叢書》之一出版的。就文科而言，北京一些歷史悠久的大學如清華、北大、師大、燕京等各有其傳統和風格，有競爭，有互補，有交流，有切磋。即使單從培養工科人才出發（當時清華已有「工程師的搖籃」之稱），過去清華工學院的學生有的是機會按照自己的興趣旁聽文科的課和講座，與文科同學共同參加各種課外活動，頗不乏多才多藝的人才。如果要培養「師」，而不是「匠」，單有狹隘的專業知識和興趣是不夠的，此專科學校（或學院）之與大學不同之處。

當然，各國都有若干在某一方面出類拔萃甚至聞名世界的專科院校。清華作為工科最高學府現在也仍在國際上佔一席之地。但是，原來有着優良傳統的綜合大學，把基礎雄厚的文科就這樣一刀砍掉，豈不可惜？也許辯者會譏為「門戶之見」， 因為昔日清華的文科已併入北大，不能算「砍掉」，名教授們也各有其位，在哪裏發揮作用不是一樣，何必非清華不可？這裏且不說文科的名教授們後半生的時間多半是在批判其前半生的學術成果中度過，一個不容諱言的事實是，院系調整之後文科大大壓縮，而且萎縮了，不僅是北京的院校為然。更重要的是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有傳統，有實力的綜合性大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清華從「留美預備學校」開始，經過幾代學人艱苦努力，慘淡經營，成為第一流的綜合性國立大學，又歷經抗戰遷校、復校以及解放前幾年那種艱難卓絕的物質條件和政治環境而能保持那樣的規模，保存了學術元氣，洵非易事， 所以我為清華文科惜，主要不是出於個人感情。至於時下各種學院改名「大學」成風，有幾家是名實相副的，沒有作調查不敢妄評，不過學術水平決不會因改名就自然提高，則是不爭的事實。

院系調整的主導思想大約一是照搬蘇聯經驗，或者說要努力改造過去承襲歐美學制的傳統；二是從建設需要出發，大力發展實用的學科，文科不但要壓縮，而且由於被納入了階級鬥爭範圍，許多內容乃至整個學科豈止認為無用，實是有害，只能加以批判、揚棄，直至取消。所以，如果說理、工、醫、農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有較大的發展，而只是在「文革」中受到摧殘的話，那麼，文法學科的破壞就不是自「文革」始了。有的是有形的，例如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學等等乾脆被取消了；有的是無形的。到「文革」中，這種主導思想又有了飛躍，因而有「大學還是要辦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的最高指示。從口氣來揣摩，大約是本來是想過大學乾脆不要辦了，後來想想理工科還是需要的。文科呢，另外還有一條指示：文科應以社會為大學，這就很明白了。與此相關聯的更深層的主導思想是始終把知識分子看作僅僅是擁有「一技之長」的工具。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實用效果的知識和學問自難得到理解和承認，遑論尊重和扶植！

從歷史傳統看，我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傳統的中國士大夫是只學文的，西方的實用科學技術剛傳入時被視為「奇技淫巧」，不屑一顧。後來吃了大虧，經先進的仁人志士大力倡導，才開始重視科學技術。不知從何時起，又走到了另一極端。其中原因十分複雜，難以盡述。有一點切身感受是，屬於理工科的知識都是專門的，即

使是一個簡單的公式，對於沒學過的人就如天書一般，只能承認自己是外行；而且容易受實踐檢驗，一個數據錯了可能人命關天，非要專家不可。而文科的知識說出來往往像是常識，無神秘感。例如只要能看報，就可以對世界大事發一通議論，何必要國際問題專家？人人都能就家庭、婚姻、醫療保險等等發表意見，何必要社會學家？當然也有許多外行不掌握的知識，看不懂聽不懂的深奧道理，但大多不能立即轉化為物質，飢不能果腹，寒不能當衣。有的對民族，甚至對人類前途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學問並不一定能立即解決令當政者頭痛的問題，因此其價值很難得到承認。這是就一般人的心態而言。至於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下，即使是常識也可以變成異端邪說，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之時，以幾條文盲或半文盲都能背誦的高度簡化的教條代替天下一切真理，連自然科學也不能倖免，這又當別論了。

在文科中被認為有用的「一技之長」是外文。一則因為它和化學方程式一樣，沒學過硬是沒法自以為懂；二則 ——這點很重要 ——史太林有過權威的論斷：語言沒有階級性！記得五十年代初期，一些西方語文專業的同學紛紛要求轉到俄語專業，把這也當做一種從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轉變，後來黨團組織佈置學習史太林論語言的文章，「從理論上」打通思想， 說服那些同學安心留在原專業學習。這裏語言只是作為一種符號，完全抽去了文化內容，純粹作為一種工具。掌握這種工具的人就被認為有「一技之長」，也成為一種工具，其用處在於幫助掌握政策的人聽懂或看懂他不懂的語言文字。這原沒有甚麼不對，但是過分狹隘，是和壓縮和取消文科的主導思想一脈相承的。

記得我進入清華外文系上第一堂「散文」課，老師當場出一作文題：「我為甚麼選擇外文系」。我寫的是心裏話，大意謂：我認為每一種文字都像一把金鑰匙，可以打開一扇扇通向無盡的知識寶庫之門；我又深感我國的文化無比光輝燦爛，卻不為世人所知，這金鑰匙（多數）也可以使中國文化通向世界。那時只有這模模糊糊的嚮往和志趣，還不會說「促進文化交流」之類的話，而且初生之犢，雄心不小，自以為將來一定要通好幾國文字的。此文頗得老師讚賞，頭一炮就得了最高分。但是進入畢業班就聽到了外文系主要是培養翻譯之說，而且重點不是指的翻譯世界名著，而是為外交服務的口譯或筆譯。有一次，一位教授被借去隨一個規格相當高的中國代表團參加國際會議當翻譯，受了啟發，歸來後在課堂上大講外文系應着重培養翻譯人才，特別是口譯。當時許多教授不以為然，「外文系以培養翻譯人才為目標」成了一句譏諷的話。我當時也曾私心竊以為離我之初衷遠矣！誰知畢業後恰恰就做了十幾年這種翻譯。直到「文革」中下放勞動，在「念念不忘老本行」被列入重點批判的「錯誤思想」的同時，卻要求「外文幹部」不要丟掉外文，後期軍代表還組織複習。後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前從「幹校」調回北京也還是由於這「一技之長」。而當時其他文科的用處也就剩下寫批判稿了 ——批別人或批自己。

憶清華，引起許多雜感。決無意貶低任何行業。出「大官」，說明造就了許多棟樑之才，我願意相信多數都是好官，當然是社稷之福，母校之榮；清華也無愧於「工程師的搖籃」之譽，幾十年來出了許多傑出

的人才，為民族振興做出了巨大貢獻，作為文科出身的一介書生，我是由衷欽佩，自愧不如的。

學外文的當翻譯也是題中之義，當一個好翻譯也真不容易。況人各有志，本人以知命之年終於遇到提倡人才流動，要求調工作不再是大逆不道，於是像童話裏「森林的召喚」一樣，又被可以坐圖書館的地方吸引過去，做起了可以稱之為以讀書為業的研究工作，已難有大成，得賦遂初，自得其樂而已。深知這決不是，也不應該是大多數人的選擇。我只是想，作為一所大學，特別是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學，除了出各行各業實際工作人才之外，總還應該出一些名家大儒，並且在學科的建樹和學派的開創方面有所貢獻。這樣的人不可能大批產生，但不應斷代，每一代都應該有佼佼者擔負起存亡繼絕，繼往開來的使命。大學的校園應該是讀書氣氛最濃的地方，有幸進入這一園地的天之驕子們，不論將來準備做甚麼，在這裏恐怕首要的還是讀書，培養讀書的興趣，讀書的習慣，盡情享受這讀書的氛圍，這裏可能積累一生取之不盡的財富，或是日後回憶中最純潔美妙的亮點。功利的考慮出了學校門有的是時間，大約到那時想躲也躲不開的。

這決非提倡大學應成為象牙之塔，學生都應兩耳不聞窗外事。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經國濟世的傳統。記得幼承母訓，作為座右銘的就是一副曾文正公的對聯：「學求其於世有濟，事行乎此心所安」。到大學畢業前夕，正是大力號召服從祖國分配之時。我們幾個女同學相約在初升的陽光中爬到一棟樓頂上在國旗下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智慧，獻給親愛的祖國。這「智慧」是我特意加上的。現在看來似乎幼稚可笑，但當時確實自以為既然身為大學生，多讀了些書，總該多獻出點甚麼，那多的是甚麼呢？就大言不慚地稱之為「智慧」了。「書越讀越蠢」是當時絕對想不到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後來在漫長的無盡頭的思想改造中，自以為產生「智慧」之泉恰好成了錯誤之源，在渴望被承認「改造好了」而不可得之餘，深感為讀書所累，常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歎，以致曾一度走向另一極端，真心誠意地接受了「讀書無用論」。如今，讀書本身至少不再有罪，再沒有「拔白旗」、「批白專」之類的運動， 知識分子也不需要無休止地為「脫胎換骨」而自我否定。清華園裏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老圖書館依然在，又有了更加巍峨壯觀的新圖書館大樓。繼前幾年設立社會科學系之後，近又成立人文學院，說明有關領導也已意識到少了這一部分的缺陷。欣見《清華叢書》又開始出了，但願能繼續下去。不過「破」易「立」難，百年樹人談何容易，再要形成一個人文薈萃的局面怕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所能及。如果鍥而不捨，努力下去，假以時日或能達到。現在應該說是既無內亂又無外患的清平世界。然而新的海潮正洶湧而來：雖然再沒有自上而下的「書越讀越蠢」的宣教，但是「蠢得像博士」，「窮得像教授」之類說法又自發地在民間流傳開來。惟其自發，衝力更大，在這衝浪之下，能剩下多少空間放書桌，放穩書桌？是的，清華園裏曾讀書。祝願清華園裏仍讀書！

1995 年

文化• 社會 • 婦女

從「偽君子、真小人」說到美國種族歧視

美國大選一場好戲，頗熱鬧了一陣子。現在雖然人選已定，但對美國、對世界會有哪些影響，還有待觀察，暫時不想猜測。從這場選舉中引發出一個說法：這是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的選擇，引起我一些想法。

一般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更痛恨偽君子，所謂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與此類人交往容易上當受騙，受害更深。還不如公開的流氓無賴，到處宣稱自己奉行「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的哲學，與之打交道，中了對方損人利己之槍，是自找的，勿謂言之不預也。這是一個角度。

還有另一個角度，從全社會來看，如果逼得一部分小人不得不偽裝成君子，說明大部分人還是喜歡君子，認同某種道德底線，公認有些事「君子不為也」，正常的家長、老師都以此教育學生。一些公然違反道德的行為會受到詬病，所以要做壞事得偷偷摸摸，所謂「見不得人」。假如這些壞事都可以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大家都見怪不怪，這個社會就失範了，也是集體性的墮落。例如鄰里中有一個人白天出現時衣冠楚楚， 文質彬彬，夜裏卻常做些偷雞摸狗的事。一旦被發現，人人喊打，無地自容。說明這個小區還有正常的秩序。而另外一個住宅區有一個或一群流氓，仗勢欺人，公開打家劫舍，宣揚一套弱肉強食的「理論」，久之，居民也都接受了，青少年甚至羡慕、模仿，做「真小人」成風，這個社區會是甚麼樣？所以歷史書上寫到一個皇朝衰落，接近末世時，往往有一個現象，就是「賄賂公行」。重點在於「公行」。因為任何官場，時有賄賂之舉是免不了的。不過在總的風氣比較正的情況下，這是見不得人的，只能暗中進行。到了能夠「公行」的時候，說明法紀、良知蕩然無存，官場從少數偽君子成為多數真小人，雖不亡， 亦不遠矣。

再跳到美國的「政治正確」。這次大選中反「政治正確」似乎佔了上風。我見到的中國不少評論中也以調侃的口吻提到這個詞。它的起源是針對種族歧視，主要是黑人，兼及婦女及其他少數族裔。美國黑人悲慘的歷史毋庸多說。為爭取到平等的、有尊嚴的「人」權，美國的歷史有多長，黑人鬥爭的歷史就有多長，還經過了一場慘烈的戰爭。南北戰爭後，黑人名義上獲得公民權，可是又經過了一百年和平的和流血的鬥爭， 到 1965 年約翰遜政府通過《選舉法》，才真正落實。即便如此，還遭到南方州政府的抵制，聯邦政府派出了國民衛隊（略相當於我們的武警）強迫執行反對種族隔離的法律裁決。再過了近半個世紀，到一位

黑人被選進白宮，這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經過幾代黑人和白人的共同鬥爭。特別要強調的是， 這裏離不開真心信奉自由、平等、人權的白人（真君子）的貢獻，多數是上層精英，也包括幾屆總統，如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肯尼迪（John Kennedy）、約翰遜。「政治正確」之說大約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高漲的民權運動開始。在這一大潮下，約翰遜政府在通過《選舉法》的同時，還通過《確保行動法》（有的譯作《肯定性行動法》），就是強制落實《選舉法》的精神，並在就業、上學等問題上對弱勢群體有一定的照顧。約翰遜總統在針對反對意見，為此法做出的辯解中說：如果一個長期在手銬腳鐐中生活的人一旦鬆綁，立即把他與受過訓練的運動員放在同一起跑線上說，你們賽跑吧，這是不公平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對黑人、婦女等等侮辱性的語言和動作在正式文件和媒體中被禁，在主流社會遭到摒棄，久之形成風氣， 在習俗中成為有沒有教養的標誌。如果公眾人物不小心用了歧視性語言，立即遭到口誅筆伐，一般都以道歉了事。（順便說一句：對婦女的「性騷擾」立法也是那個時期）。由於歷史原因， 要矯正一種頑強的陋習，開始時需要有強制性措施，有時難免矯枉過正。還須指出，堅持「政治正確」，使之成為風氣的主要是主流白人。這是社會進步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王陽明所說，「破心中賊難」。相當一部分白人， 在內心深處、在感情上還是懷有對黑人的歧視，有的還很強烈。我一直感覺到，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各種提案在國會遇到的超乎尋常的反對，固然是黨派鬥爭，也有某些議員難以出口的種族歧視的因素。例如他上任不久，第一次在國會提出他的醫改方案，有一位議員在他講到中途時，大叫「你撒謊！」。這是極端粗魯無禮，「撒謊」一詞帶有侮辱性，在議會辯論中是屬於避用的，這一規矩於英國議會開始，可以說「你說的不符合事實」，但不能扣以「撒謊」的帽子。通常一位總統上任伊始總要給予一定的尊重，我想如果這位總統是白人，儘管是不同黨派，恐怕不至於這樣不給面子。吊詭的是，2008 年有史以來一位黑人當選總統，人們都認為這標誌着美國種族平等進入新階段，這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過了八年，出現一位侯選人，竟然完全不顧「政治正確」，公然發出歧視少數族裔的言論，卻成為促使他當選的吸引力之一。

這個過程等於掀開了一張蓋子，把那些原本不見天日的種族歧視「心中之賊」給放了出來，乘機盡情發洩一通，以致於少數族裔，包括華裔都遭殃。弄不好南方 3K 黨再現，問題就更嚴重了。解鈴還需繫鈴人，就看新當選的準總統怎麼對待了。在台下信口開河容易，要為這個國家負責時，總不能眼看它重新走上種族分裂乃至騷亂之路吧。

我們常說「從來天意高難測」，其實民意也難測。看到不少評論，先把投票結果視為籠統的「民意」，一切分析從這一前提出發。這是另一種成王敗寇的習慣思維。如果是壓倒多數，猶有可說，可是在雙方票數非常接近的時候，至少不能認為勝出者就代表整個「民意」。這也適用於英國脫歐的公投，很多分析文章都以英國人「都」「從來」就疏離歐洲為前提，從歷史到現狀講得頭頭是道。那次投票也是雙方勢均力

敵，脫歐方勝出更帶有偶然性，如果再投一次，很可能反脫歐者佔多數。那麼許多文章又可能是另一種說法。不過事已如此，其帶來的後果卻是實實在在的，這且不表。再說美國，以票數論，普選票數希拉莉（Hillary Clinton）還多一些，與當年小布殊與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的情況相似。不能說「民意」一邊倒。由於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現江湖氣十足，出言粗魯，於是論者急忙得出他代表底層草根，另一位代表上層精英和大財團的結論。但是現在票倉的分類統計發表出來，在年收入 10 萬直至25 萬美元以上的人群中特朗普得票比例都高於希拉莉，而 5 萬以下的，希拉莉佔比例略高，這又如何解釋？隔太平洋觀火，要體會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族群的心理，難免隔靴搔癢。「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之苦？）」，對於他國複雜的國情、民情不宜匆忙做簡單化的分析。很多情況還有待觀察。本文只就種族歧視問題談些感想。

我一向認為美國總統能左右局勢的力量有限，由於制度的制約，為所欲為的餘地較小。還有在台下為嘩眾取寵而信口開河，真要對後果負責時，也不得不慎重從事。所以對美國內外政策將有何延續或變化，現在還言之過早。但是應該承認， 我沒有考慮到的是在思想情緒上，特朗普的極端種族主義言論（不論他以後實際政策如何）已經造成不小的後果。有人說他代表民粹主義，此說不確。應該是他挑動了剛好處於底層之上的那部分對處境不滿的人，不是矛頭向上，而是矛頭向下，或向外，把那些享受福利的人（包括不少黑人和新移民）以及中國工人看作是侵佔自己利益的敵人。借用一句過去的常用語：「轉移本應對大資產階級的鬥爭矛頭」。這恐怕不能算是代表草根的民粹主義。這部分人主要是白人藍領工人，外加下層或正從中產淪為下層的白領。白人工人向來是最歧視黑人的，一則在心理上是足以體現其優越性的對象，二則在實際上是威脅自己利益的勞工預備隊。記得 1963 年毛澤東應一位美國黑人運動鬥士羅伯特• 威廉（Robert Williams）來信的要求，發表了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其中提出那句名言：「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號召各種膚色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萬惡的帝國主義制度，同時黑人也獲得徹底解放。羅伯特• 威廉當時逃亡往古巴，後來到中國住了幾年。由於毛主席的聲明， 在中國當然獲得很高禮遇。不過他每與人談話，中國人毫無例外總要提毛主席這一論斷 ——在當時是必須的。他對毛極為崇拜，但就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與白人工人階級團結這個觀點， 根據他的切身經驗，最歧視黑人，對黑人最殘酷的，正是白人工人。我曾經接待過他，對此印象深刻。直到現在，威廉所說仍然是事實。從美國黑人的鬥爭史來看，從反對蓄奴制一直到後來的民權運動，除了黑人自己的組織之外，為黑人權利鼓與呼的是幾代白人精英 ——精英與富人不能劃等號，但是也包括某些富人。例如某些基金會的經常項目就包括資助黑人教育， 以及其他緩解種族矛盾的工作。做一個不一定恰當的類比，卻是我親眼所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歧視外地農民工的是中下層小市民，甚至是自己剛站穩腳跟的外來戶第二代。對於「外地人」，他們言談中充滿蔑視，從中得到優越感的滿足， 同時他們又不如外地人的吃苦耐勞，許多工作都不願做，卻認為是外地人佔了他們的資源。因而對擠壓和歧視外地人的政策基本上擁護。

而一直為農民工的平等權利、戶籍、子女教育等問題鼓與呼的是知識精英。正如孟子所說，「無恆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也就是「士」能夠根據自己的理念（就是「恒心」），超越自己的處境和利益來考慮全社會的問題。這應該帶有普遍性，也適用於美國白人中堅持黑人平權的有理想、有良知的那些精英。

因此，把美國總統競選說成是草根對精英，窮人對富人， 是不符合實際的。另外，「政治正確」有時可能流於形式，有時過分，走到另一極端，造成反向的不公平，這種情況也是存在的。但提出這個命題的進步意義不可磨滅，在嘲笑它之前應先了解它產生的歷史環境。根據美國最近發生的情況來看，現在還沒有到否定、放棄它的時候。

2017 年

科技創新與人類禍福

印度聖雄甘地（Mohandas Gandhi）曾說：有七樣東西可以毀滅我們：「沒有人性的科學」即其中之一。由於他遠離工業化社會的生活方式，一般人對他這話不予重視，甚至可以認為是反科學、反現代化的取向。

實際上，科學的發展是不是一定造福人類，這個問題在發達國家是相當早提出的。二十世紀初，工業化達到高潮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發現科技的發達、物質的豐富，不一定給人類帶來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證明了這一點。二十年代後期美、歐各發達國家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及 1929 年開始的、幾乎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垮台的經濟大蕭條，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高度發達的生產力、豐富的物質力量並不一定造福人類，反而產生許多新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西方研究這些問題的社會科學開始蓬勃發展，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政治學。

英國的科學家尤因（Alfred Ewing）是十九至二十世紀跨世紀人物（1885–1935），在他的晚年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同時也是機械工程師，有多種重要發明，比如渦輪蒸汽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研究破譯密碼，成功破譯了德國的潛艇信息，把美國拉入了這次世界大戰……。他是熱忱的科學倡導者，認為科學的定義就是不斷拓寬人類知識的邊界。每拓寬一個邊界就照亮一個領域，使人類從黑暗中走出來。他甚至在宗教集會上對着很多教徒講，只有宗教沒有科學，這個世界還是會停留在無知的黑暗之中。但是就是這位科學巨人在晚年說了一句話，經常被引用：

人類在還沒有能夠掌控自己之前就先掌控了自然，先具備了掌控自然的能力。這個事情將要引起不可預測的後患。

他看到了人類已經能呼風喚雨，可以有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的強大力量，可是人控制不了自己，不知道如何運用科技成果。自然科學突飛猛進，而社會的適應能力遠遠落後於這一發展，使人類面臨空前兇險的命運。培根（Francis Bacon）說：知識是力量，但是這個力量拿來做甚麼？不一定就去做好事。如何運用這個力量，取決於人自己內心追求甚麼。

我最初看到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在意想不到的文獻上， 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年度會長總結 ——他們每年發一個年度工作報告，開頭都有一篇「會長總結」。我驚訝地發現，這些大基金會的「會長總結」氣度恢宏，有點像總統國情咨文，而且水平和眼界超過某些總統。他們的都是先從整個世界、全人類的現狀出發，確定其發展需要，然後再決定下一年工作重點。三十年代初的一份「會長總結」中就引了上述科學家尤因的話， 着重提出這個問題。起因也是與大蕭條有關 ——物資極大豐富並不一定造福廣大民眾。因此，基金會開始把以資助醫學和自然科學為重點的傳統，轉向同時資助社會科學和社會改良的項目，而且出手很

大，對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和法西斯主義得以橫行於一時， 特別是原子彈的出現，引起了更大的震撼。原子裂變是一項純科學發明，可以用於和平，也可以製造武器。二戰中納粹德國和美國誰先研製成功原子彈將決定反法西斯戰爭的勝負，從而決定世界文明的走向，所以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一批科學家曾支持曼哈頓計劃，認為自己的貢獻是有利於人類的。但是在兩顆原子彈牛刀小試之後，表現出的空前巨大的、長遠的破壞力震驚世界。於是有關的科學家們進行反思，拷問良心，為此很糾結。1945 至 1946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會長總結」也反省了原子彈的問題，因為參加此項研製的那些大科學家，在學術研究關鍵時刻都得到過基金會的資助，儘管當時資助某項科研時做夢也不會想到其成果會成為發明原子彈的因素之一，這使得本來宗旨是「造福全人類」的基金會非常困惑。提出這個反省的當然不止他們一家，科學發展與人類的禍福的關係在這個問題提上了日程。能不能夠給科學劃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就不許再繼續發展？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科學有自己發展的規律。而且由誰來劃定界限？這又有回到以專制造成蒙昧的危險。

他們討論的結論是科學本身沒有責任。誰有責任呢？就是利用科學成果的人。所以要發展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要把人和社會制度作為研究和改善的對象。一方面使人能夠提高覺悟，加強自律；同時要有一種機制，迫使那些掌握權力的政治家們，以人的福祉為目標而利用科學成果，追求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而不訴諸戰爭，等等，這樣才能夠使得科學成果造福人類而不是造禍人類。他們的報告中充滿了這樣的話：

我們可支配的物質力量和我們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間嚴重失衡。

我們的政治機構基本上還是植根於十八世紀的，而我們技術的突飛猛進卻是二十世紀的現象。

我們的社會正在日益危險地傾斜，智力發展的不平衡日益嚴重，已不容忽視。

我們科技的水平已經達到二十世紀，我們的國際關係和國家制度還只停留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

那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能否與自然科學並駕齊驅？ 因為科學的發展轉化為生產力，變成工業產品是非常快的， 而且越來越快。可是人類的倫理觀念、社會制度的改變是很慢的，而且並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沿着一條規律發展，各派理論爭論一百年，也許才稍微有一點進步，總是趕不上科技和物質文明的發展。每一個時期都有理想主義者大聲疾呼，但是理想敵不過現實利益的力量。一項新發明出來之後不可抗拒地一定要用於生產。從市場規律來講，有需求就有供應，使人的生活日益方便，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另外一個規律是激烈的競爭推動生產必須日新月異，於是為了生產而製造需求。最明顯的是人們本不需要的光怪陸離的奢侈品日新月異。還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我們日常遇到的電腦、ipad、手機 word 版本，等等剛一用順手，就出現新花樣，迫使你不斷

更新，其實並不一定需要，而且帶來諸多不便和浪費。這還是小焉者。更重要的是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治理環境當然也靠科技的發展，但是治污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跟不上新產品製造過程中的污染速度。至今垃圾回收和轉化問題跟不上大量垃圾的禍害就是證明。

還有國家權力的動力，就更加強大，最重要的表現是軍備競賽。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人類休戚與共的領域日益擴展，但是掌握國家權力的人所考慮的問題還是狹隘的國家利益，軍備競賽是推動科學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力量。一個環境污染，一個軍備競賽是科技發展最大的負面影響。誠然，現在人類已經意識到環境問題，每年都舉行有關的國際會議。但是會上各國根據自身的狹隘利益，爭論很大，難以達成一致，　更難付諸實施。從局外人來看，似乎爭論的是各國的繼續污染權，也就是力爭少承擔、或延緩承擔減少污染的義務。這就是狹隘的、短視的國家利益超過對人類的責任感。但是哪一個執政者能冒降低自己國家的發展速度、暫時削弱競爭力的風險， 帶頭切實採取強有力的環保措施呢？單就一國的「國家利益」來講，也是以短期的、少數人的利益換取全民的長期利益。

至於軍備競賽，更是人類一大惡性腫瘤。據說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已經發明了製造潛水艇的原理，只因為他對人類理性的不信任，自己把圖紙付之一炬。後來的軍事科學家就沒有他的獨立性和自製力了。二戰以後大國之間不知有過多少輪裁軍談判，達成無數個限制軍備的協議，結果我們看到的是武器不斷更新，當初投在長崎和廣島的兩顆原子彈比起後來層出不窮的新型武器，已經微不足道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avid Dwight Eisenhower）離職時的名言：「軍工複合體正在左右美國的政治」被一再引用，同時也不斷為事實所證實。豈獨美國為然！上世紀六十年代美蘇兩大國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核戰爭將無贏家，正是這種清醒的認識才保持多年「冷戰」而沒有發展成「熱戰」。但是與此同時，各自仍然不斷研製日新月異的武器裝備。核大國達成的核不擴散協議被一再突破。不管是核還是其他高效殺傷力的武器，如何保證永遠控制在頭腦清醒的人的手裏？負責任的領導人背後都有廣大民眾的身家性命，使他們必須謹慎從事，可那些亡命之徒呢？還有誰能保證不再出現希特拉那樣的瘋狂的國家主義者呢？

1968 年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各自然科學學科的師生聯合發表了一項聲明，提出：「當前科技知識的濫用是人類的生存的一大威脅」，號召 MIT 和全國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團結起來反對美國政府的危險的政策，爭取「更加負責任地利用科學知識」。具體內容包括：以批判的態度審議政府在科技領域的政策；設法把科學研究項目的申請重點從軍事技術轉向解決環境和社會問題；把科學家和工程師組織起來，使他們關於科技為人道的目標服務的要求能體現到政策中。根據這一聲明，他們於 1969 年建立了「關心科學工作者聯盟」，發起了「科學為人民」的運動。這個運動最開始主要是針對美國在越南使用化學武器和發展洲際導彈，大背景是當時高漲的反越戰、反核武器、反環境污染的群眾運動。「科學為人民」運動與此方向是一致的，採取的方式是在多次「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年會上發表他們的意見，指責體制內的

美國科學家過度依賴政府， 為政府的需要服務，而喪失獨立性，違背了科學的良心。在這種會上往往有政府官員作為嘉賓講話，他們多次受到「科學為人民」的成員打斷、當面指責，有時被迫中途退場。這個運動大體上活躍於 1970 至 1980 年間。後來內部出現分歧，或因對激進的方式、或因對問題的重點，有不同意見；還有深入下去涉及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造問題，等等，分歧更大。隨着越戰停止，形勢變化，這個運動也逐漸消亡。不過就環境方面而言，匯總為「可持續發展」的命題，成為世界共同關心的問題。而科技用於軍備，不但沒有得到遏制，仍越演越烈。

隨後，美英等國又出現新型的公益模式。與上一輪運動的反體制性質不同，這一輪是政商學精英為主導，出於深切的對現有社會的危機感，提出以改革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方案。其他方面姑且不論，這裏只談與本文主題有關的，其中一個原則就是提倡「負責任的投資」，也就是在開始投資一項產業時，不僅要考慮利潤前景，首先要考慮社會效果是否有益於民眾的福祉。在以創新為口號，加速度發展的數字經濟時代，當然涉及新發明用於何處的問題。他們列入「不負責任的」投資有煙草、高度污染環境而得不到有效處理的產業，以及殺人武器生產， 等等。我曾問過這類公益組織的一位負責人，這種努力有希望遏制軍工生產嗎？他坦率承認前兩項可以有進展，就是軍工生產需求太大，目前還沒有辦法。總之，人類過早掌握了毀滅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創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競賽，誰個領先，現在還看不出有利的答案。

這些老問題還未解決，又出現新問題 ——人工智能。幾年前我聽過美國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一個報告，他說我們好像坐在一輛加速的火車上越跑越快，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是甚麼，這很恐怖。最近，上海一位科普學家江曉原發表一篇文章：「為甚麼人工智能必將威脅我們的文明？」提出的問題更加嚴重。撇開他提出的更長遠的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不談，最現實的近期威脅，一是大批失業、二是失控的軍事化（詳見《文匯學人》，2016 年 7 月 29 日）。前者很好理解，大量的工作，包括一部分腦力勞動都能由機器代替，所淘汰的人力與工業化時期是無可比擬的。關於軍事化， 過去對於發動戰爭的制約力量是「我方」也要付出犧牲，因此需要計算力量對比是否值得。如果有一方人工智能軍事化遙遙領先，完全用機器代替，己方可以達到零傷亡，這種誘惑力更難遏制，後果難以設想。

至於克隆人、從試管嬰兒發展到脫離母體的孕育胚胎……種種過去匪夷所思現在可望實現的「新發明」，不知伊于胡底， 對整個人倫觀念可能發生的顛覆性後果，若干年後，人將不人，這些，人類都準備好了嗎？

這些考慮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百年來有識之士的憂慮的延伸：人文思考、人掌控自己的能力趕不上科技創新的能力。對社會的弊病不可能發明一種像盤尼西林這樣的特效藥，也不可能製造出甚麼精神原子彈來對付足以毀滅人類的各種武器，非理性的權力野心和利益誘惑與飛速發展的高科技相結合將把人類引向何方？思想先驅和仁

人志士的奔走呼號能與之相匹敵嗎？

2016 年 10 月

閑話過敏症

今年春來不算晚，乍暖還寒，小園已經一片花紅柳綠， 煞是宜人。但是本人卻害起嚴重的皮膚過敏症，動不動到處泛紅，奇癢難忍。整天奔波於尋醫問藥中，平添煩惱。根據我的經驗，循例測過敏源是沒用的，因為這是一種普遍的病，醫生說，現在正是過敏季節，許多人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症狀。好像源頭到處都是，避不勝避。只有通過藥物、適當的生活方式， 增強免疫力。少吃通常都知道刺激性的食物，如辛辣、海鮮、酒等，好在我本不好此。不過我還是有信心能渡過此難，一方面積極治療，一方面照常工作、生活，轉移注意力，也就不太痛苦了。近有好轉跡象，想必雖然來日無多，尚不至於以「過敏體」終老。

由生理性的疾病想到精神層面，另外一種我們耳熟能詳的詞「敏感」，其廣泛的用途為我國所特有。話題、詞語、人名， 乃至日期，都可以冠以「敏感」，這個詞的含義本身也屬於「敏感」，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話題一列入「敏感」，就說不得。每年到某個被定為「敏感」的日期就如臨大敵，似乎隨時會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死人則堅決在一切可能出現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裝作此人不曾存在過，以至名字被刪、照片搞換頭術，歷史被歪曲、改寫，或乾脆留白。活着的被「敏感」人物，輕則封殺其言論空間，重則「上手段」，總之是部分或全部剝奪其公民自由權。至於「敏感」話題，多得不勝枚舉，而且無明確標準、無邊緣，無理可喻。多數「敏感」話題恰好是民眾所關心的熱點事件。大家越關心，越說不得。例如汶川地震期間，我親自遇到過文章中有「敏感」詞不得上網，卻不告訴你是哪個，自己揣摩刪來刪去，最後發現，原來是「豆腐渣」一詞，刪去後，即放行。這還算是臨時性的。

有關詞語或人物，是由何人、為何、如何診斷為「敏感」的？從無明示，全憑猜測，或根據國情心照不宣。「涉言」單位（此詞是我杜撰，套用「涉外」單位）經常收到一份名單，層層傳達，需要公開執行，但指令卻是「內部」，公開是不承認的。更經常的是從業者忽然接到匿名電話，就某篇文章，某本著作提出警告，發出查處指令，卻不得追問通話人姓名、單位，甚至不得保留電話紀錄（即使有，也沒人認帳）。但是如果以不辨真偽為由置之不理，事後的懲罰可是動真的，毫不含糊。甚至於這一做法本身也是不能公開言說的「敏感」話題。

仔細想來，這個詞的運用本身語法就不合邏輯，是主語與賓語倒置。誰「敏感」？例如被定為「敏感人物」的人，自己並沒有患過敏症，死人當然不會。至於詞語、話題更不會有知覺，那麼「敏感」的主體是誰呢？是某些主體見了這些名字或詞語就觸動過敏神經，做出了異於常人的反應。那麼「敏感」的應該是這個主體而不是那個客體，客體是特定主體的過敏源。需要治療的是患過敏症的人，或者自己迴避某些特殊的過敏源 ——例如我注意不吃海鮮，但是不能反對別人吃海鮮。然而，恰巧患過敏症者諱疾忌醫，而又手握一種不知哪裏來的無邊的權

力，自己對甚麼過敏，就強迫全國人都一起過敏，不得接觸他的過敏源，甚至乾脆禁止其出現，眼不見為淨。而患者又是隱身的，是「看不見的手」。不幸病情日益沉重，發作不分時間季節，「敏感日期」越來越多，連接一片，成了常態，彌漫於空氣之中。從對少量事物過敏，到範圍日益擴大，只見年年增加過敏源，而少見宣佈某事、某人「脫敏」的。於是苦了絕大多數的健康人，陪着一起「敏感」，生活日益貧乏，空間日益狹窄，眼巴巴望着別人享受各種營養豐富的美食，徜徉於寬闊的天地，練就健康體魄，對偶然的病毒也有強大的抵抗力。

在此情況下，在容易出現對此類「過敏源」的領域，從業者可以有兩種反應：或練就一副更加過敏的神經，不待指令， 體會上意，主動自律，主動擴大過敏源，確保安全，其結果肌體日益萎縮，所耕耘的園地日益荒蕪；或相反，逐漸產生抗體，前仆後繼，在風不調、雨不順的氣候中開闢一片抗過敏植物園，自成風景。前一種如成為主流（好像真有此趨勢），則不僅是少數領域，將使我泱泱大國整個成為一個「過敏體」， 民族精神日益萎靡。後一種則要做好各種程度的磨難、犧牲的準備，考驗着從業人員的良知、勇氣和擔當，卻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過敏是一種病，我認識過一個孩子，天生對雞蛋、牛奶、花生等等營養豐富之物都過敏，令家長發愁。醫生提出的方案是不完全迴避，而是反其道而行，把過敏的食物一點點加入飯食，開頭極小劑量，讓他承受一下，然後慢慢加大。當然有時過量一點也會發病，但不會致命，過了這個階段承受力加強， 果然此兒不再過敏，變成一個正常兒童，能夠正常的吸收營養，健康成長。我想此法也許適用於治療其他過敏頑疾，像那位醫生一樣，逐步推進。當然，這個分寸和劑量應該怎麼掌握，有賴在夾縫中求生存的高超智慧和藝術。如果一味迴避而不推進，則整個肌體將日益衰頹，直至弱不禁風，不堪一擊。

更可怕的是，真話和真相成為彌漫性的過敏源，出於生存的本能，大面積人群產生一種惡性抗體，乃至基因發生變異，　說謊、造假不臉紅，面不改色心不跳 ——也就是對謊言、惡行失去敏感知覺，於是羞恥之心蕩然無存。據說中國人對於含毒食品、霧霾空氣耐受力強於「嬌氣」的很多國家的人，人家不能忍受的，我們安之若素。這是物質層面的的，其來源在於造假者先失去對假與惡的「敏感」知覺。然而精神文明事關民族興衰的大業，對善惡、是非、真假、美醜失去「敏感」後，我中華民族基因將產生怎樣的變異？危乎哉！

2016 年 4 月

又逢「三八」

腦海中首先跳出來的題目是「三八節有感」，但與一位已故著名作家的著名文章重複，遂改用本題。不過我確實有感。

近日檢點文集，發現我過去寫過多篇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第一篇發表於 1994 年，距今已二十年，最後一篇是 2011 年，都是對當時的現象有感而發。二十年來，我為之感慨萬千，耿耿於懷的問題不但未見消解，而且有些現象變本加厲。而這些文章卻未像我其他有些言論那樣引起關注，所以借三八節之機再次陸續發表於此，稱之為「婦女系列」。今天先發一篇最新的感想，主要重點是婚姻觀。

先從最近流傳的，後來據說是虛構的那個上海女孩與江西農村男孩的故事[17]說起。事實也好，虛構也好，此故事引起熱議所湧現出來的各種觀點卻很有現實意義，因此也觸發我有話要說，就借此機會說一下。此事有多個層面和角度，這裏姑且撇開「嫌貧愛富」、「門當戶對」、城鄉關係之類的問題，只從婦女觀的角度來談。

網絡中出現的評論林林總總，我注意到一句話：「我要有女兒也絕不會把她嫁到這種人家去受苦」。這句話極有代表性，聯想到一段時間以來流行的所謂「女兒要富養」之說，所以可以作為標本剖析一番。首先，天下父母都希望子女生活富足，免於受窮，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姑且以「不受窮」為目標， 分析這句話中的多層邏輯：

（1） 不承認年輕人婚姻的獨立自主，把它當作兩家父母的事，而不是兩個人的事。口氣斬釘截鐵，主角不是女兒，而是父母。不是女兒找丈夫，而是父母「嫁」女兒。當事人的意願與感情可以忽略不計。

（2） 不指望女兒靠自己賺錢過富足的生活，而是靠有錢的夫家。就是說，做父母的責任不是培養女兒自立、自強，提高經濟收入的本事，而是為她鋪好依附別人生活的路。

（3） 結婚的對象是「夫家」，而不是丈夫本人。這位男青年本人的人品、學識、能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家當前的境遇，引申而言就是不指望他有白手起家創業的能力，而指望他有啃老的條件。

請看，從邏輯推理，這一句簡單的話中包含這麼豐富的含義。非是我吹毛求疵，而是這的確是當前流行的觀念，非常有代表性。婚姻又回到了父母之命 ——不但父母，而且是祖父母，還有七大姑八大姨都有發言權。所以有這麼多「逼婚」之事，以至於許多在外求學或工作的青年不敢回家過年，甚至出現了出租男友、女友的職業。家庭倫理觀發展——實際是倒退 ——到這一地步，還不荒唐嗎？

從根本上講，男女從兩情相悅進而組建家庭，應該是自然的感情升級的過程，媒妁之言 ——也就是今之「婚介」，只能是輔助手段。但是從社會風氣來看，卻成為主要的途徑。而且以外在的、物質的「硬條

件」為主，感情因素邊緣化了。君不見電視上多個與相親有關的頻道，不斷地宣揚此類婚姻觀。我偶然轉到一幕，只見一個小夥子戰戰兢兢地對一位大媽說自己深愛她的女兒，一定會對她好云云，那位大媽氣勢洶洶地指着他說，你連房子都沒有，拿甚麼對我女兒好？你這種情況還敢追求我女兒，就是最不負責任，我堅決堅決不能同意（大意， 原話還要潑辣，我記不清了）。那個女孩眼淚汪汪坐在那裏， 一聲不吭。這是非常典型的一幕，堂而皇之在電視上播出，也不見下面坐着的聽眾（大概是事先組織來的）有甚麼異議。這不是買賣婚姻是甚麼？現在政策開始開放二胎，我經常聽到議論：如果第二胎生個女兒還好，如果還是男孩，那可要傾家蕩產了。這當然是為以後成家着想，男家是買方，女家是賣方。方今充斥於電視的《非誠勿擾》之類的相親節目，以及家庭倫理劇，正在潛移默化地傳播這種婚姻觀。

至於甚麼「情投意合」、「休戚與共」、「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還有影視劇中常見的跨國界、跨時代的摩登婚禮，從外國教堂牧師那裏搬來的誓言：「不論富足還是窮困，不論健康還是生病……不離不棄」，云云，在現實中還有多少地位呢？

中國婦女爭取獨立平等的地位少說也有一百多年了。也曾經取得了不少成就。為甚麼在經濟空前繁榮發達的今天，在社會觀念上卻如此倒退呢？紙上的傳統文化崇尚「中庸」，而我們卻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曾經一度「不愛紅妝愛武裝」，女子都穿軍裝；「鐵姑娘」到處飛；不顧生理特點強行從事高強勞動，如扛大包、掄大鎬等等。忽然跳到另一個極端： 女性以色悅人，以色事人，重貌不重才，甚至無才便是德。過去賣身是被迫，其中情節血淚斑斑，現在各種級別的性交易登堂入室，兩廂情願。愛美乃人之天性，但現在似乎女子對天生麗質高度不自信，以致催生出畸形的整容業，對身體髮膚大動刀斧，有些做法的殘酷程度不亞於過去的纏足，只不過現在是自願的。「女為悅己者容」。中國語言以模糊見長。這句話中

「悅己」二字可以是主動，也可以是被動：為自己喜歡的人而打扮，還是為喜歡自己的人而打扮，或者是為爭取別人喜歡而打扮。從各種化妝品和時裝的廣告所宣傳的主調來看，大概是後者 ——慫恿女子為爭取男子的注意而打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無可厚非，但是走到極端，基於不平等的「被悅」的角色定位， 再雜以金錢物質的因素，就變質為待價而沽了。

從晚清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與中國的現代化同步的，男女平權是新文化運動的題中之義。今天在法律上的權利和地位當然是婦女自己奮鬥的結果，但其中佔據社會主流地位的男同胞的貢獻也不可小覷。早期的革新先驅（當然大多數是男性）為婦女解放鼓與呼，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有大量著作為證。這點可與美國黑人解放運動中白人的作用相比 ——從反對蓄奴到漫長的民權運動中，處於優越地位的白人先驅的參與，乃至犧牲，不可或缺。美國白人的民權鬥士和中國改革先驅的共同點是忠於自己對自由平等的信念，而不是在維護自由平等的同時有選擇地保持自己既有特權。當前這種倒退的、腐朽的婦女觀、婚戀觀，看似來自市井氣的準丈母娘之類，實際基礎是佔領主流地位的

男子的自私、審美觀中精神追求的缺失。婦女平權問題尚未得到宣揚自由平等的袞袞諸公的關注。甚至有些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處在革新前沿的思想者、「意見領袖」，在這個問題上卻態度曖昧，麻木不仁，甚至不知不覺間流露出的也是那種腐朽的觀念，有些人在生活上也未能免俗。迄今為止，我看到的當代學者發表過的文章言論中，關注婦女問題，繼承了五四新文化精神，而且透徹到位的，惟有舒蕪，而他也已經作古。當然，我的閱讀範圍有限，應該還有遺漏，希望知者補充、提示。前面提到，本人不少言論和文章受到關注，引起共鳴；但是關於婦女問題的言論卻鮮有回應，偶然收到讀者反饋，也完全是女性。

本文評論的是一種觀念。並不否認在實踐中某些方面的進步。有一點不可否認，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婦女地位有較大的改善。主要由於廣大婦女能外出打工，靠自己的勞動有了經濟收入，不但能自立，而且對家庭有所貢獻，自然地位和自主權與以前大不相同。這個變化是比較明顯的。就以家政服務來說，過去保姆是被人看不起的職業，多年來，大批農村婦女到城市從事家政勞動，不但提高了這個行業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而且對自己家庭和家鄉的經濟都有所貢獻。前些年聽說安徽無為縣的保姆已經成為一種品牌，而且她們打工寄回家鄉的錢已足以使貧困地區脫貧。這一轉變是有重大意義的。

我不是社會學家，僅從自己目光所及談一點感想，深入、全面的實情以及現象背後的所以然，還有待社會學家去調研。從來男女平權問題與全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分不開的。很難想像有一半人口的平等地位得不到事實上的承認，籠罩於一種落後、腐朽、畸形的觀念中，這個社會能侈談先進文化。

2016 年

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18]

我之所以被邀請到這裏來講話，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 2008 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云云。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傳統文化抵制所謂的「西化」無關。更不贊成那種讓小孩子穿着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現在講講我對學中文的看法，並且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學中文的經歷。

中國人為甚麼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係。一個中國人除非在外國生長，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為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麼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係。

中文（我這裏指的是漢文）有兩大特點：

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於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非常複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大家都歸功於秦始皇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於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既然是中國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準。

另一特點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並已融入日常話語中， 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範，應該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設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級），其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初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後無論學甚麼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個人的經歷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隨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高層的醜聞，裏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牆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麼還知道「牆有茨」？「牆有茨」出自《詩經》， 開頭就是：「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以後「牆有茨」就隱喻宮裏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醜事。過去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而對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個很尋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齡比我大約小六七歲，也就是說他是在 1949 年以後上的中學。在他看來，只有他那樣的古詩詞專家才懂，一般人，特別是學外文的，怎麼居然還懂這個詞？這說明有一個差別，就是我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的，在現在的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因為我在改革開放以後初訪美國，遇到台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 談吐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甚麼差別。

我的中文薰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三歲的時候， 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裏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甚麼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前兩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 好像常州的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大概常州有一些詩人和文人特別積極去爭取申遺，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吟詩的特點。還有朗誦文章，也是有調子的。（後來據徐冬梅老師說現在正在申遺的是整個中國的吟誦，不是常州單項）。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讓我唸《論語》，只是挑一

點，不是唸很多，也不逼我，就讓你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初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鑒》。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產生很大的興趣，於是對《資治通鑒》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鑒》是怎麼樣的一套書。特別是小學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碰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裏頭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體情節，他怎麼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鑒》，總之他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鑒》（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沒事做，就開始出於好奇， 真的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鑒》。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着看。書裏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他得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裏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甚麼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後，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乾爹的意思，不過不是正式的。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 50 歲。他非常有學問，甚麼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甚麼老師都能補上去。當然他英文發音不好，全是自學的，但是文法講得特別清楚。他還會中醫，我們家人小病都是他給開方子。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於他恃才傲物，好頂撞領導，所以在一個單位呆不長，經常失業，相當潦倒。他一失業就常來我們家吃飯。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　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他說你的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於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鑒》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裏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疲於奔命」這個成語典出何處？

《左傳》裏頭有一個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莊王底下的一個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並不高，但是點子很多，給楚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對楚莊王成就霸業有所貢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到處征伐。有一次滅了陳國。這個陳國有一個大美人叫夏姬，據說她青春永駐，無論長到幾十歲永遠「望之如二十許人」。那些公侯們打來打去，爭奪她也是動機之一。所以她轉嫁了好多國。楚莊王滅了陳國以

後，也想把這個夏姬娶過來，巫臣就勸他說，你本來伐陳是「伐不義」（霸主總要給對方安個甚麼罪名才師出有名，我忘了陳國是因何獲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給娶過來了，這不顯得你是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義上就站不住了。那個楚莊王確實有雄心壯志，就聽了他的勸告，沒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勸他說，這個女人不祥，是個妖孽，你看她嫁了幾個國家，亡了幾個國家？於是子反也聽了他的，沒娶她。最後這位老兄自己帶着這個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晉國（其中還有一些曲折的情節，不詳細講了）。另外他因為別的事得罪了楚莊王另一個弟弟子重。那兩位公子氣得要死，要求楚莊王向晉國要人，誅殺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引渡。那楚莊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較大度，說巫臣也算立過功的，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罷。不久，楚莊王死了，楚共王繼位， 子重、子反兩位公子權力就比較大了，還是覺得這口氣非出不行，於是把巫臣還留在楚國的家屬全給殺了，包括他的旁系親屬。巫臣知道後很生氣，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叫你們兩人

「疲於奔命」而死，疲於奔命這個詞就是這麼來的。他怎麼做到呢？他就今天攛掇晉國聯合吳國跟楚國鬧事，明天又挑撥鄭國尋釁，不斷騷擾楚國各個方向的邊境。他本來就鬼主意多，弄得這兩位公子在國境內外來回奔波，「一歲七奔命」，就是一年裏頭七次出國，或是到邊境。現在交通發達無所謂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這麼一個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這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玩，而且那個申公巫臣也是一個特別好玩的人、特逗，還有很多有趣的事。

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來了。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 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也還是一知半解，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很多地方我還得看註解。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薰陶，也沒有人逼着我去這麼做，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唸《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給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 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 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後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裏英文讓位予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有些「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這樣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這裏不講了，只講中文教學。它對中文特別重視。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大狗叫，小貓跳，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琅琅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着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將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學《論語》，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 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準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幹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應該說我對於《說文解字》一點都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中國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裏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 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挑着唸一點，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唸。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於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於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麼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於老師，不管我家裏碰到的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我想起來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範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教甚麼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欣賞得不得了，甚至於自己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準備考試，我必須要怎麼樣。所以我就覺得有人說「五四」以後文化斷裂，我

覺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到是沒有斷裂的。

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 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於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甚麼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後給我。但是他 1950 年調往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鑽進去弄得灰頭土臉，着實狼吞虎嚥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 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 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誌裏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後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裏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屬於「少年不宜」了。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鬆，放學後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干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着甚麼看甚麼，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薰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遊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薰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甚麼叫「文化底蘊」。

文字是思想的載體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懷， 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麼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甚麼感染和影響呢？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態度， 以及甚麼可以做，甚麼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

不是從書本裏頭學來的。今天回頭來看，讀的那些中國書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士大夫的憂患意識

我所生活的時代經歷的戰亂特別多，無時無刻不伴隨着內憂、外患。我成長的最重要的時期是抗日戰爭。所以文天祥、岳飛、辛棄疾、陸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別往心裏去。像「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總之是痛感國土淪喪，總是想着要恢復國土是吧？還有杜甫寫離亂的詩，等等。這個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講了。

厭戰、渴望和平

中國幾千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戰亂不斷。所以文學作品中這方面的內容很多，而且很動人。我小學六年級最早讀到杜甫的「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就有一種感動。還有像「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詩也很少人記得，但是這句話流傳千古，因為太寫實，太深刻了。很久以後，我見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寫的小書，題目直譯是《將軍們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戰爭中戰死沙場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將軍們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問我，對這個題目有沒有恰當的譯法，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後來這本書是否有中譯本，我不得而知。

還有兩句名句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當年程硯秋曾經排過一齣戲，就叫《春閨夢》，用的就是這首詩的意境，一位少婦思念遠征的夫君，夢裏相逢，其實他已經戰死了。程硯秋是京劇演員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勝利後四十年代後期排這個戲，但是被國民黨給禁演了，因為那時已爆發內戰，這種反戰劇影響士氣，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這齣戲，還是沒有被批准，因為在「鬥爭哲學」統治下，「和平主義」自然在批判之列。從古到今，普通人受戰爭之苦， 追求和平，與統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動心，對戰爭的殘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戰最徹底的是《吊古戰場文》，那也是我在中學時期讀到的：一開頭就氣勢非凡：

「浩浩乎平沙無垠， 不見人，……亭長告餘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作者感歎「傷心哉」！ 緊接着就問是秦、漢還是近代？其實都一樣。以下大段文章歷數自古以來的有名戰役，想像戰場的殘酷和慘烈景象，結論是，秦起長城，漢擊匈奴都使生靈塗炭，因此「功不補患」。把那些帝王的「豐功偉績」都給否定了。最後一段有幾句簡直是撕心裂肺，我永遠難忘：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

老百姓活着的時候得到過甚麼恩澤？現在他們犯了甚麼錯，就這麼給殺死了？而且「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說家人對他們的生死還不明，連弔祭都不知到哪裏去吊，死者不知魂歸何處。這是一種甚麼樣的悲慘境界？最後只能歸之於命，從古就是這樣，「為之奈何」。這篇文章對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徹底。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們是享受不到勝利成果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血淚之作，是對「一將功成萬骨枯」最好的詮釋。

民間疾苦

民間疾苦其實和戰亂分不開，老百姓除了賦稅之外，還有一項沉重負擔是服徭役，就是徵兵，或者勞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教科書經常選的。我現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有好幾十首，每一首詩都是講一種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藝者或者農民，寫社會的各個方面， 覆蓋面極廣，而且都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和宮廷、權貴的那些窮奢極侈享受作對比。作為詩，文字非常美，在形容各種美麗的東西的時候，既寫實又浪漫，想像力十分豐富，然後最後總有點睛之筆，點出他要表達的感慨和悲憤。

我稍微用一點時間以《繚綾》為例，這是我特別欣賞的《新樂府》詩之一。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這四句開頭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嘩！一大匹白緞子掛下來，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綢緞，而是有本色花的織錦。然後接着是甚麼呢？就是宮裏來加工訂貨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綾子給染成綠的了，「天上取樣人間織」，該有多美！花色織好以後，就要做成衣服了。這裏第一次點出：

「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就是誰來穿？是皇宮裏的宮女。誰來織呢？是江南貧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講怎麼裁剪製成衣裳：從「廣裁衫袖長制裙」，到「轉側看花花不定」這四句是講製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寬袖長裙，簡直漂亮極了。「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值千金」。皇帝把這賜給跳舞的宮女了。但是這麼精心製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無惜心。」就給弄髒了，腳底下踩着，毫不愛惜。最後，白居易教訓那些宮女：「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紮紮千聲不盈尺。」對這個「紮紮千聲不盈尺」，我有一個體會，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幹校的時候，在河南農村，那裏冬天婦女都織布，還是用那種相當原始的織布機，面幅很窄，她不是用絲線而是自紡的棉線，織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個冬天織不了多少。我經過老鄉門口，聽見「卡拉塔、卡拉塔」的聲音就想起白居易的「紮紮千聲不盈尺」。這首詩最後結尾是：

「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我舉這首詩，因為它比較鋪陳、辭藻豐富，那些對織錦的描述簡直美不勝收，同時對「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躍然紙上。當然這種情況貫穿在很多首詩中。只能很簡單地再舉幾個例子。

例如《紅線毯》，也是宮裏的加工訂貨，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別美，又厚又軟，到甚麼程度？「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人踩上去整個腳就陷進去了。還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織成跟宮裏的大殿一樣大，卷都卷不起來，「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想像一下：這麼大一塊地毯，一百個壯漢抬着它，從安徽一直走到長安，這是一個甚麼景象？宮裏頭特別喜歡，於是乎就「年年十月來宣州」，然後「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他特別的賣勁，討好，這是「政績」啊！最後白居易教訓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這個幾句話擲地有聲，非常尖銳。

《輕肥》，比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權貴們的宴席，全國各地的珍饈美食，吃得酒足飯飽。最後兩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對比，有極大的震撼力。

還有《賣炭翁》，這篇好像課本裏頭常選的，不多講了，不過我還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為之心酸的，就是「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我們設想一下，那個老頭兒， 在冰天雪地裏穿着單薄的衣服，還希望天冷一點，炭能夠賣個好價錢。但是最後這個希望也落空，這裏市場規律不起作用， 他那一車炭全被「權力」搶走了，只扔給他兩段綢子。這個比城管對小販還厲害。

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幾乎都是這樣子的，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對那些奢侈的東西都是形容得特別美，對比出另一種人的悲苦，更加觸目驚心。還有一個特點是他所譏刺的不是一般的達官貴人，而是直指宮廷。如《繚綾》、《紅線毯》是為宮裏的訂貨，《輕肥》一開頭就指出那些驕橫跋扈的人，「人稱是內臣」。這「內臣」不是正經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邊工作人員」，其實就是太監。可是他們還穿着文武官服，到軍中去赴宴。我覺得那時的白居易確實是有點書生意氣，有點膽量的。他不是一首兩首，而是那麼多首，從各個方面譏刺當朝，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針對別人，自己還有反省，例如《觀刈麥》，由農民的辛苦想到自己優越的生活。

有人批評白居易的詩像順口溜，太淺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來他寫的這些詩不是為在士大夫中間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讓鄉下老太婆都聽得懂的。我這個城裏老太婆也特別喜歡。我覺得一首詩不論深淺，主要是給你以美感。我前面說了，他的詩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樣人間織」這樣的詞，誰想得出來？順便說到，我對現在許多流行歌曲不欣賞，先不說音樂，單說歌詞，不是因為它淺顯易懂，而是因為它不知所云， 又沒有文采。不論是詩還是文，為甚麼要晦澀難懂才算有學問，有深度？

還有人說他虛偽，就是他那麼關心民間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奢侈的，他家裏曾經養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專場，不對他做全面道德評價。現在就詩論詩，至少他所有寫的都是表達真性情。他如果沒有認真觀察和實際的體驗的話，是根本寫不出來的。如果他沒有和賣炭翁交談過，他怎麼會知道他「心憂炭賤願天寒」？而且他關注很廣，每一個行業的操作程序和特點，他都寫得出來，他如果沒有對那些勞作者就近觀察，沒有深切的同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動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寫這個不可能是為了沽名釣譽， 像現在似的，在媒體宣傳，樹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不論如何，就詩而言，琅琅上口是優點。特別給低年級學生選詩，白居易很適合，既有美感，又培養同情心。我這裏只講了白居易，其實如杜甫有許多詩儘管是近體詩，格律嚴謹，也是琅琅上口，很容易記住，就沒有時間多講了。

政治和愛情難以區分

中國對於古詩詞的解釋，常常就是愛情和政治不分的，自從屈原的《離騷》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來，後世解釋詩詞常常把貌似講戀情的詩作政治解釋。是失戀，懷念情人，還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寵？我曾有一篇文章說過，中國的士大夫對皇帝有一種單相思的情結，老是在那兒望着金闕之上，希望皇帝對他有所青睞，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見。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很多詩就是愛情詩，後人硬要把它說成是政治詩，比如《詩經》的《國風》是吧？包括第一首「關關雎鳩」，朱熹就說他是講文王后妃之德，其實人家就是談戀愛，《詩經》裏頭有好多就是談戀愛的詩，而且是那時候的大白話。可是後來的道學家要加入政治和道德的因素。因為孔子說詩三百「思無邪」，道學先生們認為男歡女愛就不算「無邪」， 總要加入點政治，有些就比較牽強。但是有的詩確實也有所寄託，說得很含蓄、模糊，讓人去猜。李商隱的詩就有點這個味道。他的詩非常美，但很難確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朧詩。我剛才說我喜歡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時我也喜歡李義山的朦朧之美，就是那麼一種意境，讓人無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現在我想舉一個陶淵明《閑情賦》的例子。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讀過，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讀起來很美，如果變成白話，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領子，但又怕晚上脫衣服離開你的身體，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長，老不天亮。接着一連串的願附在那人身上各個部位，例如「願在髮而為澤」，就是做頭髮上的頭油，又怕人家愛洗頭，一下子隨着髒水沖掉了，「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覺就把鞋子脫在床下了……。這《閑情賦》是課本裏不選，師長不會教的。《昭明文選》裏也沒選，那位梁太子蕭統看不上，他還說過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是把它作

為陶淵明的瑕疵來看，也說明這位昭明太子還是脫不了道學氣。我最初看到這篇賦是在高中時，同學裏面偷偷傳看的，雖然沒有人說這是禁書，但根據當時的標準，這就接近「豔詞」了。所以我們幾個同學感到很神秘，偷着樂，那十個「願……」常成為我們幾個人說悄悄話的內容。從通篇來看，陶淵明見到了一位女士，只是遠遠望着，對她產生遐想， 於是天天去等她，也沒等着見一面，純粹是單相思。

但是對這篇賦還有一種政治上的詮釋，說是抒發他官場不得意。我怎麼看怎麼不像，因為陶淵明還寫過一篇《感士不遇賦》，就是講自己懷才不遇，講得很清楚，說當時衡量人的標準不是以才論，而是顛倒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懷才不遇。那篇都寫明白了，何必再寫這麼一篇用愛情來假託政治上的賦呢？何況從陶淵明的志趣來看，已經擺脫了對官場的眷戀，更不會像追情人一樣那樣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這是我的看法。陶淵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 如此而已。只是他想像力特別豐富，別人寫不出來。

隱逸情懷，逃離官場

這更加避不開陶淵明，他絕對是這種情懷和這種文學的代表人物。不為五斗米折腰已經是通俗典故。無論哪個時代，大概中文課沒有不讀《桃花源記》和《歸去來辭》的，還有《五柳先生傳》。我在〈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一文中說過，中國讀書人一方面對君王有一種單戀之情，但是有個性有才華的人又難長久在官場得意，所以留下來的優秀傳世之作，大多數是失意時候的作品，多表現隱逸情懷和內心藐視權貴的傲氣。應該說並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時候都堅守獨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現在文學作品裏的，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頌德之作，奉命文學以及湊趣的宮廷詩，大多被時間所淘汰。

我個人印象較深的，從孟子開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可愛。他見梁惠王、齊宣王，把他們訓得一愣一愣。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說，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視，別看他們那麼神氣活現的樣子。比較突出的是魏晉六朝風骨，這方面著作已經很多。我個人接觸到魏晉六朝文章時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間，是反叛的年齡，內心對他們非常嚮往。對《世說新語》裏那些故事、特立獨行的作風和充滿機智的俏皮話特別入迷。跟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在一起，經常談論竹林七賢， 很想仿效他們的做派，當然實際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較近，那時當然不存在污染問題。我是在大城市長大的，對古人悠遊山林十分羨慕，也就對所謂「隱士」很感興趣。從東漢、魏晉以來由於亂世，隱逸成風，但是

「盛世」也有不少讀書人不願做官而隱居的。孟浩然是一個。有一個詞也是我中學時候聽到後，覺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後來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遊岩，做了很短時間官就躲到山裏隱居起來，唐高宗親自登門拜訪，問他身體如何，他說「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絕症，離不開山林了。還有像南宋朱敦

儒的的幾首《鷓鴣天》是我十分欣賞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雨支風敕，屢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賞的是最後一句。後來發現毛澤東也寫過「糞土當年萬戶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懶得做官，逃離政治；而後者蔑視萬戶侯是最終要消滅他們，自己稱王。完全兩碼事。

今人不可能多讀古文，但不可不讀

我拉拉雜雜講了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學中文的經歷，和我自己的一些體會。諸位都是專業的中文教師， 我可能班門弄斧。我的體會算不上學術觀點，純粹是個人的感受，一得之愚。舉例也是掛一漏萬，免不了片面性。我決不是提倡現在的小學生花很多時間大量學古文，更不提倡讀經。我要說明的是作為中國人打一點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一種薰陶，不是作為實用的工具。有這個薰陶和沒這個薰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審美的品味是不一樣的。然後在接納外國文化時，在取捨之間你的品味也是會不一樣的。而且中國文字、文學有那麼豐富美好的東西，身為中國人，如果不知道欣賞，該多可惜！

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我的舊學根底不算深，而現在的年輕人甚至要學我學過那些也沒有那麼多功夫。只能淺嘗輒止，就是像到了一個精品店裏，琳琅滿目， 你瀏覽過，知道有這種非常精緻、漂亮的東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買過來，但是你知道你看見過，以後想起來的時候知道還存在甚麼樣的東西。如果你只進過賣粗糙、劣等貨的商店，以為那個就是好東西，那見識、品味就是另一回事。進過精品店，有了這個見識，就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關於知識的古今差異，我少年時期已經感覺到了。我還可以講我自己的一個故事：我們中學時候暑假是不留作業的，只要開學的時候交一兩篇暑期讀書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讀甚麼隨便。有一年暑假我母親讓我讀王勃的《滕王閣序》。那文章實在漂亮。王勃寫的時候是 14 歲，有名的神童才子，卻英年早逝，活了不到 30 歲。我那時剛好也是 14 歲，少年輕狂，忽然覺得不服氣。我說他也 14 歲，現在我也 14 歲，他假如從三四歲開始認字，整天唸的就是古書，一天到晚就學寫這種文章， 那寫到 14 歲寫出這樣的文章來也不是甚麼太了不起。我現在光是中國歷史就要比他多唸一千年。我還得唸外文、外國歷史地理、數理化，等等。就是說，我會的東西他不會，他會的東西我不見得學不會，我當時就是這麼認為的，我就寫了這麼一篇文章。還批評他年紀輕輕就那麼悲觀，自歎「失路之人」，無病呻吟。這「無病呻吟」是我從那些「新文學」的評論文章中學來的詞，用上了，很得意。其實王勃的「誰悲失路之人」不見得是說他自己。那時就是少年狂。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與王勃同時代有多少讀書人，讀的同樣的書，也沒寫出《滕王閣序》這樣的美文來，所以王勃還是了不起。

不管怎麼樣，現在的小孩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現在那些層出不窮的新電子玩意我都玩不過十歲的孩子，所以學古典文學佔多大的比例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在於課本的編撰和老師的藝術，你怎麼選、怎麼教、怎麼給學生以美感、為他們培育文化底蘊，為以後進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礎。

現在一天到晚講愛國主義，其實愛國也不是空的，也不是專門為某一種政治服務。你有了這個薰陶，自然而然就對中國文化，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覺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鄉、你的故土、你的這個精神故鄉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來強制你，也不管是哪個朝代誰執政，都沒有關係，這是一種永久的感情。

當年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教授叫皮名舉，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讀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的偉大，不讀西洋歷史不知道中國的落後。」就是說你一方面覺得它非常偉大，你非常熱愛它， 但你必須承認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後了。他說這話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但是這個話我覺得甚麼時候都適用。說我們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後了，並不等於你不愛這個國家、不愛這個民族。因為你知道它有這樣的歷史，它有這麼美的東西，你已經欣賞了、你已經體驗了。但是同時你覺得你應該承認它有哪些地方是那麼不如人意，這就是為甚麼我特別維護魯迅的地方。現在有很多人在罵魯迅，但他的偉大和深刻也在於對我國我民深刻的認識。還有像胡適，表達的方式跟魯迅非常不一樣，而且後來政見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對國民的認識其實是相同的。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這些人，都是熱愛這個民族，但是同時他又特別深刻地感覺到它的不足之處。愛之深而慮之遠，而責之切，覺得它需要改進的地方太多了。

2014 年

人性·文化·制度19

當前的中國現實是：彌漫性的的腐敗從官場已經滲入各個領域，包括本該是淨土的教育、文化領域；行業失範，食品、藥品都可以下毒；各種傷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誕劇層出不窮。人人哀歎：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國人錢袋鼓起來而精神趨於空虛。面對這種情況，人們提出了各種診斷，開出各種藥方。爭論了一百年的東西文化優劣之論又興起，出現了「國學熱」。另一種極端是懷念過去閉關鎖國，在物資極端貧乏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在幻覺中想像似乎中國曾經有過人心樸實的一片淨土。

關於這個問題，本人自本世紀以來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如〈方孝孺與布魯諾〉本書 133 頁、〈重建精神的家園〉411 頁、〈文化與制度：雞與蛋的關係？〉400 頁，以及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論述。今天在這個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論述。過去已經寫過的，儘量不重複，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讀，但是有些重複是難免的。

人性

人性雙重論：義利之辨

性善、性惡是中外哲學、宗教的出發點，也是分歧很大的問題。本人是人性雙重論者，這是出於自己的經驗和觀察，不是來自哪一個學派或教派。「人之初」，就帶着兩種因素。《三字經》的第二句「性相近，習相遠」，非常精闢。在不同的環境和教養中，人可以發展善的一面，也可以發展惡的一面。在儒家的學說中就是「義」「利」之辨。荀子被認為是主張「性惡」的。但似乎並非如此。他有些話明顯是人性雙重論，例如：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這裏說得很明白，就是人性善惡兩面互相克服的問題。

「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

甚麼是人的最基本的先天的本性？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延續後代。所謂「食、色，性也」。不過這是動物的共性，是作為人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足條件。人之異於禽獸者，主要是有思想，而且不斷進化，從此演化為萬物之靈，所謂「靈」就代表精神。派生出羞恥之心、善惡是非

觀念、美醜標準、發明創造的能力，等等。離動物越來越遠，成為萬物的支配者，脫離野蠻原始狀態走向文明社會。與其他動物相比，在各種器官中大腦最發達。

這裏舉一段我個人的經歷。1949 年以後「思想改造」，從學社會發展史開始，樹立勞動創造世界的觀念。猴子為甚麼變人？因為前肢發展為手，可以勞動，製造工具。從這裏引申開去，只承認體力勞動，而把腦力勞動歸入剝削，狠批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到「文革」時達到極致。在 1959、1960 年「大躍進」造成的饑荒時期，我們在北京，倖免於餓死，但是也有挨餓浮腫的經歷。肚裏沒有油水，總想吃肉而不可得。在此期間我正好讀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中提到，肉食大大促進了人的腦髓的發展，他說，「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還有發明火，吃熟肉，縮短了消化過程，更利於大腦吸收蛋白，促使人類進化。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東半球的人比西半球的人進化得早，是因為更早有畜牧業，以乳肉為主，而西半球的人還是以植物為主要食料，所以腦子比西半球的人小。我對這點印象極深。因為這是與我們自 1949 年以來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相違背的。同時也心中比較舒坦，因為我那時常常想吃肉（葷菜），自己覺得很慚愧，這段話似乎使我這種欲望取得了合法性。那個荒唐歲月，連吃肉也要從革命導師那裏找到依據（！）總之，不管恩格斯怎麼說，人大腦發達，從而有思想，是有別於動物的特點，這大概是不會錯的。實際上，手的勞動也要受大腦的支配。

人與生俱來的本性

（1） 首先是要自由。從觀察嬰兒對捆綁的掙扎到古今中外以監獄（剝奪人身自由）為懲罰，說明愛自由是天性。但這也是動物的共性，把鳥獸關在籠子裏，也不樂意。所以人之有別於禽獸的自由首先就是思想自由， 是精神層面的自由。正是思想的自由馳騁，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明。

（2） 利己和佔有欲。從觀察嬰兒就可以看到，智力正常的嬰兒對自己喜愛的東西，都是抓住不放的。所謂「孔融讓梨」當然是後天教出來的。儒家把欲利當做「惡」，其實不一定。這本身是中性的，沒有善惡之分。但是用甚麼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就有區別。界限就在是否為利己而損人。因此，才需要定出許多規則來，劃定不損人的界限。社會越複雜，規則也越複雜。否則，人類社會就永遠停留於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野蠻狀態。這就是儒家所謂的「義」「利」之辨。也就是荀子所說「欲利」與「好義」，誰克服誰。

（3） 好奇：對不知道的宇宙萬物探索的興趣：發展成為科學、哲學，智力的開發。這種探索的動力也包括改善自身處境，尋求對苦難的解決之道。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些天性在不同的環境下有的受壓抑，有的發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到很遠。逐漸形成不同群體的個性。

文化

有上百種定義。這裏只從一般常識來講，不作學理上的探討。總的說來，文化是後天形成的。

共性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從古代走到現代的共同的方向。這是大文化，是全人類共同的：除了物質層面外，自由、公平、人道、和平、去惡向善，都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各種宗教都包含這一目標。各民族、各地區有先後之分，各自經過的道路可能不同，但是大的潮流是一致的。

周有光老先生說，他不信哪一種宗教，但是信仰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這也是一種信仰。

由此形成的倫理道德觀（現在叫「價值觀」），抽象來說，基本上是普適的。如果有差別，也是大同小異。勇敢對怯懦、誠實對狡詐、守信對背信、仁厚對殘忍、見義勇為對見死不救……。從抽象意義來講，各種宗教、民族的善惡標準都無不同，但是在具體表現形式與側重點上，隨地域與時代而異。對於個人修養的道德觀，大多數來自克服動物的本能，使之服從於一定的規範，歸根結底是避免自己的欲望損害他人的利益。這是第一層，可以稱之為「大文化」。

特性

我們現在提到的「文化差異」，大多數是指第二層次的：語言、文學、藝術、審美、生活習慣、風俗、禮儀……不同地域的各群體、民族從歷史上長期形成各自的傳統和特色，駁雜斑斕，可能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不可能也不必求得一致。正因為其不同，才使人類文化如此豐富多彩，世界如此有趣。實際上我們現在講傳統，講特色，最多的內容是這個層面的。

當然有些是與社會發展階段有關的陋習，隨着社會進步而自覺或被迫改革。（例如中國的婦女纏足、古羅馬鬥獸、近來廢除西班牙鬥牛也提上日程）。還有以取笑或貶低某種弱勢群體的藝術（如殘疾人、某個種族或職業），等等。這些隨着社會向着人道主義文明的發展，逐漸受到淘汰。

制度與政治文化

歸根結底，現在中國人糾纏不清的中西文化問題，實際上是制度文化。當前，官方把發展文化提上優先日程，高調唱響

「主旋律」，要以政權的力量建設「核心價值觀」，國家財政投巨資支持主流文化產業，並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強「軟實力」， 這一切都是為了與西方抗衡。

實際上，這是以文化問題掩蓋了制度問題。一個民族或群體在某一種制度長期統治下、薰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或稱之為「民族特色」；反過來，這種文化慣性又可以影響制度，或阻礙制度的革新。許多民間諺語，也是長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禍從口出」，是中國人長期在言論受到鉗制的制度下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的，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諺語；例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會在公民社會流行。

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皇權專制時間最長，在兩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維習慣，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處。例如等級觀念、重人治、輕法治，重官權、輕民權，重家世、輕個人奮鬥；熟人社會形成的親疏遠近的觀念導致對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維權，等等。

關於對自由的追求。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精英的追求，中國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樂業。這只是天性受到長期壓抑的結果。其實安居樂業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沒有創業、居住、遷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和台灣的居民為甚麼表現出比內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今天的內地居民肯定比閉關鎖國時期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實際上相對說來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許多看起來是「文化特色」，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時段內的制度造成的。對社會發展來說，在某一個時期文化是第一位的， 在另一個時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與文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詳細論證。

關於制度文化，這裏提出兩點大的概念：

政府和國家觀念

（1） 西方中世紀以前的「君權神授」和我國的「真命天子」、「奉天承運」、「打江山、坐江山」觀念：政權基本上是武力打下來，假託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僅是給一個人，而是給一個家族，所以祖輩打江山， 子孫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撥人用武力推翻之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就在於家族繼承，大家也都承認。在這種制度下，國君有生殺予奪之權。

（2） 現代的統治權民授的觀念。從古代到現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不必詳述。到十七世紀約翰 · 洛克集大成提出《政府論》，是現代國家的理論基礎。根據這一理論的邏輯：自然人本無政府，自然資源可以隨便取， 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勞動，就成為私有財產。由於需要保護財產，才推舉出一個或一些人管理，個人讓渡出司法權。所以管理者（即後來的政府）最主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父子是自然關係，

父母有撫養子女的責任，因而子女可以繼承財產。但是統治權力（power）不能繼承，一個君主死了，就應由民眾重選。被推舉出來實行管理的人沒有時間從事生產，所以人們公攤一些錢物給他們以為補償，這就形成納稅制度。

以上兩種不同的制度文化，對「誰養活誰」的看法是相反的。

過去的觀念是「食君之祿」，現代的觀念是由納稅人供養。納稅人是主人，所以必須監督錢是怎麼花的。「無代表，不納稅」。不過中國過去也有過「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之說。是個別官員的一種朦朧的覺悟。如果明確了誰養活誰的問題，足以顛覆整個「忠君」的倫理道德觀。

（3） 第三種國家觀念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中闡述的，而為前蘇聯和一批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所實踐：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不承認人人「平等」的觀念。一個階級有千百萬人，如何實行統治？通過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也不是那個階級選出來的，是自己組織起來自稱代表那個階級的。但是實際上政黨人數也太多，只能通過少數領袖實行統治，最後高度集中到一個人。中國「文革」時發展到全面專政，以林彪的名義提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是從第一種政權的觀念發展而來，權力集中達到登峰造極。為了把自己的觀念合理化，這種理論硬把第二種政體也說成是「專政」，說一切國家都是階級專政。其結果就是徹底否定了法律的權威性。由於這種國家只考慮到第一代統治者，以後的繼承合法性途徑始終沒有徹底解決。

法治還是人治

（1） 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觀念：百姓的幸福取決於「明君」、「昏君」還是「暴君」，或者掌權的宰相。不過人治的觀念在中國最長久、最發達，形成一種傳統文化。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成系統，其依據就是「以德治國」。孔子的理想：掌握統治權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為一的。他們應該以身作則，樹立一種風氣，然後「小人」風從。但是幾千年從來沒有做到，權力與道德從來沒有統一過， 因為孔夫子沒有想到權力缺乏監督是一定會腐敗的。事實上，歷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為裏，儒家為表。毛澤東一語道破：百代都行秦法制。

人治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效率比較高。例如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厲行改革，奠定了俄羅斯的工業化，確實很了不起。但是他採取的是專制的手段，誰反對改革就流放，或處死，沒有改變制度，連農奴都沒有解放。結果人亡政息，他兒子繼任後，很多改革措施都被廢除。還有一種情況是同一個統治者，起初很英明，時間長了，永遠聽不到不同意見，長期享受特權，必然走向腐化。

在農業社會、等級制度下，百姓可以「認命」，宣傳知足常樂，樂

天知命，可能還有一定效果。現在一個靠權勢攫取大量社會財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滿身名牌，一面提議為每個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要求大家學雷鋒，只能成為莫大的諷刺。

（2） 法治：其理論的依據是，對政府的權力必須限制和監督，絕對的專制，絕對導致腐敗，到現在還沒有例外。歐洲從十三世紀《大憲章》形成的憲政的觀念：

最高權威是憲法，而不是哪一個人。然後根據憲法原則，立各種具體的法律，對任何具體的事件都以有關的法律為準。如何實施？於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來， 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有各種不同， 其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權力（power）制衡，保障民眾的權利（rights）。

在高度工業化、複雜的市場經濟、激烈競爭時代，只能靠剛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讓毒膠囊製造者傾家蕩產，道德高尚的藥商就只好破產。所以當前在中國以大力宣揚文化、回歸傳統道德來應對惡性的社會問題，有的人是出於無知或天真， 有的人則是有意掩蓋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責任。

當前中國是制度問題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看在甚麼特定的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舊的文化勢力、思維習慣；而當前中國表現出來的道德滑坡，實際是制度問題，是法治缺乏的問題。現在的關鍵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個社會多數好人得好報，而不是相反。在保證好人有好報的環境中，人們自然會形成行善的習慣。誠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國人在文化上、觀念上還有許多不成熟之處， 有些舊文化、舊觀念是十分頑強的，有了某種好的制度，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鍥而不捨的推動，有時還要用強制手段，才能逐步實現。（例如美國反對種族歧視從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實經過了一百年，期間還經過了聯邦政府派兵到州裏強制推行法院廢除種族隔離的判決）。所以百年前孫中山提出「訓政」。不過， 一是要真的向這個方向「訓練」，二是要在游泳中學游泳。若是整個環境背道而馳，再過一百年也「訓」不出來。

澄清幾個當前流行的說法：

—「用東方文化挽救所謂『西化』的種種弊病」。這個問題我在〈重建精神家園〉一文中已經闡明：所謂西方重物質、東方重精神；西方縱欲、東方禁欲；西方重爭鬥，東方重和諧等等，只要正視歷史事實，根本站不住腳。古聖先賢著作裏提倡的，不等於實踐中已經做到，相反，正因為現實情況相反， 才需要大聲疾呼予以糾正。（周恩來曾對外國記者說：你們看我們的報紙大力宣傳甚麼，正是我們缺甚麼。）人

們往往嚮往古代淳樸的民風，認為現在物欲橫流都是市場經濟之過。這就像懷念童年時期多麼天真純潔，長大後變得世故、複雜，生出許多煩惱。不論那個古代是否真的那麼美好，反正是回不去了。連孔夫子嚮往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三代」，也回不去，何況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向着現代文明：自由、平權、法治、人道努力。

—「中國是所有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而延續至今的國家，所以說明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特別優越而堅韌， 因此無需改變。」此說似是而非。首先「中國」指甚麼？如果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原，那麼從「五胡亂華」到元朝、清朝，已經被「殖民」多次了。至少「元朝」應該算是亡於蒙古族，清朝算是亡於滿族。否則為甚麼以岳飛、秦檜辨忠奸；為甚麼吳三桂、錢謙益算賣國投降？如果不算「亡國」，為甚麼要抵抗，打得那麼慘烈？為甚麼一定被歐洲白人佔領才算殖民？誠然，征服中原的蒙古族和滿族在文化上都漢化了，典章制度也基本上採用中原皇朝的（其實清朝已經改了許多）。那是因為，中原當時的農耕文明確實比遊牧民族的先進、精緻，漢族的語言、文化（也就是上述第二點的文化內涵）實在發達，皇朝統治的制度設計的確非常周到，便於統治。所以他們就採納。文化總是從高處向低處流的。但是當十九世紀中期，古老的農耕文明遇到工業文明入侵時，就不堪一擊了。鴉片戰爭失敗沒有被英國全部佔領，絕不是中國文化的勝利，是因為當時的世界形勢，英國不可能，也無意一家獨吞整個中國。假設 ——當然只是假設——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像被蒙古或滿族征服一樣，被某個歐洲國家征服，漢族的文化顯然不可能把人家給同化了。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例如印度文化至今還保留下來，但是在典章制度上肯定是先進的同化或改造落後的。

有一點常為國人所遺忘，或故意忽視，就是實際上中國在文化上開放的時期比封閉的時期長，所以漢文化並不是單向的「以夏化夷」，而是不斷融入和吸收了許多異族的文化，才有其生命力。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西學東漸，才造就了今天的現代中國。沒有這種開放和融合 ——有時是以民族屈辱為代價 ——中華文化早已萎縮。

當前在「弘揚傳統文化」的潮流下，封建糟粕沉渣泛起。我已有文章指出在宣揚「婦德」、「孝道」的名義下，竟然「三從四德」、「二十四孝」以及奢靡的殯葬和豪華墳墓都在借屍還魂，而且和當下的官商腐敗結合起來，把百年前早已擯棄的惡俗陋習以及文化糟粕又撿回來，這才是中華文化的災難。

妨礙文化繁榮的因素

權力的強制和利用

「思想不能用錢買」，也不能用強權壓出來。大一統的政權和經濟發達的所謂「盛世」不一定產生優秀的文化，歷史上多次證實，我國思

想活躍、文化繁榮時期大多是亂世：春秋戰國、魏晉六朝、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時期，等等。當然不一定非得亂世文化才發達。只不過中國的「盛世」往往是專制統治特別強，同時對文化思想控制比較嚴。別的國家並不一定如此。

某一種學說一旦變成官學，就是它的不幸，或被歪曲利用，或片面發展其某一缺陷：儒學被皇朝定於一尊、馬克思的部分學說被利用來作為唯一的治國基礎、魯迅在一次大人物的「講話」中被捧上至高無上的位置而同時其最寶貴的反抗和批判精神被扼殺，都可以算作「死神之吻」。統治者要假借一種學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斥其他學說，用權力來強制定某學說於一尊，而且任意歪曲解釋其所利用的學說。

高度實用主義、功利化

〈方孝孺與布魯諾〉一文中提到中國人缺乏與現實無關的好奇心。中國人是多神教，對各種神仙也採取實用主義態度，給諸神也分了工，例如財神管發財、觀音管送子、龍王管下雨抗旱等等。進了廟宇不是淨化靈魂而是賄賂菩薩。但是過去的文人還有田園的追求，在藝術上有浪漫的想像和創造的空間。現在的實用主義更加變本加厲。過去至少學生時代還有理想、幻想、浪漫情調。現在從幼兒園起就進入為一個世俗目標激烈競爭的絞肉機。創造力、想像力全被扼殺。

這個問題不限於中國。市場化到極致，會使文化低俗化。我翻譯的《廊橋遺夢》曾經暢銷，但是人們只注意愛情與家庭責任的矛盾，沒有注意作者通過主人公對市場摧殘藝術以及人的退化進行的批判。我在〈熱潮退去話廊橋〉一文中說到這一點。

歐美國家過去中學必修拉丁文，後來取消了（有些學校還作為選修課），至今還有不少老知識分子認為是一大失策，看似無用，但是與文化底蘊、思維邏輯有關。就像中國學生如果完全不讀古文、文言文，從實用觀點看，似乎也沒關係，但從文化傳承來看是大損失。一切以當前是否「有用」出發，近來又有理工科人士主張完全取消文科之論。這與「文革」中的「最高指示」一脈相承。甚至「文科有害論」也不是新的。大約因為學了文科就思想不安分起來，只要理工，人人變成某一專業的工具就天下太平了。實際上，理科也是要抽象思維的，所以只要工科即可。

今日更有網絡，還發展為微博，進一步快餐化。在中國現有的媒體受控制的情況下，本人對於網絡和微博的積極作用給予高度評價。但是如果只有這方面一枝獨秀，就妨礙思想的深刻化。一切表達都語錄化，沒有耐心靜下來思考、反復論證， 系統地考慮問題。本人一篇文章〈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和失落〉的遭遇使我體會到快餐文化的威力。這篇文章是我對1949　年以後的知識分子精神狀態何以至此多年思考的結果，從兩千年的傳統講起，結合各個歷史時期的背景，比較系統地解釋今天的現狀。但是忽然發現被不知哪位好事者只截取最後一段，並擅自加了一個「六十年怪現狀」的標題，在網上廣為流傳，前面的系統論

述已經沒有人注意了。只看這一部分大概比較痛快，人們沒有耐心去探索歷史根源，做更深入的思考。

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人性、制度的異化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內地相對而言，更緊迫的是制度問題，人權、自由、法治都在爭取中。但是在很多國家，包括香港地區，自由、法治的問題解決以後怎麼辦？

自由不受權力的壓制以後怎麼辦？

約翰・穆勒在《論自由》中談到自由的敵人除了強權之外， 還有社會風氣的力量，人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同的本能。這種社會風氣的力量甚至比強權還厲害。胡適在為〈王小航先生文存序〉一文中引王小航的話：要說真話，在「富貴不能淫……」三個條件之外還要加上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就是：「時髦不能動」，多少聰明人，不辭貧賤，不慕富貴，不怕權威，只不能打破這一個關頭，只怕人們笑他們「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個念頭，就可以叫他們努力學時髦而不肯說真話。

這段話先得我心。例如去年忽然大唱紅歌，全國風靡，從當政者到各單位領導到市井百姓，都是「自發的」，然而大多是有組織的。除了重慶之外，沒有地方是強迫的。我問過許多單位的負責人，是否上面有指示，都說沒有。許多人也不是甘心情願，但不知一種甚麼力量使他們覺得必須追這股風。其中個人也沒有被強迫參加，既沒有「威武」，也與「富貴、貧賤」無關，但很少人敢不參加。

以上這個例子還可以說是與權力的慣性作用有關，有一種潛在的威力。但是另外一種時髦的力量，例如追求名牌可以達到瘋狂的地步。沒有了纏足、束腰，出現了整容，在身體各部位動刀子，有的比纏足還殘酷。這也是趨同。人人都沒有自信，要模仿一種模式。五官、身材尺寸都追求標準化，失去理性，也失去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女孩子為一個名牌手提包賣身，男青年為一部時髦的「iphone」而賣腎（是真事）。沒有人強迫，都是自願的。這多麼可怕！

市場與民主的異化

這種追隨時髦背後的推手是市場，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科學與市場結合，原來是產生平等、自由的社會，造福人類。但是現在二者結合生產人們並不需要的東西，引得人們瘋狂追求，造成物質和精神的浪費。原來馬克思設想有一天，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只要用很少的時間生產出消費的需要， 其餘時間都去發揮自己的興趣，從事文化藝術創作。現在生產力早已達到這個程度，但是人的生活越來越緊張。如

同「紅舞鞋」，不斷地轉，停不下來，不知伊于胡底。

當前喬布斯成為成功創業的英雄，我在上海《文匯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喬布斯給了我們毒蘋果〉（江曉原、劉兵科學文化對話）頗受啟發。文章大意說喬布斯提供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強迫大家接受（ipad）；把我們需要的東西抓到他自己手中（紙媒、書籍）。最後的結果是扼殺文化的多元化。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市場從最自由，變成無形的專制，也是一種異化。

隨着手段的日新月異，人性的貪婪更難得到遏制。已經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也面臨異化的可能。人們一直相信，因為人性惡所以民主有必要，因為人性善，所以民主有可能。民主是用性善的一面制定規則遏制性惡的一面，也就是荀子說的「以義克利」。到今天，現存的制度是否還有效？例如媒體原來的社會批判和社會良知的功能因搶奪市場、吸引眼球、討好廣告而趨炎附勢、阿世媚俗；議會鬥爭以狹隘的黨派利益裹挾大眾的利益，等等，美、歐所面臨的問題深層次的也是制度文明面臨革新的問題。

科學進步是造福還是禍害人類

二十世紀初已經有人提出：人類掌控自然的能力超過控制自己的能力，擔心科學的發展對人類帶來災難。到原子彈的發明，又有有良知的科學家大聲疾呼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日益嚴重。

當前科學發展的兩大禍害：**(1)** 破壞環境；**(2)** 軍備競賽和戰爭。這很明顯，毋需多講。當然科學本身是中性的，主要還是掌握在人的手裏。於是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人的趨利本能能否受「不損人」的界限的約束？甚麼樣的制度能「以義克利」？ 本文開頭所說人類共同的善惡是非標準，還產生出一種異類：

以群體名義顛覆個人之間的倫理道德

人類自從有了組織乃至國家之後，用於個人之間的道德規範在群體之間就不適用。以民族、國家、宗教、種族、階級、團體、黨派，以及革命的名義，可以殺人、放火、搶劫、欺詐而不以為惡。兩千年前莊子概括為「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特別精闢。為私人的利益而做的惡行、犯罪，以國家或者革命的名義就變成大善、正義、崇高。例如說謊是惡行，但是外交官為了國家利益就可以而且應該說謊。當前流行的諜戰小說和諜戰劇更是在一個「敵、我」的前提下對人之常情和倫理道德的顛覆。在某個時期，一個種族把另一種族視為非人類，心安理得地任意屠殺，如早期歐洲人之於印第安土著、美國的種族歧視、到希特拉以種族優劣的名義屠殺猶太人達到頂峰。在這方面，中國也不例外。由於近代以來，中國作為黃種人總是受白種人的壓迫，就自以為僅僅是受害者，其實在歷史上漢族對少數民族一向以「化外」之人對待，「壯志飢

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到民國時期有些少數民族的名字還有犬字旁。

這種標準也有時代性、階段性。種族歧視在二戰後在人類的共同道德規範中列入了「惡」的範圍，達成了共識。又如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可以堂而皇之向中國或其他國家出口鴉片，現在任何一個國家以任何名義都不能公開販毒。虐待俘虜問題，古代「坑降卒」幾十萬，或者把俘虜作為奴隸，現代有了保護俘虜的明文規定；戰爭中殺害平民，直到二戰中還是被認為不可避免的，雙方都有「地毯式轟炸」，現在雖然仍然有不少無辜平民在戰爭中被殺害，但是在國際準則上已經是非法的，不被允許的，只能說是「誤傷」。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的「公德」是在進步。但是製造殺人武器，準備與其他國家作戰，還被認為是國家的「正當行為」，而且方興未艾，規模日新月異，不知拐點在何處。

一部世界史是人類自相殘殺的歷史。現在我們還沒有跨越這個階段。以「愛國」、「革命」、「信仰」以及其他種種群體的利益的名義殘害對手還有一定的道義的號召力。甚麼時候群體之間的道德標準和個人之間的道德標準一致起來，人類可望達到持久和平。但是留給人類的時間也不多了。

2013 年

說真話為甚麼這麼難？20

新年伊始，人民日報微博說今後要「努力說真話」，引起熱議。《中國新聞周刊》600　期策劃也提到，一直在「努力說真話」。我特別欣賞的是「努力」二字。如果那家媒體底氣十足地說：「我們一貫說真話，今後也將保證只說真話，不說假話」， 那麼這句話本身就足以讓人對它以後所說的每一句話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因為這顯然不符合已存在的事實，以及今後可以預期的現實條件。所以，承認需要「努力」，就是面對現實，至少這話是真誠的，進而決心為此而努力，那就更值得讚許。

那麼，為甚麼說真話這麼難？

首先，這裏指的是對當代社會，乃至後世都會有影響的公眾話語。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在日常生活中，一輩子百分之百沒有說過一句假話的，恐怕很少。即使在家人、親人之間， 有時也難免有所隱瞞。有的是善意的謊言，有的卻有損道德。有人「實誠」，有人「狡猾」，私德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媒體是「公器」，話是說給廣大公眾聽的，所以稱作「輿論」， 會產生一定的力量；而且，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所以對後世也有影響，其真、假的分量自然非同小可，所負的責任也無法和私人交往關係相提並論。

為甚麼要說假話？對誰說假話？首先是對敵人。「兵不厭詐」，古今中外皆然。現在充斥電視屏幕的諜戰劇，裏面的英雄人物都活在自己和他所屬的組織編織的謊言裏 ——為了一個「信仰」。他欺騙的是心目中的敵人，自信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心安理得。還有一種情況是外交，雖然打交道的對方不一定是敵人，但是國家之間只有利益，今天是友，明天就可能是敵，「防人之心不可無」。有一個不知何人發明的對外交官的經典定義：「一個誠實的人被派到外國，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說謊。」但是在和平時期，國家之間還是有基本的信譽規則的， 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靠謊言支撐，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發達的今天，說假話越來越難，必須限制在非不得已的範圍，而且要拿捏分寸和策略，不能「瞪着大眼說瞎話，否則非但不能維護國家體面，反為天下笑。

寫史者的標杆

那麼，對本國的公眾呢？為甚麼不能說真話？

先說歷史。大概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重視歷史，有這樣悠久的史學傳統，而且給歷史賦予這樣重大的責任。同時也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那樣，寫真實的歷史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甚至生命。於是有齊太史這樣的名垂千古的、一家三兄弟以身殉史的「史學烈士」，最簡單的「秉筆直書」成為英雄事跡。世上只有以身殉職、殉道、殉國之說，而殉史

的，似乎只有中國有，這也可算「中國特色」。

為甚麼如實記錄史實那麼難？因為是「官史」。中國的傳統文史不分，顧準稱中國的文化就是「史官文化」。史官不是民間獨立人士，而是有官職的，被寫的對象是掌握生殺之權的權貴，於是寫真話就成為與權力的抗爭。史官手無寸鐵，雙方天生就處於不對等的地位，其勝負結果可想而知。對中華民族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有血性，認死理，把說真話看得重於生命，前赴後繼，為了一個字，犧牲了三兄弟，最後對立面崔杼認輸了，他的行為還是以「 君」載入歷史。平心而論，那崔杼也不算太壞，他到一定程度就罷手了，知所止就是知恥， 說明還有所畏懼。還有一位名人就是晉國的董狐，他運氣比較好，被他筆伐的那位趙盾，歎口氣，認了。「董狐筆」從此成為寫真話的象徵。先秦時代的政治文化還沒有認可絕對集權，在位者不敢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到後世，刀把子在握，殺到你屈服為止，誅九族不在話下，三兄弟算甚麼？更重要的是，齊太史、晉董狐為後世寫史者留下一根標杆：要說真話，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努力」去做。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傳統的規矩，皇帝不能看史官對他起居言行的記錄，有點迴避制的味道。直到唐太宗堅持要看，把這個規矩給破壞了。

今天回顧歷史，古人能發明這樣一條規定，居然在專制皇朝還能實行這麼長的時間，我不由得對老祖宗肅然起敬。後來，這一傳統逐漸式微，史官筆下「報喜不報憂」，自覺地對君主隱惡揚善多起來。不過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還有許多野史、私家編撰的見聞錄。例如宋周密撰《齊東野語》的序言說：「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因為官史受當時的政治鬥爭影響，有私心、有黨爭，只有他們家祖輩傳下來的實錄是可靠的。當然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過在明清以降大興文字獄之前，這種民間野史的刻寫、流傳還有一定的自由度，而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寫前朝歷史，可以客觀一些。其所依據的史料也包括廣為搜羅的野史，甚至民間傳說，所以，為我們留下的二十四史，還有相對可信度。中國古代的史學有努力寫「信史」的優良傳統，我們常說要發揚民族的優秀傳統，這個傳統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

假消息貽害無窮

以上說的都是治史，似乎與媒體無關。事實上所謂歷史， 就是昨天的新聞。齊太史、晉董狐寫的都是當時發生的事， 當事人就在眼前，按今天的標準應該算作新聞，只不過古代沒有大眾傳媒之說，朝堂之事，黔首黎民不得與聞，記錄下來，　是留給後人看的，記者與史官合二為一。而且古人賦予歷史的意義不僅是記下所發生的事，而且帶有監督、警戒當政者的作用。如果生前不能受到一定的評判，死後在歷史上也要留下鑒定。青史留名的問題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就更在乎。直到半個多世紀以前那場大饑荒中，身居高位的領導還提

出：「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算是最重的警告，還是寄希望於對青史留名的畏懼能起到約束作用。現代的新聞報道更有即時的監督的職責，所以本文所舉寫史之例完全適用於寫新聞。

今人研究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的資料來源，除了檔案之外，就是當時的新聞報紙。檔案姑且不論，如果某個時期的報紙登的都是假消息，那可就謬種流傳，貽害無窮了。例如研究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民生和經濟狀況，如果單憑那幾年的報紙，會以為出現過畝產萬斤這樣的超高生產力，全民精力充沛，幹勁十足，根本沒有發生饑荒。若按掌握話語權者的意圖，餓死人也不能上史書。所幸「努力」挖掘和披露真相的志士前赴後繼，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野史。儘管如此，已經大規模傳播的假話都要恢復真相並不那麼容易。我見到過當代的年輕人為了解某位經濟界人物，翻閱「三反」「五反」運動中的報紙，發現對此人的詳細報道，罪名嚇人，歷數其罪狀，振振有詞。儘管這個運動的擴大化和大量冤案現在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但是對於這個具體人和這則報道，那位年輕人還是不由得不信。事實是，事主一年後就已徹底平反（他算是幸運的），那些「罪狀」完全無據。但是這種公開「揭批」是大張旗鼓的，而「平反」是「內部」悄悄的。政治運動沒有「譭謗罪」，名譽受損也沒有在同樣的範圍內恢復名譽之說。我們這一代過來人對這種「特色」心領神會，但對於後來有幸生長在比較正常環境中的人，除非有專門訓練，能分辨真假嗎？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遇到一位海外留學生，研究「反右」運動歷史，也是依據當時國內報刊的公開資料，還有經過特殊渠道得到的「右派」檔案材料，運用被認為「科學」的國際學術界時髦的「量化」分析，得出結論是「這是一場有野心的知識分子向工農幹部奪權的鬥爭」，因為白紙黑字這樣寫着，「連他們自己都承認的」。這種論文因為出處有據，註釋齊全，合乎學術「規範」，在名牌大學中居然也得到承認。從最低限度講， 這類報道是誤人子弟，而且禍延海外！當時發表此類消息的媒體和媒體人早已「丟掉」「董狐筆」的傳統。他們不享有古代史官的相對獨立性，那段時間裏，恐怕想要做以身殉新聞的烈士而不可得。

一句真話的力量

掌權者為甚麼需要向公眾掩蓋真相？當然真相是壞事，是施政之失，如果是善政，是功勞，大書而特書還來不及呢。做了錯事想掩蓋，這也是人之常情，小孩子闖了禍大多不想讓大人知道。像孔夫子提倡的「聞過則喜」，需要較高的修養，不是一般人能達到。文過飾非倒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國民性。特別是掌權者，如果有權、有辦法掩天下耳目，很少人會把百姓當作神父，自覺地懺悔自己的罪過。所以問題在於他是否擁有這個權力。

以尼克松「水門事件」為例，他觸犯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基本遊戲規則，被發現後，使出渾身解數加以掩蓋，是兩名普通記者鍥而不捨地挖

掘和披露真相，最後把他拉下馬。他一定對他們恨得牙根癢癢，如果有權力加以封殺，不擇手段讓這兩個記者閉嘴，早就這麼做了。可是他沒有這個權力。是制度設計決定真相戰勝。又如克林頓的緋聞，他最初也是否認，想掩蓋，但是蓋不住，只得承認並道歉。他差點被彈劾的罪名不是生活不檢點，而是撒謊，「作偽證」，是違法的。所以最後記者問他，認為自己的行為對美國青少年有甚麼影響，他的回答是：人不能說謊，總統也不行。政治人物的私德固然重要，而對公眾必須說真話更為重要。他們的制度、法律就是這樣要求的。

現代媒體的天職是反映真相，而真相往往被重重掩蓋， 就需要深入揭露，發展出「調查性新聞」這樣的文體。在充分享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媒體履行職責也還會遇到威脅利誘的困擾，表現有優劣之分，而在迫使政治透明的法律機制欠缺、媒體沒有獨立身份、說真話沒有安全保障的環境中，還是堅持拒絕假話，努力挖掘真相，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這樣的媒體人的勇氣、智慧和高度敬業精神可與古之太史遙相呼應，更值得尊敬。這裏的「真相」當然是涉及國計民生、社會公平正義之事，不是指那些名人八卦。如《中國新聞周刊》600 期所舉事例，涉及法制、民主、公民權利等各個方面，大多影響深遠。

要奮鬥就要有犧牲。就以孫志剛事例來說，真相的披露揭開了暗無天日的黑幕，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取消，是一大功勞。但有人因此付出了代價，只是公開加於他們的罪名是另外羅織的藉口，在這點上，今人還不如古之崔杼者流坦率。而且，收容制固然取消，還有其他類似的黑暗場所，包括勞教所。最近有記者暗訪「救助站」所遇到的險情和發現的慘狀，說明只要這種權力不受約束的體制不改變，類似孫志剛的慘案難以杜絕。當然那些冒險暗訪的記者也屬敬業、勇敢，值得尊敬之列。

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我理解有幾層意思：其一，在位者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可以看得見，其二，錯誤是特例，一經指出，很快能得到改正；其三，黑暗是暫時的，多數時間是光明的。如果日蝕、月蝕成為常態，那就是黑暗世界了。所以如果在位者掩蓋錯誤、撒謊成性，天天指鹿為馬，使民眾長期生活在謊言籠罩的黑暗之中， 這個民族必然成為愚昧的民族，而且弄虛作假成風，全社會都失去誠信。從這一角度，有公眾話語權之媒體是否說真話影響深遠。

我還是把新聞與歷史相提並論，如果說，一句真話能改變社會，恐怕有所誇大，但能照亮民眾的心智，善莫大焉。不斷地揭露真相，集腋成裘，亮光就會逐步驅散黑暗，不但照亮今人，而且惠及後世。今日之中國，堅持說真話仍然任重而道遠，同志仍須努力！

2013 年 6 月

宣揚何種婦女觀？

——沉渣泛起之一

近年來，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名義下沉渣泛起，表現之一是婦女觀。

隨着商品大潮、拜金主義之氾濫，在社會觀念中婦女回歸附屬地位，女性的角色實際淪為以色悅人的性對象。這種表現見於鋪天蓋地的商品廣告、各種時代錯位的電視劇中，已經由來已久，本人多年前曾為文述之；近來變本加厲，轉而登堂入室，進入主流媒體、官方宣傳。最近偶然見到幾則新聞，令人不知身在何世。

其一，偶見某電視頻道，號稱國際大都市的上海一位大嫂語出驚人：「女孩子婚前處女之身就是獻給婆家的最好禮物（！）。」主持人的介紹我現在記不清了，似乎這位大嫂是被奉為民間倫理道德的宣教員。也許這個節目的本意是針對時下的風氣，教育青年在性行為上自律、自愛，不要太放縱。這當然無可指摘，但是目的是甚麼？應是為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女子的甚麼「貞操」。況且，在這個問題上對少男少女理應施以同樣的教育，是否也可以說，「婚前保持童男身是獻給岳丈家最好的禮物」呢？那位大嫂顯然沒有這種想法。自古以來在兩性關係上對雙方的要求從來是不平等的，現在這種觀念陰魂不散，不僅存在於小市民的落後觀念中，竟然在主流媒體上加以宣揚。至於把婚姻說成女方「嫁到婆家」，這種陳腐觀念至少在一百年前就已開始在知識青年中破除，民國初年就有無數青年男女追求婚姻戀愛自由，走出大家庭，建立小家庭。婦女開始走向社會，有了平等的就業和經濟地位，取得人格的獨立。先母是二十世紀同齡人，如果活到現在應該有 111 歲。她於1929 年與我父親結婚前已經有社會職業，結婚提出的條件之一不是「房子」，而是「不嫁到婆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當然這在當時還是少數，不過也不是「極個別」。我國女子教育、婦女就業，開始不算晚。這一過程充滿與舊的頑固勢力的曲折鬥爭，不是一蹴而就。好容易走到今天，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時又忽然「一覺退到民國前」，能不令人感慨！

我絕不是無視當前青少年中生活不檢點的風氣和問題的嚴重性。這一方面是出於無知，一方面是大的社會影響，只能從加強科學和美育教育、豐富健康的課外文體生活等各方面加以積極的引導。那種向女孩子宣傳「嫁到婆家」如何如何的說法， 大約只能引來竊笑，對教育對象不會產生甚麼效果，卻只能助長更加不健康的落後的社會觀念。

其二，河南某地舉行「婦德」研討會。

如今全社會道德滑坡，各種傷天害理的事層出不窮，特別是官場的腐敗令人髮指。這是有目共睹，但凡有良知者都為之痛心疾首而思有以救之。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社會還是男權為主的社會。試看各行各

業的高層，特別是各級權力中心， 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在普通勞動行業中也尚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在這個時候單獨把所謂「婦德」提出來，而且是「傳統婦德」，何所指？意欲何為？社會上諸多醜惡現象是否要婦女回到「三從四德」，都做烈女節婦就可解決？色情業的主導方是嫖客還是妓女？如今官場風靡一時的所謂「二奶」、「三奶」以至「n奶」主要的道德敗壞在哪一方？手中掌握權與錢的男子把道德責任片面推到女人身上也是慣技。自古以來「紅顏禍水」之說， 順手拿來，十分方便。有幸取得一定社會地位，有一定話語權的女同胞們且不可上當，反過來助長這股逆流。

那場「婦德」會議的詳情，我不得而知，但並非出自「山寨」，而是有當地頭面人物和官方的支持。從見到的有限發言資料來看，似乎議題之一是講在社會上事業有成的婦女如何兼顧家庭的問題。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道德問題，把家庭看作是婦女單方面的責任也是誤區。既然只有男女雙方才能組成家庭，男子之需要家庭的溫暖並不亞於女方，那麼男方對家庭就有同樣的責任。至於婦女因生理特點必須擔負懷孕、生育和哺乳，正好說明應得到特殊的關注。如何根據自身的特點兼顧家庭和事業，應從完善社會制度、設施和立法來予以保障。實際上，在這方面倒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例如帶薪產假、女工多的工廠有哺乳室、托嬰室，哺乳期的女工在工間有半小時不等的哺乳時間等，在勞保條例中已有規定， 並付諸實施，也不允許因生育而解僱女職工。各單位收費低廉的托兒所、幼兒園也相當普遍。當然這一保障的覆蓋面還只限於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的職工。男女分擔家務在一個時期內至少在受過教育的人群中已經不成問題。如今在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有新的辦法，在職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對女職工更需要額外的關注，從立法、制度上切實予以解決，而不是像希特拉那樣宣揚婦女回到家庭去。事實上這股逆流在青年一代中正在悄悄興起，值得全社會予以關注，特別是社會學界和教育界。

中國的傳統道德不乏可以繼承的優秀部分，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詳細闡述。但是傳統的「婦德」正是婦女作為附屬品的產物，恰恰是幾千年來奴役、殘害婦女的枷鎖，只能揚棄，無法繼承。十多年前，本人偶因好奇仔細閱讀了《後漢書 · 列女傳》，那是表彰兩漢傑出婦女代表的名單，四百年來入選此「光榮榜」的只有十七人。其中除了蔡文姬和曹大家是有名的「才女」外，其他人的事跡都是以「節烈」為特點，而且大半是自殺的，其情節之悖理、荒唐，實在匪夷所思。即使那位以繼父兄完成修《漢書》而出名的曹大家，在《列女傳》中的事跡主要不是言其修史的貢獻，而是詳細介紹她作的《女誡》，其內容實際上就是「三從四德」的來源。這一「傳統」經過近一百年仁人志士（其中包括有先進思想的男子）的奮鬥，終於爭得如今婦女在法律上平等權利，曾經有一個時期社會風氣也為之一新。現在忽然又提出「傳統婦德」來，其倒退、滑坡豈止以道裏計！

我並不是否認方今婦女在道德滑坡中也有一份，對社會風氣應負一份責任。但「傳統婦德」不但不足以正風氣，反足以助長男子憑特權而作惡。事實上，我國婦聯一直提倡的口號「自立、自強、自尊、自愛」

在方今的形勢下還是適用的，應該予以貫徹。只是還需要增加新的內容。對目前我國社會轉型期而言，最急需的是公民教育，培養合格的男公民、女公民。不論男、女，都應懂得自己的權利與對社會的義務，而平等正是其核心價值之一。

其三，「兩會」期間一位人大代表，建議 20 歲的女子嫁給 40 歲的男人以解決住房問題。這一提議被民間傳為「兩會」「雷人語」之一，在網上已經引起一片嘩然。這一提議有兩重含義。一是掩蓋了當前住房難的真正根源，開脫了體制、政策以及官商勾結等種種弊端的責任，把一個嚴肅的問題輕浮化。事實上到 40 歲還買不起房子的男子不在少數，根據這位人大代表的邏輯，只能排除在成家考慮之外。二是把女子嫁人看作是謀生之道。

關於第一點，當前的住房政策和現實對造成青年一代「蝸居」的困境，是另一個大問題，不在本文主題之內。本文着重討論的是第二點。

這位人大代表提議的出發點實際上與當前的社會觀念有一致之處，就是回到了「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傳統」， 只是現在吃穿問題不大，代之以住房。而且公然提倡變相的買賣婚姻，青年女子為房子而賣身，犧牲終身幸福。按理說，養家糊口是夫妻雙方之事，至少在筆者這一代城市居民中已經基本實現，當然前提條件是實現男女就業機會平等。如今住房責任片面加於男方，既對男方不公平，也與女子經濟地位下降、就業機會不平等有關，同時也是社會觀念問題。特別不合理的是，住房成為男方父母的責任，以至於有些父母不堪其重負， 開始出現「不重生男重生女」之說。風氣所及，我發現，甚至在本應思想比較現代的高校中，有成年兒子的教授家庭也以為兒子結婚準備房子為己任，又見當前出現家長為兒女相親之風。據說女方家長一見面先問對方收入和房子，此條件如不能滿足，一切免談。名義上是為女兒幸福着想，實際上等於把自己的女兒變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房奴」，形同商品。如果房子是要「掙」來的，那麼女子本着自立自強的原則，也應該努力去「掙」，而不應該完全依賴男方；「先立業，後成家」如果是一個原則，對男女雙方都應該是一樣。這不僅是從男女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角度，同時也是從工薪階層經濟生活的現實考慮。

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各色人等有各種思想觀念本不奇怪。只是既然以代表「先進文化」為號召，那麼在主流「導向」中，在廟堂之上堂而皇之的「建言獻策」中，這種糟粕沉渣就顯得格外扎眼、刺耳。由於現在基本上還是男權社會，對於女子的附屬地位，男子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即使認同平等、自由，銳意改革的明達之士，對方今在婦女問題上的嚴重倒退往往熟視無睹。經濟上比較寬裕的，心安理得地享受家中「全職主婦」的照顧不在少數。實際上，方今婦女觀的問題與整個社會道德倫理滑坡的問題，乃至社會體制改革滯後的問題是一致的。傅立葉的名言：「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的標尺。」揆諸今日之中國，更是一言中的。

2011 年 4 月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今天的爭論

明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年年談五四，話題常新。只此一點就說明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對於五四精神有兩種側重點，一是「愛國」運動，一是「新文化」運動。本文要講的是「新文化」運動。其實新文化本身就是從愛國而來，其目的是變革圖強，振興中華民族。

「新文化」運動不是從 1919 年 5 月 4 日開始。狹義而言，是從陳獨秀 1915 年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開始，有一些人大力倡導新文化，並且與守舊派展開論戰。廣義而言，是從鴉片戰爭之後，在睜眼看世界的先驅中，有一些人意識到西方的先進不僅在於「船堅炮利」，而是全面的制度、文化，如郭嵩燾、王韜、嚴復，以及稍後的梁啟超等人。遠在1919 年「五四」之前，廢科舉、倡新學就已經開始了。「五四」是承前啟後的一個高潮，而且爭論也達到高潮，各種觀點表達得最充分。所以後人討論中西、新舊文化就以「五四」為符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有過幾次關於中西文化之爭，包括當前尊孔讀經之風又起。其實今天弘揚傳統文化所持的觀點， 差不多沒有超越1915 年開始的那場爭論。只不過，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可能在文化上危機感更強烈。

我從不諱言自己一向是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捍衛者。現在不想重複歷來關於「西化」與「傳統」之爭。只想就當前來自兩方面的否定「五四」精神的論點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其一，認為「五四」運動反傳統過分，甚至把當時的非孔與「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並論。把「文革」浩劫後的文化斷裂歸咎於「五四」的反傳統。此說主要發源於海外華人學者，近年來於內地也頗盛行。

其二，認為「五四」受法國革命影響太大，而沒有引進英美模式的漸近改良，使激進思想佔上風，終於導向追隨蘇俄十月革命的暴力模式，以致我們現在還承其弊。這一派還認為文化改造並非中國的關鍵問題，關鍵是要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五四健將們致力文化革新是重點錯了。照此邏輯，等於是把後來妨礙我國走向民主憲政之障礙歸咎於「五四」運動。

當前影響較大的觀點是第一種，所以本文也着重討論第一種。

決不能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革」相提並論

由於「五四」期間有人提出過「打倒孔家店」，流傳至今， 把這句話概括為新文化運動的「口號」，這本已是極端簡單化的以偏概全，又與五十多年後的「批林批孔」運動相附會，人云亦云，似乎「五四」應

為後來的「文革」負責的罪名就成立了。其實這是經不起認真分析的。

第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傳統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舊文化底蘊的飽學之士，決非盲目的批判和揚棄。在這個高度上，他們對外來文化就有判斷力，知道如何取其精華。另外，他們是一批手無寸鐵的讀書人，無權無勢， 完全是憑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對民族社會的責任感。而他們的對立面是強大的政治、軍事權力，和全社會的頑固習慣勢力，因此需要大聲疾呼，有一些語言比較激烈也不足怪。

第二，方向。「五四運動」反傳統的方向是向前進的。當時為甚麼要反傳統？因為頑固的舊禮教、僵化的思想和習慣勢力如果不打破的話，新思想進不來，制度改革無從談起，民族無法新生。今天我們可以從容不迫地研究儒學，可以有各種詮釋和理解。但是不應忘記，幾千年的皇權專制是以孔孟之道為說辭的，種種罪惡也假此以行。前面提到，晚清的仁人志士已經意識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只是代表一個高潮，成為「新文化」的符號，其方向是向科學和民主推進。

第三，客觀效果。如果尊重客觀事實的話，應該承認，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化並沒有斷裂，而且無論是在道德倫理上還是在各個領域的建設中都有中西優勢互補的成果。我國現代教育文化、新聞、出版、實業，包括前幾年舉行百年校慶的許多著名中學和名牌大學，都奠基於那個時期。近年來關於二十世紀上半年的文化、人物的研究和介紹方興未艾，是大好事。那一代人所體現的人格、精神和學養以及他們對中華民族振興的貢獻，是存亡繼絕而不是斷裂。特別是那一代知識分子都經受了抗日戰爭的考驗。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當然絕不止西南聯大），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發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天下興旺、匹夫有責」。從相當優越的生活條件跌到最底層，貧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輟，在艱苦卓絕之中堅持下來了， 而且那個時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最高境界：「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時又體現了新的民主、科學精神。他們這一代或兩代知識分子， 都經歷過「五四」的洗禮，應該就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和繼承者。文化斷裂了嗎？如果在文化上沿着那一條道路走下去，我們也許不至於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論空間。「五四」前後的思想辯論是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可以說是在春秋戰國之後最大範圍的百家爭鳴，沒有外力的壓制，也沒有甚麼權威來「定於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選擇都成為可以想像的。所以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復古與疑古，尊孔與非孔並存，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思潮都在中國的思想舞台上發出過聲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只不過有的只是曇花一現，有的則影響深遠。

所以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場啟蒙運動，其對象是上面的專制主義和下面的奴隸主義，作用是解放思想。

「五四精神」概括起來就是承載了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知識分子吸取外來文化之精華，以振興我中華。

反觀「批林批孔」，在上述幾個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 主要力量：是最高掌權者發動，服務於高層的權力鬥爭，是政治鬥爭甚至是政治陰謀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隨，誰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關聯，更少人體會暗中還影射甚麼人。這是一場悲劇和鬧劇，與「五四」的反傳統風馬牛不相及。

第二，方向。是進一步走向專制。「文革」本身一頭是高度集權，另一頭是被剝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結合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批儒揚法」，樹立的是秦始皇，宣揚「百代都行秦法制」。有一則我親歷的故事，類似「黑色幽默」：「批林批孔」初期，張良是被認為「反動」的，因為他代表「沒落的奴隸主貴族勢力」曾企圖刺殺代表「先進的法家」的秦始皇。我一位同事因工作於此時出國，過了八個月他回國後發現在統一的宣傳口徑中張良變成了「好人」，因為他輔佐劉邦有功，而劉邦，當然還有呂后，是被肯定的「先進勢力」。他惑然不解，問我怎麼回事。我說：在你出國期間張良的思想改造好了！總之，那場荒謬的運動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錮，反科學而歸愚昧，反民主而強化專制，而且「在一切領域內實行專政」。與「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馳。

第三， 客觀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斷裂，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不論中國的、西洋的、蘇東的、古今中外所有新舊文化都被否定，只剩下一部「紅寶書」，「八個樣板戲」。一代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已經學到的文化則進行

「去文化化」的清洗。歷史完全被隔斷。但是也不是完全「斷裂」，繼承的是皇權專制中最黑暗、最殘酷的糟粕，國民性中最惡的劣根性得到張揚。「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幾代人受益。我們今天如果還有不絕如縷的新文化的一線傳承， 還是受益於「五四」前後的那幾代人。「上山下鄉」之後有幸重新上大學的一代人，趕上了受業於劫後餘生碩果僅存的老先生們，應該體會最深。

第四， 追求真理的言論空間。與五四時代的百家爭鳴相反，「文革」時期思想專制和文字獄達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絕後」），一言喪命，屢見不鮮。這是許多人記憶猶新的，不必贅言。如果沒有七十年代末那場關於真理標準的辯論，我國後來的三十年改革將無法啟動，所以那場辯論應該可以算一次「再啟蒙」。

因此，五四的反傳統與「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並論。

「五四」與激進的暴力革命的關係

以導向暴力革命責備「五四」者，當然是見到暴力革命的負面後果，主張漸進的改良的。原則上，筆者並不反對。但是改良還是革命，取決於客觀形勢多種因素，並非少數人的思想傾向能決定的。

陳獨秀在 1915 年時確實非常推崇法國革命以及整個法蘭西對現代文明的貢獻，可能有點偏愛，有點誇大，但總的沒有錯。畢竟，「人權宣言」是法國革命的宣言。「法蘭西」對陳獨秀的吸引力主要是「自由、平等、博愛」。後來他和李大釗等人又曾高度讚揚美國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因為威爾遜主張公理戰勝強權，並且尊重弱小民族的權利。但是 1919 年巴黎和會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沒有主持公道，反而支持日本，令他們非常失望，而此時十月革命成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他們就轉而接受了這方面的影響。應該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打破思想禁區，為各種思潮 ——包括最激進的暴力革命 ——在中國傳播提供了條件，但「五四」精神本身並不等同於暴力革命，更不通向後來的史太林主義。是和平改良還是暴力革命的決定在於統治者的態度和特定的形勢，包括國際形勢。這是另一個問題，非本文的主題。至少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倡導集權和專制，而是相反。事實上那個時期已經有人主張中國應該先經過專制主義再實行民主，已為胡適等人所批駁。當時的骨幹們後來在政治上走了不同的道路。對每個人不同時期的言行可以做出不同的歷史評價，但是把後來中國所經歷的一切負面的事物，從強制性的「思想改造」到「文革」的根源都算在「五四」頭上是不公平的。

把力量用在革新文化上是否着力點錯了？

關於文化與制度的關係，本人已另有文章詳述（見〈文化與制度，雞與蛋的關係〉本書 400 頁）。此處主要談與五四有關的問題。

文化保守主義者持所謂「文化決定論」，也就是「國情例外論」，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來否定「平等、自由、人權、民主」及與之相配的改革。認為「五四」批判傳統實際是主張「西化」。而我華夏幾千年輝煌文明自己另成系統，只需要繼續發揚光大。實際上這些論點在民國初期的辯論中都已提過。現在又興起，只不過多一些新的名詞，包括從海外引進的話語。按這種邏輯，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強之前，中國以「三綱五常」為經，皇朝專制為緯的社會，本是和諧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進一步改革，而是回到從「五四」以來被貶低的文化傳統。所以，否定「五四」精神說穿了，就是拒絕政治和社會向着現代方向轉型。

另一方面的論點則認為五四健將們把重點放在革新文化， 而不是着重在改變政治制度，是凌空蹈虛，着力點錯了。文化是虛的，制度才是實在的。

實際上所謂「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在悠長的歷史中，在一種制度下形成的、滲透到民族血脈中的集體記憶，一種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這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有很強的韌性，在剛性的制度變革之後還會長期存在。制度的變革和實施總是靠人來做的，既是人就有思想。從晚清到民國致力於變革圖強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沒有少努力，並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他們到處碰壁，即使通過武裝起義，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裝舊酒，深感存在於國民中的舊勢力、舊思想之

頑強，所以才倡導新文化運動。今日之青年對那段歷史已經陌生。不了解這種舊文化之頑固和由此生發出的種種反人性的罪惡，也就無法理解那一批原來受過深厚的傳統文化的薰陶而又有機會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的打破枷鎖、衝出牢籠的強烈要求。

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茅盾的「霜葉紅於二月花」等大批文藝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正因為它們深刻而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代舊式宗族的腐朽、沒落、無望、舊道德之偽善、舊禮教之摧殘人性，以及開始覺醒的青年衝破牢籠的掙扎和奮鬥，這是五四精神在文藝作品中的體現。這些作品對一代人的啟蒙作用影響深遠，是怎樣強調也不為過的。

「啟蒙」有時表現為轟轟烈烈的「運動」，但其成效卻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因此採取急功近利的態度就會認為它「遠水救不了近火」。事實上思想的啟蒙與制度的變革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沒有千百萬人的思想變化，很多制度變革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終至流於失敗；反過來，一種新的制度的實施也有助於大眾的思想的革新。

當然，「五四」那一代人也有其局限性，他們不可能預見到半個世紀以後中國可能發生的種種曲折和劫難，以及今天在全球化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例如現在有人認為當年只強調了「民主、科學」，而沒有強調「自由」、「人權」；有人認為過分強調理性而忽視宗教的積極作用；有人認為對歐美民主制度的得失利弊探討不夠；另外，一種主張成為「口號」，就容易流於簡單化，真理向前一步就會變成謬誤，例如倡導「科學精神」不能等同於如今為人詬病的「科學主義」。我理解的「五四」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發展的。那一群代表人物自己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變，其後來的軌跡也有所不同。例如陳獨秀晚年的反思近來也見諸報刊。

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極為豐富，可供有志者不斷深入發掘。在我國進入艱難的社會轉型時期，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仍是題中之義。我們可以不滿足於當年的口號，但是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如果在某些方面走出了蒙昧，五四先賢們功不可沒。而他們所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今天並未完全消失，因此他們所發出的吶喊，所倡導的精神，仍值得大力發揚。

2008 年

文化與制度

——雞與蛋的關係？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談論的「文化」是指與一個民族的振興和發展道路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精神層面的因素，如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基本價值觀等，特別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稱

「大文化」。與此關係不大的如歌舞、藝術、飲食、節日、民俗、服裝、時尚、禮儀等等，不在討論範圍。在我國走向現代化的改革中，「文化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各持一端由來已久。國人一般喜歡講「主義」，再加一個「唯」字：「唯……主義」，或「唯……論」，就把事情絕對化了。我首先不贊成「決定論」，也不認為文化與制度是對立的，不過這樣就可能落入「折衷主義」之譏。我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見。

所謂「文化決定論」，也就是「國情例外論」，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來否定「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的普適性及與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資產階級」，理所當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在「但是」後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認為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傳統，本來就與西方截然不同，不適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憲政「這一套」，只能實行「威權主義」（這個名詞實際是舶來品），還是應該回到儒家的「仁政」，實行人治，和劃分等級的「禮制」，幾千年就這樣過來的，沒有甚麼不好。還見到一種說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軟弱，大權旁落於權臣或宦官之手與歐洲的君主立憲虛君制相提並論，算是已經有了「憲政」。這是出於無知、偏見，或對「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極端，雖未公開主張恢復皇權專制，亦不遠矣。這種「精英」的思潮與大眾娛樂相結合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充斥於屏幕的宮廷戲　——秦皇、漢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主子」、「奴才」，「吾皇萬歲，萬萬歲」！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強之前，中國以「三綱五常」為經，皇朝專制為緯的社會，本是和諧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進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現「五千年輝煌」，以此引領世界， 醫治西方社會的痼疾！當然持此論者並不拒絕享用西方物質文明，科技、器物。一下子時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張之洞的「體用」那裏。

正是出於對上述以「文化」、「特色」為依據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論調深惡痛絕，有些倡導自由、民主、憲政的論者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完全否定一個民族發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 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於是從晚清以來呼籲開啟民智（如嚴復）、塑造「新民」（如梁啟超）、批判國民的「壞根性」（如魯迅）、倡導「新文化運動」（以胡適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認為方向錯了，錯在沒有集中致力於制度的改革。進而認為，既然「民主、自由、人權」是普適性的， 那就存在於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對思想、文化

進行革新的問題，也沒有開啟民智、教育民眾的必要。極而言之， 文化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可以原封不動，只需要改變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權利。

這就出現一個問題，靠誰來改革制度？無論靠誰，總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為甚麼在遭遇外來列強之前，皇權專制能維持幾千年，朝野都談「仁政」而事實上暴政多於「仁政」， 卻常能行其道？為甚麼每次被壓迫者忍無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結果卻只能遵行成王敗寇的規律，成而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復循環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強之後，百年來這麼多關於制度改革，要求憲政、民主的呼聲不絕於耳，不斷於書，為甚麼這樣舉步維艱？為甚麼現代的革命運動以民主口號始，以專政極權終，卻也能在相當時期內暢行無阻？

這些問題的答案非常複雜，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迴避。本文開頭所定義的「文化」是一個民族在悠長的歷史中，在一種制度下形成的、滲透到民族的血脈中的集體記憶。這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有很強的韌性，在剛性的制度變革之後還會長期存在，所以同一種制度機制在不同國家的實踐中的表現各異。同樣的非正義，甚至非人道的現象在有些國民看來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國民卻長期忍受。同樣的議會、選舉、政黨、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後發的亞洲國家至今難以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效果，亂象叢生，法律、制度在那裏顯得軟弱無力，「槍桿子」還有相當操控局面的力量。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來執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種文化的載體。又如方今的恐怖主義，是文化還是制度的產物？

從中外歷史發展看，制度與文化是膠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孰先孰後真很難說，所以稱之為「雞與蛋的關係」。個人的專斷獨裁，乃至登峰造極的造神運動，是建立在從精英到民眾的認同的基礎上的。無「人」頂禮膜拜，也

就不成其為「神」。中國的老百姓宗教情懷不那麼強烈，但是奉現世的皇帝為神明的傳統和心理卻根深蒂固；中國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寄託在「明君」身上，貶到「江湖之遠」還念念不忘「憂其君」；中國歷來最高統治者一旦地位確立，自然認為自己「奉天承運」，掌握終極生殺予奪之權。這三方面相輔相成，不論公開宣佈的、寫在紙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實踐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習慣的「傳統」皇朝模式。大至一國，小至縣、市、鄉、鎮，莫不如此，於是出現各級「土皇帝」。這種陳年舊酒可以裝在花樣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漸使那「新瓶」變形。如晏子所說，橘過了江就變為枳。

自辛亥革命以來，經過各種新思潮和新文化的衝擊，代表專制制度的舊思想、舊文化已經破了不少，革命勝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專制，要民主為口號。但是時過境遷，朝野易位，舊的東西又在新的「革命」的「專政」理論下借屍還魂。說是新瓶裝舊酒，又不完全是舊酒，還加了許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新的成分最重要的是把「法統」與「道統」合而為一。古之皇帝掌握至高無上的生殺之權，但是不兼理論家。即使是定於一尊，獨尊儒術（注意：是「術」不是「學」），其解釋權

不在皇帝，而在博學鴻儒。所以直言敢諫之士還可以引經據典進諫，指出皇帝某一項言行不合聖人之教。儘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不代表絕對真理，不是思想領袖，所以還有所畏懼：畏聖人之言，畏冥冥之中的「天」。而當法統與道統合一之後，不但「朕即國家」，而且「朕即真理」，可以「無發（法）無天」。不論宣佈以何種理論為準則，對這種理論的解釋權卻不在最高學府，而在最高官府，而且是領袖一人。「最高指示」等同於「主義」。在這種背景下，每次集會開頭唱「東方紅，太陽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閉會唱「 ……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幾十年中兩種截然對立的觀念能夠這樣安然共處，竟無人提出有何不妥。事實上，對當時的中國老百姓而言，「國際歌」所宣揚的理念是虛，「東方紅」是實，符合千百年來寄希望於「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習慣心理。直到近年來有人寫文章指出這兩首歌的矛盾。一經點破，就如俗語所云「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着的。怎麼現在才發現呢？ 應該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標誌的那場思想解放運動功不可沒。那是在新的條件下，在我國發生的一次「再啟蒙」（第一次「啟蒙」當在二十世紀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張民主自由者對「啟蒙」特別反感，令人不解。

「啟蒙」何罪？所謂「啟蒙」，就是打破迷信，回歸理性，回歸常識。是讓理性之光照亮為各種專制統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一旦撥開迷霧，承認客觀事實，順應人性，用常識判斷，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撥開迷霧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人而異。如孫中山所說，有先知先覺，有後知後覺，還有不知不覺。就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顧準者，身陷囹圄中已經想清楚了一些問題，應該算是「先知先覺」。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如顧準那樣的「先覺」無法起帶動作用。只有後來打破「兩個凡是」，國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衝擊，「後覺」的人們於朦朧中逐漸從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體會到顧準輩的「先覺」之難能可貴。應該說，沒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沒有決策者相對的言論開放政策，真理標準的討論也不可能進行。所以還是「文化」與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動。但是遠非一勞永逸。在那以後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覺者」，乃至自覺頑強地堅守舊觀念，想要把歷史車輪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時的「政策」，而沒有形成「制度」，那麼，倒退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試以一事為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要求領袖有「雅量」多給他一點發言的時間而遭拒絕和痛罵之事，眾所周知。今天各種不同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仍有所不同。比較普遍的是欽佩梁的骨氣，對領袖缺乏「雅量」不以為然；在現代民主意識比較明確的人看來，則此事根本不是甚麼「雅量」問題，政府委員本來有發言權，誰也無權剝奪，竟然被剝奪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遲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還讀到另一種反應：一位曾任最高領袖身邊衛士的回憶錄（或訪談錄？），提到此事，卻說梁漱溟儘管如此頂撞，「也沒有

拿他怎麼樣」，足見領袖心胸寬大。這說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認為梁的行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對他本該嚴懲，竟然「沒拿他怎麼樣」（例如他後來居然沒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蕩。以上截然對立的是非觀，在今天的我國不同人群中仍同時存在。前兩種是「啟蒙」的成績，但還不一定在全社會佔主流，說明啟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國先秦時期確實有過「百家爭鳴」的輝煌局面，創造了無比豐富的哲學思想，對人類文明的寶庫作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至今我們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這「老本」。現在經常有人舉《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說明中國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討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務。姑且假設從孟子的民本思想出發，有可能發展出另一條歷史軌跡，先於歐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現代，建立中國式的民主、憲政制度。但這已無法證明。不論是偶然還是必然，歷史事實是秦始皇統一了中國， 設置了皇權專制的制度。儘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卻延續了二千年。歷代都根據前朝的經驗教訓有所增補、完善，以鞏固皇朝統治，從儒、法學說中各取所需，但萬變不離其宗， 皇權專制的核心日益堅硬（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革命領袖還以讚賞的口氣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乾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認為礙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論都給刪掉了。古禮「刑不上大夫」還為士大夫留一點臉面，到「大明王朝」實行「廷杖」，大臣可以隨時被「揪出來」， 當場按倒在地打板子，從此「士」不復有任何尊嚴。（順便提到：明太祖登基於 1368 年，正是歐洲文藝復興，走出中世紀之始）。及至清朝，大興文字獄，流毒綿長。這樣的「文化」，從哪裏孕育出保障人權的民主制度？

這一皇朝專制連同與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農耕社會達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發達的遊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後，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設計周到、精緻而堅韌，也就更難突破。所以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外來力量的殘酷衝擊下，才出現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才撕開了裂口，現代的平等自由思想、憲政、民主制度就是通過這個裂口從外面傳進來的，這一事實毋庸諱言，也無需諱言。既然承認其原則的普適性，那就是「聞道有先後」而已。在這點上用不着恥於向外人學習。老革命們常掛在嘴邊的「老祖宗」馬克思難道不是歐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為代表的「五四」以後的新文藝是晚清民初開動的「啟蒙」的結果，反過來，也構成「啟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為經典，正是由於其普遍的典型意義。那種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 今天的年輕人很難體會了。《家》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其中所描繪的偽善和非人道，那一個個為舊禮教所摧殘乃至奪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現實依據，是同代人的共同命運。不理解這種舊文化之頑固和由此生發出的種種反人性的罪惡，也就無法理解那一批原來受過深厚的傳統文化的薰陶而又有機會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的打破枷鎖、衝出牢籠的強烈要求。因此，說舊禮教「吃人」並不為過。而宣揚和維護這舊禮教的頑固勢力衛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為說辭的。在這種背景下，激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順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個

時代多數文藝作品，如曹禺的戲劇，甚至張恨水的言情小說，其總的方向都是反舊禮教、反當權的惡勢力、同情弱者，間接或直接倡導人權的。更不用說魯迅了。

本人並非魯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沒有甚麼研究。不過我始終認為，魯迅在《狂人日記》、《阿 Q 正傳》、《藥》等著作中對國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還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穩了奴隸與求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是他最偉大、最精彩之處。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長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膚之痛的感受，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悲憤極致，心頭滴血之作。揆諸今日之現狀，仍未過時，而且並不僅適用於農民。有人說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傳教士或日本人的影響，如果不是偏見，也是對那個時代的無知。

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思想先驅們都是從外抗強權的訴求中覺悟到必須內圖變革。在謀求變革的過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來自權勢集團的高壓，也來自傳統文化的習慣勢力，以及長期在這種制度和文化統治下的民眾的種種弱點。因而發出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的呼聲，應是題中之義（這與後來我們熟悉的另一種「思想改造」絕不能相提並論）。他們絕不是以國民性和文化為藉口，不要改變制度的「文化決定論」者。相反， 他們的矛頭都指向舊制度和統治者。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訴說淪為異族奴隸之苦時，千萬不要得出還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好」的結論。在魯迅之前，梁啟超有感於國民之種種弱點和衰敗的暮氣，提出「少年中國的國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說》，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確指出國民是由個人組成的，造成民弱、民貧、民無恥的根源在於作為個人的民權無保障。國民求自由的銳氣「一鋤之，三鋤四鋤之，漸萎廢，漸衰頹，漸銷鑠，久之而猛烈沉濃之權利思想，越制而越馴，越衝而越淡， 乃至回復之望絕，而受羈受軛，以為固然……」，造成這種情況，「政府之罪，又烏可逭也」？這就說得很清楚了，使國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責任在於執政者一再打擊和剷除民族的銳氣。因而他大聲疾呼倡導民權思想：「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 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 」要強國必先強民，而強民之道在於倡導和維護民權，這種思想成為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心結，無論是面向知識群的新文藝、新文化運動還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鄉村改良運動，目的都是一個：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爭取平等權利、爭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穩奴隸」。

以上種種都是說明制度與文化的革新是不可分割的，思想、制度、生產力的革新同時或交替進行，在歐洲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表現得最為典型，他們在漫長的歲月中也經歷了許多曲折鬥爭。後發國家就沒有那麼從容的時間，一般都是在外力衝擊下匆匆走上現代化道路的。物質生產、文化與制度的改變不可能配合得那麼適時，因此在轉型期表現出混亂、反復和痛苦，但是並不能以此為藉口得出專制比民主更適合於這些國家的結論。相反，這說明更需要大力進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謂不成熟的民眾不應享有自由權利之說，十九世紀的西方人早有

此說法。例如自由主義大師英國思想家約翰 ・ 穆勒在《論自由》（即嚴復初譯為《群己權界論》一書）中對「四大自由」的內在邏輯做了精闢透徹的論述後，又說，這些自由只適合於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心智已經成熟的「成年人」，兒童當然不合適。還有「那些落後的國家社會，其種族可以視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們的考慮之外」。他所指的當然是當時處於殖民統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沒有包括中國（此書於 1859 年出版，已是鴉片戰爭之後）。那麼我們今天是否承認廣大中國人還處於穆勒所說的「未成熟」狀態，沒有資格當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權利呢？

回頭看一個半世紀的歷程，儘管歷盡艱險，而且走了不少彎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認，我們在文化與制度的革新相互促進的道路上已經走了相當長的路。今天的中國人普遍的思想觀念比之晚清時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民主、人權的訴求也更加自覺，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要歸功百年前敢於偷天火的先行者。我們都是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的受惠者，應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們重複討論的問題，甚至自以為的新見解，其實他們早已思考過，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對於先輩的貢獻我們不能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凡有志於探討今日中國之道路者，首先應該了解一百七十年的近代史，都應虛心、潛心讀一些近代思想先驅的著述，包括他們之間早已進行過的爭議。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談得到進一步的創新。

正如「先富起來」的人有責任以其財富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一樣，先成為「知識分子」，並有機會看世界的幸運兒理應有責任對傳播知識、傳播思想作出貢獻。古今中外總有一些擔負社會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價值恰恰在於超越一己的和某種狹隘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關懷自由、人權、社會正義、全民族的長遠命運。在全球化的今天，還要考慮全人類的命運（如環境保護、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種思想，發表為言論，自然是為了要有聽眾和讀者，也自然會產生影響，這點無需諱言，也不必矯情。否則，媒體、輿論、報刊、書籍以及今天的網絡文化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見當然會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於與斯土斯民血肉相連，設身處地從實情出發，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觀火指手畫腳，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總會有可取之處。我期盼着再出現一次

「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局面，庶幾形成新的一輪思想解放，或「再啟蒙」，從而為千呼萬喚的制度轉型起催生作用。

2008 年

重建精神的家園

——還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2001 年被聯合國定為「不同文明間對話年」。似乎伊朗是這一活動的主角之一，是「對話年」的發起國。在 2000 年 9 月的「文明對話會議」上伊朗總統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21]作主要發言，有一句話頗有警世的味道：「一個徹頭徹尾為政治、軍事、經濟條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環境，摧毀一切精神和藝術的家園……使人的心靈無所依歸。」這一倡議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和意義，以及伊朗領導人的意圖，不是本文的關注點。它引發我深思的是：歐美人認同基督教文明，西亞北非許多民族以伊斯蘭文明為旗幟，作為世界公認的幾大文明體系之一的中華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義？真的，今天我國在世界上能自稱代表甚麼樣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舉世矚目，軍事也列入核大國。精神卻遇到了危機，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問題。作為一種主流的社會傾向，重器物輕精神之風達到高峰。從歷史上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國只重文。風光一時，名傳青史的率多是不事家人生產的文人，那些為建設物質文明作出偉大貢獻的被列入工匠，除個別例外，其名與學都不傳。後來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虧，先進人士大力提倡學習聲、光、化、電，在船堅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這追趕過程中全社會重理工輕人文之風逐漸形成。1949 年以後，由於意識形態原因，這一趨勢更走向極端。高校院系調整明顯地發展工科，壓縮文科（為方便計，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與社會科學）。「文革」中，在大學幾乎停辦的關鍵時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學還是要辦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學」，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今天，知識及其「分子」理論上得到重視，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告別了反對一切「物質刺激」，單憑對一個人一種思想的忠誠枵腹從公的年月， 卻跳到了登峰造極的「物質主義」，一切都納入商品經濟，包括本屬於精神領域的事物，只有賺錢的功能才被承認。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被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學教授朋友曾告訴筆者：他參加了一次文科教學會議，主持會議的一位教育界負責人指示：「人文要為科技發展服務，沒有用的東西少教點！」他只有苦笑。那位負責人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甚麼用？」是最常聽到的問話。而所謂「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質或政治效應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內容都該取消，或作牽強附會的改造。如今，國人對於器物方面的發展，瞄準「國際」，緊追慢趕，全民投入，義無反顧；而在精神上卻空前迷茫，無所適從，仍然徘徊於自大與自卑之間，反對「西化」仍是重要口號。但是經歷了大張旗鼓的「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的中國文化和一代新人，用甚麼去抵擋

「西化」（姑不論其含義是甚麼），又用甚麼載體去承載、挑選和吸收外來文化？

與此並存的是另一極端：動輒以「五千年文明」自詡。既認為文史哲無用，又以文明古國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實際上中國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輝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諸子的哲學思想。那時皇權還沒有完備到能夠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時期。斯時也，真是群星燦爛，思想活躍而豐富，千載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過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邊，還是從實用主義出發，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後，作為一種替代。偶然在電視新聞中看到我國一位外交官在挫敗了西方國家提出的有貶損我國政府內容的「人權」決議案後，得意地對記者說，我們五千年就這麼走過來的，我們還要走下去，你們有甚麼資格教訓我們！「五千年」在這裏是最典型、最方便的用法。對此，我第一個閃過的想法是，那麼，你把近一百五十年來仁人志士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事業置於何地？特別是涉及人權，能沿着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嗎？當然， 外交官的即興發言不必深究，舉此例只是說明一種對待歷史文明的實用態度。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尊孔之風在我國盛行一時，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反對「西化」是其政治層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於人欲橫流，見利忘義，世風日下，想從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夫子遺訓中找出路。誠然，載入經典的學說和倫理道德規範支撐了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也曾經造就足為全民風範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則，然後對老百姓產生無形的影響，就像風過處草向一個方向低頭一樣。其實這種教化的程序 ——由社會精英倡導某種思想和價值觀，然後傳播開來 ——是文明傳播的普遍規律，中外皆然。不過在中國不太成功。一是中國太大，教育又從未普及，而且歷代實行的是愚民政策，從未讓老百姓知其所以然； 二是聖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現實的強制力量；三是在中國君主專制，等級森嚴的社會裏，知識和道德行為都是有等級的，所謂「禮不下庶人」。類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的禮教對經常被迫賣兒鬻女典妻的貧苦百姓來說是一種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餓死或自殺。所以作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從來不曾如想像中那樣為一般草民所實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權位合而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國之權的在位者同時也是載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則，而且致力於對子民「齊之以德」。然而在漫長的歷史中，多數情況下權勢與道德是分裂的， 而且堅守道德規範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貧，往往還要受權勢的壓制、迫害直至身首異處。能使小人隨之而「偃」的「風」常與聖人之道相背。對絕大多數為文盲的中國農民來說，約束他們的行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二是官府的強制和各種因果報應之說（可能佛教的小乘更有影響）；三是以各種欺騙手段應付官府，連神也可以賄賂。在特別暴虐的統治下忍無可忍時則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若成而為王，改朝換代，統治與「教化」脫節的情況依然如故。

深究起來，當前流行的許多對東西文化特徵的說法是經不起事實驗證的。例如說「西方主縱欲，東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質，東方重精神」，「西方重爭鬥，東方重和諧」，「西方對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壞環境，東方有『天人合一』思想，因而順應和保護自然」等等。揆諸歷史和現實，這些都值得質疑。（實際上融為一體的，足以與今天統稱為「西方文化」相對的「東方文化」並不存在，所謂「儒家文化圈」連整個東亞也無法涵蓋，所以這裏「東方」只指中國）。應該說，對人的原始「獸性」和物欲進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準則，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標誌，並非哪個民族的特色。強制過分，則扭曲人性；縱欲無度，則社會失序。在這方面中國在兩個極端之間看不出比西方社會處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縱欲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決不亞於任何國家，只是一則比較隱蔽，沒有西方人那麼坦率；二則不平等，一方有無限權利，另一方需盡無限義務。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間決無平等可言。在兩性關係中，單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貞操，而男子，特別是特權階級的男子，卻可以縱情聲色，還傳為佳話。古詩詞中的名篇名句相當多是描寫和美化嫖娼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千古傳誦；宋代大詞人晏殊的「珠玉詞」幾乎全部都是詠宿娼生活的。同性戀也非舶來品，只不過在中國又是以不平等為特點，有一方並非自願，而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這種不平等的權利義務，其內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因勢而異，因人而異，其實帶有很大的虛偽性。所以歷代「奸臣」往往得逞而「忠臣」並沒有保障，率多下場不妙。歷代都宣揚「清官」，正因為物以稀為貴。事實上「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才是常規。總之，今天的世風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現代化的產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氣候條件下的肆虐。只要正視一下中國歷代連綿不斷的以各種名義進行的戰爭、殺戮、慘不忍睹的酷刑和兇殘的民俗、青山綠水變禿嶺黃沙的歷史，以及今天在世界各國大力保護環境、保護古蹟文物之時，我國每天都在發生的，法律禁令為之束手的、成批量的自毀家園、消滅歷史的行動，就很難自我陶醉於一片田園詩般的以「和諧」為特徵的「東方文化」之中。當然，「文革」時期達到高潮的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以極為狹隘實用的「政治」劃線代替一切是非善惡標準，以及與現實背道而馳的極端虛偽的說教，更對全民的道德素養和精神依託起了致命的摧毀作用，以至後來一旦失控，出現的是大規模無節制的不擇手段地滿足一己的貪欲。今天舉目望一望握有左右社會之「風」的手段的各色「君子」，再看看應受教化的基層「草民」的現狀，而欲從「克己復禮」中求精神文明，可乎？

百餘年來議論不休的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實際就是如何對待西方的衝擊和影響。從晚清以來，「西學東漸」的過程與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學」當然應該包括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源遠流長的西方文化的產物，而且只能在歐洲產生。在這過程中，中國人對西方或主動學習，或被動接受影響，同時也不斷予以抵制，只不過不同的社會群體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塵，走了長長的一條彎路。無數仁人志士、睿智先賢，以其真知灼見把認識一步一步向前

推進，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導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一針見血地刺到了中國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華，從舊文化脫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 沿着這一方向走下去，揚棄和吸收的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解決。但是在「五四」以後中國的多難而曲折的現實中，真是「道路阻且長」！今天，中國最缺甚麼，最需要甚麼，推甚麼陳，出甚麼新？筆者思前想後，不怕重複老生常談，方今欲重建我中華民族精神的家園，還是得回過頭來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

關於「五四」精神，八十年來海內海外已有無數論著掰開揉碎，翻來復去討論，然而至今話題常新，因為一聯繫實踐就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本文要強調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所體現的人文精神，也是筆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在發展到爛熟以後特別缺乏的部分。鑒於時下較多見的對科學和民主的皮相的理解，我有時想，是否「五四」還缺一個「人」字頭的口號 —「人本」、「人道」或「人文」？這正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精髓。細想之下，又覺得這是多餘的。因為如果正確地、全面地實施科學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貫徹其中。問題恰恰在於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見的一種是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科技」已經約定俗成，導致今日的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至於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種精神，貫穿於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之中。二者都是「人本」的產物，植根於每個人平等的自由意志和對這種意志的尊重，因此「個性解放」也是「五四」時期所大力倡導的內容。由此反觀中國歷史，表面上，古之「士」與今之「商」易位， 從只重文的極端跳到只見利的極端。但究其實質，兩個極端所缺的是同樣的東西：即超越急功近利的目標的求知求真精神， 以及鼓勵這種精神使思想得以盡情馳騁的社會氛圍。古之「士」之所以地位高，端在於與「仕」相通，所以科場失意的白頭童生學問再大也是沒有地位的，而且也真的無所用其學。「學問」的價值就在於「經世致用」，實際是給皇帝出謀劃策，得到採納了才會有用。古來的大知識分子一生中從未做過官的極少，如後漢書〈逸民傳〉中那些刻意避世的隱逸之士是特例，所以才專門為之立傳，他們保持了自己一小方精神獨立的天地，也就真的「沒有用」了，對當代和後世都無貢獻。而一旦做官，則盡入彀中，當然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中國傳統的「士」那裏，好像獨立和有用是矛盾的。幸虧古之「士」多數宦途不順，失意的時候居多，我們才有了這樣燦爛的文學藝術遺產。

我們至今為四大發明而自豪，還有古代諸多精湛技術的創造。中國人數學也不落後，中國人如果鑽研科學，其能力決不亞於西方人，現在仍然如此，這已無需證實。但是近古之後，在西學東漸之前，中國科學不發達也是無須證實的事實。在幾千年歷史的長河中當然可以找出閃爍的發明的火花。但是沒有成氣候，沒有突破性的發展。古代中國的哲人不能說沒有對宇宙奧秘的好奇和探索，只不過在百家爭鳴中能成為顯學的還是與政治文化有關的學說，主要是儒與法兩家（漢武帝以後雖然號

稱獨尊儒家，事實上歷代統治者在實踐中都是儒法兼用的）。不用等到秦漢，就在戰國後期，先哲那種「究天人之際」的氣度已經為高度實用的「縱橫學」所掩蓋。當時走紅的知識精英是蘇秦、張儀之流。他們與同時代的策士們奔走於七國之間，憑三寸不爛之舌向在位者兜售他們的謀略。他們已經沒有理想、真理的追求，而是像兜售貨物那樣備有幾套方案， 王道不售就來霸道，還總有「上、中、下」三策供選擇。古希臘人的「特洛伊木馬計」比起孫子兵法和戰國的縱橫學只能算小兒科。至今在西方詞典中作為權術同義詞的「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其代表作《君主論》（The Prince）要到 1513 年才出現，那已是明正德年間了（當然《君主論》的意義決不止於權術）。他們的思維的路數其實與幾何學推理有相同之處。與我國戰國時期差不多同時（公元前 300 – 200 年間），古希臘數學家輩出。其意義不僅在於數學的發達，而是形成一代風氣， 對求知的迷戀。筆者從明朝方孝孺和意大利布魯諾的慘死中得到很大啟發，並曾以他們各自所殉的「道」有天壤之別，為文述中西歷史不同的軌跡（詳見〈方孝孺與布魯諾〉一文，本書133 頁）。

再進一步說，今天中國的網絡英雄輩出，在短短幾年中也可以與西方試比高。但是計算機、網絡、軟件業、「數字經濟」這種帶有里程碑性質的新事物、新觀念為甚麼不首先於中國生產？為甚麼總是在人家先發明之後，我們再急起直追？以後人家說不定又出甚麼新花樣，我們又只得緊追下去。為甚麼？實際缺乏的還是一種看似抽象的精神。比爾 • 蓋茨今天在中國青年中是英雄、偶像，但是人們在欽羡其積累財富的能力時是否想到他當初首先是出於對電腦的着迷，是一種執着的探索的興趣，發財只是其結果。這種純粹出於興趣的探索精神與阿幾米德對數學物理的着迷是一脈相承的。原創性的科學發明和理論的創造依賴的是這種精神。以這種精神而有所發明的人可稱為天才，他們創造出某種新的理念（包括自然科學和哲學），然後在實用層面分為兩支，一用於改造自然，一用於改造社會，亦即技術與實用型的社會科學。如果捨去作為源頭的精神而只追求後面的分支，則我們不免永遠被動地追趕他人的腳印。

華夏文明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相當成熟，而且的確博大輝煌。但是過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結果多的是處理社會人際關係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我們以五千年光輝文明自豪，其實有原創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諸子，由於他們享有後世所沒有的思想和行動自由，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卻都被後世統治者取其所需「活學活用」。一代一代的大儒在注六經中殫思竭慮，而先秦其他諸子卻一直沒有機會得到充分理解和發揮。所以如果吃老本，我們的思想資源也還遠沒有用盡。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的斷裂從「五四」運動開始， 今日的文化危機應歸罪於當時對傳統的批判過於激烈，並以之與後來的一浪高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時達到高潮的「與傳統徹底決裂」相提並論。此說大謬。「五四」的爭論中每一個人的言論都可能有過激或欠嚴謹之處，但是這裏談的是一種籠統的精神，它與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的「批判」實難相提並論。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而是本質不同，方向相反。事實上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

以及對國民劣根性痛加撻伐的魯迅等人都是國學修養極深，對傳統文化有深刻理解的飽學之士。他們決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正因為是從傳統文化的薰陶中走出來的，更加深知其弊。他們要掙脫的是已經被推向極至的，達到荒謬程度的「道統」，是在孔孟之教的名義下所實行的摧殘人性、禁錮思想的禮教和偽善的倫理綱常。由於這種「道統」是熔化在政治文化中，與權勢相結合，具有極大的頑固性，而他們這批學人則既無權勢又手無寸鐵，所以需要以鮮明的、激進的姿態對舊勢力予以衝擊，以振聾發聵的口號喚起處於麻木狀態的民眾，「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由此而來（這個口號並非如流傳那樣出自胡適之口，而是名吳虞者）。他們並不是吊在半空中，而是立足於深厚的文化沃土上，因而對外來文化能直入核心，擷其精華，消化、吐納。對於長期在專制統治下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的民眾，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立足於啟蒙教育，是開啟民智。無論如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不可沒，否則連我們今天這點思想現代化都達不到。這種精神經受住了中國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難的歷史考驗，其中最嚴峻的是抗日戰爭。在那民族危亡之秋，於極度險惡和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新舊文化結合最優秀的品格顯出了它的力量和韌性，絕大多數知識精英保持了民族氣節，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續，至今我們仍受其惠。而作為這一事業的骨幹的大批教授學者直接間接率多受過「五四」精神的洗禮。

後之所謂「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則在每一個方面都與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遺產掃蕩乾淨，以便實行在「一切領域內全面專政」。所有口號都是憑權勢的力量自上而下貫徹的，實際上都為當時的高層政治鬥爭服務，與文化無關。例如眾所周知的「批林批孔」鬧劇就是其一。對於民眾則是實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狀態，聽憑一個人或極少數人代替幾億人讀書和思想，令無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順着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達科學、民主，文明進步，毋乃緣木求魚乎！這一切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進行，實則絕非馬克思之過，卻適足以貶損馬克思學說的威望。正因為經歷了後一個「反傳統」，包括五四傳統，遂導致全民精神貧乏，失去依託。這種「否定之否定」，實際上是從未掃清的封建傳統的變相復活，在國門再次打開時面對光怪陸離的外來文化或者饑不擇食，失去選擇和吐納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裏本來是良種如淮南之橘，過了江，很快變質。

更有甚者，今天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所謂西方就是當代美國。美國人當年繼承了歐洲文明的精華，結合新大陸的特點，發揚光大，推陳出新，成就其繁榮富強。今天，不能說美國人的優良精神已經喪失殆盡，否則無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創新能力，並在如此多元化的社會中維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洶湧而來勢不可當的美國文化影響卻率多是為美國人自己和世人所詬病的商業文化墮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說那鋪天蓋地而來的演藝娛樂模式，種種低俗到近於粗野的「審美」情趣，超前消費生活方式，以及「市場專政」帶來的拜金主義，就是學術、教育模式傳入我國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潑的特點和通才教育的傳統，而是納入市場供需，高度實用主義，聽憑市場選擇，服從市場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無幾。再從高層次上講， 開放以來美國的「思想庫」體制

對我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影響甚大。這剛好與我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　也只有向當政者出謀獻策而被採納的學問才算「有用」。有些大學的領導人就是這樣理解文科建設的意義的，「沒有用的少教點」，由此而來。

美國的「思想庫」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國實用與通才教育的消長利弊，筆者另有著述論之，不在本文範圍。至少有一點，他們的實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論自由，多家爭鳴的基礎上的，方面很廣，學派林立，與現行政策相左的論述也可以廣為傳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證明其正確。這一條件在我國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實用層面，「思想庫」的作用也變質為與「注六經」差不多。不過在這一風氣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學而優則仕」的追求。給獨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間就更窄逼了。實際上在反西化的口號下，國人每天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西化，只不過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華拒之門外。在精神層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驅們所擁抱的飽含人文精神的德、賽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正因為當年賢哲們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頭， 是以己之精華接納彼之精華，否則，只能接納彼之末流。

本文所說「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驅」可以理解為一種符號，從廣義而言涵蓋了上自晚清下至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這是一筆極大的精神財富。即使當時不同派別貌似誓不兩立的論戰，其內核也有相通之處，並且體現了思想活躍，言論自由，在總體上有助於學術文化繁榮進步。如果捨棄了這一思想資源，我們的「五千年」與現代就真的失去了連接的紐帶。這裏是作為一種籠統的精神而言，具體到每個人的思想學說，當然是非優劣都可有不同的評判。正因為我們曾有過他國所罕見的特殊的文化斷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強調這一筆精神財富。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權」與「五千年」為例，一百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幾千年統治者對人民的「鞭撻」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說：

……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夫安知乎虐政所從入之門， 乃即外寇所從入門也？

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

《新民說》，〈論權利思想〉

又說：

……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為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

〈論自尊〉

這幾段句句精彩，充滿警句，可惜限於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權思想何等鮮明，何等透徹，對於千百年來中國人民人格之受摧殘何等悲

憤！今天我們重新討論的許多話題，在《新民說》的二十篇中幾乎都有精闢之見。梁任公所論述的民權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觀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意識、權利和義務觀、法治精神，等等。這應該屬於現代社會的「普適性」的價值觀，東方與西方只有發展先後之分，不是「民族特色」問題。常見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語被引用來說明中國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實這與現代的民為國本的思想是有本質的不同的。那個時候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不是作為個人。孟子的主導思想還是維護三綱五常，特別反對楊朱的個人主義，斥之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此處不是要全面討論孟子思想，只是要說明過去帝王及其謀士都講「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為自己的「天下」服務的。「愛民如子」、

「為民作主」，與民是主人、民有權利在觀念上是主次顛倒的。源於西方啟蒙運動的的民權平等思想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種平等的觀念不但中國古代沒有，西方封建社會也沒有，這正是啟蒙思想的產物。所以，從梁啟超上述議論出發， 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國歷史的發展未能如願。事實上，就在「五四」時期，思想和社會的革新已受到內憂外患的干擾。在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中，反帝一直壓倒反封建，那時開始的「啟蒙」始終沒有完成，而且還時有倒退。對於「科學」和「民主」當時就有偏於僅僅從實用層面詮釋的傾向，本應貫徹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發揮，後來就更加得不到注意。這在當時是客觀形勢所迫，越到後來則主觀因素越重要，因為反帝是對外，而反封建則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層次的，特別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遠。

西方的所謂基督教文明如果沒有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就無法直接從中世紀走到現代，也無法繼承發揚古希臘文明的光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從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後的種種探索也是一種改革和復興的過程。在此之前，我們沒有選擇，泥沙糟粕一齊繼承下來，包袱沉重，步履蹣跚。沒有這一革新，中華古文明再光輝燦爛也無法與現代文明接軌。經過改造以後，豐富的精神遺產就可以再現民族特色。到那時，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蘊、華夏文明特有的宏偉氣度、無與倫比的精緻的審美觀才得以復見於新的民族精神之中。以倫理道德為例，竊以為馮友蘭先生早已提出的並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繼承法」基本上為我們找到了出路。作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領域內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誠實、勤奮、慷慨、仁愛、勇敢、忠誠……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與之相對的例如欺詐、懶惰、殘暴……等等，則是惡行。而通向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則各式各樣，每個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時代填入不同的具體內容。例如前面提到的方孝孺的氣節， 本是中國士大夫最寶貴的美德。把愚忠的內容換成新的原則， 依然是值得大大發揚的正氣和可貴的「傻氣」。如果沒有了這種「氣」，只剩下高度實用，見風使舵，唯利是圖，左右逢源，　其殆矣哉！梁啟超寫《新民說》已經過去百年了，而今日當務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在鑄新民。從學術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設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從魏源到魯迅乃至當代梁漱溟、馮友蘭，等等，都應該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當時

與現在的實用政治的高度加以總結、消化，然後接着走下去。庶幾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時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園。

回過頭來，再借用一百年前嚴復反復強調的觀點：中國之患「尤以癒愚為最急」，「開啟民智」是實現變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啟發人民群眾的覺悟，而不單純是識字、學習技能。覺悟到甚麼呢？最主要的是覺悟到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維護這一權利的手段以及應盡的義務。這種公民思想觀念決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從外部大力灌輸和啟發的。遠的不說，就以近年的天災為例，甚麼時候我們的媒體宣傳重點放在群眾如何組織自救、互救，創造了多少值得推廣的經驗，以及群策群力戰勝災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讓他們一個個對着鏡頭向盡了（或其實未盡）起碼職責的政府和領導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麼梁啟超和嚴復心目中經過脫愚的「新民」庶幾能夠成長起來。這樣的民眾將自覺地保護家園而不是毫無顧忌地毀壞他們並無主人感的家園。

二十一世紀世界將如何發展，實難預料。決不能指望物質的繁榮必然帶來文化的進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異的高科技（這裏「科技」是一體的）如脫韁之馬以加速度向前疾馳不知伊于胡底的情況下，不論是就世界範圍還是一國範圍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過征服自然的能力， 人類心靈是否還能保持對真善美的追求，將決定人類將造福還是嫁禍於自己。二十一世紀以文明間對話開頭，說明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識到這一點。本文開頭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語並不是危言聳聽。其實對話也是一種競爭。各大文明體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機感，也都有人在吶喊、探索。我國在一片喧囂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識有志的中青年做着甘於寂寞的可貴的努力。只不過聲音微弱，猶如優雅的絲竹管弦淹沒在震耳欲聾的酒吧歌舞噪音之中。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文明與野蠻的競賽尚屬勝負未定之秋。

2000 年歲末

男子中心社會的「語境」

幾年前，在國外一家中餐館一次華洋雜處、男女同席的宴會上，話題由中國菜美味說起，有一位美國男士講起那個老掉牙的流傳的說法：住美國房子、吃中國菜、娶日本老婆乃人生最大享受。他問我，中國人是否也有此一說？我說：我倒想知道哪國的丈夫被公認為最好。一言既出，在座女士們為之鼓掌喝彩，說是刺中了「男子沙文主義」的本質。我當然不會有想要「滿世界」挑丈夫之嫌，這句話只不過出於我的平等觀的本能。關於理想的房子、菜肴和妻子這一說法我自少年到老年多次聽說，任他「城頭變幻大王旗」，這一「幸福觀」卻沒有變，內容完全一樣，不分新社會、舊社會，國民黨、共產黨，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東方、西方，竟然有如此的「普世性」， 如此長盛不衰，令人驚歎。這不是男子中心社會的產物又是甚麼？首先，連主詞都沒有，不言而喻，這人生的享受當然屬於男人。妻子與房子並列，同是被享用的物件。為甚麼日本妻子最理想？誰都知道，日本婦女地位低，伺候丈夫最周到，最溫順。所幸這種情況也正在起變化，也許若干時後，這一流行說法會自然消亡。當然，對美國房子、中國菜的評價還是公允的，不過嚮往這種享受的主詞應該包括男女雙方。

甚麼是和美的夫妻關係？中國人都知道「舉案齊眉，相敬如賓」之說。此話我自幼就從小說中知道，在想像中總是梁鴻與孟光兩個人對坐，吃飯前先把杯盤舉起來讓一讓（至於

「案」是甚麼，當時沒有深究）。後見魯迅的《幸福的家庭》中的描述：兩人對着一盤「龍虎鬥」，「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My dear, please.”“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Oh no, please you!”」心想，這大概是中西合璧現代版本的「舉案齊眉」了。及至讀到《後漢書》的《逸民列傳》關於梁鴻的記載，方知這一「佳話」的原委與我原來想像的大不相同：梁鴻隱居於吳時，給一大家當長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原來如此！是孟光每天端了盛滿飯菜的小方案跪在丈夫面前，由於不敢抬頭，才把「案」舉過了眉。敬則敬矣，可完全是單方面的，「相」從何來？誰又是「賓」？書裏沒有提那梁鴻是如何「接過了孟光案」的，（大約連個「謝」字都沒有），只說那主人見一個打工仔能得妻子如此尊敬，定非凡人，就把他的住處從廊下遷到了屋內。所以妻子單方面卑躬屈膝的「敬」，只起了對丈夫人格的陪襯作用。當然，孟光因此跟着搬進了室內住，免遭風露之欺，也算是沾了光。也許梁鴻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他的妻子願意這樣侍奉他，也與他人無關。但是硬把這說成是「相敬如賓」，作為佳話流傳千古，矇騙後人，不得不懷疑始作俑者的動機。梁鴻是由於不願出仕王莽的新朝，決心隱逸，才贏得了志同道合的孟光的敬重，這一層情節早已無人提起，只有妻子這樣每天畢恭畢敬地伺候着，大約才是宣揚這一典故的男人們（肯定是男人）所衷心羡慕的。

還有「怕老婆」的故事，也是貫穿古今中外，為男士們茶餘飯後津

津樂道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帥胡適博士竟也對此加以推崇，令我對他的「新」打了一個折扣。從本質上說，這「怕老婆」的故事只能產生於男子中心社會，首先也是連主詞都省略了，當然是男人。再者，之所以有那麼多肉麻當有趣的故事編出來，正因為此事新鮮，和「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同屬一理。過去，女子在家中受壓迫受虐待是常規，不足為奇，所以沒有「怕老公」的故事。直到現在，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妻子從屬丈夫的家庭仍佔多數，不僅東方國家如此，像美國這樣被認為女權高漲的國家，直到九十年代的社會調查， 女子受男性伴侶的暴力虐待比例還相當高，而且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家庭。當然這種嚴肅的問題就不適合拿來講故事了。

仔細分析那些所謂的「怕」，有各種標準：一種實際是比較平等和互相尊重，但丈夫在同伴中被譏為「怕老婆」，例如我認識一對年輕夫婦，女方要考博士，一段時期中不理家務，暫時由男方主炊，男方的職業在商界，為此經常遭那一圈內人的諷刺，最後反饋到家中，引起夫妻感情破裂。又如趙樹理的小說中的一個情節，某村所有男子都打老婆，習以為常，竟有一人不打，同村人就譏以「怕老婆」。這是某種圈子中特有的輿論壓力。一般說來，文明程度較高的家庭和圈子，這類說法就少些。另一種「怕」是丈夫充分實行男主外、女主內，自己對家事不聞不問，妻子從管家到會計到出納到廚娘到秘書……一概全包，自己回家坐享清福，妻子如有怨氣嘮叨幾句，為圖清靜，不與計較，或作順從狀，對外聲稱「怕老婆」，不亦瀟灑乎！還有的人在外面做了對不起妻子的事，理虧心虛，在家或唯唯諾諾，或下一點廉價的「哄」的功夫，落一個「怕」名。至於古代所謂悍婦、妒婦，包括那位創造了「吃醋」的典故的皇后，無非是要求享有專一的夫妻之情而已，因而不見容於一夫多妻制的時代，被擁有特權的男子們誇大編排出許多故事來。當然也有女方的心態問題，有的妻子自以為大權在握，對丈夫管得緊、叮得緊，外出行程、花錢去向，乃至通信都要過問，在我看，這還是本質上的不平等所造成：一是自己缺乏安全感，似乎丈夫隨時會離去；二是自尋煩惱，試想，如果不是準備以後離婚分家，既然財產是共同的，何必斤斤計較，把會計兼出納的沉重負擔都集於一身？三是互相在心目中的地位不平等，這是最普遍，最主要的：對女方來說，丈夫和家庭是全部寄託，而對男方來說，事業第一，家庭第二，或至少二者並重。這在婦女經濟不獨立，處於依附地位時當然如此，但是現在絕大多數女同胞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怪自己想不開了。

以上所講的大多是過去的，或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觀念，改變需要時間。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很多領域都有長足的進步，惟獨在男女平等的問題上卻反而倒退。姑且不說那些社會醜惡現象，堂而皇之經常出現在電視中的新名詞，如「小妞」、「小秘」之類，含義帶有侮辱性，自不待言，秘書、公關，本是正當職業，男女都有，為甚麼要加上「女秘書」、「公關小姐」？「白領」本是外來語，泛指一切非體力勞動的職員， 當然男女都有。到了我們這裏偏要對女職員加上「麗人」的稱號，貌似恭維，實際充分體現了男子中心。這「麗人」是從誰的視角看的？決不會是女職員們自己互相欣賞想出來的。再者，除了演員、模

特等職業需要以貌取人外（男女皆然），在辦公室大家做同樣的工作，憑本事吃飯，與相貌何干？為甚麼沒有「白領俊男」之說呢？現在充斥於電視廣告和某些描寫現代生活的電視劇關於「女人」的角色安排，說到底，主要是取悅或服侍男人，化妝品屬前者，洗衣機、清潔劑等屬後者。有一則廣告宣傳「雙喜臨門」，說妹妹結婚，姐夫中狀元。為甚麼不能是姐姐中狀元，剛好是姐妹雙喜，而一定要拐一個彎到「外姓人」那裏呢？很明顯，在廣告策劃人的心目中，「中狀元」之事不屬於女性的角色。諸如此類觀念的倒退，可能與當前畸形發展的商業文化有關。且不說農村，在我國大城市中，商界與學界對兩性關係的觀念大不相同，許多庸俗乃至粗俗的風氣和語言從商界興起，憑藉金錢的力量擴散到社會。如在大學校園一類的地方，從觀念到實踐，男女平等的程度高於其他圈子。但是在青年一代男性高級知識分子中間似乎觀念反而比上一代舊些，他們在擇偶中多半不喜歡高學歷或「事業型」的女子。究其因，還是希望回家享受被「伺候」的特權。如果說外來影響的話，大約不能怪到西方發達國家頭上。據我了解，美國有法律禁止在招聘職工的條件中公開提出外貌的要求，因為這帶有潛在的「性騷擾」心態。這是六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爭取到的成果之一。

其實，男女平等的含義很簡單，就是把女人首先作為獨立的「人」來對待，處以平常心，不必處處突出一個「女」字。去年新一屆政府成立時，電視播放新任部長的訪談錄，一位女部長在回答記者問中表示反對「女強人」之說，甚得我心。我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女強人」一詞的前提是女人的常規是弱者，所以「強」才作為特例提出。固然，許多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至少在觀念上有一個向甚麼方向推動的問題。我國如此注意「導向」的傳媒，特別是影響面最寬的電視，是否也意識到在這個問題上至少對營造「語境」也存在導向問題呢？

1999 年

五四運動與《列女傳》的聯想

近年來，否定五四運動之說一度風行，似乎主要來自海外。其根據是把「文革」否定一切的帳也算到「五四」頭上， 歸咎於新文化運動反傳統過激，還有人對「科學」、「民主」的口號提出異議。這些筆者都不敢苟同。近日欣見有不少文章力辯把五四運動與「文革」等同之非，說明二者截然相反，所反的「傳統」也決不是一回事，有許多精闢之見，我十分贊同。別的不說，單從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五四運動劃時代的貢獻也是不可抹殺的。因此想起十八年前讀《後漢書》、《列女傳》的感想。

那一年我因動手術住院，忽然想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想當然地認為《後漢書》中一定有《蔡琰傳》，並且一定附《十八拍》，就讓樂民回家去找。待他下次來探視，說有一件事不敢告訴你，怕氣壞了身體，然後在我催促下，故作囁嚅狀說：《後漢書》、《列女傳》的題目中沒有「蔡琰」，只有「董祀妻」，豈不是太豈有此理？而且沒有附《十八拍》。我為之啞然，這是他對我維護男女平等的立場時不時地總要「幽上一默」。這一來，倒引起我對《列女傳》的興趣，出院後就翻出來一讀。不讀猶可，一讀之下真的氣不打一處來。主要還不是因為蔡文姬作為董祀妻出現，那是統一規格，除了個別未嫁女子外，題目一律都是「XX 妻」（有一人是「XX 母」），這且不必計較。主要是那傳主的事跡和入選標準實在是置女子於死地而後已。兩漢四百餘年，中選入傳者統共只有十七人，倒有十人受表彰的主要事跡是自殺或變相送死。且看其死因：

以著名的「曹娥碑」為例，曹娥的父親是「巫祝」（大約相當於現在某些鄉下「跳大繩的」），在一次「溯濤婆娑迎神」中溺水而死。年方十四（虛歲）的女兒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最後投江而死，縣長為之立碑，是為「曹娥碑」。一個未成年的孤女頓然失怙，其絕望無靠可以想像，哀號「旬有七日」而未見有人去勸慰或伸出援助之手（即使有，也未入作傳者的視野），「父母官」不但見死不救，還要樹碑表彰，鼓勵大家都照着做， 真不知是何居心。「曹娥碑」之所以出名，還因為有名人題謎的曲折故事，這種殘酷的「風雅」就不去說它了。

有若干例是夫死堅決不改嫁而自殺的，情況各異，有的是娘家逼嫁，但也有人尚未遭到逼迫，作預防性自殺的。有一人沒有自殺，先把自己耳朵割下以示守寡決心，真是鮮血淋淋， 觸目驚心。還有一位賢惠兒媳因婆婆好飲江水，每天到離家六、七里的江邊去打水，有一次遇風，未能及時回家，渴了婆婆，就被丈夫趕出家門。她寄居鄰家，還鍥而不捨地靠晝夜紡績給婆婆送珍羞，終於感動婆婆，被召回，繼續為滿足老人家喝江水而奮鬥。她自己雖然沒有以身殉，兒子卻因被派去「遠汲」，不幸淹死了。兩口子還向老人隱瞞，說孫子到外地求學去了。這種悖乎人情的行為與「郭巨埋兒」倒是異曲同工。

給我印象最深的最荒唐的「模範事跡」是關於一位「少習儀訓，閑

於婦道」的賢女子，嫁了一個「驕淫輕躁，多行無禮」的丈夫。她的公公責備她沒有盡到「匡夫」的責任，說兒子不改是「新婦之過」。按說「養不教，父之過」，諉過於新媳婦， 就夠不講理的了。那賢媳怎麼辦呢？她想，自己若是規勸丈夫不成功，公公一定責怪自己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設若丈夫居然聽了自己的話改邪歸正，那他就成了「違父而從婦」，也就是媳婦的話比父親的靈，「其罪在彼」。這一下子就把自己推進了一個進退維谷的悖論之中。讀者諸君試替她設身處地想想如何走出這兩難困境呢？出路很簡單，三個字：「乃自殺」（！）這種倫理價值觀和由此產生的思維方式實在是讓人只有死路一條！而這個少婦就憑這一件事「名垂青史」了。

《列女傳》中真正以自己的才學見長，算得上人物的只有蔡文姬和班昭二人。班昭即曹大家（音 gu），以「曹世叔妻」入傳。她佔的篇幅最多，顯然作者對她也最重視。但是讀過《傳》之後卻使我對自幼就心儀的這位亙古大才女失去好感。班昭繼其兄班固續成《漢書》，這一業績名垂千古，是眾所周知的。

《傳》中關於此事卻敍述簡略，只有兩三行。篇幅長在於全文登錄了她所作的七篇《女誡》，這是她病重時留給女兒的遺訓。她在序言中稱，諸女正當出嫁的年齡，卻還沒有教育好，擔心其以後行為有失，「取恥宗室」，所以特意作《女誡》七篇，讓女兒們各寫一通，以此為訓。結果，不但她的女兒，實際上近兩千年全中國的女子都受其誡。所以值得了解一下這「七誡」的內容：

第一「卑弱」：開宗明義說明女人就是「下人」，所以「古禮」生女三日就「臥之床下」，並且「弄之瓦磚」，象徵操勞。為體現「卑弱」，就得「忍辱含垢，常若畏懼」。

第二「夫婦」：明確夫婦關係是夫「禦婦」，婦「事夫」，前者顯示「威儀」，後者屬「義理」。

第三「敬慎」：講「陽剛陰柔」，「男強女弱」之道，既然對方是強者，就只有順着他，所以「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

第四「婦行」：提出婦女的「四德」—— 德、言、容、功。

（千百年來的「三從四德」，原來至少有一半的始作俑者就是曹大家！）。

第五「專心」：反復說明夫可以再娶，婦不能再嫁，「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

第六「曲從」：簡言之就是對公婆絕對服從，說的對，「固宜從令」；說的不對，「猶宜順命」。

第七「和叔妹」：這一段很有意思，不像前六段那麼道貌岸然，而是教女兒如何從策略上討好小叔、小姑，因為人總不能無過，關係搞好了有過錯也可在公婆面前代為遮掩，否則相反，所以與「叔妹」關係處好至關重要，而「求叔妹之心」，還得靠「謙順」。

總之，生為女兒身，只有低頭，低頭，再低頭。實際上曹大家是承

前啟後，總結了本來已在實行的許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把它進一步規範化，以她的身份和聲望，影響不可低估。兩千年來中國婦女基本上是被束縛在這種規範之中的，而從漢朝以後總的趨勢是日見其緊。當然這不是曹大家一人之過，不過她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我沒有遍查二十四史，不敢肯定《後漢書》以後其他史書中是否還有像這樣集中的女子列傳（印象中似乎沒有），至少之前沒有。所以《列女傳》是為後世樹立了一個標準，試觀其人物故事不都是《七誡》的實踐嗎？它也證明，越是認真、忠實地實行這些訓條，就越沒有活路，宜乎其一半以上都以自殺告終。鼓勵這種做法的男子必然殘酷，女子則人性扭曲。所以當時我曾想過，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們會是怎麼樣？如今想到五四，又想起了當年讀《列女傳》時的心境。

五四運動內容非常豐富，它倡導的個性解放是全面的， 不僅限於婦女。當然，這一新思潮不是突然爆發的，實際上從十九世紀末伴隨着西學東漸，各方面風氣漸開，在思想、人才、理論、實踐等方面為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高潮的到來作了準備。不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沒有這樣一批飽學深思，而又堅決徹底反封建的勇士，以如椽之筆衝鋒陷陣，沒有這樣一個群眾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力對幾千年的封建觀念、習俗和頑固勢力給予了致命的衝擊，那堅固深厚的堡壘是很難動搖其根基的（至於徹底摧毀，現在還很難說）。

筆者自己的家庭也有切身體會。先母是世紀同齡人，有幸生長於得風氣之先的江、浙沿海地區，她的父母就比較開通， 使她幼年（辛亥革命之前）免於纏足，能跟着兄長一起讀家塾， 青年剛好趕上「五四」前後，能上「新學堂」，學習現代科學知識，而且婚姻自主。儘管她最終為家庭而犧牲了自己的事業，　但是那個時代關於婦女獨立、男女平等（還有民主、科學）的觀念在她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貫穿在日常言行和對人對事的態度中，使我們姐妹無形中身受其益。我常覺得，在某些基本觀念上，她在九十高齡時比當代有些青年人還要「新」。例如如果晚輩女孩子中有「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思想，她一定本能地認為這孩子「沒出息」；對於男青年擇偶不願要學歷高的，她也頗不以為然。女孩子應該和男孩子一樣讀書、立業， 對她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不僅是她個人，我兒時所接觸到的長輩中「知書達理」的婦女，即使自己沒有機會上學，大多認同這樣的觀點，或至少有這樣的嚮往。對照上述「女誡」中所宣揚的倫理觀，再對照當前在市場經濟新的條件下在婦女觀念上又沉渣泛起，以新的形式宣揚或實行種種倒退、腐朽觀念的現象（幾年前筆者曾就此問題發表過文章，此處不重複），更令人感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之可貴，其反封建、反傳統，功不可沒，而在很多方面要實現「五四」先驅們為之大聲疾呼的理想，還是「同志仍須努力」的。

本人無意做整個五四運動的大文章。只是從婦女恢復「人」的地位這一點上，可以肯定，無「五四」，無以有今天！

1998 年，「五四」前夕

描述

[←1]

編按：梁效是「兩校」的諧音，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

[←2]

蘇聯「解凍文學」中一部小說《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中的人物，一個敢於不顧壓力與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女青年。

[←3]

編按：曹州教案發生於 1897 年（光緒二十三年），兩名傳教士，能方濟和韓理加在張家莊留宿時殺死。

[←4]

編按：載漪（1856–1922），38 歲襲封端郡王。義和團事變禍首之一。

[←5]

編按：剛毅（1837–1900），晚清大臣。他曾監斬戊戌政變的戊戌六君子，並曾統率義和團。

[←6]

編按：周有光（1906 –2017）是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他年輕時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1955 年開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一直致力於中國大陸的語文改革。晚年關注中西文化和人類文明，多有著述。2013 年出版了全集共 15 卷。

[←7]

這部分有關數字大多引自《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梁碧瑩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年。

[←8]

邵燕祥曾為文詳細摘錄朱元璋所刪《孟子》的章節。廢孟子配享孔廟一事因有大臣力諫而未果。

[←9]

嚴復晚年的轉向遭人詬病，但他前期對啟蒙的貢獻和精闢言論不可抹殺。

[←10]

詳見《科學文化評論》2010，第 2 期，113 頁。

[←11]

詳見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終結〉。

[←12]

韋棣華女士（1861–1931）生於美國，1899 年到中國文華學院任英語教師，並兼管圖書館工作。她致力發展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創設圖書館學科，是近代新圖書館運動的倡導者。

[←13]

本文原載《國家人文歷史》百期紀念專輯 2014 年第 4 期

[←14]

本文根據在《南方周末》1000 期慶祝會上講話補充修改

[←15]

《美國新聞史 ——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美】邁克爾・埃默里，愛德溫・埃默里著，展江、殷文主譯，新華出版社，2001 年 9 月出版，第 18 –19 頁。

[←16]

編按：「天京事變」是 1856 年在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發生的太平天國領導層的嚴重內訌。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及燕王秦日綱在此事件中被殺。

[←17]

編按：2016 年春節期間，網上流傳「上海女孩因年夜飯跟江西男友分手」，原因是城鄉差異、貧富差距。

[←18]

本文乃根據 2014 年 4 月 13 日在南京「親近母語」論壇上的講話增訂和補充。

[←19]

本文按 2013 年 7 月在香港書展上講話修訂。

[←20]

本文為《中國新聞周刊》600 期專刊約稿

[←21]

哈塔米為伊朗改革派領袖，於 1997 當選總統 2005 年下台。他執政期間進行務實外交，倡導文明對話，開啟了伊朗外交新局面。